

緬甸的變臉

一個由血、
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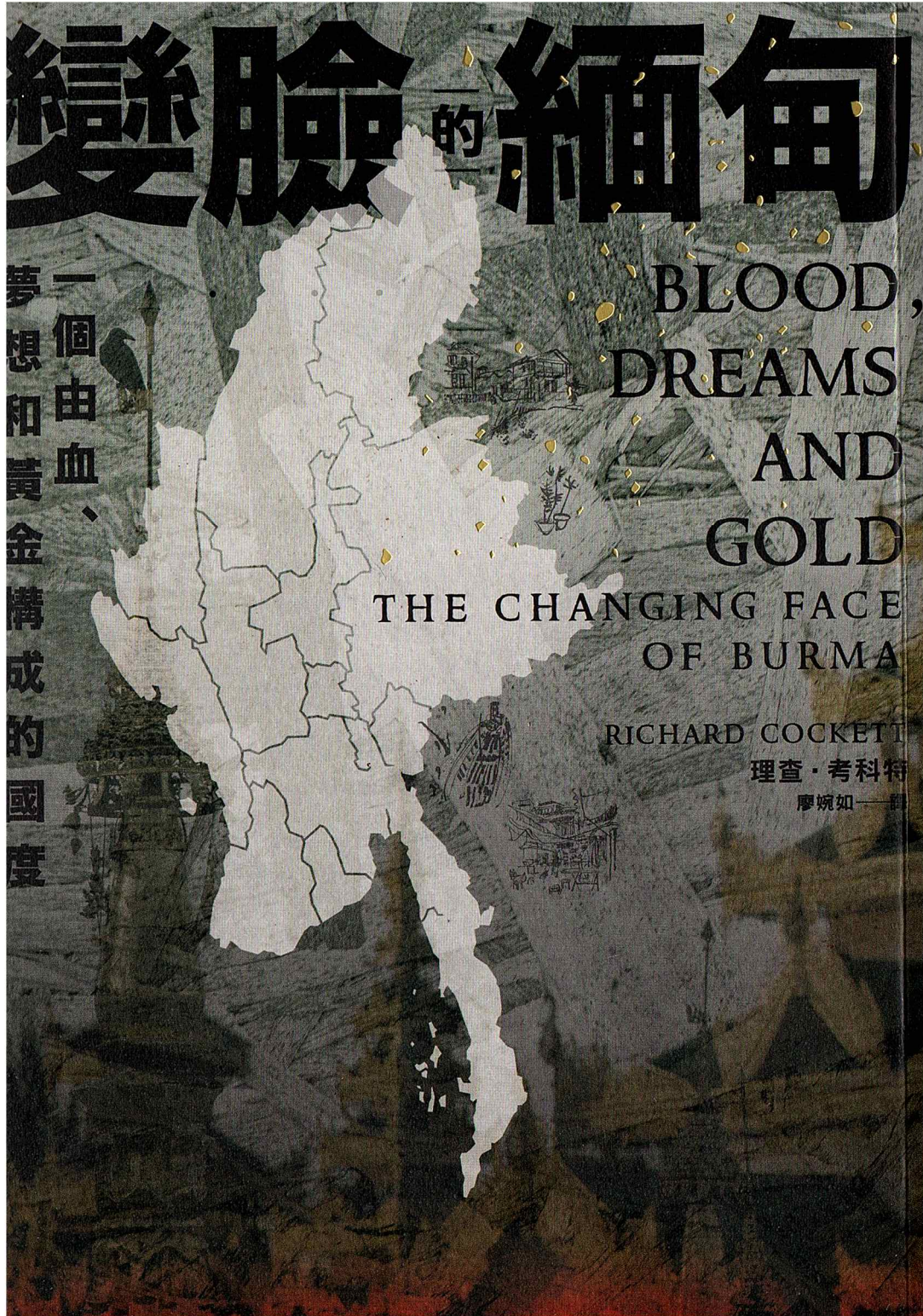
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

RICHARD COCKETT

理查·考科特

廖婉如——譯



變臉 的 緬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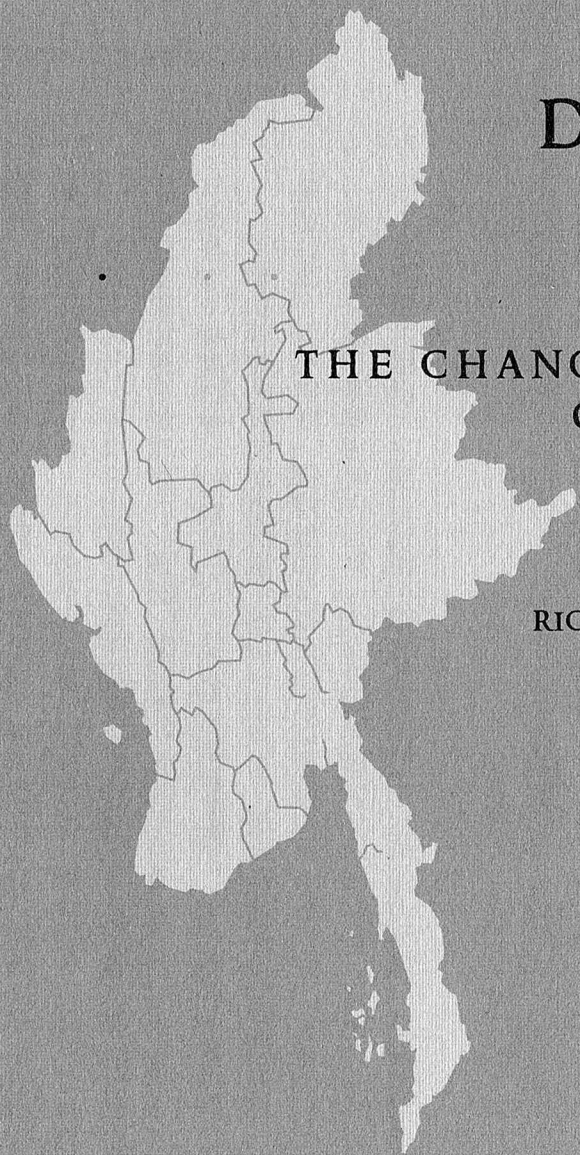
一個由血、夢想
和黃金構成的國度

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

RICHARD COCKETT

理查·考科特

廖婉如——譯



推薦序

不斷在變臉中的緬甸

張翠容

我們留意緬甸，主要是這個小國有美麗的民主女神翁山蘇姬，全球焦點放在她身上，她的一舉一動是國際媒體追訪的目標。大家認識的緬甸，它的過去、現在、未來就好像只圍著翁山蘇姬而來，或許再加一點點她的父親昂山將軍那段由他牽頭的獨立運動悲壯歷史。

英雄做時勢，時勢也做英雄；緬甸一路走來，都展現出不同的歷史時勢，從內到外之間的互動過程，複雜多變，但讀者往往只能靠媒體對某國、某地做出某些新聞性的描述，浮光掠影，在未知全貌下或許有不少疑惑，卻又容易匆匆下判斷。

去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當緬甸舉行第一次民主大選後，翁山蘇姬雖不能登上總統寶座，但她逐步掌握實權，正如她所說，她在總統之上。緬甸似乎揭開了歷史新一頁。自由化的緬甸，首先吸引的自然外資，其實早於千禧年軍政府推行開放改革，外資已在覬覦這塊經濟處女地。

我有一位香港工業界朋友要到緬甸投資，爭喝頭啖湯，但又不無憂慮，例如軍人背後的動向、翁山蘇姬地位的穩固性、族群之間的矛盾、各利益團體的角力等等，都影響著緬甸的局勢和發展方向。

換言之，我們關注變臉後的緬甸，特別是翁山蘇姬的變臉，正受國際人權組織的極大非議。要知道，緬甸的穆斯林特別是羅興亞族群受到當地極端佛教徒的打壓。在二十一世紀竟然就在民主緬甸，出現種族隔離政策，在緬甸西部若開邦設有羅興亞族集中營，受隔離的羅興亞族為了自由投奔怒海，翁山蘇姬對此不願置評，但無疑這是民主緬甸一大隱憂甚至恥辱。

原來民主緬甸為我們帶來更多的疑問，緬甸不斷在變臉中。我們不明所以，其實反映了一個翁山蘇姬根本就不能讓我們認識緬甸，而理查·考科特這本《變臉的緬甸》正好為我們填補這個缺口。他是一名記者，不過他更像歷史學家，當他把緬甸不同的面孔放在歷史的脈絡中，便讓我們有恍然大悟之感。

市面上當然有不少有關緬甸的歷史書，大多流於死板沉悶，《變臉的緬甸》卻是一本活歷史，有記者對過去歷史的抽絲剝繭，又有記者在現場的考察記錄，層層緊扣，無論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歷史及新聞事件，都變得突然立體起來，至少可對現狀做出較可靠的分析。

作者對緬甸族群衝突分析得特別透切，湊巧我去年就這個議題也在緬甸做出一些探索。當千禧年緬甸進入緬甸民主轉型之際，軍政府為了對他們執政無能解困，遂轉移大眾的視線，向社會兜售恐懼與仇恨。

在二〇〇七年，緬甸軍政府因取消燃油補貼，導致油價上漲，公車收費漲價，讓生活困苦

的緬甸民眾更陷入困境，引發連場示威，過萬名僧侶加入抗議行動，突然聲勢浩大，被稱為「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最後卻不幸遭血腥鎮壓。大部分示威僧侶不是給逮捕，便是逃亡到泰國去，一片風聲鶴唳。

全緬甸僧侶共五十萬，比四十五萬的軍隊為多，加上僧侶對群眾有感召力，軍方深知不能長期與他們為敵，最後轉為懷柔策略。當被囚禁僧侶陸續獲釋，軍政府向一無所依的僧侶提供援助。在仰光一位曾參加二〇〇七年示威的僧侶向我說，有政府人員遊說他們成立護教組織，政府背後出資，他們護教之餘又可每月領人工，甚具吸引。

因此，自二〇一〇年開始，佛教界護教組織如雨後春筍，最令人觸目的是九六九運動，僧侶被誘導關注緬甸佛教國家的純正性。與此同時，政府不斷散放消息，國內佛教界正面對伊斯蘭的威脅，矛頭直指西部的羅興亞族。

一種陰謀論是這樣說的：根本就沒有羅興亞族，他們其實是從孟加拉非法偷渡到緬甸的孟加拉穆斯林，他們受背後更大勢力指示，編出他們在緬甸的根，目的是要吞併緬甸，消滅佛教。本來要聲討軍政府的僧侶，現在就轉而去護教，眼前有了新的敵人。

另一方面，究其族群矛盾的遠因，亦可追溯至一九二一年的緬甸，仍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當時緬甸原住民在不同的地方，便說著不同的方言，但不表示他們屬於不同民族，只是殖民者硬要以民族把他們分類。換言之，殖民者在緬甸創出了好些民族名稱。

有趣的是，早年在緬甸一帶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在這方面也「貢獻良多」。他們走到偏遠的地方，遇上不一樣長相和口出別的方言的人，便為他們冠名；更甚者如有夫婦來自兩個族群A和B，生出來的子女，傳教士竟視他們為一個新族群叫AB，如此類推，使得緬甸族群變得特別多。當有你與我的分別，紛爭便來了。愈多的分別，紛爭便愈多，團結更渺茫。

換言之英國殖民者走了，留下各民族自相殘殺，這是不少前殖民地的眾生相。在其他處於民主轉型的地区，例如北非和東南亞，先未見民主之利，卻把複雜的內部問題，猶如潘朵拉盒子一打開便無法收拾，最常見的是族群矛盾湧現，宗教派系之間的鬥爭更是棘手。

從緬甸再回看我們，是否有一種可憐身是眼中人之感？那就讓我們好好閱讀這本書、閱讀緬甸。

目次

推薦序	不斷在變臉中的緬甸	張翠容	3
關於地名與人名			9
地圖			12
前言	馬賽克鑲嵌畫一般的緬甸		17
第1部	多元社會及其敵人		
第一章	血、夢想和黃金之城		25
第二章	將軍的復仇		73
第三章	緬族化運動		101
第四章	壓迫與反抗		155
第五章	毒品浩劫		181

第2部 為存續而改革

第六章	一窮二白	209
第七章	本夫人不轉	229
第八章	來自上層的改變	255
第九章	一場全新的地緣政治大競局	281
第十章	緬甸的未來與多元社會的幽靈	303

後記

誌謝

註釋

參考書目

345 337 333 329

關於地名與人名

凡是書寫緬甸的人，無不面臨一個罕見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稱呼這個國家。一九八九年，執政的軍政府正式更改緬甸很多地名，連國名也都改了（把Burma改成Myanmar）。自此混淆叢生，緬甸國內大多數人現在稱自己國家為Myanmar，但是在國外仍以Burma一字為主，尤其是英國和美國。

更改地名是個政治性決策，屬於「緬族化」(Burmanisation)政策的一環，前後的脈絡在第三章有完整的描述。我在內文裡清楚表明我選擇沿用舊名Burma的理由。為求歷史真實性起見，我也用「殖民時期」的舊稱來稱呼那些城鎮和其他地方，當我描寫那時期的情況時。下列是一九八九年更名的八個行政區（共有十四個行政區）^①：

① 編註：今天的緬甸共轄有七個省、七個邦和一個奈比多聯邦特區，七個省的主要人口組成為緬族，七個邦的主要人口組成則是少數民族。七個省分別為伊洛瓦底、勃固、馬圭、曼德勒、實皆、德林達伊、仰光；七個邦分別為欽、克欽、克耶、克因、孟、若開、擘。

欽族 = 卑頗族 = 新福族

Arakan (阿拉坎) 改為 Rakhine (若開)
 Irrawaddy (伊洛瓦底) 改為 Ayeeyarwady (伊洛瓦底)
 Karen (克倫) 改為 Kayin (克因)
 Karenni (克倫尼) 改為 Kayah (克耶)
 Magwe (馬圭) 改為 Magway (馬圭)
 Pegu (佩戈) Bago (勃固)
 Rangoon (仰光) 改為 Yangon (仰光)
 Tenasserim (丹那沙林) 改為 Tanintharyi (德林達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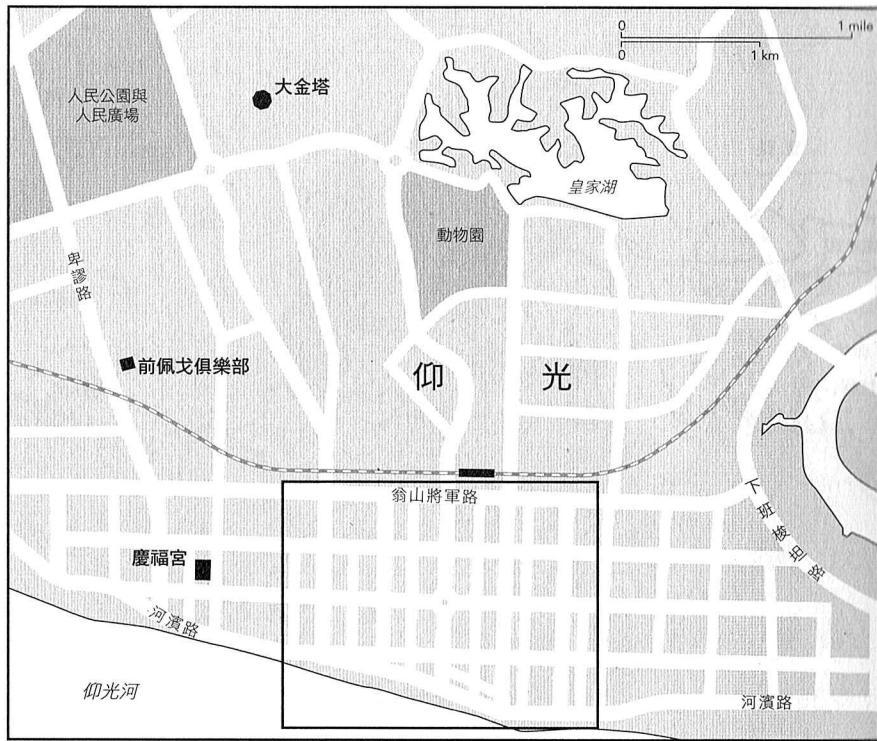
完盡翔實的更名說明，以及緬甸普遍地名命名法的有益介紹，在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4402150947> 及 <http://www.pcgn.org.uk/burma%200907.pdf> 網站可找到。

為了後續可能產生的混淆，在此先行澄清，Burman 一字在此指的是緬甸最大的族裔緬族 (Burmese)。視上下文而定，Burmese 可能是指全體緬甸人 (亦即，緬族以及克欽族 [Kachin]、克倫族 [Karen] 和生活在緬甸的其他一百多個少數民族)，也可能純粹是指緬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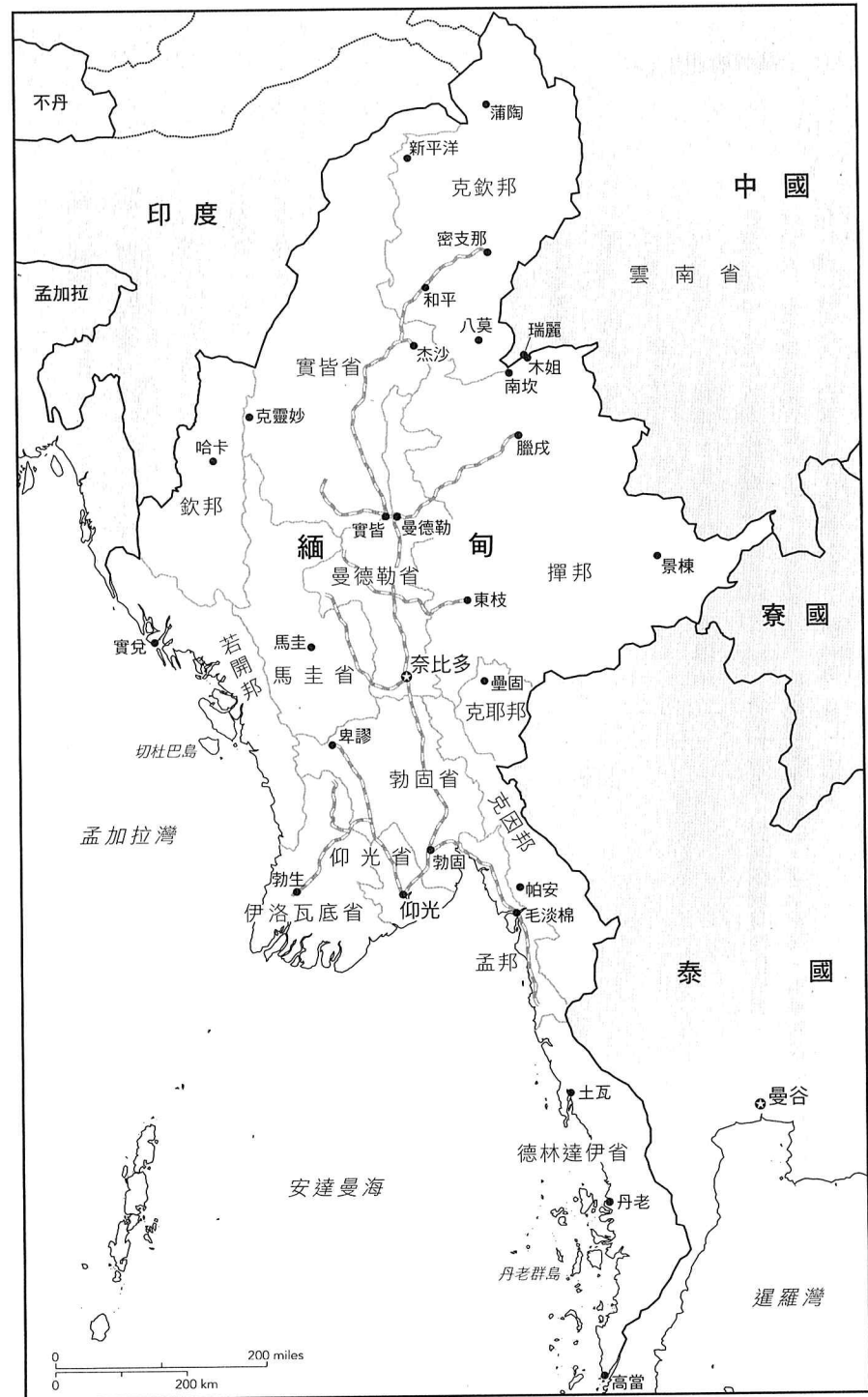
對於習慣西方命名法的人，緬甸人名該如何翻譯也同樣費力。緬甸人名沒有姓氏和名字之分，而是當做一整體來用。敬語也是個問題。緬甸人通常在名字前加一冠稱，男子名最常冠以「吳」(U) 或「貌」·「茂」(Maung)，女子名前常冠以「瑪」(Ma) 或「杜」(Daw) (因此

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常被稱為杜蘇姬)。我沒把這些敬語譯出來，除非不譯會難以指認，譬如說獨立緬甸的首任總理努 (Nu)，通常被稱呼為吳努 (U Nu)。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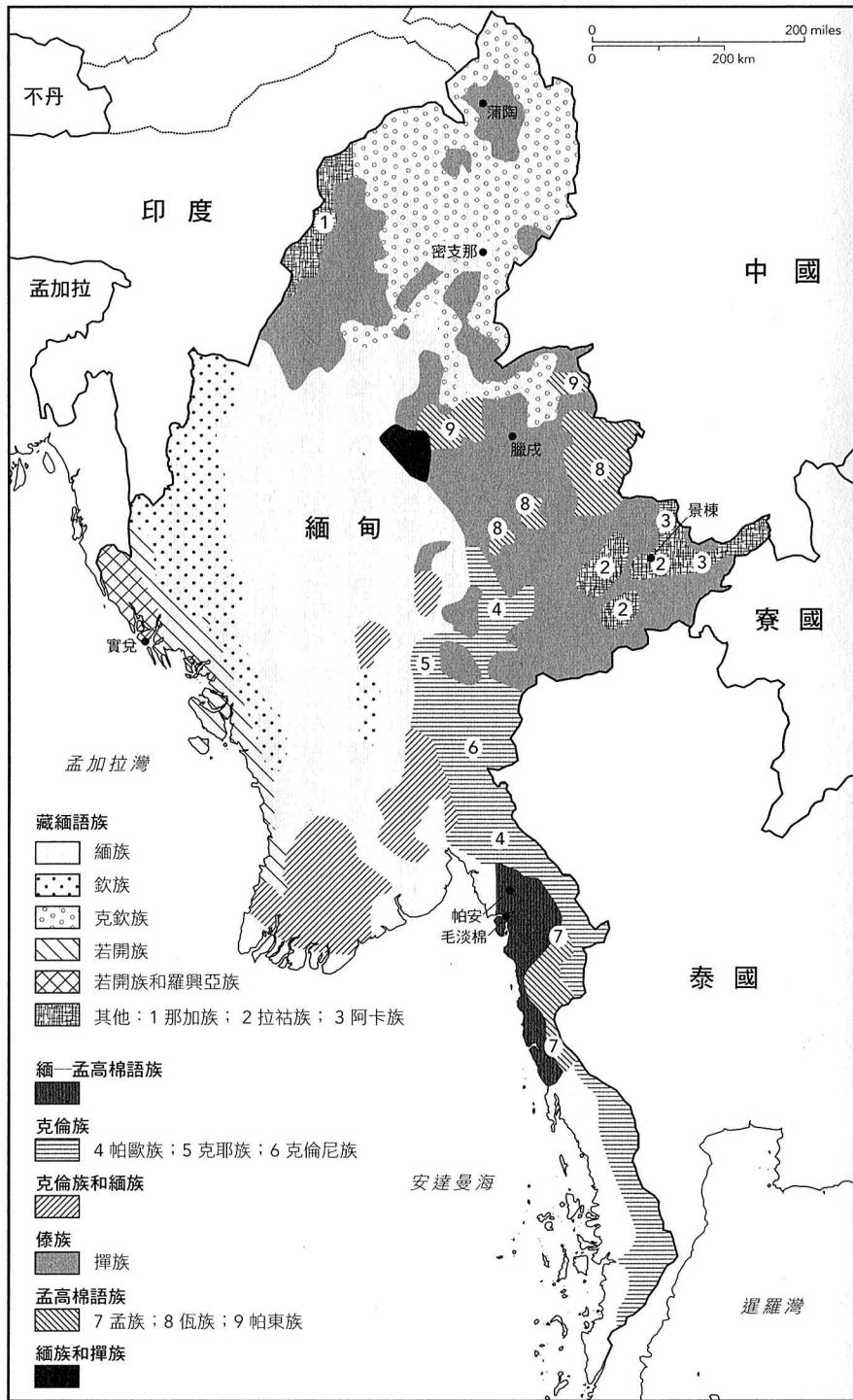
② 譯註：緬甸人會在名字之前加上敬語，以示性別、長幼和尊卑。對長輩或有地位的男人，冠以「吳」，有叔、伯、先生之意；對平輩冠以「哥」(Ko)，有兄輩之意；對晚輩則稱「貌」，意為弟弟。對長輩或有地位的婦女稱「杜」，有姑、姨、孀之意；對晚輩或平輩稱「瑪」，意為姐、妹、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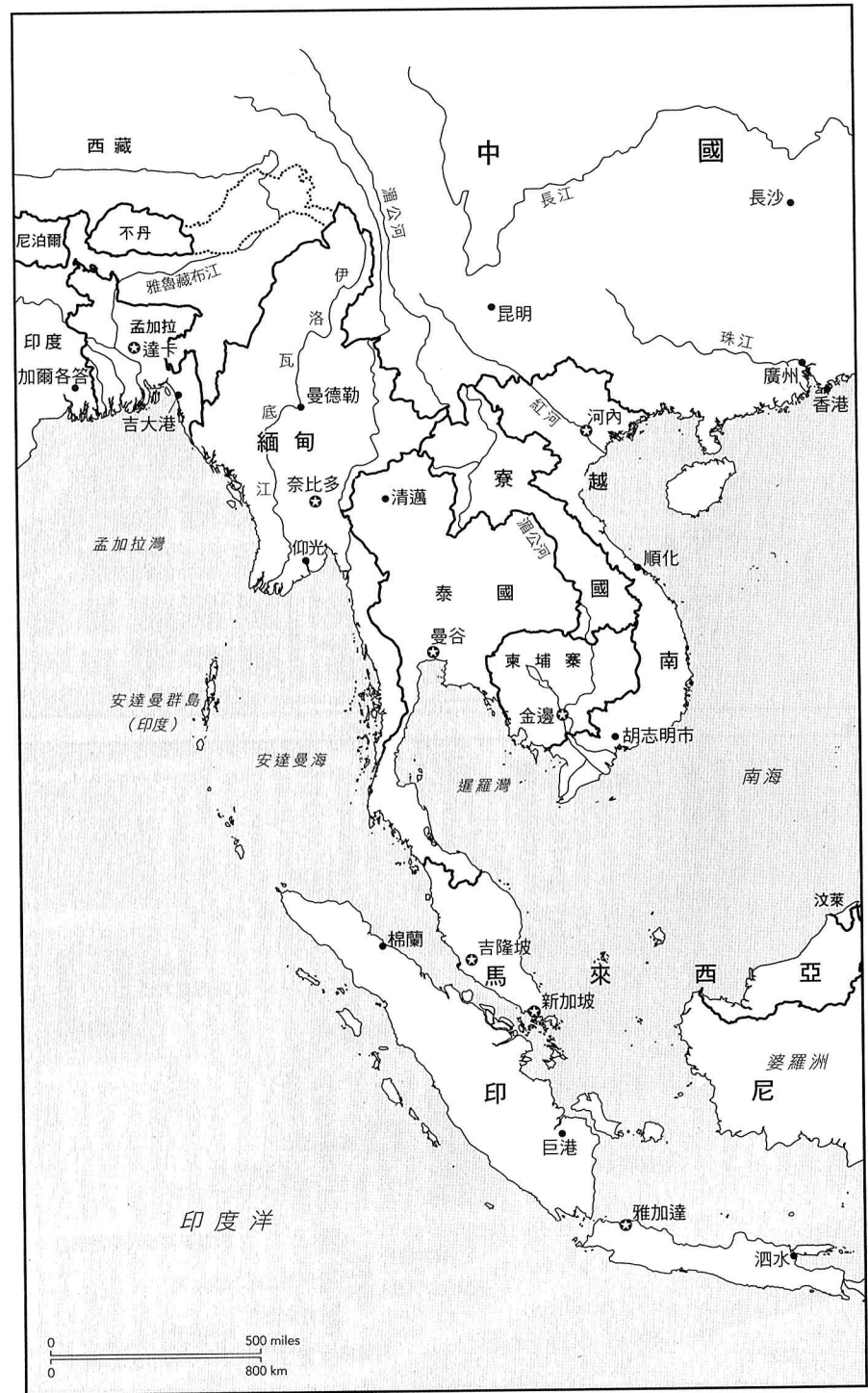
地圖二 殖民時期仰光市中心



地圖一 緬甸全圖



地圖四 緬甸族裔分布



地圖三 緬甸及其鄰國

前言 馬賽克鑲嵌畫一般的緬甸

直到這千禧年的第一個十年尾聲，緬甸近乎遺世獨立。它的孤立令人同情，並不光采；它的領導人作風獨裁，行事隱密，人民處在半封建狀態，極度貧困。放眼鄰國，這國家只能跟人民同樣蒙昧、政權同樣殘暴的北韓相比。這不是一隻亞洲虎，執政將軍們一味忽視過去數十年來讓東南亞脫胎換骨的科技及經濟創新，結果讓這個曾經繁盛一時的壯麗國家江河日下。一個警察國家，監控著衰敗的經濟、普遍的饑荒和關在狗籠裡的政治犯。

這是緬甸的悲哀，而更悲哀的是這樣的發展軌跡不能歸咎於外在情勢。早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西方經濟制裁開始啃噬這個國家之前，緬甸軍政府已經鋪陳一條走向衰亡的道路。沒錯，從一九六二年起統治這國家的將軍們，接收的是一九四〇年代撤離的英國殖民者留下的燙手山芋，但獨立後的新統治者卻讓原本層出不窮的問題更形惡化，讓這國家形同引火自焚。

在這本書裡，我將述說驕傲的帝國子民緬族所建立的王國，如何被一個歐洲帝國羞辱和征

服的始末；殖民主義者如何為了一己私利剝削這片土地；在獨立之後，以將軍為首的政權如何試圖抹去外國勢力入侵的所有痕跡，建造一個他們想像中的純緬族國家。我將指出，荒腔走板的政策如何讓這個國家直到二〇一〇年仍大半處於孤立狀態，以及後來軍政府如何明顯改變路線，令全世界震驚，其中包括釋放了繼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之後世上最出名的政治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最後，我將檢視這些變革，試圖評論它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寫過去，邁向一個現代的亞洲國家。

我將從緬甸的自然地理、城鎮和村落、山川與叢林，以及棲居其中的各色族群來述說這國家的故事。數十年軍事統治切斷了這些族裔及其地域與緬甸其餘地區的往來，更別說與這世界的往來，不過對於在合理限度內想一探究竟的旅人來說，現今這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到得了的。就某方面來說，這是一本當代人類學作品，它重新發掘了在別處幾近消失的生活方式，也重現軍政府試圖趕盡殺絕的許多族裔的遺痕，譬如毛淡棉（Mawlamyine，即 Moulmein）的英緬人（Anglo-Burmans）^①和仰光市區的印度人。這些人韌性堅強，依舊存活下來，想必也在新緬甸的建設貢獻了力量。從這方面來看，在緬甸走訪探究有著渾厚豐碩的觸感，你仍可以親眼看見、親手觸摸到緬甸的活歷史，與之交談。這些都是拼貼緬甸這幅馬賽克鑲嵌畫的一個個閃著晶光的小巧碎片。

坊間當然有很多描寫緬甸的書，有新聞寫實、抒情描述，也有學術文章。本書未了的參考書目列出了其中寫得最出色的，或至少是我認為最受用的。然而這些著作大多數僅只著眼於緬甸政治、歷史、民族誌和文化幾個特定面向，時間框架通常也相當有限，本書嘗試做些突破。我想用一本書的篇幅對當代緬甸做個深入淺出的描述，在歷史和政治的解析當中穿插訪談與報導。必要時，我也說明了書裡引用的論據與數據的出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很高興他們的談話被引述，但我有時不能透露他們的姓名，理由不需贅言。遇上這種情形時，我都會清楚說明。

我以形塑當代緬甸的三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來架構本書的第一部：英國殖民主義、大緬族主義、少數族裔爭取自治的抗爭。這些力量通常激烈碰撞、相互抵觸，震裂了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我從殖民時期的探討著手，並非我認為它必然是緬甸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個面向，而是這個時期的遺跡，仰光市區裡幽森的龐然建築，是來到這法定國都的當代遊客最感震撼的。

本書所持的論點是，除非這三股力量被調和，一個嶄新國家就此從廢墟中崛起，否則緬甸終究無法享有和平繁榮的前景。從整個歷史來看，緬甸做為一個後殖民國家，自始至終從沒步上正軌，從無寧日。在這最深刻的層面上，這國家仍在生死存亡之間掙扎。全體人民能夠回首的黃金年代尚未出現，有的只是一段分崩離析、干戈不息的歷史，而對這段歷史又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緬甸，某人的黃金年代是另一人被打壓的悲慘回憶。

然而這些力量若能調和，報價何其浩大，因為這些相互對抗傾軋的每一股力量，都存有豐碩的商業、智識和文化資本。如果這些力量能夠統整融合，那麼緬甸當可輕易取回從前身為亞

① 編註：專指英國人和緬甸人所生下來的後裔。

洲先進國家之一的地位。就目前來說，它仍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

第一章說明英國在緬甸藉由仰光、毛淡棉和實兌（Stirwe，舊名為阿恰布〔Akyab〕）這幾個舊時沿海的貨物集散地進行殖民統治的基礎和成果。第二章和第三章闡述緬甸獨立、民族主義以及軍政府的崛起，主要聚焦於新首都奈比多（Naypyidaw）以及古皇城曼德勒（Mandalay）。

我把緬甸置於區域脈絡中來看，以顯示它的經歷頗為平常，譬如被殖民以及反抗活動。西方很多人似乎預期，在反對勢力領袖翁山蘇姬的領導下，變革的緬甸肯定會發展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但從區域的共同歷史來看，緬甸比較可能變成像馬來西亞、新加坡或泰國那樣的威權國家，不健全的民主受族群和宗教的政治擺布。緬甸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四章和第五章談的是緬甸眾多的少數民族——有時又稱為「山區民族」（hill people）——的處境。他們主要居住在這國家的邊陲地帶，過去六十年左右都困在與中央低地緬甸的衝突之中，而中央低地的緬甸是最大族群，占全國總人口的六成。第四章談的是克欽邦（Kachin）。第五章原則上是談克倫邦和撣邦（Shan），但也把焦點擺在毒品的蹂躪，以及毒品猖獗如何威脅散居在緬甸東部邊境的所有少數族裔的生活與展望。少數民族和緬甸之間的分裂，始終是這國家當代文化和政治上主要的斷層線，這斷層自獨立以來便一直存在。不僅是因為緬甸軍隊對山區民族的殘暴鎮壓，軍方也藉由持續的戰鬥來合理化它對緬甸各層面的極權控制，以及它對抗議學生和民主人士的壓制。

在第二部「為存續而改革」中，我探討了自從一九八〇年代末全國民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簡稱全民盟）和其他反對團體的崛起，緬甸軍政府面臨的改革壓力。尤其是最後三章，我特地評估了軍政府自二〇一〇年起在政策上的明顯轉向，這試圖回答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那就是經過數十年冷血統治，將軍們為何決定要採行前所未見的深遠改革？短短幾年之內，絕大多數的政治犯獲釋，報業解禁且蓬勃發展，連美國總統也前來訪問。

在最後一章〈緬甸的未來與多元社會的幽靈〉指出，改革初期的樂觀氣息如今正在消退，隨著族群和宗教暴力衝突——昔日緬甸的幽靈——的爆發，民主與現代化歷程面臨脫軌的危險。就某個層面上，對於成千上萬為求改革而飽受牢獄刑求之苦多年的政治活躍分子來說，達到部分民主的新時代是勝利的明證。然而在另一層面上，這國家目前則必須承受始料未及的改革後果。

第 1 部

多元社會及其敵人

第一章 血、夢想和黃金之城

一座宗教古蹟迄今仍盤踞著仰光這個昔日緬甸首都，也是當今第一大城的天際線，以當代亞洲大都市來說絕無僅有。令人眩暈的玻璃帷幕摩天樓早已經征服曼谷、吉隆坡、首爾和新加坡，但是在仰光，金光熠熠九十九公尺高的佛塔仰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依舊吸引從各個最佳視角來的目光。造訪這城市的每個旅行團，都以這裡為起點，假使你在仰光或整個緬甸只打算參觀一座古蹟，非大金塔莫屬。「一個金色的神祕之物自地平線隆起，一個美麗眩目的奇蹟在太陽下閃耀。」大英帝國的桂冠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如此描述他對大金塔的第一印象，該建築至今一如它在吉卜林的年代一樣仍是奇觀。它除了是亞洲最優美的宗教遺址之外，肯定也是最貴重的。大金塔上砌著兩萬兩千塊金板。每座佛塔頂端都有個漸呈尖細的圓錐結構，稱為剎竿（*stupa*）或寶傘，上面通常鑲嵌著寶石，而大金塔上六公尺長的剎竿充滿了傳說，據信剎竿上鑲了八萬五千顆寶石，尖端上是一顆七十六克拉巨鑽。

大金塔約莫建於十五世紀，儘管緬甸人宣稱它有超過兩千年的歷史。不論哪個說法為真，它可不是死氣沉沉的古遺址，被小心維護著只能恭敬地遠觀。恰恰相反，大金塔經常進行修繕保養、重新鍍金並重建，這是一個生機盎然的結構體，依然是緬甸境內非常興盛的南傳佛教的主聖殿。每隔五、六年，佛塔會清出朝聖者和敬拜者貼上的數百萬片金葉。木質的底座會被檢查，必要時也會修繕。刮除的金葉片則鑄成純金佛像。

剝竿也定期更換，只不過間隔的時間長很多。目前的剝竿是第四座，在一九九九年被安放塔頂。前三座被保存於佛塔底部，最古老的兩座放在石墓中，第三座放在金屬和玻璃製的保護櫃裡展示，這是倒數第二任的緬王敏東王（Mindon）^①在一八七一年捐贈給大金塔的。跟老國王一樣，每年成千上萬的佛教徒也會捐獻禮物來妝點剝竿，只不過規模小很多。紅寶石、藍寶石、翠玉和鑽石鑲的戒指、手環、墜子和項鍊，垂掛在剝竿上的小木橇，讓這神聖寶地上方更是閃爍生輝。現今信眾喜歡奉獻珠寶，多少是因為龐大的大金塔建築群裡，已經沒有多餘的空地可以再蓋信眾捐贈的佛塔或亭閣，或安放一尊佛像。大約有一百五十座較小的佛塔和六千尊佛像挨擠在主佛塔周圍。做善事譬如供養大金塔表示虔敬，是祈求人生順遂的一種非常務實的方式，這叫做「積功德」。

^① 編註：敏東王（一八〇八至一八七八年）是貢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的倒數第二任緬王，貢榜王朝覆滅於一八八五年，領土被併入英屬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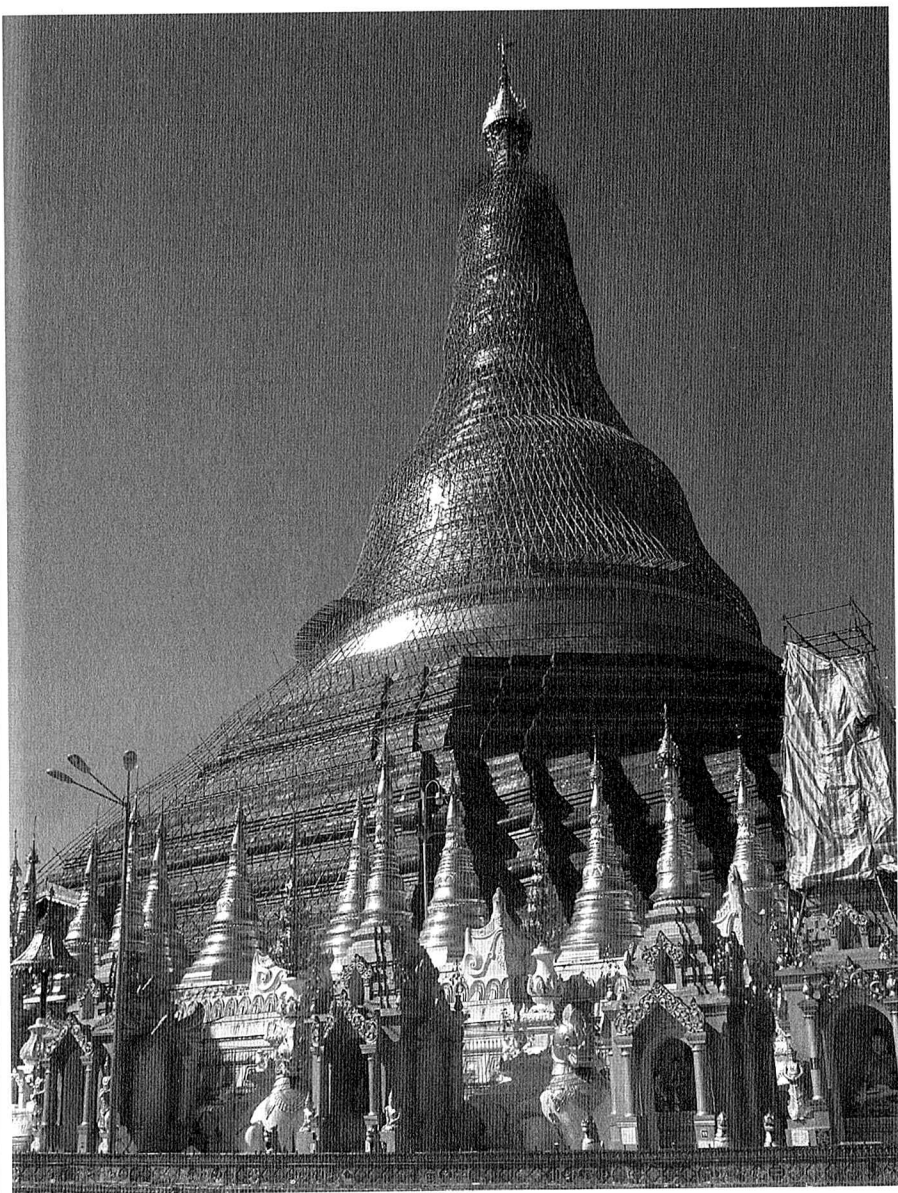


圖1 仰光大金塔，緬甸佛教最知名的象徵，圖中正施作例行的重新鍍金（作者提供）。

大金塔的基底有八個台座，代表一星期的每一天（星期三上午和下午被劃分為兩座）；來到這裡的善信會按自己的出生日找到代表的生肖，在生肖像上澆水慶生。來訪者當中最有名的是翁山蘇姬；她在星期二來到大金塔的一角，就在南門旁邊，輕輕地往一尊獅子澆水。

幸好大金塔自始生機勃勃，除了佛教傳統的要求之外，它歷經多次劫數也總能逢凶化吉。事實上，第一座剎竿是地震震倒的。大金塔也在入侵軍隊掠奪後倖存。英國兵在十九世紀中攻入當時被稱為仰光的都城後，企圖搬走雕刻精美，重達二十四英噸的信古王之鐘（Singu Bell）當戰利品，不料他們要把鐘搬上等候的船時，不小心讓它掉到仰光河裡了。後來緬甸人把那口鐘打撈上來，目前已修復妥善，安放在靠近大金塔的原位。相傳英國拿走了一尊金佛像：願望成真佛（Su Taung Pyay），維多利亞女皇夢到正是那尊佛像讓她犯頭痛，於是下令把祂送回去。佛像一回到仰光，顯然女皇的偏頭痛就好了。

話說回來，儘管大金塔盤踞仰光天際，我們今天所見的這座城市，大半以上一點也不像佛教城，它其實是商業和殖民主義的產物。直到今天，大金塔和西方商貿城這兩個世界，不管在精神上或地理上都形同陌路。由於歷史和政治的變幻無常，它們孤立於各自的世界裡。佛塔和緊鄰的周邊地區被細心養護和裝修，反觀舊殖民城區則大半傾頽荒涼。走到舊碼頭附近，離壯麗幽靜的大金塔不到兩英里，那一帶的仰光破敗骯髒，明顯不討喜。在以前，緬甸導遊不會特地帶遊客進到市中心，他們幾乎一概略過該區歷史，僅集中在大金塔和仰光其他的寺廟和僧院觀光。他們認定這座城市的其餘地區，也就是歐洲人沿著仰光海岸和勃固河岸興建的城區沒什

麼看頭。整體來說，在最近以前，他們的想法是對的。

然而不到一世紀之前，情況完全相反。當時大金塔無疑仍令人讚嘆，即使高傲的英國人也不情願地脫鞋入內，但真正吸引人的是仰光市中心。做為英國殖民時期的緬甸首都，仰光是個繁榮的貿易城，足以跟加爾各答、新加坡、檳城和上海媲美，它是當時東方最現代化、國際性跟令人興奮的城市之一，「頂峰盛世」一如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在一九二七年出任智利駐仰光領事時形容的：「血、夢想和黃金之城」。

如今，雖然經過數十年的朽壞和忽略，舊城區裡仍有夠多的遺址，可供人憑弔這夢想與黃金之城，它曾經吸引了世上無數族裔和宗教來到這狹仄骯髒的街道，快速發展成具有全新社會形態的大都會，當代全球化世界的前身。這就是以仰光做為描述當代緬甸的最佳起始點的理由，因為今天的執政者仍舊與遠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在仰光成形的一切所衍生的後果拚搏，而這後果，直接肇因於英國的殖民統治。

邱吉爾的大冒險

早在十六世紀，歐洲人便開始陸續抵達後來隸屬緬甸的海岸。其中特別是葡萄牙人，在後來數百年間蹂躪緬甸心臟地區的各種占領與收復的爭戰中，偶爾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對緬甸有著最決定性影響的，是最成功的歐洲殖民者——英國人，他們建造了現代城市仰光，最後把這

國家形塑成我們今天所知的模樣。

十九世紀初英國人之所以會被吸引到這個國家來，是因為它靠近英屬印度的地利之便，後來英國人便從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市來掌管這地方。英國人是在十九世紀內分三階段漸進地占領緬甸。英屬印度和緬甸國王在曼德勒城外皇都阿瓦(Ava)王宮裡擺不平的邊界爭端，引發了一八二四年首度也是最重要的一場英緬戰爭。不像當時很多的殖民戰爭，是一支現代的小規模軍隊對上一支中古的龐大軍隊那種勝負立判的一面倒對峙，而是兩大帝國之間，區域裡最軍事化、驍勇善戰的兩股武力之間的正面交鋒。緬甸當時才攻克印度東北的阿薩姆(Assam)和曼尼普爾(Manipur)，再之前則占領了孟加拉灣的阿拉坎獨立王國(現今的若開邦)。屢次勝戰使得緬族危險地逼近大不列顛東方帝國的邊界，豐碩戰果也讓緬族將領對自己的作戰能力和軍隊的神威有無比的信心。他們自信可以打敗英國，就像他們打退阿拉坎、泰國和其他很多軍隊一樣。

最後緬族戰敗，但英軍經歷這兩年的苦戰，也賠上了英國人和印度人共一萬五千條人命，這在當時可是相當龐大的數字，尚有數以萬計的緬族人死亡。英國迫使阿瓦王朝求和，緬族人後續被迫讓出曼尼普爾地區以及剛攻克不久的阿拉坎和丹那沙林半島(當時被稱為德林達伊)地區，那是在安達曼(Andaman)海沿岸往南延伸至泰國西邊，指向現在的馬來西亞的一條狹長土地。因此，英國在緬甸取得了第一個小立足點。位於丹那沙林半島頂端懶洋洋的熱帶小港毛淡棉，成了英屬緬甸的第一個首都。

與阿瓦王朝的貿易爭端，讓英國隨後在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三年之間占領下緬甸(Lower Burma)其餘地區，下緬甸大致上包括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沿海的緬甸以及當時還是小港的仰光及其近郊。仰光最初是十一世紀時孟族人(Mon)建立的漁村，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才被緬族的阿瓦王朝所攻占。

最後，英國在一八八五年對上緬甸(Upper Burma)的緬甸心臟地區發動攻擊，入侵曼德勒，緬族眾多皇都當中最後(也是最後)一個。就像歷史上常見的，這一回，一度叱吒風雲的緬族王朝，其殘存勢力也不得不強權的爭奪及其商業的貪婪下屈服。這是維多利亞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英國不想把上緬甸讓給它最大的敵手法國，當時法國已經入侵印度支那，征服了今天涵蓋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區域。加爾各答和倫敦的政客和官員被仰光商人和金融家所蠱惑，認為唯有攻占上緬甸始能打開通往鄰近中國及其龐大商機的門戶，而那商機，他們宣稱，遠遠超過中古王國。

因此，就如英國強行向中國人傾銷鴉片，引發先前與中國交戰，在一八四二年併吞香港，開啟了中國人所謂的「百年國恥」，眼下與中國有更頻繁商貿往來的前景，也注定了緬甸的命運。就如一位英國商人所言：「在英屬緬甸的商業貿易之外，倘若又加上中國西南和獨立緬甸的整個商貿，可想而知，在大不列顛商人眼裡那是多麼龐大的商機。」仰光的商人也在盤算：「鄰近緬甸的中國省分裡住有將近一億零三百萬的居民，如此龐大的人口幾乎從未被歐洲商貿觸及。」英國人因此得出結論，這是一座寶山，英國人絕不可錯失良機。¹

假使這些是英國動武的真正動機，那麼入侵的藉口則是緬甸末代國王錫袍（Thibaw）的暴虐不仁。錫袍王的父親敏東王是個明君，即使英國帝國主義者在他的王國裡蠶食的面積愈來愈大，他的外交手腕仍堪稱靈活老練。敏東王在位期間總共生下一百一十個孩子，其中有四十八個男丁（外加可能的子嗣），不過他也留下了一個被派系鬥爭撕裂的朝廷。錫袍王在一八七八年繼位後不久，敏東王其餘的子女大多被圍捕入獄。次年二月，為了阻止皇族血脈溢散，他們在數天之內全數被屠殺，不是被絞死就是裹在毛毯裡被亂棒打死。死者當中有三十一人是老國王敏東的兒子。

儘管在阿瓦王朝的歷史記載裡，這類謀殺不是沒有先例，但還是讓英國人和在緬甸的歐洲人義憤填膺。錫袍王矢口否認直接涉案，但是自從屠殺發生後，他的朝廷就被鄙夷為野蠻的巢穴和罪惡的淵藪。錫袍王乖張拙劣的行徑更讓情勢雪上加霜，他對法國人敷衍地獻殷勤，對英國商人要求的通商特許一概拒絕，終究惹惱英國採取行動。

最後在一八八五年下令開戰的是藍道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勳爵，當時的印度事務部大臣。身為第七代馬爾博羅公爵的第三個兒子，他是英國最顯赫的貴族家族的後裔，幾乎和緬王一樣自負、衝動而尊貴。一八八五年，藍道夫·邱吉爾不過三十多歲，但已經是英國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做為激進的托利黨帝國主義者，他逮到機會，抓住了英國與緬甸另一次貿易爭端，派遣在緬甸的地面部隊沿著伊洛瓦底江北上，逼錫袍王就範。和第一次英緬戰爭不一樣，這次是不折不扣一面倒的戰事，緬族軍隊和亨利·普蘭德賈斯特（Henry Prendergast）

將軍率領的一萬名左右，由英國兵和印度兵組成的部隊首次交鋒後便棄械投降。不久，錫袍王被迫流亡印度，於一九一六年在印度過世。這是新形式的強行互換帝王，因為英國早先把蒙兀兒帝國的末代君王巴哈杜·沙·扎法（Bahadur Shah Zafar）放逐至仰光。緬甸的穆斯林每年仍在他的忌日悼念他，他的墓地靠近動物園。

大意入侵上緬甸並推翻原本的君主政體，是藍道夫·邱吉爾勳爵對英屬緬甸的個人貢獻，這全面併吞帶來了長久的反彈。當時的慣常做法是，英國會找當地王公、部落頭目或君侯（maharajah）當代理人來統治帝國，這個體制即後來所謂的「間接管治」，或以當時的說法是「扶植聽命於英國的本土親王」。然而藍道夫·邱吉爾勳爵卻堅決主張全面併吞上緬甸，讓整個國家由英國直接管治。很多英國議員和官員反對這個做法，主要是基於成本考量。藍道夫·邱吉爾勳爵的主子，保守黨出身的首相索爾茲伯里（Salisbury）侯爵，至少也為此發愁，不過最後還是讓邱吉爾一意孤行。

因此，在面對異國入侵之外，緬族人還必須目睹國王被流放，君王政體以及輔佐君王的樞密院（Hindaw）被廢除，維繫皇室王國的其他舊建制和常規大部分被破壞。這徹底壓制他們的君王政體、習俗和認同，反而激起落敗的緬族人憤怒反擊，開始進行等同游擊戰的方式來抵抗英國統治。英國以暴制暴，最後部署了高達四萬人的英印軍團平定了叛亂，只不過要到一八九〇年代中才終於撲滅最後一次的反抗活動。

這一頁的鎮壓史在緬族人心裡留下了苦澀的怨恨，喚起了極其深沉的反英情緒，甚至延續

至四十年後第一代的緬甸獨立運動領袖。緬甸是大英帝國之內出了名的危險地區之一，儘管英國人怪罪於緬族人的天生邪惡和本性不良，但英國人所謂的這種土匪活動，無疑很容易用直白的反英情緒來解釋。君主政體的廢除，也在緬甸民間之中留下了危險的空虛，讓更近代的軍事獨裁者得以趁虛而入。

更糟的是，剛被征服的緬甸並沒有像英國其他屬地那樣成為獨立的殖民地。基於行政的考量，它被納入英屬印度，成為「印度」許多省分之一，受加爾各答（一九一一年之後改為新德里）的總督府管轄。如此一來，曾經不可一世的獨立緬族帝國，淪為另一個帝國的附屬，等於是在軍事的羞辱之上又加了施政的羞辱。就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隸屬印度管轄的緬甸，在社會內部至少造成了至今依然左右著這國家政局的某些致命的緊張和裂隙。這是藍道夫勳爵異想天開的殖民主義的代價，而他的兒子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爵士有朝一日將了然於心。

仰光，其盛況與局勢

在第二次英緬戰爭之後，英屬緬甸的新首都從毛淡棉遷至仰光。殖民建築師在一八五三年嶄新地規劃出一座殖民城市，位處大金塔以南兩英里之處。它在地理上和大金塔周遭古老的緬甸原有文化和新皇城徹底劃分開來，晚至一九二〇年代居民還記得有老虎在分隔這兩個城區的

森林地區徘徊。以較小的司雷寶塔（Sule Pagoda）為中心點的新市區，大體上蓋在仰光河岸的沼澤地上，用從城北挖來的數百萬立方英尺的土來鞏固地基。

遊客今天看到的翁山將軍路（Bogyoke Aung San Road）以南的大部分殖民城，是在一八五三年之後大約九十年期間內建造的。這裡嚴整的棋盤式道路和其餘的城區呈鮮明對比，也許是傲慢的維多利亞人，要把秩序加諸於在他們眼裡邪門迷信的舊社會之上。英國人為了施政蓋的很多精美建築都還在，雖然大多數都處在程度不一的毀朽狀態。最有名的佩戈（Pegu）俱樂部，英國官員與紳士會進來點一杯同名的雞尾酒，打打撞球消遣消遣的去處，如今搖搖欲墜、雜草叢生，只有流浪動物和衣衫襤褸的孩子出沒。然而還是有夠多的昔日遺痕足以讓人一窺仰光在最鼎盛繁榮的時候宏偉迷人的光景。

譬如仍舊占據一整個街廓的政府祕書處，這種龐大的建築體在當時頗為平常。一九四七年緬甸從英國取得獨立前夕，獨立領袖翁山將軍（翁山蘇姬的父親）及其內閣就是在這裡遇刺身亡。自從二〇〇五年整個政府部門遷至新首都奈比多，這棟行政大樓便圍起警戒線封鎖，任其崩塌。仍舊以原初的功能在使用的是高等法院大樓和宏偉的市政廳，就在司雷寶塔對面。上述的行政大樓大部分是英國政府的建築師設計的，其中最有名的是蘇格蘭人約翰·貝格（John Bege），但是市政廳的設計，英國人倒是讓自己稍微享受一下在地風情，把建築合約給了緬甸建築師西圖烏丁（Sih U Tin），結果出現了融合歐洲功能主義和緬甸風情的異國情調，飾有孔雀與巨蟒。²

更令人驚奇的是依舊聚集在孟鈴特街 (Merchant Street) 和潘索丹街 (Pansodan Street) 上的金融機關和商業總部。沒有什麼比這些招搖而精美的雪白立面，更令人遙想二次大戰前緬甸乃該區域富庶大國的年代。這國家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英國（主要是蘇格蘭人）和歐洲的貿易商靠著石油、橡膠、錫、鉛、銀、玉石等其他很多產物大發橫財。在英國抵達之前，伊洛瓦底江沿岸的平原數世紀以來一直有石油開採活動，不過直到蘇格蘭人大衛·嘉吉 (David Cargill) 來此以機械方式開採，才把緬甸變成石油輸出國。他創立了伯馬石油公司 (Burmah Oil Company)，殖民經濟的基石，後來被納入英國石油公司 (BP)。伯馬石油公司壟斷緬甸油田，直到一九〇一年標準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也加入開採才告終。最終，緬甸一日可生產超過一百萬英噸的原油。

這個殖民地不僅以「黑金」聞名，其「褐金」也相當馳名，因為緬甸擁有世上最廣大的柚木原始林，不僅數量龐大，品質也居世界之冠。緬甸柚在它知名的諸多特性之中，以硬度和耐久度最受好評，而且似乎還可以抗白蟻蛀蝕——譬如說，英國皇家海軍就只用緬甸柚來製作戰艦甲板。像孟買伯馬貿易公司 (Bombay Burmah Trading Corporation，在倫敦以華勒斯兄弟 [Wallace Brothers] 為人所知) 這類的公司，在緬甸和泰國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林業貿易網絡來採伐柚木。它的總部占據仰光最佳地段之一——河濱路 (Strand Road)，碼頭沿岸的主要街道。公司營運規模之大，一度用上六千頭大象來把巨大的原木從陡峭的山坡地拖到伊洛瓦底江畔，然後再運往仰光和其他地方。著名的緬甸林務署的成立，就是為了保護國內的柚木原始林，長

久下來，它成了殖民時期緬甸最有勢力和最受重視的機構。和柚木同等重要的還有亞洲主食稻米，到了戰間期，精耕細作使得緬甸成為世上最大的稻米輸出國，其中大多栽種於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翠綠的溼地裡。

大英帝國最主要的銀行，不管是英國銀行或印度銀行，大部分也在此設立分行，服務這些有厚利可圖的商業行為。到了二次大戰之初，這些銀行大部分在緬甸都有龐大的業務，因此紛紛蓋起新大樓來彰顯其重要性。印度、澳洲和中國的渣打銀行——今天的標準渣打銀行——於倫敦設立不久即在一八六二年於緬甸設分行。因為提供大量資金協助農業發展，渣打銀行的業務成長得比幾處的營業所還快，因此購置了面向潘索丹街的一大塊土地。在



圖2 仰光潘索丹街上標準渣打銀行前總部。一九四一年開張時，是亞洲最現代的建築之一（作者提供）。

一九四一年蓋好的總部，是一棟融合了裝飾藝術和緬甸風情的精采傑作。當它開張時，該大樓被視為東方最先進的建築物之一。除了其嶄新的拱頂是在英國特別製造的，它也以該城最早的地下停車場自豪。原初的內部裝潢如今仍完善保留，員工古老的作業方式也是。自緬甸軍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把它收歸國有以來，這裡似乎沒什麼改變。當行員莊重地把小紙張遞來遞去時，天花板的吊扇依舊在拋亮的柚木櫃台上方嘈雜地颼颼作響。

潘索丹街上標準渣打銀行對面是帝國的另一個忠實支持者建利銀行 (Grindlays Bank)。它的總部建於一九三〇年，依舊以金漆門廊上方華麗的裝飾藝術風格柱廊自豪。隔壁是赫赫有名的伊洛瓦底汽輪公司 (Irrawaddy Flotilla Corporation) 的豪華總部，這間在一八六五年成立的公司，在緬甸境內眾多河流上提供內陸運輸。在二次大戰之前，它旗下約有六百艘輪船在營運，是當時世上最大的內陸河輪船公司（或者他們如此聲稱）。該公司總經理住在市中心區北邊與身分地位相符的豪華宅邸，現在是英國大使的官邸。在潘索丹街上有著古典廊柱和隱蔽入口的總部，依舊是公營的內陸水路部門的職員辦公處，同樣在柚木辦公桌上辦公。其他著名的辦公樓之中，仍然佇立的是孟鈴特街上的伯馬石油公司。

總之，到了二次大戰前夕，仰光市中心商業區包括了上海灘之外的東方最富麗堂皇而傑出的建築。同樣的，這城市也以當時最先進的蒸汽街車和早期的「動力馬車」(motorised wagon) 自豪，而動力馬車隨後快速取代了將貨物從碼頭搬到河濱路後方倉庫的「苦力」。現代的百貨公司開張，最有名的是羅伊百貨 (Rowe & Co.)，往往又被稱為東方的哈洛德百貨。它位於摩

訶班都拉路 (Mahabandoola Road) 轉角的新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曾經坍塌為廢墟，如今已重建修復，再現往日風光，堂堂然成為緬甸本土銀行之一的所在——老舊殖民時期建築獲得大事翻修的首例。羅伊百貨公司以建立一個商店遍布全國各地的銷售網自豪，一如某位顧客回憶道，世上沒有哪樣東西在羅伊百貨公司買不到。某個印象深刻的緬甸居民如此描述那個年代：

取名為守護神 (Palladium)、精善 (Excelsior)、環球 (Globe) 和卡登 (Carlton) 等這類名稱的電影院，對居民有著莫大吸引力。街車和巴士……在城裡穿梭。住在仰光意味著身處於這城市的國際性之中，可以接觸到現代生活的所有便利設施——這



圖3 現今可見的殖民時期仰光 (作者提供)。

多虧一個外來統治階級出現，讓地球上這個小角落的人在自己家鄉一無所缺，而且很多方面還提供了更多。³

一八七七年建造的火車站是仰光最壯觀的建築，有固定車班開往曼德勒和毛淡棉。可惜的是，這是殖民時代建築物當中少數沒能存留下來的其中之一。一九四二年節節敗退的英國人不想把它留給進犯的日本人使用，於是將它炸毀。

血與夢想

上述是仰光富裕而井然有序的歐洲風格部分。而聶魯達形容的「血與夢想」，則要從碼頭向上延伸、熙攘擁擠的街道上去找，越過殖民時期金融機關和公家機關浮誇雄偉建物一帶。在那裡，仰光開始變得和格拉斯哥（Glasgow）有幾分神似，當時的格拉斯哥是大英帝國僅次於倫敦的第二大城。這相似性絕非巧合。剝削緬甸天然資源的財團之中，蘇格蘭公司占絕大多數；仰光大部分的發展靠的是蘇格蘭資金，因此大多數的建築也由蘇格蘭建築師建造。譬如伊洛瓦底汽輪公司，其總部實際上就在格拉斯哥，主要的貿易商葛拉漢公司（J. & F. Graham Company）也是，而它位於仰光河濱路的總公司，現在是英國大使館所在地。就如蘇格蘭建築師負責建造極其大量的政府辦公大樓，他們也插手當地平價公寓的設計，在市中心這些公寓建

築仍為數眾多。它們和格拉斯哥的古老公寓非常相像，只不過格拉斯哥老公寓大多已拆毀。

這些後街大多依然保有昔日原貌。這些典型的仰光公寓，一樓總是做生意的小店家，店面往後延伸至深黑隱蔽處。狹窄的階梯陡直上升至四樓或五樓。當今住家公寓的陽台散落著晾掛的衣服、盆栽、舊電線和嶄新的衛星小耳朵。曾經宏偉的科林斯式壁柱在層層古漆之下一有裂隙，就會有藤類植物的根深深掘入那殖民時期的立面。在這裡很常見一種薄荷綠的特殊色調，在十年前也許是非常廉價的一種漆，而今斑斑剝落，街上隨地可見。城內也時興以裝飾性的金屬圍籠封住陽台，一來可以防止人摔落陽台，二來也可以避免城裡數不清的鴿子飛進屋內。

人行道上方在頭部的高度，沿路有末端綁著大鋼夾或小紙袋的繩子垂懸著，等著人來收信。一位賣水的小販朝其中一條繩子拉了幾下，頭頂上遠處某層公寓門鈴隨之響起。一扇窗遮板開了，有顆頭顱往下探。水販比了比放在路上的一口寬大的塑膠瓶。「明天吧。」那住戶揮了揮手說。於是水販推著手推車繼續前行。格拉斯哥的公寓和仰光的公寓有一點不一樣，那就是緬甸的街道比較窄，因此一當烈日高照，巷弄內可提供遮陽的蔽蔭，而格拉斯哥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然而與蘇格蘭第一大城的相似性，僅止於這些外部的磚石結構。因為挨擠在這些狹長破舊的樓房裡的，依舊是過往世上最國際性都會之一的殘存。新仰光立穩根基後不久，吸引了無數人前來，結果原本居住於此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儘管一手規劃並統治該城，卻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就像隸屬大英帝國，在官方「門戶開放」通商政策下運作的其他城市，不分種族、膚色

和宗教，仰光歡迎從世界各地前來，一心想找發財機會的商人、勞工、神職人員、碼頭工人、冒險者等所有人。只要他們接受英國政治和經濟領導權的基本架構，而這架構在此通常著力不深，就可以憑個人喜好進行貿易、販賣或兜售。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對很多人來說，他們也可以保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對於湧入仰光的數十萬移民來說，這城市因此非常自由又兼容並蓄。新城市規劃的一環，是在宗教中立的官方政策下，將土地特定分配給印度教徒、亞美尼亞人、穆斯林、猶太人、浸信會教友和其他教徒等，讓他們搭建敬拜場所。英國人及歐洲人其實只在城裡相當小的「白人」地盤內活動，譬如官員俱樂部、較時髦擺闊的飯店，以及孟鈴特街上的銀行和商務辦公大樓。他們和在周遭急遽擴增、生氣盎然的多元族裔社會少有日常接觸。由於殖民時期的緬甸歸英屬印度帝國管轄，因此來到仰光以及更廣泛地說來到緬甸的新移民，絕大多數是印度人——或者說，構成英屬印度的各種族裔、印度教徒、穆斯林等等。蜂擁而來的人潮無可阻擋，事實上，英國殖民主義者鼓勵人口移入，他們需要「苦力」來建造新的殖民地 and 殖民城市，也亟需在英屬印度習得行政和專業技能的印度人。最後，就如美國人類學家羅絲·佛萊曼·瑟妮雅（Ruth Fredman Cernea）寫道，仰光的英國俱樂部諸如佩戈俱樂部和金姆卡納（Gymkhana）俱樂部，只不過是「大印度洋裡英國味十足的小島，帝國主義者可隱身其中滿足個人的、社交的或儀式性需求的地方」。⁴

印度人，通常是一貧如洗的印度人，在十九世紀末以一年大約八萬人的比率來到緬甸。到了一九三一年，緬甸境內的印度人口超過二百萬，而緬甸總人口據估計也不過一千四百萬有餘。從孟加拉來的吉大港人（Chittagonians）大約占移民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多是穆斯林。在仰光幹活的那些較窮的挑夫、清潔工、碼頭工人大部分來自印度奧里薩邦（Orissa，今天的奧迪沙省〔Odisha〕），靠近孟加拉的一省，鄰近卓塔納浦（Chota Nagpur）。從馬德拉斯（Madras）來的泰米爾人（Tamils）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稻田裡幹活。極具實業家精神的古吉拉特人（Gujaratis）成群結夥抵達。尼泊爾人也來了。這些民族都認同自身的族裔——孟加拉人、旁遮普人（Punjabi）——就跟他們今天的後裔一樣，而這些子孫和最初千里迢迢來到仰光的先人已經隔了好多代。即便是今天，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勢在仰光市中心其實無關緊要；英屬印度帝國在一九四七年的血淋淋分裂，在南亞鬧得如火如荼，在仰光似乎沒在個人和社群關係裡掀起波瀾。

無數的南亞移民大舉湧入這殖民城市定居，到了一九四〇年，仰光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來自次大陸。由於緬甸、印度在英國治下同屬一個地區，因此印度人可以在仰光、緬甸和印度之間自由遷徙，印度社群的流動性很高。很多單身男性來了一陣子，賺了一筆錢，便回印度去。不過，也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在緬甸首都長久定居下來。根據一九三一年的人口普查，已經有三萬九千九百四十九位在緬甸出生的印度人住在仰光，占該城總印度人口的百分之十五。⁵

就像一位緬甸婦女蕙蕙棉因（Wai Wai Myaing）記憶中的那個年代，「搭乘遠洋輪船來到仰光港的旅客一靠岸……，舉目所見印度人居多；纏著簡單腰布和裹頭巾的碼頭苦力、馬車夫，

和戴著招牌頭盔的錫克教警察。」。今天的仰光感覺上仍比較像加爾各答或清奈 (Chennai)，不太像東南亞的其他大城吉隆坡或新加坡。

城裡的公寓樓房和其他建築大部分是印度勞工蓋的，他們被蔑稱為「孟加拉工兵」(Bengal sappers)。他們通常受雇於印度人開的公司，往往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這些人當中約有十分之一是包身工，實質上就是得不到衛生設施、醫療或足夠食物的奴隸。事實上，別的不談，單就一文不名的新來者出乎意料地大舉湧入仰光，就顯然讓英國當局招架不住，對英國當局來說，要維持一個井然有序的歐洲城市表象都很勉強了，更別談內涵。就如一位英國警務督察說的：「仰光的勞工條件對於任何自稱民主的文明國家來說是很不光彩的事。」⁷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在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碼頭正後方的區域為了讓銀行和其他辦公室進駐而清空之前，歐洲區範圍之外的仰光市中心已經成了髒亂和疾病的代名詞。一八九一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提到印度移民的高死亡率：「他們一起擠在不衛生的屋舍裡，增加了我們主要城市的死亡率，……住在近郊沼澤區畜舍不如的茅棚，最令人作嘔的穢物就堆在門前，不是堆積成山，就是在水坑裡發酵。」

顯然，隨著時間過去，情況並沒有大幅改善。旅行作家諾曼·路易士 (Norman Lewis) 在一九五〇年造訪仰光時同樣感到驚愕，儘管那時仰光正努力從戰爭的毀壞中復原：

(英國殖民時期建築的) 這些巨柱依舊挺立卻難掩落魄，底部有四處覓食的狗徘徊流

連，衣衫襤褸、四肢伸展的屍身橫陳一片凌亂。側巷內堆積著發出惡臭的廢物，數量增加之快，連狗群和烏鴉都消耗不完。排水溝蓋被移走尚未補上。瘦得可怕的印度人奄奄一息躺在陽光下。⁸

而今沒有人奄奄一息躺在街頭，但敞開的排水溝依然相當顯見。然而，這些吃苦受罪的外來者功勞匪淺，他們協助打造出世界上最繁忙的貨物集散地之一。移民最多的時期正巧也是「經濟成長驚人」的年代，一如殖民時期緬甸的一位歷史學家所形容的。舉例來說，一九〇〇年的出口總值是一八七〇年的五倍；到了一九二七年，則是超出二十倍。很多移民一開始也許一貧如洗，但是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那幾年，很多人的生活水平都高出亞洲大部分地區許多。因此，忍受飄洋渡海之苦來到仰光，一上岸卻要面對如此惡劣處境的數以萬計的人，在此地的生活條件很可能比他們揮別的祖國家鄉來得好。這些移民逃離的不僅是極端的貧困，還有饑荒、洪水、氣旋和摧殘孟加拉灣沿岸土地的其他天災。

在新國家找出路的移民典型心願驅策下，很多印度人在緬甸變成富豪。除了聲名狼藉的切蒂亞人 (Chettyar)——而他們的出現是更後來的事，這些富豪包括諸如阿卜杜勒·卡里姆·賈瑪爾 (Abdul Karim Jamal) 等人，他在一九二〇年被英國封為爵士。阿卜杜勒·卡里姆·賈瑪爾在一八六〇年代跟著父親從印度的卡提瓦 (Kathiywar) 來到仰光，當年只有六歲。他父親的生意小有規模，而賈瑪爾爵士——緬甸人喜歡這麼稱呼他——則大大擴張了事業版圖。他有著

稻米之王的美名，紀念他對於稻米出口的貢獻，但是他對石油、柚木和茶葉也非常感興趣。賈瑪爾爵士是梅門穆斯林（Memon Muslim），既是慈善家也是百萬富翁，仰光甚至有一條大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仰光還有很多富有的印度商人，毛淡棉、曼德勒和其他地方也有。如果說英國殖民主義白人明顯構成了仰光社會裡最有特權、最排外的階級，那麼富有的印度人也不惶多讓。他們甚至擁有專屬的星期一午後俱樂部，當然是仿效英國紳士俱樂部。⁹

南亞人的大舉湧入賦與仰光獨特風情，但是孟加拉人、旁遮普人和奧里薩人等其他幾近三十個族裔與國籍的人也前來，大肆利用了蓬勃發展的仰光。一如馬來半島上的英屬海峽殖民地——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成千上萬的華人也來了，落腳在港口後方印度社區的西邊，介於今天的瑞波沙街（Shwe Bonha Street）和二十五街之間。他們主要是小商人。根據一九三一年一份不完整的人口普查，當時緬甸約有二十萬名華人，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雲南省人，雲南省在緬甸的東北邊境外。中國城從二十四街開始，位於十八街和河濱路的轉角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福建式廟宇「慶福宮」。這座廟的歷史有百年之久，但保存得相當好；呈現中國本土廟寺樣式，這棟歷史建築經常被「增建」。在緬甸的中國人勢力到了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才成氣候，但是很早就起頭。

仰光也有一個繁榮的猶太社區，極盛時期多達兩千五百人，在一八五〇年代便相繼抵達。猶太人大部分來自巴格達，也有很多是經由加爾各答根基穩固的猶太社區來的。此外也有從波

斯來的和少數從英國來的。這些猶太人大多數是商人，特別被柚木和稻米的商機吸引。一九一〇年，仰光一度有個猶太裔市長。還有數量更少的猶太人社群散布在殖民時期緬甸的主要商港和城鎮；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勃生（Bassac，現今為Patheingyi），也曾經有過猶太裔市長。

來自巴格達最成功的猶太商人之一艾薩·索費爾（Issac Sofaer），設計並建造了索費爾大樓，該大樓在當時是仰光最高檔的辦公區（現在的洛卡納藝廊大樓 [Lokanar Gallery Building]），入口處裝飾的綠色磁磚是特別從曼徹斯特進口的。索費爾的地位之崇高，從總督親自前來為大樓啟用剪綵可見一斑，而這大樓隔壁就是伊洛瓦底汽輪公司的舊總部。索費爾在一九二六年逝世。他的公子亞伯拉罕離開緬甸到好萊塢發展，在電視影集《星艦迷航記》（*Star Trek*）的首季，以及深受兒童喜愛的另一個影集《太空歷險記》（*Lost in Space*）中演出。在索費爾大樓承租商辦的國際租賃戶包括路透社、著名德國攝影師菲利普·克利爾（Philip Klir）、希臘皮革商和仰光炙手可熱的理髮師，菲律賓人克魯茲（M. D. Cruz）。甚至也有過一家維也納咖啡廳。

最富有的猶太家族，所羅門（Solomans）家族、索費爾家族和柯翰（Cohens）家族在市中心及當時的市郊之外擁有大量房產，避暑別墅聚集在茵雅（Inya）湖周圍和更遠之處。他們雇用大量的僕役，其中有本尼以色列人（Bene Israel）也有科欽猶太人（Cochin Jews）（本尼以色列人與科欽猶太人皆是印度猶太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興盛的民族），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所羅門家族擁有一家有名的製冰和瓶裝工廠，並率先把可口可樂帶進緬甸。巴格達猶太人跟自己人說阿拉伯語，跟外人說英語。

猶太區或多或少集中在三十一街，而最顯赫的猶太家族之一的子孫山米·山謬斯 (Sammy Samuels)，目前在那裡仍有辦公室。瘦弱而面帶稚氣的山米在一九八〇年出生，也在仰光受教育長大。他是緬甸公民（他的緬甸名是翁索文 [Aung Soe Lwin]），經營一家旅行社，名叫「緬甸平安」(Myanmar Shalom)②，最特別的是，他規劃了遊覽緬甸境內猶太文化遺產的預約旅行團，接的主要是美國觀光客。山米的曾祖父在十九世紀中從巴格達來到此地，先是經由陸路橫越印度——然後再從加爾各答經海陸抵達仰光。他基本上是個柚木商，他的後代和仰光猶太社區的核心，宏美的木斯米亞約書亞猶太會堂 (Musmeah Yeshua Synagogue)——關係密切，該會堂位於幾個街廓外的二十六街轉角。

最早的猶太會堂建於一八五四年，但曾遭祝融之災。後來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之間，以磚石和鐵材重新建成塞法迪猶太風格 (Sephardic)③，而今隱身在一排油漆店後面。這棟宏美的建築和毗鄰的街區呈鮮明對比，高聳的內部鑲飾著美妙的柚木梁柱和緬甸大理石地板，修復得相當出色。這是仰光唯一的猶太會堂，就任何地方的同類建物來說也是異數，這與建築師以及舊時在巴格達的大多數會眾的祖籍大有關係。譬如說，在正規的猶太會堂，人人面朝同一方向，朝向耶路撒冷。反觀這裡，上等柚木與藤木相間的長椅順著會堂的四面排成許多正方形區域，因此禱告時家人可以彼此融為一體，這是中東傳統。猶太社區裡較顯赫的家族在會堂裡有專屬的方形區域，可把他們自己的祈禱書留在相鄰的柚木櫃裡。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會堂前方有個掩蔽的小房間，妥拉 (torahs)④就保存在裡面，在兩英尺高的銀製立櫃中。那

些妥拉是一九〇〇年代初在巴格達手工製作的。在這裡每個家族都保有自己的妥拉，一度存放著一百二十六部。目前只剩兩部，可見戰後猶太社群的大批離去。這裡也有過一間猶太學校，大約有兩百位學生，校區靠近現在的皇家公園飯店 (Park Royal Hotel)。艾薩·山謬斯 (Issac Samuels)，山米的祖父，長久以來在會堂擔任理事，他也讓兒子承諾會繼承衣鉢。在山米的父親，摩西斯·山謬斯 (Moses Samuels) 於二〇一五年過世之前，他幾乎天天向嘖嘖稱奇的遊客解說會堂內部，而他也肩負著看管九十一街猶太墓園的任務。艾薩·山謬斯是最後幾個安葬在那裡的人之一。

仰光還有個來自波斯東北的巴哈伊 (Bahai) 信徒形成的強大巴哈伊社區。某個滂沱大雨的雨季早晨，我和巴哈伊緬甸總靈體會 (Bahai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的成員坐下來（當然是圍坐在高度拋光的精美柚木桌旁）討論巴哈伊教的起源以及它和緬甸的關係。巴哈伊教是第一位先知使者巴孛 (Bab) 於一八四四年所創立，巴孛六年後在塔巴里 (Tabriz) 殉道。第二位先知巴哈歐拉 (Bahau'ah) 流亡在外，從巴格達流浪到伊斯坦堡，最後命喪巴勒斯坦的阿克

② 譯註：shalom 乃希伯來文，意思是平安。

③ 譯註：塞法迪猶太人是指十五世紀末之前祖籍伊比利半島，遵守西班牙裔猶太人生活習慣的猶太人，塞法迪是猶太人稱呼伊比利半島的名字。

④ 譯註：記載猶太人歷史，以及上帝啟示猶太人的道德律和禮儀律的訓誨書。

里 (Acre)，也就是現在以色列的阿卡 (Akko)。巴哈伊教的全體總部位於以色列的海法 (Haifa)，巴哈伊信徒和猶太人之間的往來向來密切，在仰光格外如此。

巴哈歐拉努力宣揚教義，一八七六年兩位巴哈伊傳教士賈默·艾菲迪 (Janal Effendi) 和薩伊德·穆斯塔法·魯米 (Sayid Mustafa Rumi) 來到仰光。這個新殖民地在那時的威望，從緬甸是繼土耳其和埃及之後第三個被相中來進行傳教事業的國家可見一斑。這兩位巴哈伊教士顯然很有說服力；全國總靈體會會長亨基殷 (Tin Kyine) 告訴我，在該會的全盛時期，緬甸的巴哈伊信徒曾經達到四萬七千人。至今信徒仍約有三千，光是仰光就有兩千人。巴哈伊教開辦六所育幼園，大多數在仰光，全國各地也都有學習中心。大部分的巴哈伊信徒都是從佛教徒皈依而來，全國總靈體會的所有成員目前一概是緬族，這給了巴哈伊教一把保護傘，免於緬甸當局以民族主義為名的迫害。亨基殷同樣坦率地表示，巴哈伊信徒和仰光的穆斯林、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都相處融洽，大概是因為巴哈伊教沒有階層組織、沒有正式的宗教儀式，也沒有禮拜堂，因此他們相當不引人注意。正如亨基殷帶著令人驚異的說服力的談話：「眾生的血都是紅的，眾生我們都愛。」

另有一個頗具影響力的亞美尼亞社區，人數約在五百名左右。亞美尼亞人長久以來擔任戰敗緬王的策士，在英國接管之後繼續待了下來。著名的薩奇士兄弟 (Sarkies Brothers) 留下了痕跡。他們在東南亞創辦連鎖飯店而聲名大噪，第一間是位於檳城富麗堂皇的東方大飯店 (Eastern and Oriental)，接著是新加坡的萊佛士酒店 (Raffles)，然後才是仰光這間風格較內斂

的河濱飯店 (Strand Hotel)。河濱飯店興建於一九〇一年，由薩奇士設計，仰光本土的一位土耳其——亞美尼亞人承包施工。飯店面向碼頭，經過一九九〇年代的修繕，至少重現了些許往日風光。一代代驕奢的歐洲殖民主義者以進出各地的薩奇士飯店來標示他們在東方遊歷的進程。諾維·考沃 (Noel Coward) 就是享受過河濱飯店的輝煌年代的幾個英國作家之一。事實上，他最有名的文句出自他的緬甸歲月：

緬甸最兇悍的土匪從來搞不懂，

正午的溽熱才是仰光本地人最想躲開的，

他們只管放下蘇格蘭威士忌和裸麥麵包躺下來……

只有瘋狗和英國人才會在日正當中外出。

距離薩奇士河濱飯店後方一個街廓，有座亞美尼亞教堂聖若翰 (St John the Baptist) 教堂，這位址再恰當不過。教堂建於一八六二年，由亞維耶·伽朵 (Avier Chaytor) 牧師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七日祝聖啟用。從街上看，這教堂破敗不堪，但是在傾頹的波狀金屬屋頂下，柚木材的內部保存完善，悉心打掃和看管教堂的是緬甸天主教徒史蒂芬。他與妻子和幼女就住在這教堂土地上的一座簡陋小屋，小屋部分是利用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被日本炸毀的教堂門廳的破瓦殘礫搭建的。自那時起，這地方沒什麼改變。史蒂芬從依舊散落在地上的瓦礫當中為

我撿拾一些藍色和白色的陶瓷碎片，那是戰前時期一套茶具的殘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德國人來了，日本人也一樣。有家日本海運公司以直通東京為業務，日本船隊也搶攻仰光和加爾各答之間更多有利可圖的商貿。進到仰光港的日本船比其他國家的還多。在一九三〇年代末，為了可能的入侵，日本益發想獲取仰光的情報。到了二次大戰初期，謠傳仰光城內的日裔牙醫人數多得離譜，其中至少有幾個是間諜。仰光肯定有日本情蒐的前線組織或公司，譬如大東亞船運公司 (Daico Shipping Company)。¹⁰

那時期仰光顯然也有美國人，主要是隨同有名的飛虎隊從仰光機場出任務、冒險犯難的飛行員。這半官方的美國志願航空隊的成立，就如它的原本名稱所透露的，是為了支援蔣介石麾下深陷苦戰的國民黨軍隊，對抗日本入侵中國，其主要任務是捍衛滇緬公路這條從一千英里外的仰光，運送大量物資設備到國民黨軍隊大本營重慶的補給線。這些飛行員常流連在「銀光燒烤」(Silver Grill)，那是名叫皮特·阿拉頓 (Pete Aratoon)¹¹的亞美尼亞人開的餐廳兼夜店。據傳，飛行員是城裡玩得最瘋、酒也喝得最兇的一群人，顯然他們想都不想就「把某個嬌小僕人當排球玩」。¹²

多元社會

仰光社會裡的各色種族多樣得離奇，一個有名的詞就是專門為它而造的——「多元社會」

(plural society)。這個詞如今已普遍被曲解，最初是由英國殖民政府官員轉任學者的傅尼凡 (John Sydenham Furnivall) 所提出，用來描述仰光市中心（以及荷屬巴達維亞，也就是今天的雅加達）的特有現象。傅尼凡對於在緬甸的英國人和在印尼的荷蘭人多有研究，著有幾部長篇大作討論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在今天，傅尼凡可說是沒沒無聞，但是他的著作在他的年代可是影響力十足，而且在研究東南亞史的學者眼裡，他依然是宗師級的人物。我早年到緬甸旅行時，有位美籍東南亞史學家就堅定地跟我說：「如果你不認識傅尼凡，就不可能了解緬甸。」他說得沒錯。

傅尼凡在一九〇二年以印度文官機構的殖民官員身分來到緬甸。一九〇二至一九三一年，他住在緬甸，也娶了一位緬甸姑娘，之後他在劍橋大學任教，講授緬甸文和緬甸史，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八年他回到緬甸，為剛獨立的緬甸政府提供意見，成果繁雜紛陳。他創立緬甸研究協會 (Burma Research Society)，是第一個對這國家進行系統性的西方實證研究的團體，多少也負責把費邊主義 (Fabianism，英式的漸進式社會主義) 價值觀灌輸給第一代的緬甸獨立領袖。

以下是關於多元社會的描述，摘錄自《殖民政策及實務》(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這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八年，是傅尼凡最重要的著作：

在緬甸就像在爪哇一樣，造訪者首先會注意到的大概是人種的混雜——歐洲人、中國

人、印度人和本地人。這是以最嚴謹的定義呈現的混雜，因為各色人種並存而不混合。每個群體都保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語言，保有自己的觀念和做法。他們只有在市集進行買賣時，才以個人的身分往來。這是個多元社會，在同一個政治單位下，不同的社群共生並存，但各自分立。甚至在經濟的範疇裡，勞動力也依照族群來劃分。本地人、中國人、印度人和歐洲人各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每個主群體內的次群體也具有特定的職業。多元社會的形態形形色色，但不管是哪一種，現代熱帶經濟是一大特色……當經濟力不受集體意志控制時，多元社會即應運而生。¹³

就如每個社群忠於自己的宗教，就經濟的觀點而論，今日的仰光也保留很多傅尼凡所謂的「現代熱帶經濟」的特色，而且保留的程度往往到了荒唐的地步。仰光五十年來的經濟孤立另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是：緬甸最大城市的運作靠的是以小家庭經營的商業為主幹的村舍經濟（cottage economy），而商業的內容又視族裔而定。因此，傅尼凡所謂的「特定的職業」大半仍取決於族裔和街區；大規模零售的超市模式多半會略過這城市，直到二〇一一年，有空調的典型亞洲大型購物中心才開始四處出現。

以三十二街為例，自翁山將軍路往南從香格里拉飯店（以前的盛貿飯店）後方穿越好幾個街廓直抵碼頭的這一條街，街上幾乎清一色是與紙有關的行業。每個街廓都專攻紙業的某個側面。此外，店面大約只有六英尺寬的所有一樓店家都是自給自足的製造廠，他們賣的產品大部

分都在店內製成，排版、印刷、裝訂和販售一概在那狹長的空間內完成。因此每個店家都是自己產品的專賣店，也都是家族企業。

幾乎家家都有老舊的英製、德製或日製的裁紙機或印刷機。我瞥見一位看起來不像出版商的人，在狹長昏暗的店鋪深處幹活，身上只著一條籠基（longyi）^⑤，打赤膊，露出乍看以為是日本黑道的刺青。附近另一個裝訂商的生意規模更小，店主懷特先生露齒對我笑，他坐在置於人行道的一張小凳子，就著一口朝上的箱子，徒手製作小學課本。「讀小學免學費！」他一邊開心地宣布，一邊把書封縫到一疊紙上，再用打火機把線頭燒熔，最後取一把大剪刀修剪整齊。「日本政府出資援助我們緬甸政府，現在所有孩子上學都免錢。真好啊！」他每天製作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本書，每本賣一百五十緬元，大約十五分美元。除了賣書給初級讀者，他也賣香菸，大概是要拓展客源吧。

他身後的這條街放眼望去有無數間一站式全包服務的小出版商。店門口不牢固的桌子上擺放著自家產品：中國武俠小說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作品及《頑童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後方則擺美妝雜誌和一些書名模糊難辨的老舊教科書。一輛貨車試圖擠過狹仄的街道，車身寫著「各種紙類，應有盡有」，打廣告推銷韓國藝術紙、加拿大新聞用紙和印尼道林紙。

⑤ 編註：籠基是一塊繫在腰間的長方形布，外觀類似裙子，盛行於南亞與東南亞等潮濕炎熱的國家。

下一個街廓是一整排販賣蕾絲花邊淡紫色婚禮文具的商家。另一個街廓則幾乎全是粗製濫造的低俗小說，再下一個街廓則是孔版油印機器，有些店家忙著印刷，有些則忙著修理機器。店主大多數是南亞後裔，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有。更靠近碼頭一帶的二十九街也是出版商的地盤，Pyigyimundyne Praka 出版社就坐落在此，目前的店主人，一位六十多歲優雅的緬甸女士，是創辦人的孫女。幾年前我造訪這裡時，這地方老舊狹窄而布滿塵埃，到處是油墨漬卻令人愉快——熱帶的狄更斯。店鋪後方有個相當大的印刷機，一箱箱新紙就堆在機器旁備用。我從架上取下她的一本出版品：《緬甸人眼見耳聞的英國人》（*English through Burmese Eyes and Ears*），克拉斯曼（H. Kluseman B.A.，已退休）和吳祿培文（U Lu Pe Win, M.A.）合著，一九五七年出版。一本手工縫製裝訂的書，薄紙頁已泛黃。這書依然在販售。

華人似乎壟斷縫紉機市場。在鄰接的街道一側，一家接一家的狹長店鋪，盡是展示古老縫紉機，有的待售，有的待修理。孟加拉人則壟斷墨鏡、繩索和油漆及水泥市場，店家全在肯吉丹街（Ken Ze Dan Street）上。有些店只賣亮漆和薄泥漿。另一條街大概是腳踏車修理，再另一條則是空調機具維修，諸如此類等等。要找魚網？二十六街介於孟鈴特街和摩訶班都拉路之間有七家古吉拉特人開的店。想買鐵絲網？二十七街上介於孟鈴特街和摩訶班都拉路之間至少有十間相連的店家。另外在瑞波沙街上有一整排賣黃金、鑽石和其他各種珠寶的店鋪。

即便是少數幾座室內市集也依族裔和交易細分區域。其中規模最大最壯觀的是森吉市場（Theingyi Zai），越過摩訶班都拉路在木斯米亞約書亞猶太會堂正對面。有幾棟大而深的愛德華時期風格結構的建築，每一棟都有其特色。其中最大的一棟，擠滿了貨品與人潮，寸步難行，販售的清一色是織品和廉價的中國製塑膠玩具及家用品。在低懸霓虹燈的刺目光線下亂劈殺價的商人幾乎都是緬族人。

在東面樓房做生意的全是印度人。在這裡，咖哩和香料、印度什香粉、小茴香和醃漬萊姆的辛嗆熏眼刺鼻。其中一個攤販威廉鄔（William Oo），就著擱在他膝上的寬大平籃挑揀腰果。他是個穆斯林，讀的是天主教教會學校。「我父親和祖父以前也在這市場工作。我祖父來自馬德拉斯，在緬甸結婚成家。我住在他生前住的同一層公寓。我是學校裡的教士和修女撫養長大的。」他說他從教士和修女身上學到很多。身為穆斯林的他介意上天主教教會學校求學？「不會，當然不會，我們信仰同一個上帝，只不過禱文不同罷了。」很難想像幾十年來三代或四代的人靠這小攤子維生，賣的東西不脫幾種香料、紅醋栗和腰果，不時可見反光的白花花瓣在商品裡爬進爬出。

綠色、粉紅或藍綠色萊姆染著鮮艷色素，治糖尿病的藥材放在桂皮旁，淡水貝類等著被熬煉成傳統藥方。在通道和巷弄交錯的迷宮之中，山竹果、有尖刺的榴槤、巨大的波羅蜜、棕櫚果、毛茸茸的紅毛丹全都在促銷。時值芒果季，市場婦女拉開嗓門吆喝叫賣，使勁以聲量壓過對方。一位優雅的婦女，正等著與辣椒一併炸過的若干肥大黑蟋蟀被一一放入她的購物袋裡；她多添了幾條長長的淡紫色茄子和肥美的蘆筍嫩莖。在這，你可以閉上眼睛循著氣味——過熟的水果、濕漉漉的魚在陽光下慢慢升溫的腥味、從一大塊肥皂磚切下來秤重的香皂——尋找眼

前的路。

慵懶的毛淡棉

傅尼凡的多元社會盛行於大英帝國所屬的很多貿易站。對早期的理想主義者和帝國鼓吹者來說，譬如萊佛士 (Stamford Raffles) 爵士和萊特 (Francis Light) 爵士，這兩位分別創立新加坡及檳城這兩個貿易據點的東印度公司事務員，多元社會是英國當局為它的屬地帶來的最大恩澤。慵懶的老漁村發展成「自由貿易港」，在英國政府善意的密切監督下任何人都可以前來看生意，這些城市成為繁榮富庶的貨物集散地，也是迅速擴張的帝國貿易體系海運要道上少不了的中繼站。這些港口是自由貿易主義的具體化身，而自由貿易主義這概念是由好幾代的英國冒險家和官員熱切地強加給被認為落後的很多種族，而且往往是套在大砲的砲口上強加的。殖民時期緬甸的其他兩座主要港口：阿拉坎的阿恰布 (今天的實兌)，以及孟邦 (Mon) 的毛淡棉，跟仰光一樣就是這類港城的其他實例。

比起仰光，毛淡棉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一八五二年為止英屬緬甸的第一個首都毛淡棉，依然保有十九世紀多元社會的精髓，就像它也保存了大量的殖民時期建築。吉卜林從仰光沿著海岸前往日本再到英國的途中曾在此停留一宿，讓毛淡棉聲名大噪。停留期間，他造訪耶淡蘭佛塔 (Kyaukhanlan Pagoda)，這座位於山脊上面向薩爾溫 (Thanlwin) 江俯瞰毛淡棉全市

的佛塔以及其他幾個景點。回到英國後，登佛塔的經驗給了他靈感，寫下他膾炙人口的詩〈曼德勒〉(Mandalay) 的頭一句。◎眾所周知，這詩人其實從未到過曼德勒，然而這首詩非常成功地召喚了東方異國對維多利亞時期帝國主義者的魅力。從吉卜林的日記來看，這魅力多半來自毛淡棉：「要不是第一段階梯底的那位緬甸姑娘令我魂不守舍，我一定會清楚記得佛塔的模樣。隔日正午啟程的輪船，讓我打消在毛淡棉永遠待下來的念頭。」然而吉卜林在這首詩的最後一節卻低估了這座城鎮，他寫道：從佛塔上「……慵懶地眺望大海……」，熱帶的慵懶這個暗示帶來誤導，因為毛淡棉不管在過去或現在始終是個喧囂繁忙的城市，儘管過去五十年左右它比仰光更加與世隔絕。它是緬甸的一顆遺珠。

毛淡棉依然呈現殖民時期多元社會所需的格局。在主要市場周圍，有防波堤突出的河岸邊，仍舊是最主要移民貿易社區。以華人居多，加上很多從南亞來的民族，據我所知，人數仍有八萬之多。他們主要盤踞下大路 (Lower Main Road) 的北邊，靠近市場。這裡有幾座清真寺，包括最大的加拉丹 (Kaladan) 清真寺，砌有灰綠色磚石，可追溯至一八四六年。更往南靠近市場的幾棟建築，屬於較小的蒙兀兒式什葉派清真寺，是城裡唯一的什葉派清真寺——「來自伊朗」，一位信徒驕傲地告訴我。總之，毛淡棉有九座清真寺，其中包括令人嘆為觀止的蘇拉提遜尼賈瑪 (Soori Sunni Jama) 清真寺。

◎譯註：「在毛淡棉古塔旁，向東遙望大海……。」

對於非穆斯林的南亞人社群來說，這裡也有大約五十座廟寺，全都標榜著照應來自各個不同地區的移民信眾。因此在古塔路（Old Pagoda Road）這條從河畔通往山上的路，有座古吉拉特寺（一九五六年建），與哈瑞奎師那（Hare Krishna）寺（一九一五年建）只隔幾扇門。就像看管古吉拉特寺的纖瘦年輕男子曼尼須（Mannish）說的，這裡同樣也有屬於孟加拉人、印度斯坦人（Hindisani）、泰米爾人、旁遮普人和錫克人的寺廟。跟仰光一樣，人們就用這些字眼自稱，而非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甚至也不用印度教徒或穆斯林。

當我問起各種社群之間有無任何緊張或敵意時，曼尼須的神情略帶不解。「我們都很友好。」他向我保證，手比向隔壁的清真寺。「我們都上同一所學校，大家都在市場一起幹活。」他的寺廟也許是古吉拉特寺，他說，但是屬於其他寺的印度教徒也可以來這裡敬拜。「神明只有一個，」他說，但語言有很多種，他本身會說印地語、古吉拉特語、緬甸語和英語。在多元社會裡使用多種語言事實上很有必要，而且對很多人來說是很自然的事，僅是出於必須跟住在同一條街上不同族群的各種人溝通的需要。有位仰光來的猶太人賈可伯·摩斯·柯翰（Jacob Moses Cohen），據傳會說阿拉伯語、緬甸語、印地語、烏爾都語和孟加拉語，以及英語。

在毛淡棉主要市場的後方，是個大型的中國人社區，目前是醜陋的現代水泥建築。過了這個巷弄狹密的擁擠地區有幾座中國寺廟，最古老的一座是建德堂，興建於一八五二年。其內部以保存完善的柚木天花板自豪，漆上了古典紅色。廟裡的一位老者翁明英（Aung Myaing）說，在毛淡棉中國人仍有七萬多人，其中很多是從檳城來的。他說，就跟印度人一樣，中國人

認同自己的家鄉，這認同透過城裡超過三十間的中國廟來表達。因此這裡有三間福建廟，包括建德堂這最大的廟，以及源自廣東、雲南、海南等地來的廟。中國人全都是商人，他說。

就像中國和印度來的移民，把地域、宗教和商業看得比國族重要，歐洲移民也是如此。白人居住的地區都在上大路（Upper Main Road）兩側，為得體起見，那一帶離市場和貨貿交易的髒汙世界夠遠，又足以就近關照貿易事務。當新殖民政府在一八五三年遷都仰光，這裡只留下少數政府機關。最著名的是英國監獄，依照標準的圓形監獄設計，建造於一九〇八年，目前仍在使用的。吉卜林登上的寶塔直接俯視監獄放風場，假使他晚個數十年到毛淡棉，他那首有名的詩想必大為不同。

在毛淡棉大量保留下來的是歐洲傳教士的龐大建制：他們的教堂、修道院、學校和住所。對於毛淡棉以及緬甸的後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傳教士是浸信會教士，位於上大路和大威傑提路（Dawei Jetty Road）轉角處的就是緬甸境內最古老的浸信會教會，由美國人艾多奈拉姆·耶德遜（Adoniram Judson）所興建，也是緬甸境內第一座浸信會教會。艾多奈拉姆·耶德遜在前往印度的途中，船被風吹離航道，結果不得不在毛淡棉南方五十英里處被稱為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沿海殖民地棲身避難。他在那裡建造了他的第一座教堂，不過他的傳教事業是在毛淡棉蓬勃發展。這座一八二七年建造的教會本身很普通，但是在馬路對面的紅磚教會學校確實散發出殖民時期傳教士的雄心與自信。這座學校建於一八六四年，有棟優美的四層樓建築面向庭院，庭院遠端有同樣雄偉的一批圓柱建築，今天位於此處的公立第六高中足以容納超過兩

千名學子，傳教士的雄心壯志不言自喻。

身為英國新殖民地的第一個首都，毛淡棉是前來緬甸落地生根的大多數英國人安頓的所在，其中包括喬治·歐威爾的外婆，而歐威爾本身也在一九二〇年代擔任殖民地警佐期間在這裡短暫住過。數十年下來，很多英國人娶了當地緬甸女子，或者說孟族姑娘。背向上大路朝河方向的路上坐落著很多英緬通婚者的大宅邸。毛淡棉因此是英緬人的大本營。他們是城裡的商賈貴族，即便在第二次英緬戰爭之後大部分英國人和歐洲人都搬到仰光去。

格蘭·覺紐 (Glenn Kyaw Nyunt) 生於一九四五年，他的妻子凱瑟琳 (Catherine) 生於一九四七年。格蘭和凱瑟琳告訴我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背景經歷相當具代表性。格蘭的父親席瑞·科薩克 (Gyri Cusak) 是英緬混血，凱瑟琳的父親艾瑞克·尼爾森 (Eric Nelson) 也是英緬混血，曾與二次大戰期間聯軍在緬甸的遠征軍特種部隊欽迪 (Chindits) 特遣隊一同作戰。他隸屬英國皇家陸軍工兵爆破小組，負責爆破橋樑。緬甸在一九四八年獨立後，即使大部分的英國人都離開，但大半的英緬人都留了下來。凱瑟琳的家族內相傳，艾瑞克·尼爾森獲選參加一九四六年在倫敦的二次大戰勝利大遊行，但是妻子不願意他參加，深怕他一去不返。於是艾瑞克·尼爾森留了下來，找到一份差事做，幫助在地方上擁有很多家鋸木廠的一名蘇格蘭木材商經營生意，這情形在他那個年代很常見。英緬人經營毛淡棉所有的木材公司、石油公司和礦產公司，這些公司構成該地區大部分的出口額。而格蘭這一邊，他的姑姑主持一所很有名的私立學校。格蘭和凱瑟琳都同意，他們從未和哪個穆斯林、印度教徒、古吉拉特人或住在毛淡棉

的任何人有過任何摩擦。「沒有衝突，老毛淡棉人只想著努力幹活和怎麼賺錢……還有別跟政府過不去。」凱瑟琳說。

多元社會及其敵人

仰光猶太社群的編年史家塞尼亞 (Cerna)，曾描寫整個區域內巴格達猶太人「千絲萬縷的綿密網絡」，勾串出仰光猶太人和他們在加爾各答、上海、香港、卡拉奇 (Karachi) ⑦、泗水 (Surabaya) ⑧、達卡 (Dacca) ⑨，以及大英帝國（大部分）全盛時期的其他所有主要貿易站的親友的關係網絡。然而在仰光、毛淡棉、阿恰布、曼德勒等地的其他所有族裔也是如此，每個社群都視自身為該族裔更大整體的一部分，而且會為了貿易、金融和政治上的利益善用那些關係網絡。

這千絲萬縷的綿密網絡無遠弗屆也非常久遠。在仇外的緬甸軍事領導人的無情打壓下，這些網絡已經破損，但依舊存在，只要一有機會，隨時可以再重建，為這國家謀利。不過這有賴

⑦ 譯註：在巴基斯坦。

⑧ 譯註：在印尼。

⑨ 譯註：在孟加拉。

當代緬甸如何學會再次包容這些人民，甚至是否能夠再次包容。因為緬甸的多元社會有個致命缺陷。在聽慣了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宗派血腥傾軋的現代人眼裡，這多元社會的文明與包容令人新奇，它熱烈擁抱每個人，卻不包括土生土長的緬甸人。當英國人和數百萬移民在他們所打造的商港發達起來，緬甸人卻發現自己被逼到家土邊緣，不管在行政上、實質上和文化上都是。傅尼凡對於多元社會的最初描述，確實和西方所理解的多元論大相逕庭。它指的並非是自由選擇共同生活的形形色色族裔的聚合，傅尼凡幾乎是帶有貶義地使用多元社會這個詞，用以批判移民種族以商業和自由貿易為名，對本土社會的強加干預。對他來說，對其他評論者也是，野心勃勃的忙碌移民把本土社會——譬如阿拉坎族 (Arakanese)、緬族、孟族等等——的傳統結構擠到一旁甚或摧毀了。這強加的體系主要在英國和荷蘭兩大海強權沿海的港口城市扎根，隨著殖民統治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擴張，多元社會也逐漸往像緬甸這樣的國家的內陸延伸。

從本質和歷史來看，緬甸是農耕的封建社會，有其相應的價值。殖民時期緬甸的新興商業社會對他們來說很陌生。最好的情況來說，他們是消極的旁觀者，最壞的情況是忿恨的受害者。譬如說緬甸人本身就對從印度次大陸來的移民毫無掌控權，直到緬甸在一九四七年獨立前夕通過的「緊急移民法」(Emergency Burma Immigration Act) 情況才有所不同。傅尼凡便詳細記述了緬甸人被排除在自己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之外的經過，而這類的記述不只他寫過。

特別是印度人接手了緬甸人不會做(或不想做)的大部分差事。殖民時期的緬甸率先亞洲擁有全國性的電話系統，這項發明緬甸人至今仍津津樂道。但是緬甸當時的郵政和電信卻是印度人在管理，因為與其從頭開始培訓新的緬甸接線生，雇用駕輕就熟的印度人來掌管和經營簡單又划算。就如傅尼凡評論道：「電信部門成了印度人保障區……電話系統也是，直到一九三〇年或更晚，不懂印度斯坦語根本無法在緬甸使用電話。」老練的印度人填進了英國人為了管理殖民時期緬甸所創造出來的很多職缺，所有職員和官員，甚至警政的很多職位都由印度人出任，使得印度人的地位凌駕在緬甸人之上。

以著名的伊洛瓦底汽輪公司為例。對經營該公司的英國人來說，這內陸河渡輪服務是效率與舒適的代名詞，不過就如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貝利 (Christopher Bayly) 和提姆·哈柏 (Tim Harper) 對該公司的描述，它也「赤裸裸的種族排外」。¹⁴ 它的管理者大部分是英國人或英緬人，所有的員工幾乎都是從吉大港 (Chittagong，吉大港當時屬於孟加拉，現在是孟加拉共和國的主要海港) 來的印度人。伊洛瓦底汽輪公司壟斷伊洛瓦底江的航運業務，對於股東來說是一大便利，但對於在地緬甸人而言不見得有好處；相對上的高價讓很多在地人無法在自己的聖河上旅行。縱使他們負擔得起，也很可能「巧妙地被拒於特別二等艙之外」。

至於英國人積極建造的鐵路和橋樑，受雇參與興建的緬甸人不多，受訓成為工程師的更是少之又少。舉例來說，一八九五年一家專為公共工程部門訓練人才的工程學校開辦，但收的學生幾乎清一色是印度人或英印混血兒。

當這快速發展、相對繁榮的殖民地裡的所有差事全數落到外來者手中，緬甸人愈來愈發現

在自家國土裡，自己反倒成了少數民族——而情節最嚴重的就屬「多元的」仰光。到了一九〇〇年，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緬甸人，這引發強烈的民怨。儘管較富裕的家族依舊舒服服地住在繁榮又蔭鬱的郊區，譬如九文台（Kemendine），但他們還是充分意識到被白人統治階級壓制，且被隔絕在占據港口及其周圍、大舉湧入的族裔之外。

因此，緬甸人不只要應付白人殖民統治的種族歧視與不公，還被其他更有特權的臣屬對象蹂躪。一八八三年六月成立的仰光市政委員會的組成不言而喻，緬甸代表有五席，歐洲人、歐亞裔人、猶太人、帕西人（Parsi，波斯的索羅亞斯德人〔Zoroastrians〕的後代）和中國人各有一席，而印度人和穆斯林則有兩席。英國人占領稱霸已經是苦難一椿，但緬甸人發現，自家人不僅在數量上不敵外來者，還常常被其他所有人壓在頭上。

令緬甸人尤其不滿的，是在他們和英國人之間當捐客賺錢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其中又以被稱為切蒂亞人的印度放債人最令人厭惡。在大半是農村的緬甸，多元社會外來的商業規律與既存的農村文化災難性地相抵觸。在多元社會的模式裡，切蒂亞人是從切蒂南德（Chetinand）——即今天印度的泰米爾那都邦（Tamil Nadu）——來的特定一小群人，他們在十九世紀初的英屬印度自樹一幟，以在農村小額放款為利基。後續他們跟著英國人進入錫蘭、馬來半島、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⑥，繼而又深入法屬交趾支那（現在的越南）以及柬埔寨。不過他們在緬甸最活躍（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他們所有業務裡大約有三分之二在緬甸），也最受爭議。

切蒂亞人全面涉足緬甸的金融活動。他們辦理存款業務、兌現支票也從事黃金交易；在緬甸快速繁榮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是不可或缺的金融家。但是他們的放債業務，使得緬甸人長久以來憤恨難消。他們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到處貸款給貧窮的稻農購買種子、聘請工人、修堤等等，拿農人的土地當抵押。景氣好的時候這做法行得通，但是當穀物歉收，而且這情況經常發生，或是米價在全球市場下跌，緬甸人還不出債來，只好任家族歷代持有數百年的農地被沒收。切蒂亞人會將土地拍賣套利，往往賣給投機商人，諸如此類。這過程在經濟大蕭條之後變本加厲，重創緬甸稻米的出口，最後到了一九三八年，下緬甸幾乎有一半的土地是由外居地主擁有，有整整四分之一的土地由切蒂亞人持有。¹⁵

就如研究緬甸的經濟歷史學者尚恩·特尼爾（Sean Tunnell）寫道：「下緬甸大量可耕種土地的讓渡，就緬甸的政治經濟是樞悲劇性的大事，而切蒂亞人在這國家的故事，也達到同樣悲劇性的高潮。本土耕種者的怒火延燒，加上大緬族主義者的煽動，切蒂亞人輕易變成代罪羔羊，不但為當前的災難背負罪名，也成為外國勢力支配緬甸經濟的清算對象。」耐人尋味的是，甚至連英國人也承認放債人所造成的傷害。英國人蒙巴頓（Mountbatten）勳爵，同時也是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東南亞戰區最高指揮官認為，英國在一九四五年從日本人手中取回緬甸

^⑥ 編註：指英國於一八二六至一九四六年期間，針對馬來半島的三個重要英屬港口（新加坡、檳城、馬六甲）的管理建制。

後，應該試圖停止，或起碼要減少，切蒂亞人剝削的現象。反思日本人在一九四二年初接管仰光之後迫使大部分的切蒂亞人逃離，蒙巴頓承認，如此一來「緬甸農民肩頭上沉重的債務包袱被移開了，但想到我們重回緬甸的同時這包袱又被加到他們身上，我非常難過」。¹⁶令人玩味的是，儘管很多印度人在一九四五年英國重返緬甸時回到緬甸重拾以前的生活，在一九四八年緬甸獨立後，緬甸新政府卻不准切蒂亞人繼續在緬甸重操舊業。

若開族和羅興亞族間的世仇血恨

受苦受難的原住民族群不只緬族。其他族裔像是居住在緬甸西部今天的若開邦的阿拉坎族，在自己的家土上遭遇更嚴重的邊緣化。他們的受害情結直到今天依舊存在，而且招致悲慘後果，因為非阿拉坎族的人住到他們的土地上，主要是信仰穆斯林的羅興亞族人（Rohingya）。若開族（Rakhine，即阿拉坎族）一方面與緬族的對立日益升高，另一方面與羅興亞族的衝突加劇，在在為緬甸未來政治情勢投下莫大變數。

對立衝突的中心在實兌，西部若開邦的熱帶首府。實兌舊稱阿恰布，曾經是一五三一年建國、繁榮自主的阿拉坎王國首都，乃印度洋的貿易中心。然而這一切在緬族國王於一七八五年併吞阿拉坎後畫下句點。併吞後緬族人還把兩萬名阿拉坎俘虜押回新皇都阿瑪拉普拉（Amarapura），而第一次英緬戰爭之初，從孟加拉東進的英軍最先侵略的地區就是受緬族打壓

的阿拉坎。聖馬可（St. Mark）教堂，緬甸最古老的英國國教會教堂，仍佇立於實兌。在英國統治下實兌這位處加拉丹（Kaladan）河口、面向孟加拉灣的優異河港，很快成為貿易站，重要性更甚以往。也因此，就跟仰光一樣，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移民前來找工作和發財機會，最後成為殖民時期緬甸的第四大城。

一九一七年，阿恰布地區主管司麥特（R. B. Smart）編輯的《阿恰布地區英國公報》（*British Gazetteer for Akyab District*），記錄了這一波移民的大舉湧入如何劇烈改變了這城市和若開邦其餘地區的人口結構，繼而造就出阿恰布獨有的多元社會。在一八七二年，印度人（有印度血統的）只有兩千六百五十五人，到了一九一一年，增加到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人。在一八七二年，穆斯林（那些有印度血統的穆斯林，也被稱為從孟加拉來的吉大港人）有五萬八千兩百五十五人，在一九一一年，人數達到三倍之多。然而本土的阿拉坎族人數，僅從一八七一年人口普查的十七萬一千六百一十二人，增加到一九一一年的一萬九千四百三十二人。司麥特總結道，其結果是「西邊來的吉大港移民尚未持續湧入之前，阿拉坎族人已漸漸被擠出阿拉坎之外」。在阿恰布城本身，司麥特估計，人口有「不下六成」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到了殖民時期尾聲，實兌有八十五座清真寺，甚至比仰光（七十座）和曼德勒（六十座）還多。¹⁷

對於阿拉坎族的苦境，司麥特卻不盡然寄予同情。他寫道：「（阿拉坎族人）頂不住這股壓力的原因在於他們很揮霍，雇用的勞力比所需的還多，他們不願做自己本分該做的事。」不管真相為何，不爭的事實是，儘管在二十世紀之初阿拉坎已成為緬甸蒸蒸日上之的稻米出口產業

的中心，不過境內十座蒸汽動力的碾米廠全是印度人所有，唯一一間例外，但所有者也是中國人。司麥特也記錄道，雖然仍「留有一些阿拉坎手工藝匠」，主要是金匠和銀匠，「印度人似乎逐漸趕走了本土手工藝人」。顯然原住民族裔縱橫流離，不管是阿恰布的阿拉坎族人或仰光的緬族人，都對該為此負責的外來者和整個殖民體系憤恨難當。再者，因為很多移民是穆斯林，因此矛頭便指向伊斯蘭信仰及其信眾。

在英國人抵達之前，就有穆斯林移民來到緬甸，但規模相對小，一般而言也被接納。參照上述資料，譬如英國記載了一八二〇年代中期已經在阿拉坎世居多代的穆斯林人數。事實上，穆斯林商人長久以來在阿拉坎和緬甸沿海的其他地方落腳。曾有個穆斯林族群直接效命於阿拉坎王並為之作戰，後來遷往內陸在緬甸王宮廷內任事，他們的後代仍住在今天的曼德勒附近。

然而在多元社會結構下穆斯林大規模移民則另當別論，這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自稱羅興亞族的人，最初被歸為吉大港人，無疑在英國人抵達之前就在阿拉坎扎根，他們當中有些人為證明這一點而亮出土地所有權狀給我，但其餘數千人是跟著殖民國進入緬甸的。

殖民早期的緬族人顯然並沒有在語言上區分歐洲人和印度人，他們一概被稱為 *Kala*，意思是外來者。後來，當英國殖民主義者大批出現，*Kala* 一詞才有了細分，他們被稱為 *Ingalei Kala*（英國 *Kala*）。他們也被叫做 *thosang Kala*，「披羊皮的 *Kala*」，指的是他們身上厚得出奇的毛料服裝。英國人十分清楚，他們的緬甸新臣民多半把他們和印度臣民混為一談。後來 *Kala* 一詞演變成專指穆斯林的貶稱。¹⁸

此外，有一點也不能忘記，阿拉坎族人對移民大舉湧入的怨恨，是在他們被緬族併吞之後。除了吉大港人，強加在阿恰布的多元社會，也代表著他們的仇敵緬族也令人不快地湧入。古老的獨立王國阿拉坎，當代若開民族主義者的精神指標，雖被緬族征服，但從未全然融入中央的緬族王國。直到十九世紀阿拉坎族人才感受到「緬族化」的十足力道。這是因為，除了一九一七年《阿恰布地區英國公報》記載的穆斯林令人不快的湧入，在阿拉坎的緬族人數也從一八七一年人口普查的四千六百三十二人，增加至一九一一年的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五人，全都是被繁榮港口的賺錢機會吸引來的。

因此，在阿拉坎族人心中，多元社會是雙重的詛咒。他們既要忍受穆斯林的大量移民，也要忍受緬族人的大舉湧入。由於殖民當局的輕忽，這些怨恨輕易地轉為種族歧視和偏執，尤其是針對孟加拉來的穆斯林，或所謂的「孟加拉人」，就如憤恨的阿拉坎族人——以及緬族人——對羅興亞族人或穆斯林的蔑稱，而他們至今多半還是這麼叫。在英國統治下，緬族人很可能也跟阿拉坎族人一樣對大量湧入的穆斯林移民心懷憎恨，但阿拉坎族人也憎恨緬族人，自此這憎恨一直左右著若開邦和緬甸的政局。

二〇一三年，若開民族發展黨（*Rakhine Nationalities Development Party*，現名為若開民族黨〔*Rakhine National Party*〕）發言人，一位名叫瑞茂（*Shwe Maung*），堅決又固執己見的學校教師，在該黨位於實兌大街、塵埃滿布又破舊不堪的總部，跟我細說從頭。就像克欽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被緬族迫害，他主張：「要成為真正的聯邦，我們必須是個聯邦制國家……五千年來

我們（阿拉坎族人／若開族人）擁有主權，一九四八年後我們同意成為（緬甸）聯邦的一部分，當時我們鑄下大錯。」比起對穆斯林，尤其是羅興亞族人，他對緬族人的態度稍稍沒那麼偏頗。確實，像瑞茂這樣的若開民族主義者自認仍受兩面夾擊：「我們是穆斯林化和緬族沙文主義的受害者……在這雙重的擠壓之下，我們愈來愈窮，受的教育愈來愈差。」

至少有一些所謂的吉大港人（或羅興亞族人）早在英國人抵達之前就已經在實兌落地生根，但若開族人並不關心這個事實。若開族人無意深究這細微差別，他們只想要羅興亞族人滾開，而且最好是滾出這個國家。我在實兌和某位自詡為若開知識分子的人談過話，這人從前是民主激進分子也是教師，名叫翁覺讓（Aung Kyaw Zan），談到穆斯林像「病毒湧入」，如果撒手不管，他們會繁殖下去，直到把若開邦淹沒。「這讓人不齒，也不人道」，他譴責。「他們不接受節育。」

第二章 將軍的復仇

被強加進來的多元社會，以許多特殊方式形塑了緬甸的反殖民抗爭，至今仍持續影響這個國家。在緬甸普遍有個說法，說緬甸愛國主義者的敵人有三：傳教士、士兵和商人，反映出殖民統治最沉重的幾個面向。倘若傳教士和士兵毫不含糊指的是歐洲基督徒，主要是英國人，那麼商人不論想像或事實，幾乎總是指印度人，往往也指穆斯林。數以萬計的印度教徒也從印度遷徙至此，但是他們比較能輕易地融入緬甸社會。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上另有一套律法要遵守，這意味著在政治操作上穆斯林成為更明顯的目標。¹

第一次重大的大緬族主義運動「我緬人」（Dobama Asiayone），打著「把緬甸還給緬族」的口號。從一九二〇年代初開始的反英國統治的抗爭，自始就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對抗相對少數的英國統治者和官員，另一種是對抗英國人任命的無數印度官吏及其他都督。就某些方面來說，比起印度人遭遇的暴力攻擊，打倒白人殖民統治的抗爭反而相對溫和。排印暴動於一九三

○年在仰光碼頭爆發，一九三八年又爆發一次，期間全國各地有數百名印度人遭殺害。英國殖民當局成立暴動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在一九三九年發表調查報告，把流血事件的主因歸結於親佛教徒緬族的媒體煽風點火。

近來在實兌針對穆斯林和印度移民後裔爆發的殘暴攻擊，起於二〇一二年六月，顯示了更形加劇的古老成見如何被利用，引發後來的大規模種族清洗。從很多方面來看，二〇一二年攻擊羅興亞族穆斯林造成數十人死亡的事件，打從殖民時期就埋下禍因。探究近來流血事件肇因的很多分析家，都得出和一九三九年的調查委員會同樣的結論，也就是說，這些血腥事件多少是由更沙文、更極端的佛教媒體平台所發起和動員的。在一九三〇年代這些平台是報紙，不過現在很可能是臉書和線上聊天室。

各種「入侵者」

長久以來被外來的異族社群排除在外，被硬擠到社會邊緣的人——緬族和阿拉坎族人——會有如此的反應不足為奇。沒錯，地區上反殖民運動的領導者，無不自覺有責任去對抗歐洲殖民統治和強加的多元社會這雙重的罪惡。他們不僅要把歐洲人趕出去，也要想辦法從好幾代的外來移民手中取回他們視為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兩種抗爭打從一開始便糾纏在一起，而且在東南亞依然普遍如此，因為這區域都經歷過被殖民占領的歷史。因此，舉個例子，當緬甸被殖民期間經歷南亞來的大量移民潮，馬來亞的馬來人以及後來成為印尼的爪哇人和蘇門答臘人，也目睹了一貧如洗的中國人大規模蜂擁而來。以馬來亞來說，移民的規模之大，到了一九五七年馬來亞從英國獨立時，以最初屬於馬來柔佛王國 (Malay Sultanate of Johor) 一部分的新加坡為例，簡直是中國人的地盤 (人口有八成五是華人)，而舊港檳城也同樣是華人占絕大多數。總的來說，獨立之際，在馬來亞的中國移民大約占總人口的四成五。跟在緬甸一樣，這些移民很多在錫礦坑和橡膠園從事辛苦吃重、薪資低廉的體力勞動，但也有少數人力爭上游自行創業，最後富甲一方。同樣的，跟緬甸一樣，一九四〇和五〇年代在馬來亞加快步伐的馬來民族主義獨立運動，也和仇視移民及整個多元社會的政治敵對密不可分。

抒發這類情緒的主要政治管道「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簡稱巫統 (UMNO)，成立於一九四六年，表明要從非原住民族 (也就是中國移民和印度移民) 手中取回馬來人的權利和特權地位。准許屬地自治的英國工黨當時打算賦與獨立的馬來亞所有人民同等的權利，無視馬來人亟欲獨厚的「種族」和宗教，使得馬來社會大為不滿，群起反對，於是催生了巫統。在馬來人的聯合抵制下，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時，第一五三條款被列入憲法，以保障國內「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接下來的七十年左右，巫統欲達目的不擇手段。透過不公正地劃分選區以及林林總總在選舉制度上的操弄，巫統贏得了每一場選戰，無不打著「馬來人至上」為名，自獨立以來始終掌握政權。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

邦，巫統再下一城，而新加坡之前才納入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不過兩年。新加坡的龐大華人人口很容易讓種族失衡，對於新誕生的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相當不利，結果馬來人為維護霸權，悍然將這島國羞辱地逐出聯邦。

在每一場選舉，包括二〇一三年最近的一次，巫統會煽動鄉村的馬來人，也就是它贏得選舉的主力軍，警告說窩藏在社會底層的移民和入侵者，對馬來族及其宗教的威脅緊迫。它所傳達的訊息是，只有巫統會跟馬來人、伊斯蘭和被遺忘的人站在一起。其實非馬來人人口比例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持續下降，但巫統漠視事實、操弄恐懼。這種威脅式政治，是後多元社會的特色。在我執筆之際，甚至還有人指控弱勢的華人是馬來西亞的「入侵者」，結果被依煽動叛亂罪起訴。當事人是馬來族一位出名的穆斯林領導者：阿都拉再益拉曼（Abdullah Zulk Abdul Rahman）。後來他對華人的「公民權和財產」提出質疑。誰該為華人侵害馬來人負責？他在臉上寫道，這「全是英國人造的孽，他們勾結華人來欺壓馬來人」。在獨立後經過兩三個世代，這類情緒仍有大肆抒發的空間著實令人匪夷所思，不過這也顯示出馬來人積怨深沉，就跟緬甸人一樣。

除了要求殖民時期的移民對原住族裔權益、權力和財產的損失進行賠償，這些地區的獨立領導者也關注多元社會的另一個惡果，而這也是傅尼凡特別憂心的。根據傅尼凡的說法，多元社會會產生財富，但這財富本質上短暫又不穩定，缺乏任何的「集體意志」，或者說共同的社群意識。這是因為多元社會只是不同族裔的「雜混」，而不是由共同文化或宗教所維繫的有機體。為這強制力是避免移民被原住族裔攻擊或移民彼此之間起衝突的唯一壁壘。

後殖民社會始終在應付這個問題。一九六九年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發生的馬來人排華暴動，還有在印尼經常爆發的類似情況，對某些執政精英來說，似乎證實了傅尼凡最深的恐懼：一旦殖民政權消失，「整個社會將再次陷入無政府狀態」。

對此，傅尼凡提出的答案是，殖民政府應該比原本打算的多留久一點，建立出一「集體意志」之後，再把更強壯更有適應力的國家交還給原住族裔新統治者。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代，緬族人和馬來人等不太能接受這個觀念。事實上個別政府在面對獨立後種族之間的無政府亂象，做法也差異很大，而緬甸就此在軍政府統治下走上了與鄰國迥然不同的道路。

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來說，新政府是以自成一格的威權主義取代殖民帝國父權體制的鐵腕。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沿用許多殖民時期的專制舊法，形成獨樹一幟的政府，他總是辯解說，他的治國方法是解決多元社會所引發的怨對與敵對的最穩當做法。就像馬來西亞的一黨獨大，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在獨立建國以來始終執政，代表的是絕大多數華人的利益。就像馬來西亞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同樣採取不正手法進行選區劃分，輔之以其他形式的選舉操作，加上利用司法打擊政敵，贏得了每一場普選。不過，新加坡式的威權主義有時候立意較為良善。舉例來說，在強制配額制度下，新加坡的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不得不共

享所有的公共住宅，以避免族裔聚居，這完全是出於好意。同樣地，若有記者或評論質疑這島國內族群間和諧共融而被認定為「暗中顛覆國家」，這國家也會嚴加打壓。新加坡的媒體受到嚴密箝制，很少有言論自由。

在馬來西亞，政府的威權作風也不遑多讓，這些社會很少有真正的「多元態度」（以西方的定義）。表面上遵守民主制度，但政治競爭僅維持在最低限度，而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執政黨都由某個族裔所支配。

以印尼來說，這東南亞的最大國則偏好更包容的做法，至少在辭章上顯示出包容；「多元一體」（unity in diversity）是印尼立國口號。一九四五年獨立時，總統蘇卡諾（Sukarno）揭櫫「建國五原則」（Pancasila）為新治國方針。第一是「信奉唯一的神」，但沒有指涉伊斯蘭或其他特定宗教；第二是「人道主義」；第四是民主政治；最後是將「社會公正」帶給印尼全體人民。這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做法，至今依然如此。然而無恥政客及其黨羽深諳如何利用針對華人移民的仇恨，與族群和宗教有關的抹黑中傷（以及更等而下之的），每每會在選舉期間和國家有難時出現。

反觀緬甸後殖民時期的軍政府，則採取壓根不同的策略。他們沒去構思對策來因應他們所接收的社會現實，反而想辦法瓦解它，企圖打造一個同質性的緬族社會。因此一九六〇年代初掌權的緬甸將軍們，以「大緬族主義」為名蓄意摧毀多元社會。軍政府操作「種族與宗教」議題，矛頭不僅指向殖民時期的移民，還有居住於昔日緬族王國邊緣的少數民族——克欽族、克

倫族、掸族（Shan）等等——這些民族之所以加入剛獨立的緬甸，僅基於一個理解，那就是獨立的緬甸絕不會是同質的國家，而是邦聯國家（confederated）。打從一開始，各民族對於未來的展望在根本上即有衝突，這衝突至今尚未解決。²

戰爭帶來的機會

緬甸多元社會的瓦解分兩階段，一是日本人在一九四二年初入侵，繼而是軍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執政。第一階段，至少在某個程度上，是一九二〇年代末和一九三〇年代從仰光大學爆發的那種大緬族主義的表現，第二階段則是第一階段的合理結果。

在一九三〇年代抱持法西斯擴張主義的日本掌權政府，之所以對緬甸特別感興趣，是因為它蘊藏大量石油、稻米和其他商品，可提供龐大的海外軍需。此外，日本帝國軍隊在一九四二年入侵緬甸，尚有其重要的戰略性考量。日本最高司令亟欲切斷經由緬甸北部支援蔣介石軍隊持續對日抗戰的補給線。自一九三七年從滿洲入侵中國之後，日本一直無法將節節敗退的中國軍一網打盡，益發感到挫折。蔣介石的勢力棄守中國大部分沿海地區後，撤退至內陸深處的重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敵對共產勢力，則在中國西北以游擊戰的形式抵禦日軍的進犯。

事實上，蔣介石的軍隊已退守至中國西南邊陲地帶，只能靠西方支持者，主要是美國人，從緬甸經由後方可靠地給與支援。因此，在世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進行的這一場生死存亡的抗

戰，緬甸具有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蔣介石退守內陸的國民黨流亡政府，於是藉由赫赫有名的「滇緬公路」，這條盤繞揮邦北部山區，經由臘戍（Lashio）跨越邊界進入中國西南的一條陡峭曲折的路，取得補給。超載沉重的卡車今天依然往返行駛在這同一條道路上。從一九三〇年代起，大量的物資抵達仰光碼頭，隨後被運往北上的一條漫長路途。

因此，對日本人來說，假使他們能夠占領緬甸，中國這極有價值的戰利品很可能就成為囊中物。一九四〇年夏天，英國新任首相邱吉爾在歐洲軍事及外交的緊迫情勢下，同意日本的要求，將滇緬公路關閉三個月，以緩和日軍在同時間裡對英國東南亞殖民地的威脅。但是一等這條路又開放，每個月大約有兩萬英噸的物資持續送抵國民黨手中，這令東京極為光火。重新開放滇緬公路無疑讓日本更想入侵緬甸。

然而，除了通盤的戰略考量之外，日本對緬甸的進犯，無疑也受到爭取獨立的大緬族主義分子的鼓動慫恿。他們急切地想要尋求盟友——有人說是任何盟友都好——來幫助他們擺脫英國的統治。

到了一九四〇年，前十年間與英國當局抗爭的各色學生團體，已經合併成名為「自由同盟」（Freedom Bloc）的統一陣線，雖說這些團體先前就有大量重疊，譬如「我緬人」組織、德欽黨人（Thakins）和仰光大學學生聯合會。年輕的學生翁山擔任自由同盟的總書記。德欽一詞在緬語裡是「主子」或「大人」的意思，通常用來指英國人。翁山及其同儕反諷地拿這個字當黨名，藉此主張他們才是緬甸的主人。

緬甸獨立抗爭的領袖翁山，一九一五年出生於緬甸中部的一個小鎮納茂（Nawauk）。反抗外侮的精神在家族流傳，翁山的舅公博敏勇（Bo Min Yang），曾奮勇抵抗英國的入侵。如翁山日後曾提到，他從小夢想著加入拯救緬甸的革命大業，但他的父母親自始至終更憂心的是，他直到六歲才會說話，他們擔心他是個啞巴。翁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高中時期表現過人，以亮眼成績在一九三三年進入緬甸最高學府仰光大學，一九三七年自英國文學、當代史和政治學系畢業。

翁山的個子不高，短小精幹，兼具實踐家與政治思想家的氣質，起碼是個政治謀略家，也是個滔滔雄辯之人，總之翁山天生具有領袖魅力。進入大學不久，他便投入學生政治活動和反殖民抗爭，迅速被公認為他那一代的緬甸民族主義的領導人。一九四二年，他與金姬（Kin Kyi）成婚，生下四名子女，老二就是翁山蘇姬（大兒子住在美國，完全沒有涉入緬甸政治，二兒子八歲時在自家花園的人工湖溺水身亡，小女兒出生後不久即夭折）。

一九三〇年代其他的學生領袖還有德欽努（Thakin Nu），即後來的吳努，緬甸獨立後的第一位首相，以及後來的軍政府獨裁者奈溫（Ne Win）。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巴莫（Ba Maw）博士，一九三七年英國將緬甸自印度分出來，在印緬分治的新憲法下，巴莫博士於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出任緬甸首位總理，但他反對緬甸加入二次大戰，結果被殖民當局以煽動叛亂罪逮捕入獄。參戰完全是倫敦單方面的決定，沒有和緬甸人商議過；這既成事實實在緬甸引發大量民怨，印度的情況也一樣。巴莫是個老派人士，政治性格和翁山大不相同，但他也加入了自由

同盟。

最先和仰光的日本領事接觸的是巴莫，他試探日方對緬甸爭取獨立的態度。日方表達認可，除為了日後可能的進犯，日本人也急於獲取更多情報、爭取更多同盟。在當時冒充為仰光的日本新聞特派員、大名鼎鼎的鈴木敬司上校的安排下，緬甸民族主義者和日本的結盟更形強化。雖然和日方搭起了這些聯繫，翁山仍舊在一九四〇年八月悄悄離開緬甸，為爭取獨立尋求外援，他帶了一張同志給的「空白支票」，打算跟最有利的任何國家或組織接觸。

根據他的口述，翁山首先企圖跟中國共產黨接頭，他認為在理念上，他與中國共產黨比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日本、左翼的緬甸民族主義者更契合。然而他還來不及接觸到中國內陸的共產黨員，就從台灣橫越海峽來到廈門島時，淒慘地被日本人攔截了。他隨即被匆匆帶往東京，接受了鈴木上校的提議。對翁山來說，他眼下「必須盡量把損失降至最少」。

如果說日本人和緬甸民族主義分子一開始的合作有點誤打誤撞，但在雙方均有利可圖的情況下，進一步的猶豫很快地煙消雲散。翁山和德欽黨的其他人——後來成為緬甸有名的「三十壯士」的一組人——祕密離開緬甸，在日本占領的中國海南島上一處特別建造的軍事場所接受日本人密集軍事訓練。這組人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反殖民緬甸獨立軍 (Burma Independence Army) 的核心人物。日本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入侵緬甸，緬甸獨立軍跟著日本軍前進，沿著暹羅／緬甸邊界號召並集結志士。三十壯士劃破自己的胳膊，以同一口銀碗汲取眾人之血，摻混酒之後輪流啜飲，誓言齊心為國盡忠。就如常被提到的，這是一群

非常年輕的有志之士，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四歲。緬甸民族主義者想要的都到手了：軍事訓練，以及積極的外來同謀。翁山似乎異想天開，以為日本人和英國人如火如荼開打之際，緬甸獨立軍可以伺機奪取政權，宣布獨立。

就日本來說，它不僅在緬甸取得一支對地形瞭若指掌的後備軍力做內應，而且在某個程度上，它多少也為自己的進犯找到合理藉口，即幫助亞洲同胞脫離英國（及美國）的帝國主義。就如日本官方審定的二〇〇一年新版歷史教科書裡說的，「日本發動戰爭的理念」體現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中，藉由這個自決自主的後帝國同盟，日本將領導剛被解放的亞洲人。這同一本教科書堅稱：「為了滿足這些地域裡的人民的期待，日本允許緬甸和菲律賓在一九四三年獨立。」³自戰爭開打以來，戰勝的西方強權，謹記著日軍對西方戰俘和亞洲民工所犯的恐怖暴行，譬如說在泰國／緬甸興建「死亡鐵道」(Death Railway) 的奴役虐待，都對日本人的這些「理念」不屑一顧。然而，當時無疑有一些日本人嚴肅看待這些理念，就像很多懷抱希望的緬甸人。確實，一九四三年，在日本入侵的將近兩年後，緬甸獲得日本正式授與概念上的獨立。日本扶植的緬甸新領導人巴莫，後來參加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東京召開的惡名昭彰的大東亞會議 (Greater East Asia Conference)，首相東條英機邀請日本占領區裡的傀儡領袖來慶祝新亞洲精神，即不受西方殖民主義宰制的亞洲。

這當然大部分是政治宣傳。不過就如研究日緬關係的歷史學者席金斯 (Donald Seekins) 寫道，它仍有「莫大的吸引力」⁴，尤其吸引著在自己國家上被多元社會排擠至邊緣的那些占多

數的原住族裔；不僅是緬甸的緬族，還有馬來人和爪哇人。巴莫在東京的會議上激烈地宣告說：「我身上的亞洲人血液一直在呼喚其他的亞洲人；不論我是睡著的夢，還是醒著的夢想，我都聽到亞洲對它子民的聲聲呼喚。」

他對「亞洲人」的定義，實際上僅限於緬族人。他肯定沒把譬如說印度人包括在內。大緬族主義加上日本式國族建構的混合，對於獨立後的緬甸有著深遠的影響。

悲慘的逃難潮

一九四二年，隨著日本軍隊和緬甸獨立軍橫掃緬甸、勢如破竹，迅速擊潰設備不良、指揮無方的英軍之際，緬甸獨立軍也轉向應付國內的問題。據大多數人的說法，緬甸獨立軍受到占多數的緬族熱烈歡迎，至少部分是因為緬族人一心想和他們眼中的僭取者印度人和其他群體算總帳。相反的，對很多印度人來說，即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甚至在日軍侵入之前就很清楚可見。一位名為納德·泰耶吉 (Nadir Tyabi) 的印度人，在印度人擁有的塔塔石油公司 (Tata Oil Mills) 任事，經常走訪緬甸各地，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記載道：

我總覺得，就世局看來，緬族人正等待機會要把印度人趕走，以重拾他們的地位，不管準備多麼不足……（印度人）已經開始躁動不安，我聽到零零星星的小道消息，一旦日

軍開始從南進犯，就會有大批印度人湧向仰光，從那裡離境逃回印度，主要是因為走海路是最快速也是最便宜的方式。⁵

泰耶吉預見了整起戰爭最可怕的事件之一，一場大規模逃難潮，在復仇的緬族人逼迫下，五十萬南亞人逃向印度。就如席金斯總結道：「在開戰後的幾個月，緬族人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了多元社會的問題。當英國人開始撤退，緬族暴民襲擊下緬甸城市與鄉村裡的印度人，數以萬計的印度人離開緬甸，往往是徒步逃離。」

還有成千上萬的其他人加入這些難民行列，其中包括英緬人和潰散的英軍。在當時，約有一百萬人出走，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強迫遷徙。這也是英國史上唯一一次所有官兵攜家帶眷跟著軍隊撤退。據估計，高達八萬人在逃難途中死亡，這些衣衫襤褸、飢病交迫又驚恐害怕的人潮，得要跋涉數百英里，穿越這片恐怖土地，逃向通往孟加拉、曼尼普爾、納加蘭 (Nagaland) 和相對安全的英屬印度的山隘，幾乎家破人亡。仰光亞美尼亞教會的一面牆上，至今仍掛著一個紀念碑，紀念「已故的阿若開耶·馬克提旭·米納斯 (Arakiel Mackerich Minus) 和伍絲庫姆·米納斯 (Wosoom Minus)，以及其所摯愛的孩子和孫子，他們在一九四二年集體遷徙至印度途中喪生」。下方列了十三個名字。

從緬甸悲慘又屈辱的撤退，不僅暴露出大不列顛帝國統治的薄弱，也預示著它在緬甸這特殊形態的殖民即將告終。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的悲慘撤退中倖存的人，很多從未再回到緬甸。英

國人自詡為緬甸多元社會的道德領頭羊，卻在仰光碼頭上演歐洲白人搶先印度人和緬甸人占光僅存的船鋪空位的一幕幕不光采景象後，完全瓦解。印度男性一律不得以甲板乘客身分出行，表面上的理由是要留住仰光的勞動力。他們被逼得不得不步行離境。類似的場景也在檳城上演，英國人搶在日軍抵達前撤離喬治市（Georgeown）。在那裡，逃命的英國人遺棄當地的華人，而這些華人比印度人更害怕強烈反共的日本人。

緬甸獨立軍不僅趕走印度人，也撲向國內其他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先前支持英國統治的民族，還有為捍衛印度人而戰的一些族裔。緬甸獨立軍痛擊譬如克倫族和克倫尼族（Karenis）等其他原住族裔所展現出的血腥殘暴，有時就連日本人也心驚膽寒；在某一次的襲擊中，克倫族和克倫尼族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四百個村落全數被摧毀，約有一千八百名親族慘遭殺戮，這一筆家仇血恨克倫族人永遠忘不了。在阿拉坎，緬甸獨立軍和當地的若開族人趁機突擊穆斯林羅興亞族人，他們聲稱羅興亞族人接受節節敗退的英軍武裝訓練。一九四二、四三年發生的血腥衝突迴盪了數十年。我所訪談的人，經常一開口就主動談起這些大屠殺和復仇的殺戮，或會從戰爭年代談起。在一個時間靜止的國度裡，人民對這些事件仍記憶猶新。⁶

就在戰爭即將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翁山眼看著日本就要戰敗，他機巧地改換門庭，帶著緬甸獨立軍投靠史林姆（William Slim）將軍麾下重新振作的英軍，史林姆將軍是英國在戰時表現最優秀的戰地指揮官。他的第十四軍團在印度邊境頂住了日軍對英屬亞洲帝國的進犯，並從一九四四年年終開始逼迫日軍退回緬甸。結果，大緬族主義分子往英軍靠攏後，反倒以戰

勝方之姿崛起。此時，緬甸獨立軍和日本人其實已經將殖民政權和經濟摧毀殆盡，衰弱的英國已無力再重新統治前殖民地，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英國同意緬甸宣布獨立。然而遺憾的是，由於飽受外國軍隊的一波波轟炸、洗劫和蹂躪，至此緬甸的經濟已經是一敗塗地，況且緬甸又缺少多元社會這戰前年代的成長引擎帶動，這國家從未真正復甦。

緬甸的光復本身，恰好是對緬甸多元社會獻上的最後一聲喝采，因為史林姆將軍麾下足足有七十萬人的第十四軍團，就是讓人眼花撩亂的多元族裔雜牌軍，一如戰前的緬甸社會。有位歷史學家推測，第十四軍團肯定「包含最多元的族群，這說不定是史上空前絕後的」，這支軍團的主力是印度人：拉普族（Pajpurs）、多格拉族（Dogras）、錫克族、捷茲族（Jats）、旁遮普族、阿希爾族（Ahirs）、阿米爾族（Amirs）、查馬爾族（Chamars）、拉瓦特族（Rawats）、米納族（Minas）、馬哈爾族（Mahars）、庫爾格族（Coorgs）、阿薩姆族（Assamese）、阿地瓦希族（Adivasis）、庫蒙族（Kumaonis）、帕坦族（Pathans）、布拉輝族（Brahuis）、莫族（Mers）、泰米爾族、特列古族（Telugus）、帕黎阿族（Paraiyals）、布茹阿曼族（Brahmans）、印度斯坦人、穆索曼族（Musulmans）、旁遮普穆索曼人（Punjabis Musulmans）、馬德拉拉斯穆索曼人（Madrassi Musulmans）和來自尼泊爾的廓爾喀族（Gurkhas）。此外還併入了來自東非和南非的各種軍隊，包括來自奈及利亞的豪薩族（Hausas）、伊布族（Ibos）和約魯巴族（Yorubas），來自獅子山共和國的曼迪族（Mandis）和提米尼族（Timinis），來自烏干達的巴干達族（Baganda）和阿寇爾族（Achole），以及來自索馬利蘭的索馬利族（Somalis）——除此還有紐西

蘭白人、澳洲白人、加拿大白人和南非人，更不用說蘇格蘭人、威爾斯人、愛爾蘭人和英國人。⁷

位於今日仰光近郊的濤建 (Tadkyan)，有座占地廣大又維護得很漂亮的英聯邦戰爭公墓，默默見證著收復緬甸的第十四軍團的犧牲奉獻。素樸白石碑上刻的無數人名，來自世上的每個角落，證明該軍團的多元性，而抵死奮戰的士兵們所要保存的那個社會，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們抵達仰光時已經差不多消失殆盡。縱使如此，最後在被「解放」的城市。裡高舉英國國旗的，恰好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蒙希夫·可汗 (Mohammed Munsif Khan) 的印度人。

全面封鎖

從一九四八年獨立到一九六二年，一個積弱不振又受困於內戰和共產黨叛亂（這是更後來的事）的國家，在第一任總理吳努相對溫和的領導下蹣跚前進，舉辦了幾次民主選舉。然而在一九六二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軍方取得政權，廢除憲法並解散國會。奈溫宣告「議會式民主不適合」緬甸，改以透過「革命委員會」執政。緬甸自此與現代世界隔絕。五十餘年之後，它仍在返回現代的路途上奮鬥。

帶有部分華入血統的奈溫，曾是三十壯士的一員，於一九四八年被任命為軍方首領。政變不久，他的軍方同謀，無人不知的「將軍們」，成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 (Burmese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這是新的執政黨，也是一九六四年之後新政權唯一合法的政黨。它也是自此在緬甸執政的所有半軍方「政黨」的先驅。

該政黨的新理念即惡名遠播的「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力挺新政權的目標與抱負的史學家們把它描述為：「就構想上，它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就實踐上，具有列寧主義色彩；就目標上，具有佛教色彩。」其他大多數評論者對於這套已經在別處證實是災難一場、毫無章法、令人費解又過時落伍的政治經濟空談，可就沒那麼寬厚。在緬甸也證實是場悲劇。

它的核心思維是要打造一個共產主義式的國有化經濟。實際上，這政策的一大要旨，是要把外來的、私有的企業統統逐出緬甸，打造一個獨厚緬族人、由緬族人把持的經濟體制。於是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將矛頭指向了多元社會。戰爭期間多元社會雖挨了一記重拳，但直到此時經過精心策劃、有系統實施的步驟，才徹底瓦解了殖民經濟。

一九六三年，新政權頒布「企業國有化法」(Enterprise Nationalisation Law)，賦與政府接管大企業的權力，最重要的是，它也接管外國人所有的企業。在一片倉促中，一波往往在槍口的威脅下進行的國有化行動開始了。外國人的企業全數被政府接收，補償條款則語焉不詳。這做法有效地剝奪了外國人的生計，迫使他們離開。最先出走的公司之一是伊洛瓦底汽輪公司。所有的外國銀行，其中有半數是印度人開的，也被收歸國有，後來被合併成一體，即知名的緬甸人民銀行 (People's Bank of Burma)。國際性的大銀行也蒙受其害，像是標準渣打銀行。真正受苦最深的，是大多數身處仰光市中心和殖民時期其他貨物集散地的數十萬南亞人、華人和其

他小商人。

留在仰光的人仍記得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這一天，軍隊進城來，把能搜刮的都搜刮走了，剩下的則被勒令停業。在五十年左右的軍事獨裁下生活過來的居民，仍然不願意談起這些事，更別說願意具名，但你若打破砂鍋問到底，他們可是記憶深刻。一位高個兒卻駝背的古吉拉特人，住在二十六街，英語說得非常流利，他告訴我，他當時二十五歲，在自家的五金行工作。在槍口威脅下，他被命令要關閉店鋪，並被保證說會得到補償。「我還在等。」他說。他的家族大部分都離開了，但他留了下來，後來開了一家油漆店。對於當今想來緬甸投資的人，他直言不諱地說：「不要相信這些人，不要在這裡開工廠。」他非常懷念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人把這裡建造成全世界最漂亮的城市，他們制定法律，教育我們，建設這個國家。」街頭巷尾經常會聽到這種論調。

另一個古吉拉特人告訴我，軍隊不僅關閉他的腳踏車維修店，也沒收了他在碼頭的兩個倉庫，連同倉庫裡的所有物品。他們也凍結他的銀行帳戶，加上後來實施的貨幣停用，他所有的存款一瞬化為烏有。他留了下來，他說，但所有的孩子和姪甥都離開了，因為新緬甸的機會顯然愈來愈少。他的兒子是一名醫生，住在英國，他的女兒住在孟買，也是醫生。當這國家墮入貧窮，醫療體系已然崩塌，他們都是緬甸亟需的人才，但當權者似乎毫不在意人才外流。

加總起來，大約有四十萬印度族裔被迫離開，他們的家族通常已經在緬甸立足了好幾代。大約有十萬左右的華人也離開，在一九六七年仰光發生反華暴動之後，更是加速出走。儘管奈

溫也有華人血統，但說不定正是這個緣故，他對華人尤其心狠手辣。他下令關閉華人學校和華語教學機構。很多人認為，一九六七年及之後的反華暴動，是軍政府在幕後唆使；華人商店被搶劫，學校被縱火，逼使更多華人離開，成千上萬的英緬人也出走。

奈溫發給每個離境的印度商人一筆小錢，嘲弄地聊表補償。緬甸新政權的種族歧視和吝嗇，令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Jawaharlar Nehru) 主政的印度政府大為反感，於是派遣渡船和飛機接僑胞返鄉。但還是有印度人喜歡緬甸的生活，因此有三分之二的人留了下來。不過根據一項估計，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早期，仰光的非緬甸人口已經從超過五成以上降至百分之七左右。¹⁰

這些作為顯然讓當時很多緬族人——還有阿拉坎族人——大聲叫好。此外，雖然緬甸處理多元社會問題的作風和區域的鄰國譬如馬來西亞和印尼很不一樣，但是手法如此殘酷的政權不只有緬甸。另一個英國前殖民地烏干達，採取了更殘暴的手段來對付該國的南亞社群，這些南亞人是在十九世紀中期隨著殖民統治遷移到那裡的。盛傳會吃人肉的癡狂總統伊迪·阿敏 (Idi Amin) 在一九七二年直接下令，要求近六萬名印度移民（大多數是古吉拉特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有）即刻離開烏干達，他聲稱夢見上帝指示他驅離印度移民。雖然印度移民在烏干達長期受到差別待遇又被汗名化，但這些印度移民還是事業有成；他們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營收卻達全國收入的五分之一。就跟緬甸一樣，把亞洲人驅逐出境是大多數烏干達人所樂見的，這也讓阿敏的支持度攀升。當時阿敏掌權不過一年，且持續統治（摧毀）這國家七年。

的確，在其他幾個國家裡，後殖民時期的統治者對於印度人不是給與差別待遇，就是把他們

們趕走，而這些印度人從前是在英國的鼓吹下前去英屬殖民地發展經濟，有時是為了取代奴隸。在斯里蘭卡、坦尚尼亞、肯亞和南非，當新的統治者試圖打造在種族和文化上更趨於同質的國家時，印度人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打壓。斯里蘭卡的印度泰米爾人大概是境遇最悲慘的；長達近二十年的泰米爾暴動，最後在二〇〇九年於該島東北海灘上的一場血腥屠殺，被僧伽羅人（Sinhalese）^①為主體的軍隊所殲滅。

在烏干達，驅逐亞洲人對國家經濟帶來嚴重衝擊。這些亞洲人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事業版圖遍及海外的印度實業家，他們創造的營收占全國財富的絕大多數。他們當中很多是商人和銀行家，然而他們在烏干達的資產被阿敏及其親信沒收後，事業大體上也毀了。在緬甸的情況也一樣。數萬人被驅逐之後，曾讓仰光和緬甸致富的技術、資金和貿易網絡也一併流失了。儘管遭受二次大戰的蹂躪，國家獨立之際又爆發種族內戰，但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仰光仍舊是相對富裕的城市。譬如說，仰光當時又逐漸成為區域性的商業及運輸樞紐，它的飛機場被視為東南亞最先進的，在區域上的地位就像今天的新加坡一樣。

然而不過十年光景，仰光的光環盡失。串連區域內商業社群的貿易銀線，若不是全數斷裂也已經磨損。仰光就像烏干達維多利亞湖畔同樣破敗的城鎮金賈（Jinja）的翻版。金賈是印度社群聚居的地方，很多出色的建築顯然都帶有印度風格。然而，烏干達的亞洲人被趕走之後，無人維護那些建築和俱樂部，這曾經繁榮一時的城鎮，感覺起來和仰光一樣荒涼。

仰光的多元社會，這個最初激發傅尼凡省思的那個社會，是今日全球化城市的先驅，累積無數的財富。一九六〇年代外國人（包括傅尼凡本人在內）被驅離之後，緬甸經濟的急遽衰退絕非巧合。黑市活絡，尤其是在邊境地區，但正規的經濟從未復甦。

舊時的緬甸是封建的農業社會，商業活動從來不怎麼熱絡。商業文獻裡所有的經驗證據均指出，從創新和生產力的角度來看，多元化與移民帶來了好處。來到仰光、毛淡棉、曼德勒和緬甸其他殖民城市的移民，絕大多數在抵達時都一貧如洗，因此他們有極大的動力要讓自己發達，連帶地也促使這國家發達。

一九六二年上台的軍政府，最終把這國家帶向令人扼腕的毀滅。當種族歧視驅逐了多元性與創造性，商業也因而枯竭，尤其是仰光開始墮入可悲的荒涼破敗。這城市大半被肆意蔓延的熱帶氣候所吞噬，不見任何養護建築物的措施。將軍們的「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政策，實際上意味著經濟上的鎖國。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當將軍們終於承認社會主義政策失敗，開始改弦易轍，採行某種的裙帶資本主義時，大部分的傷害已經造成。

結果，使得亞洲其他大城市脫胎換骨的經濟發展湍流，就這樣跳過了仰光。在雅加達、吉隆坡和曼谷，戰後急遽的工業化和全球化，幾乎抹去了傅尼凡所謂的「現代熱帶經濟」的最後特色，原本一排排的家庭式經營小店，被換成大型購物商城，裡頭充斥著電漿電視、設計師品牌和美容整形手術。只是大多數亞洲人絕不會後悔。

^① 編註：僧伽羅人是斯里蘭卡最主要的族群，占總人口的七成五以上。

包容的美德與利益

戰前仰光城裡富有而自豪的歐亞族群，現今所剩無幾。留下來的猶太人僅有二十名左右，在海外資金的協助下，為維護猶太會堂奉獻心力。就像有同樣遭遇的很多族群，他們飽受雙重打擊，先是一九四〇年代初的日本占領，繼而是將軍們的國有化計畫。逃過第一次劫難後回到仰光來的少數人，怎料竟又要想辦法避開第二次劫難。亞美尼亞人的遭遇更悲慘；到了二〇一三年，僅有兩個家族留下來，其中一家族的長老貝西爾·馬丁（Basil Martin），從前是電子工程師，現今已八十七歲，病弱體虛。另一家族的長老李察·「迪奇」·米納斯（Richard “Dicky” Minus），五十八歲，相對上精神矍鑠，負責修繕他們的教會。「從我祖父的年代起，我就來到這裡，」他告訴我，「我父親和祖父都是教會理事。」禮拜儀式減為一個月兩次，由英國國教會的牧師主持。通常有五或六名信眾，他跟我說，信眾的人數偶爾會增加，如果前南斯拉夫大使一家人和一位獨居的俄國人出席的話。迪奇以前靠維修舊英國車和日本車做點小生意，現在已經退休。他告訴我，他打算在此終老，就算所有人都走了也一樣。

將軍們醞釀的新仇外氛圍，隨著一九八二年頒布的「公民法」（Citizenship Act）終於轉為法律。這項立法核可了既存的歧視性措施並編成法規；唯有原住民——在一八二三年之前已經定居在這國家的民族——的後裔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其餘的人如果有公民權的話，也只能

到某種次等級的公民權。一八二三年這一年可不是隨便挑的，那是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英國人開始持續占領緬甸的前一年。因此，這條法規試圖將時光倒轉，回到緬甸被殖民之前的極樂世界，拒絕賦與隨著英國人來的所有族裔公民權和機會。所以直到今天，最初的印度移民後代（大概多達兩百萬人）和華人移民後代常常還是無法取得護照或身分證。加爾各答的印度學者賓諾達·庫默·米希拉（Binoda Kumar Mishra）博士，稱那些人是「世上數量最龐大的無國籍印度人」。

這種差別待遇也針對印緬通婚的家庭——任何血統不「純正」的人。因此，這些人進不了公立大學，也不能在政府機關任職。儘管這些人的家族在緬甸通常已經居住了起碼四代或五代之久，而且往往和緬族通婚，但真切地來說，他們在這國家的法律上並不存在。

即便是少數那些想盡辦法——通常要付上夠多的錢才成——弄到公民權的非緬族人，仍然受到嚴重的歧視。以英緬人來說，也就是英國殖民者和本土緬族通婚所生的後代，他們的產業——主要是在毛淡棉附近的橡膠園——在一九六二年被收歸國有之後，大部分人都離開了。大多數前往澳洲、紐西蘭或回到英國。只有少數留下來，譬如毛淡棉的格蘭·覺紐，但是他和家人們也被猛烈排擠在主流的緬族生活之外。國有化之後他的家族失去產業，他母親在毛淡棉和苗眉（Maymyo）辦得很出色的學校也被迫關閉。格蘭和太太當初留下來是為了照顧年邁的雙親，後來純粹是忘記要離開。「我們只是努力『融入』。」格蘭說。他們得到次級公民權，因為他們血液裡的英國味有效地取消了完整公民權的資格。在他們登記身分的毛淡棉移民局裡，

他們被歸類為英／緬人，而且被加上「(可疑)」的註記。他們的女兒嫁給緬族人，聰明年輕又受過良好教育，原本想當救護見習隊員，但也因為具英國人血統又是基督徒而遭到拒絕。

她的技能，在緬甸被埋沒了。這官方背書的緬族優越主義，讓這國家喪失了大量人才、資金和商業動能。緬甸若要再度富強，必須再找回真正的多元性。殖民式的多元社會排擠緬族人；未來真正多元主義式的社會將必須欣然擁抱那些被緬族國族主義所排擠的所有人。

值得謹記於心的是，傅尼凡筆下在一九四八年被摒棄的多元社會價值，在現今所受到的重視，遠非傅尼凡年代可想像的。他談到的「每個群體都保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語言，保有自己的觀念和做法」，其實是一種批判。在他看來，這現象不利於更廣大的社會凝聚力，因為像仰光這般城市裡的多元族群既不融合也不通婚。這見解在當時也許真切，不過各色族裔之間也沒有彼此迫害或侵擾，而且令人稱奇的是，至今依然如此。

就當代的眼光來看，這確實是仰光的多元社會的一大優點；它也許排擠原住民族，但是在移民本身和殖民當局所共同設定的疆界和權限內，它曾是個和睦融洽的社會，現今也是。就如前面提到的，移民帶著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來到仰光，在方圓數英里的範圍內擠進各式各樣的教堂、清真寺、廟宇和會堂。在世上很多地區經常上演的血腥宗派衝突和種族仇恨，似乎不曾在這些老舊街區出現。今日的仰光市中心，隱沒在世界的一隅，歷經動盪飄搖還是挺了過來，依然是多元宗教和諧的出色模範。當今可與之媲美的，也許只有在文化與信仰上有著醉人多樣性的紐約，不過以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的氛圍來看，仰光大抵是無與倫比的。

在這裡，你幾乎不會想到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在別處發生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的殺戮。拿木斯米亞約書亞猶太會堂來說，入口的一側是一排油漆店，全是穆斯林所有。山米·山謬斯告訴我，如果他或其他理事必須稍微挺身而出，這些店家老闆會捍衛這猶太會堂，在光明節(Hanukkah)②的慶典之後，他們也會幫他清理場地。更有意思的是，山米介紹我認識猶太會堂的看管人阿斯朗(Aslan)，而他是個遜尼派穆斯林。阿斯朗在這地方打掃、看守三十年了，在他之前阿斯朗的父親也在此看管好多年。會堂把所在處的一小塊地出借給他做為部分酬償，他在那塊地上開了一家茶館。阿斯朗的祖父從北印度移民過來，上遜尼派清真寺做禮拜，就在同一條路往下的兩百碼之處。我認真地問阿斯朗，身為穆斯林，在猶太會堂工作有沒有碰上什麼問題，但他只是一臉不解。他的家人和山謬斯一家子處得非常好。「在這裡上班沒問題啊！這裡歡迎所有人來。」我和山米談到這世上會不會有另一個雇用穆斯林員工的猶太會堂，他認為孟買可能有另一間，但他不確定。

事實上，木斯米亞約書亞猶太會堂在被稱為班貝坦鎮區(Pabedan Township)的穆斯林區正中心，四面幾乎都被清真寺和經書院(madrasas)圍繞。這一區大多數人是從古吉拉特移民而來，普遍仍自稱是古吉拉特人。猶太會堂的正後方是埃雷哈迪斯遜尼賈瑪(Enlay Hadees

② 編註：猶太人的節日，為紀念西元前一六五年猶太人從塞琉古帝國(Selucid Empire)手中奪回耶路撒冷，將第二聖殿重新獻給上帝。

Sunni Jamay) 清真寺，建於一九〇三年。寺裡有位古吉拉特人，他並不在意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他告訴我，他是在一九四八年跟著父母親一起來到緬甸；目前會上清真寺做禮拜的只有十個人，全都是同一家族。當我問他，清真寺和猶太會堂離這麼近究竟有沒有問題，他的神情也隱約有些困惑。從猶太會堂順著二十六街往下不遠處，有一座遜尼派穆斯林經書院，建於一八八四年。經書院裡住著來自（當時的）孟買的家庭；他們每晚迎接兩百五十位學生。再隔幾戶就是阿斯科的遜尼派清真寺，最初建於一九二三年。

仰光最大的清真寺——至少上那裡做禮拜的人自豪地如此聲稱，大概在幾個街廓外的瑞波沙街上。蘇拉特遜尼賈瑪 (Surti Sunni Jama) 清真寺的歷史超過百年，砌著青色和白色磁磚閃閃生輝，禮拜殿分上下層。內有冰涼的大理石地板、淨身池和充足的風扇，仰光的清真寺是躲避戶外灼熱熱氣的宜人場所。下午一時的禱告結束後，很多信徒在禮拜殿外有霉味的舊地毯上四肢舒展地躺著，假寐養神。

仰光七十座左右仍在使用的清真寺裡，只有兩座屬於什葉派。¹¹ 緬甸境內有九座什葉派清真寺，相較之下遜尼派的禮拜殿卻有兩千五百座之多。屬於少數的什葉派，在仰光的人數大約是一萬人，他們從沒提過和遜尼派穆斯林社群有任何瓜葛。當自古以來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分裂在敘利亞、伊拉克和中東其他地區以及鄰近的馬來西亞及印尼加深、加劇，在仰光的什葉派和遜尼派機構往往坐落在同一條馬路上相安無事。佇立於摩訶班都拉路和三十街的轉角，是仰光最大的什葉派清真寺。這座蒙兀兒什葉清真寺大概是仰光所有的清真寺當中建築最宏偉的一

座，它的宣禮塔高聳於周圍街道之上。目前的結構體是在一九一八年完成的，取代了一八五四年建造的原初木造建築。我和蘇拉特遜尼賈瑪清真寺裡的遜尼派信徒交談時，引不起任何人對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競爭甚或敵對表現出興趣。蘇菲教派 (Sufi) ③的一些傳統思想在遜尼派社群裡的強烈影響，似乎在緬甸造就出更具包容力的伊斯蘭教。「我們在這裡相處得非常融洽，」其中一人說，「這全關乎心靈，我們包容彼此，了解彼此。」

於是，形形色色多得出奇信仰和聖所持續存在。當我站在二十九街上，一間有著讓人不敢恭維的橘色立面和柱廊式窗戶的至尊薩蒂亞納拉揚 (Shri Satyanarayana) 印度廟宇外，一位穿著帕索 (pasoe) 和白襯衫、正走過公車站牌的好心人問我，想不想進去參觀。想，麻煩了。他自我介紹說名叫阿迪·戈普塔 (Ardi Gupta)，他祖父從勒克璦 (Lucknow) 搬到二十九街，阿迪和兩個女兒、三個兒子就住在祖父住過的房子裡。他會說英語、緬語和印地語。這座廟宇很乾淨，維護得很好，諸神被漆得亮麗而且穿著衣袍。釋迦牟尼佛有個別的神龕。

堅固的英國國教會教堂、天主教堂、衛理公會教堂和其他的基督教堂，大部分蓋在市中心區的邊緣。聖三一教堂，英國國教會的天主堂，建於一八八六年，有一座獻給二次大戰的盟軍烈士的附屬小禮拜堂，最近剛修繕完畢。在這十足蘇格蘭風的城市裡，位於大塔路 (Signal Pagoda Road) 的長老會教堂（目前的單調建築建於一九三一年，在皇家公園飯店對面）成了實

③ 編註：伊斯蘭教中神祕主義教團，以追求精神層面提升，嚴守生活規律為教旨。

質的蘇格蘭教堂，有個暱稱叫蘇格蘭教會 (Scots Kirk) ④。

駭人的熱帶氣旋納吉斯 (Nargis) 在二〇〇八年橫掃仰光，導致數千人死亡，猶太會堂舉行多重宗教團體的聯合禱告。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猶太教徒一同參加。「我們相處融洽。」山米·山謬斯這麼說。他說，參加緬甸平安旅行社行程的一些美國猶太觀光客，一開始會因為這會堂的所在處四面被穆斯林商店、穆斯林、穆斯林學校和清真寺包圍而「嚇到」。他們以為會受到敵視，但後來看到所有人和睦相處反而「震驚又驚奇」。

在仰光也有薩拉菲派教徒 (Salafists) ⑤，緬甸伊斯蘭中心的負責人埃倫 (Aye Lwin) 這麼說。他說，在別處這教派被視為有點邪惡，但是在緬甸，這僅意味著伊斯蘭非常多樣。埃倫補充說，緬甸的伊斯蘭最大的特色是「非常寬大又溫和」。他自己也是混血兒，就像仰光市中心很多人一樣；從這角度來看，傅尼凡所持的多元社會裡不同「群體都保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語言，保有自己的觀念和做法」的論點，如今已經過時。然而緬甸當局肯定不想承認這一點，因為這會顛覆他們承襲自英國、小心翼翼建構的族裔分類。埃倫的父系有部分阿富汗血統，母系有孟族和緬族血統，而他嘴裡又冒出最正宗的英文。為什麼宗教信仰和祖先大相逕庭的這些人會相處得如此融洽？他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這裡的所有不同種族依然被一件事結合在一起，那就是商貿。」

④ 譯註：低地蘇格蘭語。

⑤ 編註：遜尼派中以薩拉菲主義為基礎的極端保守運動，反對任何形式的創新與異端，嚴守伊斯蘭教法。

第三章 緬族化運動

對於當今的遊客來說，要想了解緬甸的執政將軍們想像中，不受外國甚或少數族裔勢力污染的純正緬甸是什麼模樣，只要前往新首都奈比多瞧瞧就知道了。在很多緬族人眼裡，仰光始終是被殖民的恥辱象徵，然而從昔日的英國首都北上兩百英里，你會遇見一個夢幻般復古的緬甸。世上還有其他人工得出奇的首都——澳洲的坎培拉和奈及利亞的阿布賈 (Abuja) 瞬間浮現腦海，但奈比多肯定是最詭異的一個。

在這裡，軍政府企圖重現古老的緬甸王國，彷彿這國家近代的大半歷史從未發生過。他們在奈比多（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重建了古代的阿瓦皇都和曼德勒，想必是希望人民感染到先人對古代緬族君王的敬畏。奈比多一字直譯是「太陽皇城」。新首都也被稱為王居，或王都。

沒有人確知軍政府——尤其是獨裁統治者丹瑞 (Than Shwe) 大將軍——在二〇〇〇年代早期相中這地點的原因何在。奈比多位於緬甸中央地區的邊緣，人稱的乾燥地帶，遠離易受攻

擊的沿海地帶，因此始終有個揣測是，從仰光遷都至此是因為軍政府考量到，美國萬一從海上進犯，舊首都將首當其衝。在當時，這樣的憂慮不像在今天看來的那麼思慮不周。小布希政府當時把緬甸歸為世上幾個「暴政前哨國」(outpost of tyranny)之一，而且美軍正忙著擊垮伊拉克和阿富汗這類前哨國。那是「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年代，儘管緬甸並沒有被明白列入軸心國，但小布希總統及其幕僚錯過了他們對緬甸軍事統治者表達反感的少數機會。舉例來說，美國國會在二〇〇三年通過「緬甸自由和民主法」(Burm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t)，正式賦與美國總統在緬甸「建設民主」的權力，並在軍政府垮台後對該國的重建預作準備。在丹瑞那一幫人聽來，這簡直是美方下令要發動政變；一些喜歡說教又愛干涉的美國國會議員還真希望該法的立意正是如此。

奈比多是在極其隱密又倉促中建造的。曾經參與該計畫的一位工程師告訴我，有超過三萬人參與建設，主要是接受建設部、住宅及人居所局指揮，人數很可能一度高達八萬。因為施工倉促，他說，當第一批政府官員現身上班時，馬路還沒修好，供應自來水的地方沒幾處，可入住的大樓還沒接上電線。

為取得土地以興建不斷擴張的新城市，當地好幾個村落被摧毀，我這位工程師說，有些村落得到補償金，但很多沒有。此外，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一份報告斷言，起碼有兩千五百名當地村民被強徵去建造新首都裡的軍營。我這位工程師說，由於完工時程緊迫，加上貪汙成習，「承包商良莠不齊，也很少控管品質。」結果造出了一座華而不實又粗製濫造的都城，可說是將軍們行事風格的一個明證。儘管大部分的建築物看起來雄偉壯觀，但細看之下你會發現磁磚鬆脫，窗戶嘎嘎作響，鐵製品鏽蝕。外交部大樓看起來就像五十年前蓋的。

儘管施工粗劣，奈比多肯定還是讓這麼一個極度貧窮的國家耗費了數億美元。就連將軍們最可靠的友邦中國，在短時間內也對這整件事的荒唐愚蠢感到不滿，原因之一，是該工程挪用了緬甸原本要還債給中國的資金。在昔日西方盟友頻頻挑撥下，據說中國這一回相當惱怒，以致二〇〇六年初在仰光大使館網頁上短暫發文，批評遷都一事的開支與濫用。

幸運兒

了解奈比多謎團的關鍵，在於洞悉奈溫與丹瑞兩位將軍的性格，他們自一九六二年起先後在緬甸執政，而後者正是奈比多的創建者。奈溫自一九六二年起正式執政，直至一九八八年，下台後仍在幕後掌權多年，而丹瑞自一九九二至二〇一一年在位。想想兩人在緬甸握有的權力之大，主政的時間之久，對比之下，外界對這兩號人物的認識卻是相當稀少。至少從丹瑞寥寥可數的幾張滿臉橫肉的肖像照，確實透露出他在位時的暴虐不仁。可以確定的是，為了讓執政具有正當性，他和奈溫汲汲營營要喚起緬族尚武的昔日盛世。儘管他們出身低微，但很多證據顯示，兩人都自稱是古代緬王的後裔。奈溫的幾段婚姻之一就娶了個末代緬王的後代。¹

軍事背景對他們來說顯然很重要，占星術也是。數字命理學和占星術深入滲透緬甸文化生

活，奈比多發生的一些光怪陸離的事，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都和算命和占星大有關係。這兩位將軍頗好此道，緬甸古帝王也有同樣嗜好，大多數人民也是。他們那一代的男男女女家裡有占星書和星座盤，就連做一個小小的決定也要翻出命盤來看的，這相當尋常，今天緬甸很多的年輕人依然如此。

最有名望的一些占星師，可以在仰光大金塔北面入口處沿著階梯兩側擺設的小棚子內找到。我認識的一位年輕的緬甸朋友，手機裡就下載了便利的占星APP軟體，她帶我去見其中一名占星師。她覺得他奇準無比，每當生活遇上重要關卡，她都會找他算運勢。她的人生似乎被流年運勢所支配，不論吉凶，就像她對翁山蘇姬的欽佩和對全民盟的支持左右她的生活。她跟我承認，為了避免頭髮分岔，她每星期只在特定的幸運日洗頭。

我見了占星師薩亞耶希圖(Saya Khang Si Thu)，一位可親健談的人，他所在的小空間裡擺滿了鮮花、書籍和星盤，牆上掛著兩幅水瀑的大海報。我報上我的生日，透過幾張星盤和一些快速運算，他算出我是個寫作者和教師——這兩項都算對了。我的緬甸朋友跟我說，這部分是占星師法力的重要測試；假使他這方面算錯了，顯然是江湖術士。薩亞耶希圖也算出，我的幸運數字是一、四、七。這些數字的任意組合對我來說都是吉利數字。譬如說，假使我受邀到友人家裡吃晚餐，友人家若是在皮卡迪里街五號、十一號或四十七號，我就該去；若在三號、六號或十五號，就絕對要避開。我的幸運色是天藍色，看似如此，而且我應該和家人一起在（真正的）瀑布前合照，這樣才能提升好運勢。為了這些寶貴資訊，我遞給他五塊美元。薩亞

耶希圖的棚子外排了長長人龍，所以我快速穿越隊伍。

我對自己的幸運數字興趣不大，但緬甸將軍們可相當著迷——還給國家帶來禍害。奈溫出了名的迷信數字九，迷信到他在位時把緬甸經濟搞得急遽崩壞（可參見第六章）。同樣具爭議的是一百三十五個族裔這份名冊，這名冊是緬甸政府從英國接收的，所列族裔在一九八九年經官方認定為法定族裔時，名冊才首度曝光。然而這份古老清冊隱含無數明目張膽的罪惡——無論有作為或無作為，並且後來在二〇一四年備受爭議的全國人口普查中派上用場，人們只能揣測，將軍們想要維持一百三十五這數字，是因為這三個數字加起來是九。

一般認為，監督一九八九年天文館興建工程的是奈溫，這座天文館靠近仰光的公家機關區，非常方便。承蒙日本出資而蓋成的天文館在人民公園的一角，靠近大金塔。之所以建造天文館，官方的說法是提升科學教育，而某個年紀的緬甸人仍記得被老師帶去參觀的情景。一位見多識廣的記者斷言，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讓緬甸領導人在做任何重要的決策之前觀測星象。想當然耳，它經常對大眾關閉。²

奈溫將軍只不過是追隨篤信先兆、數字和星象的歷代統治者。一九四八年，頗受好評的獨立緬甸創建者對於翁山將軍在前一年遇刺一事仍餘悸猶存，他們打算讓這個新國家盡可能有好的開始，於是要求即將撤離的英國人和其他外交人員，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清晨四點盛裝集合，見證宣布獨立的一刻。這時辰是星象師認為的良辰吉時。

奈比多的創建人丹瑞將軍，更是迷信占星和數字命理，而新首都的設計與規劃，據信都是

依此而來。於是，仰光的公務員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早上的六點三十七分整，開始動身遷往奈比多的新辦公室，看來丹瑞的幸運數字很可能是六。新首都的吉祥數字是十一，因此打頭陣的十一個部門後續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早上十一點開赴新都。同樣的，根據某些目擊者的描述，頭一批從仰光出發至奈比多的隊伍，出動一千一百台軍用卡車，載著十一個步兵團連同那十一個部門的公務員。經過幾年的施工，新開張的國會終於在一個古怪的時間，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早上八點五十五分，開始它的第一個會期。

如果占星術確實在奈比多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倒也符合我們對舊時緬族宮廷與君王迷信占星術的理解。譬如說，緬族皇朝通常會因為有惡兆出現，而在宮廷占星師的建議下遷都。一七八三年皇都從阿瓦遷至阿馬拉普拉，一八二三年又因為一隻兀鷲棲在宮殿尖頂上的凶兆再遷回去，隨後不久這城市大部分地區便遭祝融之災。歷來緬族皇都的遷移，總共不下十次，都是出於戰略和星象上的考量。在這樣的脈絡下，遷都奈比多倒也沒什麼大不了。

奈比多的總總無非是要喚起緬族皇朝光輝的過往與傳統。在這個願景裡，不見多元社會的出現，構成緬甸當代人口大約三成五的少數族群也從未存在。對緬甸歷史的這種單一詮釋，或者應該說是緬族皇朝的史觀，在奈比多處處可見。緬族最有名的戰士君王阿努律陀（Anawrahta，一〇四四至一〇七七年在位）、莽應龍（Bayinnaung，一五五一至一五八一年在位）和雍笈牙（Alaungpaya，一七五二至一七六〇年在位）的巨大雕像，聳立於彬馬那（Pymmana）附近龐大的閱兵場。這些君王積極發兵攻占各地王國，將緬族的疆土擴張至今日的泰國和印度境內。

根據丹瑞的傳記作者羅傑斯（Benedict Rogers）記述，一九六二年軍事政變後，丹瑞最初被指派的工作之一，是擔任仰光政治科學中央學院的教師。在這裡，他不僅對年輕的軍校學生灌輸奈溫「具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套意識形態信條，還教授緬甸史。羅傑斯道，這也許能解釋「丹瑞何以對緬甸古代戰士君王著迷，並且把興建的新都視為王居」。外交官前去拜會時，往往要聽他長篇大論講述他個人詮釋的緬甸史。丹瑞生於一九三三年，在他被派到中央學院教書之前，大致上沒受過教育，因此出身行伍的他，很可能著迷於緬族昔日的富國強兵、阿瓦王朝曾是稱霸一方的強權這種簡化的想像。

出了奈比多市中心不遠，有一座烏帕塔桑蒂佛塔（Uppatasanti Pagoda）。這是直接抄襲仰光大金塔的複製品，只不過稍微矮一點。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這座九十九公尺高的佛塔啟用時，丹瑞和家人前來獻禮。二百零八英尺高的「大聖旗桅」矗立在其中一個角落，底座上有銘文寫著，這根旗桅是「向壯麗的烏帕塔桑蒂佛塔致敬，其無價的寶石與精湛的工藝在神聖……緬甸聯邦奈比多皇城的山丘上熠熠生輝」。和仰光大金塔不一樣的是，這佛塔內部空空如也，牆上繪有一系列巨型壁畫，描繪佛陀一生的重大事跡以及緬族國王的日常生活。在這裡，宗教、王權和當代軍人統治者明明白白交織纏結。

打從一開始，將軍們為了穩固政權，就急於籠絡這全國性的宗教，使之成為全面掌控國家的另一個機關。僧侶團體——在緬甸稱為僧伽（sangha）——在殖民政權眼裡一直代表著抵抗勢力的重要觀點，因此將軍們竭盡所能避免這同一股勢力會挑戰他們的威權。奈溫設立了大頭

領 (Maharayaka, 或簡稱 mahara), 這個委員會的四十七名僧侶全數由政府任命, 目的是為僧伽制定政策。後來在各省和鎮的層級也設立仿效大頭領的組織, 上下貫穿了政府體制。

大頭領的設立, 意在呈現仁厚的親佛教政府與僧伽融洽合作的印象, 但很少有僧侶上當。曼德勒最重要的寺院住持阿利亞萬沙·比萬薩 (Ariyawuntha Bhivansa) 告訴我, 大多數的僧侶都不接受大頭領——「他們和獨裁者沒兩樣, ……這些僧侶根本是獨裁者的翻版, 一心想控制僧侶。」11007年的番紅花革命 (Saffron Revolution) ① 終究暴露出政府掌控不了僧伽, 無法利用佛教達成自身的目的。

除了透過大頭領試圖掌控僧侶, 奈溫還處心積慮讓自己看起來像善良佛教徒, 後來的丹瑞也是, 即使他們的殘暴和專制透露相反的訊息。他們和其他軍官在全國各地興建了數百座佛塔, 除了做功德之外, 據某些人說, 也藉此贖罪。的確, 全國最著名的很多佛塔內經常擺放丹瑞和家人禮佛捐獻的相片。其中最著名的捐贈, 當今仰光大金塔頂端的剎竿, 緬甸佛教的至聖之物, 大體上是軍政府出資建造的。一九九九年, 穿著特殊的橄欖綠制服的士兵煞費力氣地把剎竿搬到佛塔頂端的景象也留下照片; 他們幾乎隱沒在一大群僧侶和在場觀看的人群當中, 當中有很多是當權者的黨羽, 無疑也在努力做功德。

這國家的軍人統治者跟所有佛教徒一樣也相信「改運」(yataya), 也就是行善積德來消災解厄。奈溫把緬甸紙幣的面額全改成九的倍數很可能是為了改運, 這說法聽起來頗合理。就跟每個緬甸男生一樣, 丹瑞年少時肯定也入廟兩次當過小和尚, 三、四歲時入廟幾天, 以及在十

七、八歲時入廟幾個星期。也有證據顯示, 二〇一一年他正式退位後, 在僧院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將軍們篤信佛教,」研究緬甸佛教的專家華頓 (Matt Walton) 博士說, 「他們可能會愈來愈虔誠, 因為他們做的壞事愈來愈多。」

除了篤信南傳佛教信仰, 緬甸人也深信冥界的神靈, 尤其是納特 (nat)。據說納特是從前反抗緬族國王統治而死法淒慘的造反者和罪犯的鬼靈, 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惡靈。有座萬神廟就供奉了被正式認定的三十七位納特, 其中半數是女性, 統稱為三十七神靈, 同時也供奉其他較鮮為人知的次要納特。大部分的城鎮和村落也都有供奉納特的神龕, 好讓緬甸民眾獻禮敬拜, 安撫這些神靈, 但香火最盛的地方在勃固、蒲甘 (Bagan)、曼德勒和普帕 (Papa) 山。

帶我去見占星師的那位緬甸朋友特別敬畏最神通廣大的兩位納特。她在仰光考高中之前曾特地到勃固的納特廟敬拜。她跟我說明: 「你要帶供品安撫納特, 放在神像底部即可。你可以帶米、威士忌或香菸去, 就看你拜的納特喜歡什麼。我拜的納特喜歡威士忌、炸雞和燻魚。我把供品留在神像旁, 納特廟裡的慰靈人 (nat-sooths) 會把東西吃掉或喝掉, 或者撒在廟四周的土地上。」她有考上高中。祈求好運的人也可以直接雇用慰靈人來安撫納特; 慰靈人主辦的

① 編註: 番紅花革命發起於二〇〇七年, 得名於站在示威最前線的佛教僧侶。遊行群眾將象徵僧袍的深紅色帶子別在衣服上, 表達對僧侶的支持。由於聲勢浩大, 英國《泰晤士報》引述外國人權組織之說, 開始稱之為「番紅花革命」。

一連三天的納特祭，是緬甸最壯觀的活動之一。

在緬甸倒也不是人人都相信納特，就算相信，信的深淺也不一。譬如說，最敬畏納特的人不吃豬肉。再譬如說丹瑞這樣的人的私人生活裡，納特扮演什麼角色，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不過一般說來，納特的信仰長久以來已經被用來鞏固中央皇權，順帶的也維繫著當代的中央政權。一般認為緬族國王——主要是阿努律陀——收服了這些邪靈，把祂們轉為善靈，並納入主流信仰。⁴

白象

奈比多充滿皇朝象徵。烏帕塔桑蒂佛塔旁有五隻所謂的「白象」，拴在牠們個

別的涼亭內。這些是患白化症的大象，膚色其實是淡粉紅色而非白色。這些象非常罕見，因此在緬甸是代表權力與福分、近乎神奇的象徵，總讓人聯想到皇族與貴族。據信，君王擁有的白象愈多，威望愈高，二〇〇〇年代初，丹瑞便大肆炫耀他尋獲三頭白象。其中一頭象的命名，直接援引這皇室傳統；這隻可憐的動物被叫做「賜福吾國的尊貴大象」。在西方，「白象」一詞意指昂貴卻毫無用處的東西，便是源自東南亞皇家供養大象的習俗。自從馬戲團經紀人兼演出者巴納姆（P. T. Barnum）買了一隻名叫東大龍（Young Taloung）的大象之後，這個詞便廣為人知。巴納姆在傳單上把這頭動物叫做「神聖緬甸白象」。他付了巨款給暹羅國王買下這頭大象，然後又費了好大力氣把牠運至英國，卻赫然發現他的白象實際上「帶有些許粉紅斑點的髒灰色」，因此大失所望。

新首都的總統官邸顯然是按照曼德勒的舊皇宮打造的，那舊皇宮也是緬族末代國王敏東王和錫袍王的朝廷之所在。這座總統官邸跟曼德勒的舊宮一樣，由一條寬闊的護城河（儘管目前尚未注入水）所環抱，而且由兩座主橋對外連通。為了顧及將軍們打高爾夫球的嗜好，官邸也被一座高爾夫球場圍繞，從官邸前方往外延伸的一條寬闊空曠的道路，想必也充當緊急逃難的出口。公共區和等候室又大又深，有大量的空間可以掛設龐大的枝形大吊燈。「這裡和白宮一樣大嗎？」一位頗生敬畏的緬甸記者問我，我倆在中庭轉來轉去，當時是二〇一一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拜訪總統登盛（Thein Sein）期間。「這裡大多了。」我不得不承認。



圖4 兩尊納特神像，造反者和不法之徒的惡靈（作者提供）。

總統接見外賓的廳堂，簡直是不加掩飾的王座廳，登盛在此會見希拉蕊，三十多年來首位美國官方高層外賓。所有物品都覆蓋著金色和紅色；總統的高背椅，不管怎麼看都像極了加冕椅。到了主政的後半期間，隨著奈比多慢慢成形，丹瑞的生活方式可比在位的君王，一位緬甸皇帝。世人偶爾——通常是意外——可窺見丹瑞「王」極盡奢華之能事的生活。其中一回是二〇〇六年他把女兒嫁給佐朴溫（Zaw Phyo Win）少校的婚禮。從一段外流的婚禮影片可以看見他們啜飲香檳，切五層蛋糕，顯然忘記了他們的國家至今仍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對新人收到的新婚禮物包括豪華的車子與房子，謠傳價值大約五千萬美元，阿諛諂媚的將軍們相互較勁，看誰出手更闊綽，想必是為了保住後台。婚禮細節外洩後，輿論一片譁然，群情激憤，不過丹瑞及近親在特權保護下對這一切置若罔聞。

曼德勒的舊皇宮在二次大戰期間被夷為平地，先是被日本人炸毀，繼而又被聯軍轟炸，一九九〇年代軍政府在原址照原樣蓋了一座複製品。這只是軍政府為了要具體重現輝煌的昔日，急於修復重建的許多皇室遺址之一。蒲甘，可媲美柬埔寨吳哥窟皇城的緬甸古城，成了最臭名昭著的修復工程的苦主，縱使部分被重建得面目全非，仍在爭取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同樣的，奈比多的建築似乎也毫無限制。亂無章法的龐大國會大樓全是仿古的緬族風格，森嚴的高牆上以砲塔和開垛口封頂。

儘管蓋了國會大樓，一開始國會議員可得到的居所顯然很少，反對黨的國會議員是絕對分不到的（雖然現在情況不同了）。軍方的代理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簡稱鞏發黨），總部相當豪華，飾有廊柱和山形牆。為了打造皇朝氣勢，主要由各個政府部門和官員宅邸所構成的整座城，在數百畝空曠土地上豪奢地延伸，給人空間廣袤和權力浩大的印象。將軍們總算擺脫了外來者充斥、擁擠混亂的仰光街道，為自己慷慨建造十六線道的巨大高速公路，但卻詭異地空無來車。確實，奈比多與曼德勒或仰光之間最驚人的差別是，在政府機關建築群之外，這地方簡直杳無人煙。被迫搬到奈比多的國會議員和公務員，很多都沒把家人帶過去，他們也許是不想讓妻小感受到那股孤涼。

在主要的政府機關區邊緣，當權者的親信和家人蓋起他們自己的高檔飯店，接待預料會湧入的外交官和顯貴。中國人興建的一座大型機場位在城外六英里處，對於虛張聲勢的緬甸將軍們來說，那是個不能說的恥辱。宏偉的出境大廳以設有三十二個劃位櫃台自豪，據稱預定給國內線和國際線班機使用，只不過以二〇一四年來說，只有兩個櫃台在營運，一個服務來回仰光的私營短程航班，另一個服務更稀少又不固定班次，由國內航空公司提供的「表定」班機，也只飛往仰光。顯而易見的是，就像這城市其他大半地區，機場偷工減料的結構體已經在朽壞。如果奈比多真如泰國學者杜亞帕·普立夏若須（Dulyapak Preecharushh）宅心仁厚說的，是「反殖民主義的一項重要工程，為了恢復緬甸的國家尊嚴，並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維繫緬甸的文化認同」⁵，然而一如阿瓦王朝的昔日都城以及阿馬拉普拉，奈比多所發揮的功用很可能只有一時，在它倏然聳立的那塊土地上原有的森林和田野重新收復失土之前。

同質的社會

奈溫和丹瑞將軍為了一己之私而加以利用的昔日緬族皇朝，無疑是鼎盛的輝煌年代。緬族王國一度威震東南亞。在偉大的戰士君王統治下，緬族的疆域擴張至南邊的孟邦，東邊的撣邦和西海岸的阿拉坎邦。在十八世紀，緬族軍隊圍攻占領暹羅的宏偉都城阿育陀耶（Ayutthaya），對當時緬族王朝來說，阿育陀耶是區域內商業和政治上的頭號勁敵。阿育陀耶被夷為平地後，暹羅遷都至曼谷，而曼谷大體上是按照舊都的格局鋪陳，阿育陀耶如今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定的古城遺址。

因此，在日後幾次英緬戰爭中一再被英國打敗，對緬族來說是沉重的打擊。從很多方面來說，這說明了將軍們何以不顧一切，幾乎是喪心病狂地要把壓垮緬族的殖民社會給徹底根除，重建昔日純正的緬族帝國。翁山蘇姬，翁山將軍的女兒，曾準確地對比印度和緬甸被帝國占領的經驗。這是她熟悉的主題，因為她母親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是派駐新德里的大使。

「對緬族來說，被占領是全新的經驗。」翁山蘇姬寫道：「印度自有史以來便經常受到從西北來的外族入侵，緬甸則不同，除了十三世紀蒙古帝國短暫的侵略，摧毀了蒲甘之外，緬族從沒遭受過任何嚴重的外侮。」不像緬族這般把英國的占領看成單一的毀滅事件，印度人認為這只不過是一連串外來文化與政治勢力入侵的其中之一。一位傑出的印度作家和歷史學家莫罕

（Raja Mohan）告訴我，對印度人來說，「被殖民是另一次無關緊要的有趣遭遇。」今天有成千上萬在加爾各答的孟加拉人，開開心心地在印度總督柯曾（Curzon）^②為了紀念維多利亞女王而建造，用白色灰泥砌成的雄偉紀念館外踴躍晃蕩。這些人把它當成宜人涼爽的避暑之處，儘管他們也可以輕易把它看成異族占領的象徵，憎恨它或甚至毀壞它。

相反的，緬族把英國併吞緬甸看成空前的一場災難，一種生死存亡的威脅，不僅是對國家的威脅，也是對自身認同的威脅。翁山蘇姬繼續說道：

緬族之間瀰漫一種感覺……一種不斷蔓延的仇外情緒，由理由充分的憂慮所醞釀出來的，他們憂心，若任由殖民統治繼續下去不加遏止的話，它將危及自身民族的生死存亡。這類種族存續的威脅，與其說是來自英國人，不如說是來自印度人和華人，這兩者在二十世紀全球化之下成了更立即的指標。這些移民不僅在緬甸取得經濟據點，也和緬族女人共組家庭，從根本上打擊緬族的男性尊嚴和種族純正。⁶

因此，最早在一九三九年，國會便通過一項法案「佛教婦女特殊婚姻與繼承法」（Buddhist Women Special Marriage and Succession Bill），企圖防止印度男性和緬族女性之間的婚姻。遺憾的

② 編註：喬治·柯曾（George Curzon），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五年之間擔任印度總督。

是，這類的法案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不斷出現。從二〇一三年起，起碼有四項法案開始在國會裡試圖闖關通過，或者，總有某個委員會試圖以各種方式要插手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結婚這種家務事，限制穆斯林生小孩的上限，以及阻止佛教徒皈依其他宗教。這些提案當中有些是僧侶發起的，其用意無非是要獨尊緬族，尤其是打壓穆斯林。

一旦緬族從殖民者手中取回權力，他們會把殖民主義的惡魔驅除殆盡，這一點和印度人很不一樣。獨立後的新國家，會是一個全面的緬族國家，以緬族為強勢文化。這個政治藍圖，始於「解放」緬甸的首任領導人巴莫，也就是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人扶植的政府的首腦。巴莫自封 *Naingandaw Adipadi*，意思是緬甸元首，並從古代帝王借來大量的排場和儀式，宣揚他治理的合法性。巴莫甚至穿戴得有如古代君王。此外，為符合日本的治國原則，新緬甸由中央掌權，而且是文化同質的國家。只有一個政黨——我緬貧民黨 (*Dobama Sinyetha Asiyone*)^③，或者後來的大緬黨 (*Greater Burma Party*)——可以掌權，可以動員所有緬族人；這個黨，就像巴莫後來解釋的，將是「緬甸本土種族的大熔爐，大緬民族將從中崛起。我們昔日的部落歷史已經結束，部落之間的帳都算清了，一個新的民族和歷史就此開始。過去，政黨遮蔽了人民，現在，我們要從正確的一端，從人民這一頭，開始團結一致」。

重要的是，緬甸在後殖民時期的每個政府，尤其是自一九六二年起軍人專政所把持的政府，都參考了巴莫復興緬族的政治藍圖。這藍圖當然容不下殖民時期的多元社會，不過對於戰後的緬甸更重要的是，它也排除了其他很多原住民族裔真正表述其文化與宗教的可能性，而他們最正當的領導人。」⁷

因此，當巴莫宣稱「部落之間的帳都算清了」，他的意思是，國家應該在緬族霸權之下統一。克倫族、克欽族、欽族 (*Chin*)、孟族、撣族和其他所謂的「山區部落」，屬於國家法定的一百三十五個原住少數民族，理當比多元社會的移民享有更多權力，甚至是完整公民權。然而事實上，自一九六〇年代以降，軍政府試圖建構一個高度中央集權、文化同質的緬族國家，結果數十年來與克倫族、撣族和更多族裔爭戰不休，這些少數民族自視不得不重啟殖民時期之前的古老戰爭，來對抗意欲收復失地的好鬥緬族，而這些戰爭基本上仍持續著。

在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緬族和山區民族這兩造的經歷迥然不同，這些敵對狀態已然加劇。少數族群當中有很多是站在英國與聯軍這一方對抗緬族，譬如克倫族和克欽族，而緬族如我們所知大體上與日軍同一戰線。因此緬甸的戰事，部分屬於族群內鬥，形成了受日軍訓練、大部分是緬族人的緬甸獨立軍，和接受英軍武裝支援的克倫族、克欽族和欽族，兩造對壘的狀況。這基本的族群分裂從根本上形塑了巴莫及其緬族後繼者諸如奈溫 and 丹瑞的政治信念，這些人在二次大戰期間大部分時間都效力於緬甸獨立軍。因此緬族和山區民族這兩造，對於二次大戰和

③ 譯註：由巴莫原先成立的貧民黨 (*Sinyetha*) 和翁山的德欽黨合併而成。

自身在緬甸獨立過程中的地位，始終各有一套論述。

儘管如此，在建立新緬甸之初還是採取了一些調解作為，勾勒出胸襟更開闊的緬甸，主要是為了平息少數民族理由充分的疑慮，擔心緬族領導的嶄新國家很可能會迅速落入大緬族主義者把持的專制政府手中。一九四七年的彬龍協議 (Panglong Agreement)，乃翁山將軍和捍族、克欽族和欽族的領導人在緬甸即將從英國贏得自由的前夕所簽訂，其承諾邊境地區原則上在內部事務享有充分自治權，並且展望着克欽邦最終將由自身的立憲議會來治理。彬龍協議也承諾，「邊境地區人民將享有在民主國家裡被視為最基本的權益與特權」。在這個基礎上，好幾個族裔勉為其難加入了這個新國家，揮邦甚至獲得承諾，在獨立十年後有權力完全脫離緬甸。但是就如我們會看到的，這份協議從未被徹底實行，至今一直是緬族和其他民族領導人之間主要的爭論焦點。

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初，大體上由總理吳努主政的緬甸戰後頭一個民主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把聯邦國家這個鬆散的概念制度化。他們將聯邦的經費花在為全國眾民族設想的計畫上，隱約承認和贊同這個新國家並非由緬族獨占。譬如說，廣播開始以二十種左右的民族語言，由緬甸國家廣播電台 (Burmese Broadcasting Service) 發送，這電台仿效英國廣播電台，總部設在仰光。穆斯林羅興亞族人記得，他們被清清楚楚地寫進教科書裡，但如今他們的存在卻幾乎被抹煞。

緬族的洗腦

儘管有上述這些表示，但其核心動力始終朝著種族、文化和宗教的同質化——以緬族來代表包羅萬象的國家認同——推進。譬如說，吳努通常被認為是獨立早期的領導人當中比較包容、民主的一個，然而在一九六一年立佛教為國教的也是他，結果激怒了大多數信基督教的克欽族和克倫族（雖然另一個法案也在同時間通過，以保障宗教自由，但它不過是聊備一格）。真正說來，是一九六二年的軍事政變，奈溫上台，才開始了有國家在背後撐腰、毫無保留的緬族化運動。緬族以多元社會為敵的大肆掃蕩，摧毀了殖民時期繁榮經濟的引擎，後續針對國內非緬族群的種族內鬥，也耗盡了這赤貧國家所剩無幾的國庫，而且獨立之初在國際間贏得的聲譽也大半丟光了。

軍政府執政期間，市面上的英文書很少見，但有一本一直買得到，那就是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將軍們之所以容許它在市面流通，想必是它的內容對殖民政權進行高度批判，而且出自局內人之手——艾瑞克·布萊爾 (Eric Blair)，後來以筆名喬治·歐威爾寫作，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在緬甸擔任實習警司。但緬甸人會調侃地說，歐威爾描寫緬甸的書又不只一本，而是三本，《動物農莊》(Animal Farm) 和《一九八四》(1984) 更是準確預言了這國家在緬族化政策下的景況。後兩本在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自然從未販售過。登盛上台後政

治有所改變的一個明確跡象，是歐威爾的「緬甸三部曲」的後兩部終於在二〇一三年於仰光的書店面世，緬甸年輕人爭相閱讀。

就像歐威爾反烏托邦小說描述的，軍政府侵入生活的每一面，不論多麼隱晦或匪夷所思，企圖塑造一黨獨大的緬族國家。譬如，拿語言來說，這是歐威爾最關心的題材，也是溝通與文化的基本共同點。新的執政當局著手把國內舊時的英文名稱都換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舉例來說，仰光以殖民時期歷史學家命名的費里街（Phayre Street），以及以英國總督命名的達豪斯街（Dalhousie Street），都換上了緬族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標示公車路線的數目字也換成緬文。在脫離殖民統治的社會裡，重申在地固有文化的現象很常見。蘇丹就發生過同樣的情況，而蘇丹是非洲頭一個跟英國爭取到獨立的國家。

但是將軍們的企圖可不止於此。一個被稱為「國家語文委員會」的新組織下令，英國語文全面撤出學校課程，不得做為授課語言，只能當第二語言來教。更重要的是，將軍們明令，緬族語文是全國上下所有教育體系唯一可以使用和教授的語文，斷然否定了緬甸邦聯內其他所有原住民族使用、教授和學習自身語言的權利。這麼一來，語文變成緬族化的主戰場，在這個起碼有一百種不同語言，其中包括至少三種特殊語系（藏緬語、孟—高棉語和傣語）的國家，人人都只能講緬語。對於欽族和克倫族來說，緬文簡直和西班牙文或俄文一樣陌生。

以華金斯（Justin Watkins）博士這位緬語專家同時也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者的話來說，數百萬不能使用母語的人，等於是「被褫奪語言權」，後果不堪設想。一九四〇年代末出生，

克倫族最能言善道的發言人之一阿倫梭烏（Alan Saw U）說：「這是所有少數民族最氣憤的一點，他們竟不能教、也不能學自己的語言」，簡直是對過去五十年左右的武裝衝突火上加油。這就好比拿「強迫同化」這把長矛刺入緬甸所有非緬族、非佛教徒的心坎，逼他們接受單一的緬族文化。好似少數民族語言就該被扔進歐威爾筆下的「記憶洞」，連同他們獨特的文化與政治認同一起消失。^④

老一輩的克欽族悲痛地記得一九六〇年代末仰光下達命令，指示克欽語不能在學校裡使用或傳授的那段時光。在克欽族學校裡，中央指派的教師全都是緬族人，他們沒興趣學也不關心長久保存在地方言。克欽邦的學校到處張貼海報，警告「說學校老師聽不懂的語言是無禮的」。結果學生即便是在私底下也不敢說克欽語了。

談到語言受打壓，孟族人的感受最強烈，因為他們自認在文化上比緬族優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區域語系之一孟—高棉語的始祖。當代的緬文源起於孟文。孟族設立平行運作的委員會和志工組成——通常是僧侶——的支援團體持續教授他們的語言，希望能一代代傳下去。這是很危險的志業，成果時好時壞，端看緬族政府隨時的打壓有多強烈。官方對於非緬族人的差別待遇也讓和孟族一樣的少數民族處於難以翻身的嚴重劣勢，因為無法把緬語說得流利，也就進不了公家單位工作，就某方面來說，這個說緬語、緬族人主導的政府是國家最大的雇主。

^④ 編註：「記憶洞」是「一九八四」中政府機構使用的一種文件銷毀工具，把文件丟進去，「歷史」就消失了。

一九八九年，緬甸政府繼續在語文方面發動攻勢，頒布了惡名昭彰的「拼音規範法」(Adaptation of Expression Law)。表面上聲稱是為了去除老舊的殖民時期名稱，實際上是更進一步推行緬族化。通過「拼音規範法」之際，軍政府特別感受到以全民盟為主的民主派勢力施加的壓力，而該組織前一年才成立。這項法律明令更改緬甸地名的英文譯名，可是卻以緬甸多數民族——緬族——的語言來呈現，而不是以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的在地方言來呈現。因此對緬甸的所有居民來說，這些新命名遠不如原本很多的英文拼寫具有包容性，因為英國殖民者通常會仔細記錄他們所聽到的地名如何發音，然後盡可能貼切地轉成英文拼寫。這意味著原本的英文地名普遍反映了在地民族對地方的命名，但這些現在都被任意廢除了，沒問過最常使用它的在地人意見。於是，緬族改為Bamar，十四個邦和省的名稱拼寫有八個也改了，造成永久的混淆。因此阿拉坎變成若開，克倫改成克因，馬圭的拼寫方式由Magwe改為Magway，佩戈改成勃固，仰光的拼寫方式由Rangoon改為Yangon。就如華金斯的總結：「這是把地名大大地政治化了，緬族語言劫掠了他族的語言。」普遍來說，語言學做為一門學科漸漸從緬甸的大學廢除了。即便某個緬族人想學自己國家裡眾多少數民族語言的任何一種（而非某個克倫族人想學緬語），現在也幾乎是不可能了，因為能勝任的老師寥寥無幾。

一九八九年的法令最令人詬病的一點，是把國家的正式名稱從Burma改成Myanmar。這又是表面上打著反殖民主義的名義所進行的事。一個好聽的說法是這樣說的，因為Burma是英國人給這個國家取的名字，為了徹底拋開殖民的枷鎖，這國家應當回歸英國人踏上這塊土地之前

的名稱Myanmar。再者，Burma僅反映占多數的緬族的存在，因此Myanmar更能代表這國家的所有民族。事實上，就像後來很多人指出的，在英國人抵達之前，Myanmar和Burma幾乎是相互通用的詞。因此，Burma一詞從來不是殖民時期的造詞，抱持該觀點者之一的翁山蘇姬就說：「沒徵詢過人民的意見，沒有人可以擅自更改國名。他們（政府）說『Myanmar』意指緬甸所有民族，而『Burma』僅指緬族，這說法是錯的。『Myanmar』是『Burma』的古體字，它就是單指緬族人。我當然偏好『Burma』一字。」

更改國名進一步褫奪了習慣用Burma來稱呼緬甸的非緬族群的權利。在這些族群看來，套用某群專家的話來說：「Myanmar及其衍生字是十足陌生的字，只會讓人想起強勢族群的語言。」我認可他們的抗議，所以在這本書裡都用Burma這個字。

一如語言成為緬族化政策的工具，教育也是。課堂裡的活動愈來愈以維繫軍方控制為目的，而不是讓孩子學習知識與技能。結果全國的教育水平在過去五十年來嚴重下滑，這一切是從辦學優異的基督教教會學校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被迫關閉，大部分的外籍教師被逐出校園開始。有著堅固的維多利亞紅磚建築的教會學校被國家接管，這些學校現在大部分仍是政府資助的公立學校。

為了終止或降低外國學校在國家教育體系裡的主導地位，拿教會學校開刀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免不了的，只不過始終不見稍微可以媲美教會學校的任何教育單位取而代之，或者說經常毫無建樹。很快的將軍們的野心便昭然若揭，緬甸的教育要達到的目標，遠遠超過根除已經

式微的殖民勢力。

受壓迫者的教育學

強制同化或緬族化的過程從學校開始，更具體地說是從教科書下手。一回我和幾個仰光學童坐下來討論他們從小六到國三的歷史課本——薄到不行的幾本線裝書——學到些什麼，結果相當發人深省。小六的課本從歷代緬族國王略為冗長的敘述開始，特別著墨他們打敗泰國人和攻陷泰國皇都阿育陀耶的豐功偉業。學童們學到關於蒲甘很多事，緬族傳統服飾也有詳細解說。不過書裡對緬甸的其他民族幾乎隻字未提。當他們被提及，孟族、撣族和克倫族被描述為「形形色色的叛亂分子」。課本談到，強大的緬甸軍隊輕易地剿平了他們的叛亂活動。

課本也說到印度移民來到緬甸是沾英國人的光，但僅僅巨細靡遺說起切蒂亞人的禍國殃民。一概不提伊斯蘭或穆斯林移民或其他宗教信仰。歷史的終章停在奈溫成立軍政府保家衛民。此後的緬甸歷史發展，官方則保持緘默，由此看來，想必寬宏大量的緬甸軍隊仍持續在保家衛民。

跟我談話的小女生們只要背出幾個老國王，考試就及格了，她們顯然對那些國王的事蹟記不得不多。對她們來說，緬王的名號只是為了升學必須牢記幾個星期的無聊遠古往事。她們大部分是生活在緬甸首都仰光的緬族女孩。這同一部偏頗的當代緬甸史，在全國公立學校教授，而

在克倫族、欽族或克欽族的土地上，這同樣的獨尊緬族的論述激起更大的政治反彈。況且上課只用緬語，這又幾乎把國內其他民族的在地歷史全部抹煞。

我和欽族年輕一代最優秀的青年之一，人權活躍分子齊麗·扎豪（Cheery Zahau）在仰光見面，她記得一九九〇年代在曼德勒西邊的實皆省（Sagaing）讀書時，讀過幾冊一樣的歷史課本。對她來說，那是在大緬族主義下實行的漫長的政治宣傳。她記得（用緬語）上課盡是講述古代英勇的緬族國王，而老師在描述各個少數民族時，大多帶有「負面的言外之意」。因此，撣族「吸食大量毒品」；克倫族是「分離主義者」；而她的民族欽族則是「落後而未開化」。很多年輕的克欽族信誓旦旦說，在舊的緬甸地理課本裡，也就是他們的父親在一九五〇年代必須讀的版本，克欽族被描述為「居住在北部山區的野蠻人」。我的克欽族友人沒人可以看出當年的課本給我看，但很多克欽族人仍堅信課本這麼寫。

總的來說，官方教科書在課堂內對非緬族裔塑造出來的負面形象，也和不效忠國家及造反畫上等號。照這樣說，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緬甸人、緬甸的良好公民，就必須放棄他／她本身的少數民族認同，也因而暗示著他／她天生有叛亂傾向。就像學者華頓（Mathew Walton）寫道：「把非緬族裔和不效忠國家畫上等號，（軍政府）把非緬族裔對自身的認同視為他們若成為國家的一員就必須克服的障礙。」我聽過譬如說穆斯林和基督徒被要求皈依佛教，或克倫族或克欽族的名字要改成緬族姓名，才有機會在政府機關謀個相當低下的差事等等諸多這類故事。然而，如果有人真的煞費苦心如此隱匿自身的族裔和宗教信仰，加入這唯一而純正的緬族

國家，他們會發現自己仍然有點格格不入，而且會疑神疑鬼。換句話說，這終究是行不通的。

在國二課堂上，身為浸信會教徒的齊麗聽到有關佛陀一生的諸多故事，但從沒有其他宗教，譬如伊斯蘭或她信仰的基督教的相關敘述，而且這些宗教還被視為「異教」。總之，她自覺「被洗腦」。齊麗一九九九年高中畢業後，跟很多欽族人一樣，越過邊界逃到印度去，在那裡她加入印度密索蘭邦（Mizoram）的一個欽族婦女團體。說到這裡，她坦承說，她花了一年的時間「反轉她從學校學到的一切……我爸在我身上費盡力氣才把『政府軍是人民保母』、『緬族是統治階級』的觀念破除」。

據她說，她的很多朋友「仍被洗腦」。這多半是因為她和同儕生在一九九〇和二〇〇〇年代初受到國際制裁的孤立緬甸，「接觸不到其他的訊息來源、電視、報紙、網路等等」。因此，從學校課本裡讀到的——據說課本內容都經過軍方高層領導核准，和從政府派任的老師聽到的——而教師幾乎都是緬族人，他們都照單全收，視為圭臬。獨立思考或對老師——緬甸社會傳統的權威人物——的觀點提出質疑，是完全不被鼓勵的。

索然無趣、死記硬背的教學確實也強化了教師的權威。當今緬甸的教育體系從上至下仍時興這種教法，連大學也不例外。一位思想相當開放的老師，至今仍深怕曝光的四十歲仰光印度教徒，告訴我那一套教學方法如何起作用，以及它對緬甸學童的影響。這種「靠背誦或者填鴨式的學習方式，完全阻礙學生發展批判性思考或創造性思考」，他說。學業表現的評量僅依據學生是否準確地複述老師的上課內容，而且必須和課文內容完全一致。背誦學習做為一種教學

法，當然在全世界的學校裡都很常見，尤其是一九五〇年代之前的英國，不過在數十年前這種教法在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極權國家像是中國除外）已經落伍，而緬甸卻依然採用。在這教育體系裡的受害者都心知肚明，背誦式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年輕學子始終沒機會學習質疑權威，進而也不會質疑他們的軍方統治者。

這正是不折不扣的受壓迫者的教育學，只不過不是著名的巴西反殖民主義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想像中的那種。我訪談的這位親切的老師告訴我，如果他的學生有些許批判思考或獨立探究的能力，那麼「學生就會自己判斷是非，不會輕易被他人說服，而這是一個國家發展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他本身總會慎選一些不一樣的資訊來源——他特別喜愛《讀者文摘》、《國家地理雜誌》和《探索頻道雜誌》——並帶到課堂裡，來跟政府教科書對照比較，讓學生知道，只靠課本無法得知這世界的真實全貌。

無論如何，不管老師的立意多麼良善，學生在公立學校裡學到的不多。就算在最好的高中裡，每班的學生人數也多達七十人或更多。據我所知，當今一整班的學生人數已經高達八十，山區學校可能達到一百。人數多到這種地步，一位緬甸婦女告訴我，人流的控制是一大問題。因此，學生上學的時間也不長。大部分的學校分兩梯次上課：第一梯次在早上七點到七點半之間到校，但早至十一點或十一點半便放學；第二梯次從中午開始，四點結束。這四小時的上課時間包括半小時下課時間。

雖然二〇一三年總統登盛上台後，新政府進行了一些改革，但在教育方面改革不大。為了

彌補正式上學的時間太短，學生學得太少，只要家庭負擔得起，大多數學生都會參加私人補習（一班大約二十五人），每天至少補習兩個鐘頭左右。因此，儘管表面上讀公立學校免費，事實上孩子的教育花費可能相當昂貴。因為多出這筆支出，很多家庭往往只挑一個小孩接受充分教育，不是老大就是資質最好的那一個。在四個月長的暑假（三月到六月）裡，經濟許可的家庭多半會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讀書，三十二小時的教學要花費大約二十美元。來到這裡的孩子通常又由公立學校的同一批老師來教。

因此，事實上很多緬甸學童被教了兩遍。他們上公立學校主要是為了取得官方認定的畢業證書，這是將來求職時必須出示給雇主看的，或者上大學必備的，然後他們上私人學堂去真正學點什麼。這種狀況可能演變得極為離譜，尤其在山區。二〇一四年，我走訪在克欽邦中心威茂鎮（Wai Maw）基督教浸信會領袖訓練中心，當時這中心也充當學生難民營，收容被緬甸政府軍逼迫逃離家鄉的學童。這一百一十位年齡不一的克欽族學童，必須要到附近兩所公立高中上學，除此之外他們也分兩梯次天天到該中心上課。因此，他們每天的作息從早上四點半開始，準備上浸信會中心六點鐘開始的兩小時課程。接著他們到公立學校上九點鐘開始的課，下課後再回浸信會中心上四點鐘開始的兩小時課程。晚上十點鐘熄燈，週末也沒放假。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中心有安排課程，晚上也會不固定地安排一些加強課程。才十二歲大的孩子就這樣過著漫漫長日。

在緬甸，教會學校仍被禁止，所以這些男女學童在浸信會中心上的額外課程不被官方認證，不算正式學歷。這些浸信會教徒冀求的，頂多是多花點錢讓孩子受良好的非正式教育，以彌補正式教育之不足。跟我談話的幾個克欽族學童承認，每天上完課都很疲累，但沒有人抱怨。他們說，在公立學校學不到東西，只拿到畢業證書而已。歷史課照例只談緬族國王；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是緬族人，上課一概用緬語教學。克欽族學童聽緬語聽得很辛苦，他們會抱怨說從來都學不到有關克欽族的人民、文化或地理；他們覺得上課無聊透了，因為在課堂上只許做一件事，就是聽老師單調乏味地一直講課。他們為了考試背誦上課內容，考完就統統忘光了。更惱人的是，化學、物理、生物和數學課本都是英文的，為的是讓緬甸當局可以宣稱他們符合國際水準，但是這些科目還是用緬語授課，而授課老師幾乎不懂英文。所以考試要及格的竅門，是把英文課文整段背下來，遇到相關的問題再寫出來。所以緬甸校園內流行一則笑話說，學生考試時抄寫藏在袖口裡的小抄，叫作弊，但是他／她若把死背的整句或整段英文寫出來，就叫申論，申論就可以取得學歷。

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估計，二〇〇九年緬甸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不到百分之二，就國際標準來說這數額非常之少。¹⁰ 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更少，

¹⁰ 編註：台灣近年的教育經費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至六之間，其他幾個國家如日本占百分之五·一、南韓占百分之七·六、美國占百分之六·九、英國占百分之六·四（以上皆為二〇一一年資料）。

僅占國內生產毛額百分之〇·五。^⑥二〇〇〇年，世界衛生報告 (World Health Report) 指出，緬甸的衛生體系是除了受戰爭蹂躪的赤貧西非國家獅子山共和國之外全球最糟的。¹¹ 對比之下，緬甸軍事方面的支出卻高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四十，雖說近幾年這數目字也顯著下降。^⑦ 但這筆預算也包含軍營內軍人子女專屬的學校經費。這些當然也算是公立學校，不過就像歐威爾說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合格教師的嚴重短缺、班級的龐大、長期缺乏教科書以及破敗的老校舍（遇上雨季經常不堪使用）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很多人說，識字率和算術率急遽下降。在鄉下地區，尤其是克欽邦、克倫邦和其他少數族群地區，這情況通常比緬族人居多的城市更糟糕。舉例來說，二〇一四年聯合國資助的人口普查發現，這國家整體來說平均有九成的成人識字，但在克倫族這數字降至百分之七十四，掸族則降至百分之六十五，反映出全國經費分配的不平等。即便是教育方面分得的預算如此稀少，緬族仍拿走最大的份額。

高等教育機構面臨的情況，說起來比軍政府掌控的學校更糟糕。政府當局很清楚，坐落在市郊美麗廣闊土地上的仰光大學的學生群體，一向是反殖民統治的反抗核心（畢竟翁山和很多將領也都參與過反抗活動）。因此將軍們自始便一心要防止學生推翻他們的統治。軍方掌權後最先採取的動作之一就是炸毀有名的學聯大樓，而一九三〇年代翁山和其他人就是在這棟大樓裡密謀起義。一九七四年學生發起一波示威活動後，軍隊進入校園鎮壓，但是一九八八年四處蔓延的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才最終決定了這所大學的命運。那些抗議者同樣是由大學生領導，

因此事後軍政府著手清空仰光大學，連帶的全國各地大專院校也無一倖免，以徹底杜絕校園成為抗議政府的大本營。因此原本是地區上最優秀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半被摧毀了，僅為了政治的目的。

曾經是全民盟重要人物和翁山蘇姬左右手的欽蕾 (Khin Lay)，清楚記得仰光大學被襲擊的經過。一九八八年在爭取民主的抗議中被逮捕時，她就讀物理系（她未來的先生讀經濟系）。在此之前，學校課程和老師都非常優秀。一九八八年之後，學校一度停課好幾個月，其他的非學術活動大部分也一併停止。最後所有的正常課程全都停擺。後來的一九九〇年代，仰光大學整個被清空，其他的都市大學也一樣，仰光大學原先的六萬名左右學生，被重新分發到首都邊緣的一連串較新、較小的大學就讀：達貢大學 (Dagon University)、東仰光大學、仰光科技大學以及電腦研究大學 (University of Computer Study)。如此這般分散學生的唯一目的，是要確保將來不會再有受過教育、思想相對上自由的年輕人大批聚集，近逼政府挑戰權威。因為這些新學校都地處偏遠，學生往往要花上數小時，耗去了大半天時間，才能進到城裡。

普遍一致的看法是，這些新大學辦學不佳，現在依然如此。它們靠小額預算營運，教授並不多，課程也很少。學生最終可以取得必要的學位，但所有雇主都心知肚明，那一張文憑基本

⑥ 編註：台灣近年醫療保健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五以上。

⑦ 編註：台灣近年國防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至三之間。

上毫無價值，看不出學生的真實能力和資質。因此，緬甸報紙的徵人啟事通常會要求應徵者除了提供大學文憑之外還要附上特殊技能的證明，因此求職者必須具備一些隱約有幫助的證照。

如果說緬甸心臟地區的高等教育水平大幅下滑，那麼其他少數族群和山區就是一落千丈。目前是英文老師的一位聰明親切的克欽族人告訴我，他二〇〇〇年代初在密支那（Myittha University）大學——克欽邦最高學府——就讀的經驗。他在英文系讀了三年，但系上師生比很離譜，大約一比一百，事實上他從沒跟老師討論過課業，一次也沒有。所有的教學活動就像在國高中一樣靠死記硬背：「我只是坐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把我們必須背誦的英文字句抄寫下來。」他讀了三年，取得文憑，但是他承認，要真正學會英文只能到校外去學。跟他同時代的人也跟我說到類似的經驗。這些教育機構有時候也被用來做為種族過濾（ethnic filtering）的工具。譬如說在實兌，我聽說蓋在城區邊緣的大學大多只准信佛教的若開族學生入學，被准許入學的穆斯林羅興亞族人少之又少，以他們的族群人數來說當然不成比例。

負擔得起費用、能夠到國外進修的少數人，通常前往美國或澳洲。精英子弟以及打算在政權裡往上爬的人還有另一個存在已久的選項：彬烏倫（Pinya Oo Lwin）的國防綜合大學（Defence Service of Academy），位於曼德勒城外，彬烏倫是昔日英國的避暑勝地，舊名為苗眉。國防綜合大學建造於一九五四年，仿造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皇家軍事學院和西點軍校（分別是英國陸軍軍官學校和美國軍校）培訓陸海空軍官。通過入學考試的十六歲候選人要另外接受兩項測驗，一是體能，另一項是心理測驗。課程長達三年或四年，只有最後一年專攻軍事訓練。頭

兩年大部分在修課，修習科目不外乎數學、科學和基本語文，由此看來，心懷抱負的軍官的在校學習並不充分。總之，國防綜合大學的課程設計，大體上是為了彌補一般人教育的不足。

文字憲兵隊

嚴格審查是政府盡可能確保在校學生及其他所有人得不到另類資訊的手段。這種審查是由新聞出版審查局負責，那是一九六二年政變後成立的單位，後來改名為新聞出版審查與註冊局。審查辦公室恰好設在前日本憲兵隊——戰時日本的祕密警察，等同德國的蓋世太保——總部。《人民時代週報》（People's Age）的裴敏（Pe Myint）這位傑出記者告訴我，在過去的年代，新聞出版審查與註冊局主任對於所屬的監控網非常自豪，他曾向裴敏吹噓說，他們是「文字憲兵隊」。很不幸的，他真是一針見血。

裴敏跟我描述這審查系統如何運作。所有私家報紙、雜誌和期刊的編輯必須先把文章送去給新聞出版審查與註冊局審查，之後尚未分頁的校樣也要再送審一次，好讓審查員可以再次確認所有被禁的文字、段落甚或整篇文章已經刪除。這過程極其繁瑣又冗長，因此所有的獨立出版社只能出週刊或月刊。反觀政府出版品，像是歷史悠久的官方報紙《緬甸新光報》（New Light of Myanmar），則每天大量出刊。直到今天，《緬甸新光報》依然繼續報導國內所有正面消息，宣傳政府的德政。

大部分的審查員，總共約有一百人左右，都是軍系人馬。很多人受過情報蒐集、政令宣導和心理戰的訓練，因此記者們若想瞞天過海，也逃不過他們的法眼。他們組成團隊，進行嚴明的分層監控。以紅筆為武器的這些人經常輪換調動，確保他們不會和記者太熟絡。不過有些人顯然會跟記者套交情，裴敏說起有些審查員會文興大發，也想當作家：「審查文章看多了，他們自以為把捉到寫作的要領，會要求獨立雜誌社刊出他們的文章——雜誌社非刊不可，否則就等著瞧！」

除了這類套交情之外，審查是極端嚴肅的事。假如審查員修改過的地方沒被逐字更正——絕對要一字不差，那麼編輯和記者可能會立刻坐牢。不出所料，好幾位傑出記者成為全民盟的創黨人，在政府眼裡這些人是罪加一等。其中一位優秀記者梭登（Soe Thein），在緬甸以筆名茂溫達（Maung Wuntha）為人所知，就因為參與全民盟坐牢三次。他在二〇〇一年最後一次入獄，最近才獲釋。梭登魅力十足又能激勵人心，二〇一一年軍政府開始進行變革之後，他大力倡導新聞自由，可惜在二〇一三年英年早逝，死於癌症。他也是最會跟審查員玩貓捉老鼠的一個，常在文章裡夾帶真實新聞蒙騙過關。他告訴我，他學到「在字裡行間隱藏弦外之音」。他使用隱喻、引經據典和以古鑑今的手法來掩蓋他對政局的批判，他相信讀者能夠意會審查員沒看懂的內容。

其他人也用類似手法。有個例子讓梭登印象特別深刻；因為文章裡不能提到翁山蘇姬，所以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翁山蘇姬被解除軟禁時，如何報導這消息，可要費點心思。一份體育報紙機靈地拿英超賽事當頭條，巧做文章。頭版的一串標題「桑德蘭大勝切爾西」（Sunderland Freeze Chelsea）、「曼聯被維拉打趴」（United stunned by Villa），以及「阿森納挺進，希望在握」（Arsenal Advance to Grab their Hope）裡，每個字母的顏色被特地調校過，以凸顯另一個句子，讓讀者讀取真實消息：「翁山蘇姬重獲自由，全民團結挺進，希望在握」（Su Free Unite and Advance to Grab the Hope）。

難以啟齒的事

緬甸政府格外敵視穆斯林，想盡辦法把他們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在若開邦，當地穆斯林羅興亞族人甚至不被承認是公民，他們的人數約有一百萬，而當地總人口數不過五百萬左右。一九七四年通過的「緊急移民法」，就是特別為了確認他們不是公民。結果羅興亞族人的地位幾乎和非法移民差不多，他們不能享有憲法的權利，在往後數十年間，面對通常是緬甸軍隊直接發動的一波波攻擊，毫無招架之力。他們的清真寺有幾座被摧毀，騰出的土地上蓋起了體育場、警員宿舍、開馬路，甚至蓋佛塔，墓園也被遷走改建。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一年間，經過幾次嚴重侵襲破壞，超過二十萬穆斯林逃離邊境，進入當時劃歸孟加拉的土地。¹²

針對穆斯林的這種暴力攻擊，並非只出現在若開邦，緬甸境內到處有類似的情況發生。譬如說在克欽邦首府密支那，穆斯林的主墓園就被夷平，蓋起新大樓給警員家屬入住。在北邊揮

邦的臘戍，最主要的穆斯林墓園也被遷至城外，表面上的理由是不符合衛生法規。當局在原地興建了更多的員警宿舍以及卡車停車場。就像不把羅興亞族人看成緬甸公民一樣，緬甸政府竭力貶低整個穆斯林族群的重要性，不管是在人數上或精神信仰上。

因此，譬如說在一九八三年的人口普查，緬甸境內的穆斯林人數很可能被蓄意少報。以三千四百萬總人口來說，這數字本身就低得很難採信，僅有百分之三。九是穆斯林。不過這項人口普查肯定沒把羅興亞族人算在內。事實上，很多人同意，真正的數字應該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這麼一來，穆斯林人口是緬甸境內弱勢宗教族群裡人數最多的，領先基督徒，僅次於佛教徒。當政府官員和將軍們一個個積極出資贊助佛教僧院、寶塔、學校等等，緬甸文化遺產裡的伊斯蘭成分幾乎不被正視，遑論保持或維護。

政府在全國各地少數族裔居住的邦首府興建文化博物館，主要是為了吸引遊客，對於緬甸眾多少數族裔來說，簡直是一大羞辱。這些博物館的興建，完全沒問過當地人意見，而當地人的文化理當是博物館要呈現的內容。這些博物館似乎有意把克欽邦或撣邦的文化描繪成殖民時期之前的古怪遺風，而非生氣勃勃的一種當代生活方式。這些陰暗潮濕、經費不足又少有人造訪的邦立博物館，令當地人憤恨不平，孟邦人尤其不滿。事實上毛淡棉的孟邦文化博物館格外陰暗沉悶，館內收藏的樂器、文獻和陶器蒙上一層塵灰黯淡無光，即使在豔陽高照的日子，接待櫃檯仍發給我一支手電筒，好讓我為自己開路。

一九九〇年代中興建的仰光國立博物館，情形也差不多。寬大而通風的一樓獻給了緬族國王；正中央是讓人嘆為觀止的錫袍王金獅寶座。一九〇二年，英國把寶座運到緬王被流放的印度，在一九四八年歸還給剛獨立的緬甸。還有來自曼德勒皇宮數量龐大的雕塑品，以及從舊宮廷搶救出來的幾件精巧細緻的金色檳榔葉盛器。上面的樓層展示緬族的自然史、音樂和視覺藝術，但要到最高樓層才總算有個燈光昏暗的「全國眾民族文化展覽室」。裡頭沒有雕塑品，而是擺放穿著各地傳統服飾的假人，和大量的弓、箭、矛和鼓。大致上給人的印象是：有一群生動的落後民族，居住在更文明的緬族社會邊緣。

軍人與情報員

緬甸軍政府最重要的機關當然就是軍隊本身，緬文是 Tamadaw。⑥至今軍隊仍是緬甸最強大的組織，往往占國家總預算的最大份額，幾乎涵蓋國家的領導全體，它透過各種控股公司的實體運作在經濟上扮演關鍵性角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讓掌權的軍政府有其存在的理由。根據將軍們在每年三月二十七日軍人節不厭其詳地重申，政府軍是唯一能夠阻止緬甸聯邦「分裂瓦解」並捍衛憲法的機關。簡略地說就是，唯有政府軍能夠逼迫所有少數族群接受緬族中央政權。因此，唯有政府軍有權治理統一的緬甸。

⑥ 譯註：Tamadaw 字面意思是「偉大的國防力量」。

軍方必須擔任中央領導這種狂妄自大又自圓其說的大量信念，源起於緬甸共和國在剛獨立的頭幾年軍方所遭遇的重大挫敗。Tarnadaw 是翁山將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翁山蘇姬之所以受到很多緬甸人愛戴，不僅是因為她追求民主的執著，另一個更單純的原因是，她是緬甸獨立英雄和緬甸軍隊創立者的女兒。

與節節敗退的英國當局達成協議後，新成立的緬甸愛國軍 (Patriotic Burmese Force) 和英緬軍 (British Burma Army) 合併的一支理當「統合」的軍力。因此，它是在戰時分裂成兩造，往往互相攻擊的緬甸人的聚合體。緬甸愛國軍的前身是翁山的緬甸獨立軍，之前大部分為日本作戰，而英緬軍是由效忠英國的族群所組成，包括現今仍訓練有素的所有少數族裔民兵組織。於是，獨立當時總共有十五個步兵營，全是按各個少數民族來劃分，譬如說這其中包括了克倫族步兵營和克欽族步兵營，只有四個營是由緬甸愛國軍組成。新成立的軍隊的領導人是一位有名的克倫族戰將史密頓 (Smith Dun) 將軍。

這個由宿敵聚合而成的薄弱聯盟，在新國家一宣布獨立便四分五裂，也許不足為奇。克倫族起而反抗緬族主導的新政府，克倫族徵集兵 (Karen Levies) 很快投入反抗陣營。三個緬族步兵營也倒戈加入更強大的共產叛亂勢力。總之，在獨立一年內，緬甸軍隊便喪失十五個營當中的九個。剩下的軍隊，一度少至兩千人，獨力在仰光郊區拚命抵抗克倫族和共產勢力。說來很不可思議，獨立後吳努治下風雨飄搖的第一個政府最終撐住了局面。縱使政府軍勉強擊退各方敵人守住首都，但打從一開始軍方便令不出仰光，管不動都城之外的大片江山。就某個程度來

說，六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由身為克倫族人的史密頓將軍擔任攻打克倫族叛軍的軍隊指揮官顯然不被信任，所以他在一九四九年被解職。頂替他的是奈溫，而讓政府軍脫胎換骨，轉變成今天模樣的，也正是奈溫。奈溫是翁山為首在戰時接受日軍訓練的三十壯士之一，有些人也評論過一九五〇年代的政府軍在戰略和訓練上都帶有濃厚日軍色彩。¹³不過更重要的是，要在軍系裡步步高升，幾乎完全要看你和愛好高爾夫球的奈溫有多親近。他的老班底是緬甸第四步兵營，而軍隊的高階軍官和一九六二年之後掌權的執政團或革命委員會成員，大部分是第四營出身。

奈溫肩負的使命，是洗刷軍方一九四八年受的那種恥辱。他把設備不足、多元族群的一支小軍隊，改造成不斷擴張、以緬族為主的龐大軍事—經濟複合體，掌管國家全面的運作。光是軍隊人數便道盡一切。從一九四八年僅兩千人，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政府軍足有十八萬六千人。到了一九九九年，人數達到三十七萬人，二〇一〇年很可能已經達到四十萬人。¹⁴對比之下，英國這個人口數和緬甸差不多的富庶國家，軍人大概只有九萬人。

這個龐大軍團的主要任務，不是捍衛國家，抵禦外侮，而是打擊軍政府的內敵。因此緬甸軍隊幾乎傾全力打倒反叛勢力，既要對付主要在國內東部活動的共產黨人，也要打擊各個少數民族的武裝叛軍，譬如克欽獨立軍 (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克倫民族解放軍 (Kare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以及撣邦軍 (Shan State Army)。為了打內戰，緬甸軍隊從意想不到的一些海外伙伴取得愈來愈多精良的武器，在早期這些伙伴包括英國和西德。冷戰時期的美國

因為急於扶持能夠打擊共產勢力的任何一方，所以也送武器給緬甸政府軍，直到從一九九〇年代起中國大抵成了最主要的供應者。

在奈溫領導下，從一九六〇年代起，軍方發動名為「四斷」的主要平亂政策，目的是要切斷武裝叛亂組織從鄉村、叢林或心臟地區取得食物、資金、訊息和兵源的補給管道。事實上，這形同殘酷的焦土策略，軍方燒毀村民的農作，屠殺支持叛軍的可疑村民，逼迫人民離開村莊遷至軍方選定的新地點。軍隊也封鎖克倫邦和克欽邦的大片區域，阻斷陸路和河路的交通。每個村落事實上都必須做出一個嚴苛的決定，套一位評論者的話，就是要「戰鬥、逃離，還是加入政府軍」¹⁵。「四斷」最先在納加(Naga)和克欽山區實施，隨後情況最慘烈的是在撣邦和克倫邦。克倫邦尤其被政府軍蹂躪洗劫。成千上萬的村民被迫越過附近邊界逃到泰國，很多人至今仍困在散布於泰緬邊境山區裡長期存在的難民營。

「四斷」政策涉及惡劣的侵害人權，這些惡行都證據充分，包括強暴婦女、嚴刑拷打、草率處決等等。很多目擊者也作證說，軍方強逼村民從事徭役，而且把村民和犯人當成人肉掃雷裝置。「自由緬甸守護者」(Free Burma Rangers)這個潛入緬甸東部邊境救助受害村民的人道組織的一名成員說：「緬甸軍為避免械具遭抵抗軍(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破壞，譬如說築路的推土機，他們會找來三十名左右的村民，強迫村民走在推土機前頭，去清除叛軍埋在地下地雷。」

這種做法似乎持續到今天。二〇一四年，緬甸軍在撣邦北部與克欽族交戰期間，士兵仍舊抓村民去當搬運工或人肉掃雷裝置。有位被強逼當搬運工的村民告訴「緬甸民主之聲」(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他們不會刻意進到村子裡擄人，而是擄走那些在軍隊路過時不巧在村子附近的田裡幹活的人……緬甸兵把我們分成十到二十人一組，強迫我們走在他們前面去清除地雷。有時候他們不會叫我們搬東西，只叫我們走在他們前面。」¹⁶

有些人認為，是「四斷」政策本身使得政府軍變得暴虐殘忍、麻木不仁，結果臭名昭著。其他人則主張，是緬族人對克倫族、克欽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種族仇恨，讓政府軍打從一開始就非常樂意去執行這恐怖政策。克欽獨立軍的一位高階軍官棉基璠里(Myangng Naw Li)中校，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就在克欽山區與緬甸軍抗戰，當我在二〇一四年於密支那與他交談時，他對畢生死敵的動機做了一些解析。

棉基璠里中校十二歲時加入克欽獨立軍，多年來親眼見識過「四斷」政策。以下是他對緬甸軍的看法：

我開始跟緬甸軍作戰時還很年輕。我聽說他們會擄掠小孩、強姦小孩等等。起初我不相信，但當我開始打仗，我才知道他們真這樣幹。他們想要徹底淨空(克欽)這地區，他們想要摧毀一切，豬、牛、牲畜，燒毀房屋。他們顯然受過系統性的訓練。他也把孩子當

◎譯註：二〇〇五年五月開播，是緬甸有史以來第一個免費而且獨立的緬甸語電視頻道。

攻擊目標。緬甸軍進到村子裡時，村民通常都逃走了。緬甸軍會待在村裡，等村民從藏匿處回來，他們就開槍射殺。這類的情況我聽很多，他們洗劫村子，凌虐強姦婦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幹？緬甸兵這樣做是有誘因的；因為他們的長官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打退克欽獨立軍，村子裡的一切全歸他們，包括女人、酒、物品等等。

顯然，這情況已經持續了數十年，而緬甸士兵覺得強暴克欽族婦女是他們的權利。他們的長官也不會對他們的行徑感到格外不妥。以下是幾年前被緬甸兵強暴過的一位克欽／揮族的混血姑娘的證詞，是克欽族一位非政府組織成員所採訪整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約中午十二點，一位緬甸兵喝醉酒，進到村子裡來。我的名字是蒂蒂(Hwe Hwe)，十歲，在基本教育高中讀一年級……午休時間，我回家去，在吃午飯時，有個男人進到我家，我從沒在村子裡見過這個人，但我認得他身上穿的衣服。他穿的衣服是隔壁家的老人的。

他用緬語跟我說話，但我聽不懂，我不會緬語。因為我聽不懂他說的話，那人很生氣，把我正在吃的那盤飯揮到地上。然後他把我拖到我房間，在我爸媽房間的後面。進到房裡他脫光我衣服，我努力要逃跑，可是他把我抓得很牢。他把衣服塞進我嘴裡，我沒辦法喊救命……然後他強暴我。強暴完之後，我咬他的手，逃到我奶奶家。

我們跟一位緬甸軍官投訴，軍官叫我的老師和奶奶去把強暴我的人找來。被強暴後，有整整四天我沒辦法走路，因為實在很痛。¹⁷

受害者的奶奶接續說：

我們到處去找那個士兵，可是他逃走了，我們逮不到他。到了晚上，兩名軍官……到蒂蒂爸媽屋裡，拿出三萬緬元（三十美元）請他們原諒。那兩名軍官要求說，讓事情到此為止。我說我要打電話請村長來一趟，但他們不准我打電話。我們拿了錢，但我們很不滿意也開心不起來，我們會拿錢只是因為他們有槍，我們很害怕。（就算）他們給我們一百萬緬元我們也不會滿意。

很遺憾的，政府軍的運作是包得密不透風的官方機密，我們大概永遠也無法得知，士兵是受長官慫恿去做這種事，還是個人臨時起意，又或整個軍方已經扭曲到無以復加，強暴婦女成了集體的反射動作。可以確定的是，緬甸將領從未對士兵的行為致歉過，即便是登盛身邊的改革派也沒有。同樣的，每年軍人節軍方首領持續搬出同一套合理化說辭，強調軍人做為維護國家統一與團結等等的唯一捍衛者。

除了發展戡亂的戰力，軍政府也特別著力於情蒐、心理戰和電子戰等等旁門左道，包括竊

聽和信號情報。有位專家寫道，奈溫的一大創舉是在緬甸軍隊成立惡名昭彰的軍情局。這單位是由曾在英國和美國受訓的丁戊（Tin U）創立。軍情局會定期整肅異己，它躋身亞洲最具效力的祕密警察部隊之一非浪得虛名。它不僅鎖定軍政府的明顯敵手收集情報，也對政府官員收集情資。丁戊在一九八三年最終被逮捕入獄，就是對自己的工作太內行，握有太多頂上司們有罪的情資，以至於成了長官們的眼中釘。繼任的欽紐（Kin Nyunt）同時也掌控了國防情報局，他在二〇〇四年同樣也被丹瑞整肅。欽紐直到二〇一二年大赦才從牢裡獲釋，但是和他同時入獄的二十一名軍情局官員則仍舊在牢裡，儘管大部分的政治犯早已獲釋。¹⁸

最優先的是心理戰，或「心戰」。心理作戰局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成立，當時軍官們飛往世界各地考察，從形形色色的國家譬如南斯拉夫、以色列、美國、巴基斯坦和英國的相關活動裡，擷取對緬甸最有利的點子。緬甸一位退役軍官向我描述心戰如何運作，他在一九九〇年代駐紮下緬甸時曾聽過某位擅長打心戰的少校講課。這位少校訓練聽眾如何進行政治宣傳，他把這個範疇分三種：第一種「白色宣傳」關乎傳遞「正確」的真實訊息給人民；第二種「黑色宣傳」關乎傳遞錯誤訊息或純粹謊言（要讓人信以為真，他說，「你只要無止境地反覆一直說」）；第三類更有意思，叫做「褐色宣傳」，專家說，這就是政權用來「改變人民心態」的手段。

褐色宣傳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心戰最隱晦的活動，軍方深深著力於以普通書籍、雜誌甚而娛樂為幌子的政治宣傳工作。一位西方研究者卡拉翰（Mary Callahan）透過管道取得一九五〇年代政府軍的檔案資料，她寫道：「接下來十年間，心戰行動包括……資助皮威表演（Pwe，傳

統雜耍表演）、廣播節目和小冊子的發行與流通。」他們進軍商業雜誌。一本他們一推出就大受歡迎的熱門雜誌，硬是賣得比時常批判政府軍的一本左派刊物便宜，逼得後者只好關門大吉。心戰雜誌自然不會讓人看出它和軍方的淵源。¹⁹

那名少校在講課時誇耀的另一個心戰案例，是一本在二〇〇〇年代早期流通、聲名狼藉的書，散播與伊斯蘭及穆斯林有關的謊言和迷思。緬語書名是 *Myo pyauk hma so pyauk teh*（可粗略地譯成《吾族失落的可怕》），作者不詳，據說是心理作戰局的作品。這本書充滿杜撰的資料與註腳，使得它帶有真實感，而且到處可以取得。它被蓄意操作成緬族佛教徒版的《錫安長老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而《錫安長老議定書》是早期一本惡作劇的書，旨在揭發猶太人統治世界的陰謀。²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打從心戰作業一開始，它就明明白白是為政治服務，用盡各種手段來鞏固緬族主導的政府軍的合法性。

一九八八年之後，大部分的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和緬甸共產黨對於國家的完整性不再具有實質威脅，這類情蒐、黑色宣傳和監視機關很可能被用來對付翁山蘇姬倡導的民主運動。結果緬甸不折不扣成了歐威爾筆下的警察國家，充滿形形色色錯綜繁複的竊聽者與電子監聽裝置。很多溝通管道一概被禁止，譬如網際網路、智慧手機和國際的晶片卡。它們被核可使用時，祕密

²⁰ 編註：《錫安長老議定書》出版於一九〇三年的俄國，作者不詳，內容描述猶太人陰謀征服世界的具體計畫。學者普遍認為該書是俄國祕密警察組織虛構出來的作品，做為反猶的宣傳工具。

警察肯定會布線監控。

後繼的軍政府選擇大幅擴編政府軍，設立相關的情報單位，在經濟上帶來龐大的金融體系扭曲，在國家整體的政治、經濟上釀成大禍，並不令人訝異。把高達四成的預算投入軍事開支造成了嚴重後果。這筆經費無論如何都是迅速萎縮的國民所得的一部分，四成的預算甚至不夠支付平定叛亂、祕密警察和情報作業的總費用。因此，軍隊在戍守土地的同時被鼓勵從事生產，增加自身的收入。結果，駐紮在山區的部隊不得自行耕種和買賣來養活自己和發薪餉。一九六二年之後，軍隊也在國家經濟上把持特權，它可以訂定條款涉入緬甸各種營利事業，從飯店到伐木業，從瓶裝到賣車，從國內銀行到航空工業，甚至養豬業。軍方往往壟斷進口貿易，譬如食用油、香菸和二手車的進口。以緬甸的標準來說，這些都是利潤很高的生意。結果軍方高層的利益和國家的商業及金融部門密不可分。

竊國者侯

軍官們最初是在一九六四年將外國企業收歸國有的行動中涉入這些事業。這些企業通常直接被奈溫及其親信充公，尤其是最有利可圖的生意譬如寶石買賣。寶石買賣後來讓很多高階將領家財萬貫。多少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將軍們設法把緬甸馳名的寶石打造成國家的驕傲，先後在仰光和奈比多建造巨大浮誇的博物館來炫耀國家最稀珍的寶石。

緬甸特有的翡翠最為珍貴，中國人尤其喜愛，通常大量購買（可參見第四章）。緬甸紅寶石占全球產量的九成左右，品質卓越，若以每克拉計價，當屬世上最貴重的寶石。緬甸「鴿血紅」紅寶石和藍寶石也很出名。不過翡翠和紅寶石卻是在近乎使用奴役的惡劣條件下開採的，而採礦公司若非緬甸軍方所有，就是與軍方關係密切的人。

一九六四年，軍政府首次舉辦一年一度的緬甸寶石博覽會，最近幾年則在奈比多有如巨穴般的瑪涅雅德納翡翠廳（Maniyadana Jade Hall）和緬甸寶石博物館（Myanmar Gems Museum）舉行。這是緬甸玉石與寶石買賣的展示窗，吸引了數千名交易商前來。二〇一三年的會展招來了四千名外國珠寶商，募到破紀錄的二十四億美元資金。這個數字讓人得以一窺將軍們經手的未曾洩漏的金額，尤其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有軍方背景的公司取代了擁有大部分礦產的地方企業或私人企業，特別是在克欽邦。軍方直接插手寶石和玉石生意後，產量急遽拉高。舉例來說，硬玉的輸出量，在二〇一一年高達四萬五千英噸左右，相較之下二〇〇〇年初期僅有一萬英噸。²⁰一年一次的寶石博覽會不足以應付這龐大的寶石流量。現今則有年中展覽會和「特展」，在仰光和奈比多之間輪流展出。

由於緬甸軍方涉入寶石開採，美國和歐洲從一九九〇年代晚期開始，對緬甸紅寶石和玉石實施貿易禁令。而今寶石的開採依舊貪腐不堪，充斥著勞工虐待，美國仍維持這項進口禁令，即使其他的貿易禁令幾乎都已解除。不過，中國人對玉石、紅寶石、柚木和緬甸其他珍貴資源的永不厭足，有效抵銷了西方制裁的影響。

軍方在商貿各個層次的涉入，嚴重扭曲了緬甸經濟。其主要的控股公司，緬甸聯邦經濟控股有限公司（Union of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成了操控緬甸經濟的最大玩家之一。利用奈溫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明顯失敗後引進經濟改革的機會，緬甸聯邦經濟控股有限公司於一九九〇年成立，其股本是由國防部採購署和軍系幾個合作企業、軍團協會和退役軍人組織共同持有。²¹它的運作完全不透明，財務與人事也教人摸不清。軍方所屬的另一個控股公司緬甸經濟公司（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情況也一樣，持股的也都是現役和退役軍官。

軍方把持地方經濟的狀況，可以從曼德勒往東北到臘戍，路程約一百二十公里，接著再往中緬邊境去的這一趟路，略窺一二。臘戍是撣邦北部的主要城市，有很多華人聚集，因為它是前往邊城木姐（Muse）的最後一個重要的停留處，過了木姐即進入中國西南的雲南省。這裡是東北指揮部（North-Eastern Command）的大本營，在戰略上以掃蕩當地撣族和克欽族武裝叛軍為主。除了純粹的軍事角色之外，這指揮部的商業活動還挺活絡的。

臘戍城外的路標得意地指示著進入東北指揮部所屬大片農地的入口，往木姐的一路上盡是軍方的林地和農場。指揮官利用部隊敲詐顧客。當地撣族民主黨（Shan Nationalities Democratic Party）的聯邦議會成員之一耶屯（Ye Tun）舉了個實例，指出軍隊在臘戍的籠飼雞農場生意。多年來，駐守撣邦入境檢查哨的士兵攔阻了載有雞隻的所有車輛進入，以維持軍方刻意哄抬的雞隻價格。耶屯說，他在議會揭發了這起詐欺，所以哄抬的情況停止了，但是這類事件在緬甸不勝枚舉。

更離譜的是，軍方也深深涉入該地區罌粟的大規模種植和販賣。在美國施壓之下，泰國和中國在二〇〇〇年代初剷除菸田，根絕罌粟的種植，但是緬甸軍方卻就此開始與名為民兵部隊（People's Militia Forces）的武裝幫派聯手種植更多的鴉片，遠遠逃過美國法眼。這些民兵部隊，又叫做邊防軍（Border Force Guard），最初是在獨立後想借用他們的力量，打擊分離主義運動的頭幾任政府的許可下成立。然而其中很多部隊後來淪為庇護毒品買賣的私人軍隊。檢查哨的緬兵遇到運毒的民兵部隊會放行，但會攔下當地少數民族的同行對手。某個以泰國為基地的撣邦遊說團體表示，緬軍和民兵部隊的關係之密切，以致二〇一〇年有七名打著軍方代理政黨鞏發黨旗幟的民兵部隊頭領獲選進入緬甸新議會（聯邦議會和邦議會）。為了吸引當地農民的選票，他們高喊要讓農民無後顧之憂的種罌粟。

令人震驚的是，該地區的柚木也遭大量砍伐並走私到中國去，且往往都在軍方掩護下進行。靠近中國邊界的山區，整片地景看起來彷彿被人用一把巨型電動剃鬚刀給剃過，濫伐的程度直比毀林。早自一九九三年起，理論上私伐林木是不合法的。然而英國非政府組織「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估計，從一九九〇至二〇〇五年，緬甸失去了百分之十八的森林，而它原本擁有全世界柚木林的五分之四。²²目前情況稍稍好轉，雖然在二〇〇八年中國當局仍記載，有二十七萬立方公尺的原木和十七萬立方公尺的鋸材從木姐越過邊境進入雲南省。十分之九是在緬甸非法盜伐的，而且一般威信，木材是在緬甸軍方協助下被偷運出境。

緬甸公務人員薪水微薄，過去是如此，現在也差不多，不管軍方、奈比多公務機關、警

員、審查員或海關人員皆是如此，可想而知，他們都會借職務之便賺點外快。因此，公職的低薪資助長了貪汙受賄，甚至讓貪汙賄賂成為必要，而且這股風氣在公家機關裡根深柢固。這不代表說每位官員都涉入毒品買賣，而是即便是相對善良誠實的官僚也認為，一定要利用職位額外撈點錢，讓自己持續握有職務特權。

二〇一四年，一位不願具名，在政府某部門擔任副主任的資深官僚，跟我詳述他的財務狀況。以他的高階職位加上所有福利，月領三百八十美元；底薪是兩百二十美元。然而他大部分的收入來自進口加工品的生意以及在奈比多的家族事業，而且賺得比公家薪水多很多。他承認，公家職位給與他的公司「協助與庇護」，讓他贏得更多生意，譬如說，他在首都尤其吃得開，可以穩當地取得公家的合約，這是在政府部門沒有人脈的大多數包商很少能享受到的奢侈待遇。這位非常盡職而且聰明的行政官員跟我說，他在公家當差「只為了顏面，不是為錢」。

人人不法

軍政府手中的王牌，是國家體系實際上讓人人不法，因此人人都有把柄。全民盟成員奈基溫（Nay Chi Win）在二〇〇〇年代大半都在為該黨從事地下工作，他這麼跟我說明：「你做每件事都要證照，買電視要證照，開餐館要證照，買筆電也要。要取得的證照那麼多，大家也就懶得申請了。所以人人都違法。如果有人對你要手段或把你違法的事張揚出去，那麼他們（祕

密警察）會威脅要關你，或者，他們會要你告密，供出朋友的不法情事。」因此政府建立了由探子和線民組成的一支軍隊，他們滲透到反對黨以及外國非政府組織、大使館等處，無孔不入。

「全民盟內埋伏著成千上萬的眼線」，這位年輕的活躍分子回憶道，「所以很多真正的全民盟黨員都潛逃國外，留下來的黨員很多都是眼線。」二〇〇〇年代末，全民盟每週三晚上舉辦青年聚會，奈基溫和朋友人的任務就是要仔細調查與會者的背景。某晚，參加週三聚會的一個年輕人被發現在咖啡廳裡把開會文件交給警察保安處的人，顯然是個眼線。奈基溫描述接下來發生的事：「下一次聚會時，我們大略提及我們之中有個眼線，並客氣地請他以後別再出現。但是下次開會時他竟然第一個到，他目前還在全民盟擔任高層……目前這些臥底的人數和全民盟的黨員總數比起來是少數，但他們還在。」

軍政府其他的惡劣行徑在今天仍相當明顯。「很多犯人，」奈基溫繼續說，「被政府吸收，成為政府雇員，以交換減刑，所以政府很容易找到領錢替它辦事的人。人人都可能是探子，或者替精武幫（Swan Arr Shin）辦事。」這些人是政府雇來的惡棍和流氓；翁山蘇姬管他們叫做政府的褐衫軍（Brown Shirts），比擬為希特勒手下兇殘的執法者。緬語的意思是「暴徒」。他們被利用來恐嚇或打擊政敵，尤其是騷擾全民盟。

二〇〇三年翁山蘇姬差點遇害，很可能就是神出鬼沒的精武幫策動的。當時她罕見地從軟禁獲釋，正展開全國巡迴演說，在一次下鄉途中，她的車隊遭到襲擊，約有七十名她的支持者

被當場砍殺或活活打死。一般威信，精武幫和惡名遠播的強硬派昂當（Aung Thang）關係匪淺，而昂當也是丹瑞的親信。他曾是軍方派任的國會議員，也擔任過工業部長。精武幫至今仍相當活躍；很多穆斯林認為近幾年來反穆斯林的諸多暴力攻擊就是精武幫煽動和執行的。穆斯林受害者注意到，襲擊者往往訓練有素又組織嚴密，而且被一輛輛汽車或小巴士從城外載進來。這些受雇的人手通常都使用同樣的武器——棍棒、刀刃和火把——來對付穆斯林，而他們先前也受雇去對付全民盟以及二〇〇七年發起番紅花革命的僧侶。

政府的其他分支沒那麼兇殘但更加陰險，主要是警察系統以及國內錯縱複雜的各種情治單位，想必也跟軍方一樣從奉命要調查和迫害的對象得到好處。某個被警察保安處加害、不願具名的人告訴我，官僚到她家白吃白住的例子。

她先生在二〇〇〇年代早期身陷政府內的一波政治鬥爭，結果被羅織貪汙罪名遭捕。警察保安處指派兩名便衣處理這案子，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調查期間隨時盯梢她先生。打從一開始，這兩名便衣就擺明要他們供養；如果她先生在家吃午飯，便衣也表明要一起搭伙。

她和先生各有一輛車，於是便衣占用了其中一輛。他們擁有一間房子和一層家庭公寓，結果便衣也占用了家庭公寓一年才歸還。她被迫把一條小金鍊送給其中一名便衣的女兒；至於另一名便衣，她送上相當於兩千五百美元的緬幣，而且是裝在袋子裡由某個中間人轉交。當局強烈建議他們不要請律師，如果他們不從，他們被告知說，她先生的刑罰只會更重。最後，她先生被以違反貨幣規定判六十年牢獄（此外還有另一條罪名被判處終身監禁）。他最後假釋出獄

時僅坐八年牢。

鑑於在緬甸經濟裡盤根錯節的這些剝削和寄生關係，軍方會自行抽身而退，還是被迫這麼做？這是登盛政府及其後繼改革者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為了打造對投資者友善且更平衡的經濟，好讓自由競爭出現，軍方舊有的獨占壟斷和經濟特權勢必得打破。然而到目前為止仍不見軍方接受了這思維的跡象。為了換取外資流入和解除經濟制裁而不得不釋放翁山蘇姬和開放些許民主是一回事，為了換取進一步的改革而放棄經濟特權和畢生的衣食父母則是另一回事。

值得稱道的是，登盛總統始終在督促軍方從經濟中略微抽身，迫使軍方放棄某些貨品的進口壟斷，譬如啤酒的進口。但是根據西方某家金融投資公司對我的簡短說明，緬甸軍方的兩大控股集團依舊故我，至今仍「毒害很深」，就像大部分半軍方的商人「顯然無意改革」。既然他們從現狀享有那麼大的利益，又何必改革呢？

第四章 壓迫與反抗

如果說舊首都仰光和新首都奈比多，先後代表緬甸受外國人壓迫以及後續對於新國家認同的追尋，那麼在這國家的邊陲地帶，則瀰漫著一股迥然不同的態勢。在這裡，很多少數原住民族持續向緬族抗爭他們表述自身文化和政治認同的權利。這是崩解散落的馬賽克鑲嵌畫的最後一塊。

不同於殖民時期來到緬甸而構成多元社會的那些移民，克倫族、欽族、孟族、克欽族、掸族和其他族裔（但不包括羅興亞族人）起碼始終被占多數的緬族正式承認為原住族裔，如同一九八二年「公民法」所定義的。他們和緬族的爭鬥，從很多情況來說早在殖民時期之前就已經開始，如獨立以來政府當局與多元社會的扞格齟齬，他們與緬族的武裝衝突也從未止息。大體說來，居住在這國家偏遠又不易抵達的地區，少數原住族群受多元社會的影響遠不如住在城市和沿海地區的緬族深，不過有個很重要的面向除外。自十九世紀中期起，基督教傳教士——主

要是浸信會教士——便開始對當時仍相信萬物有靈的山區民族傳教，包括克倫族、克欽族與欽族。結果這些少數族群發展出自身特有的一套宗教及文化認同，使得他們和居住在中央平原信奉佛教的緬族多數族群之間形成一道深邃的鴻溝。

理論上，少數民族譬如克欽族應該和緬族一樣平等，享有同樣的公民權利和機會。但是實情始終很不一樣，而且會持續下去。宗教只是信奉佛教的緬族歧視他們的其中一點而已。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被當成次等公民或更惡劣的對待，這是血腥內戰的起因也是後果，自從獨立以來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便一直與中央的緬族當局交戰。

因此，主要盤踞中央低窪平原的緬族和居住在蜿蜒遼闊邊境的少數民族之間的分歧，始終是緬甸最嚴重的斷層線。地理的因素關係重大。少數族群棲居的馬蹄形區域環抱緬族的中心地區，是緬甸特殊的政治地理特色。緬甸的命脈是幾條南北向的大河，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洛瓦底江，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區，流經相對平坦沉靜的中央地區和下緬甸，最後出海。國內東西向的活動相對很少。就像緬族軍隊從未在山區裡壯大過，少數民族武裝部隊也從未在這遼闊的國土裡相互串連，四十二萬平方英里的國土面積約莫是英國的三倍大。

這國家裡的人民大約有三分之一屬於非緬族裔。假使馬蹄形斷層線產生的衝突無法解決，緬甸將永無和平或繁榮，而且要先有和平才有繁榮。少數民族和執政的緬族之間的差異，又以克欽邦這個從中央平原延伸至喜馬拉雅山山腳下的遠北地區最鮮明。因此，緬甸政府是否真想改革，緬甸是否可以真正去期待和平與民主有朝一日會到來，真正考驗就在克欽邦的土地上。

淪陷的密支那

在今天，造訪克欽邦首府密支那這樣的一個城市，彷彿冒險挺進敵人占領的城市。這確實是在當代緬族治下的克欽族人的感受。二〇一五年初，克欽邦主要政治團體「克欽獨立組織」(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sation)的武裝派系克欽獨立軍，是與登盛的改革政府簽下正式停火協議的最後一個主要少數族群武裝部隊，一般認定這是全國性停火協議的一環。但是克欽邦對中央恨之入骨，即使如此的停火協議有效，它是否會導向實質的政治會談仍屬未知。一如後面會討論到的，克欽邦曾經走過這條路，但毫無所獲。就目前來說，緬族在克欽邦多半仍以暴力施加統治。

克欽邦通常被認為是山區，但它的首府位於緬甸中央低地。密支那以北五十英里處才是山區起點。因此山區民族真正說來是居住在該邦偏遠北部一帶，由遠方的喜馬拉雅山雪山山峰所環抱，山谷中的邊疆小鎮蒲陶(Purao)附近的族裔。更多的克欽族人住在往東逼近中國邊境的地區，尤其是在巴交(Parau)附近。克欽邦的低窪地區環繞密支那及其南方，全都是肥沃青翠、栽種水稻的農地，灌溉農田的圳渠從山區引水，只不過這套灌溉系統是英國人對邊疆地區的建樹。這裡形成了當代克欽邦的行政中心，因此克欽族的各個次族群南遷至密支那及其周邊定居。

緬甸中央政府在密支那的地盤，主要侷限於占據伊洛瓦底江江畔最佳地點之一的龐大建築

群，建築群以路障、武裝衛兵和帶刺鐵絲網對外封鎖，與該城其餘地區隔離。這裡住的是中央指派的克欽邦都督，或叫首長。就像邦或地區上所有的這類首腦，他是奈比多的中央當局直接任命的。他只回應中央，而非回應實際上管轄的人民。從一九八八至二〇一一年，密支那歷任都督（後來的首長）都是緬族人。唯獨最近這一任是克欽族人，不過他也被大多數克欽族人視為緬族走狗。在其他邦裡，這類傀儡的存在也都是常態。

不論如何，就像專家指出的，這些首長及其閣員「做決策的權力相當有限」。實際上掌握權力的是邦的書記，首長的主要顧問，這人通常是政府軍退役的軍官。比首長次一級的區長，也對所管轄的範圍握有可觀的權力，這些人通常也都是緬族人。他們也都要向首長進行施政報告而非對人民報告。我的欽族朋友齊麗·扎豪曾詢問當局為何欽邦的政務官都是緬族人。得到的答案是「沒有合格的欽族人可以勝任該職務」。緬甸有大約一百萬的欽族人，和克欽族的人數差不多。

透過這樣的行政架構，緬甸政府掌控了邦內所有的學校、稅收、醫院、司法和警政。緬族在克欽邦的統治，借展現軍威當後盾，在山區的其餘地區也是如此。一座大型的軍事基地緊鄰密支那機場；克欽獨立軍估計，總共約有兩萬五千名緬族士兵駐紮全邦境內。

密支那的公職差事大部分是外來的緬族人包辦，這引發大量民怨，因為這裡極度缺乏穩定持久的工作機會。就像我們之前談過的，中央政府也制訂教育政策。教師一概由奈比多的教育部聘任，而且根據學生告訴我的，這些教師幾乎清一色是緬族人。跟其他邦的首府一樣，政府

也在克欽邦蓋了一座博物館來介紹該邦的民族，儘管這些博物館陰暗潮濕、門可羅雀、乏人問津。常展的內容有當地傳統服裝和古代竹造屋的小模型——不過什麼都比不上緬族。

中央政府也主張，各邦或地區的天然資源均歸國有，不論玉石、黃金、鎳礦或柚木。不管從什麼標準來看，它已成了中央集權的體系，緬族為首的奈比多政府權力一把抓。當局也嚴厲掌控邦內的所有活動。我入住的飯店有個大型立牌明確標示，哪些城鎮外國人可以造訪，哪些不得造訪。不得造訪的城鎮在數量上自然比可以造訪的多得多。緬甸的移民官員仔細記錄從密支那機場出入的所有人。玉石開採區是嚴格禁止進入的，偏離伊洛瓦底江沿岸的南北軸線太遠的區域也一樣。緬甸軍隊會乘著淺吃水船從政府建築群出發往伊洛瓦底江上游巡邏偵察。所有道路也都布滿路障。

比起凋敝、窮困、燈火管制的密支那，即便是頹敗的舊仰光感覺上仍然前景可期。我在二〇一二年第一次造訪密支那時，這地方顯然數十年毫無改變：極度貧窮，和緬甸其餘地區完全隔絕，更別說與這世界脫節。看似緬甸最老舊的火車，偶爾會緩緩行駛在鐵軌上，從曼德勒北上展開漫長旅程。入夜後即便是主要街道也燈光昏暗，很難在坑坑洞洞的路面上行走。不像曼德勒和仰光，密支那的網路連線慢得無法使用。電話系統勉強堪用，不過城裡只有三個地方可以打國際電話，當我們找到這些地方時卻都已關門打烊。我的嚮導想起我下榻的破舊老飯店有台「可以打國際電話的電話機」，臉上露出了喜色。快帶我回去，我說。櫃檯上有幾台蒙塵的老機具，我依指示使用紅色的一台。試了五、六遍都沒成功，嚮導見狀似乎很訝異。「我三年

前用的時候還撥得通啊！」他驚呼。

數百年的反抗

族裔之間的關係倒也不是一直劍拔弩張。就像緬甸所有的一切，緬族和克欽族之間的仇恨與衝突其來有自。一如最近一位克欽族編年史家沙登（Mandy Sazan）指出，在十九世紀中之前，緬族和新福族（Singpho，又稱景頗族 [Jinghpaw]）之間沒什麼摩擦，而新福族後來和其他族群被統稱為克欽族。新福族或景頗族是成功的商人，多半是靠後來向西延伸至阿薩姆、向東至中國雲南的土地所產的原物料做買賣。硬玉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產自密支那西北方的胡康（Hukawng）河谷一帶。

到了十七世紀，新福—景頗族群和中國雲南商人已經建立了非常綿密的網絡。雲南商人把玉石囤積在雲南府（今天的昆明），廣東商人會來此購買。紅寶石和其他的貴寶石也在此進行交易。這是非常大規模而老練的貿易文化，慢慢形成至今仍遍及泛亞地區的貿易局面。大約有十三萬的克欽族仍居住在雲南省與緬甸接壤的邊境。他們仍保留景頗族這名稱，而中國人也這麼稱呼他們，屬於中國官方承認的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同樣的，也有成千上萬的克欽族仍舊居住在印度東北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與緬甸克欽邦接壤的邊境。

然而新福—景頗族所形成的這個龐大、相對繁榮的無國界實體，卻因為英國對緬甸的殖民戰爭開打而快速起變化。第二次英緬戰爭戰敗後，敏東王決定向北方擴張領土，以彌補他漸次割讓給英國的南方國土。於是敏東王在一八六九年宣布壟斷玉礦，規定開採的玉石僅能由他收購。這有效切斷了新福—景頗族商人和出高價的中國客群之間的往來；類似的壟斷也延伸至其他貨品。且不管新福—景頗族商人只把次級寶石賣給緬族來規避新規定，更重要的是，就如沙登寫道：「該地區的新福—景頗族商人認為，緬族以新強權之姿施加統治，顯然是要榨取他們的經濟機會。」²這說法至今也成立。

緬族君王政體在一八八五年崩解之後，新福—景頗族快速地直接經驗到殖民統治，但是他們的被殖民經驗和緬族的大不相同，結果導致這兩個族裔至今仍持續分裂。

克欽族起初也跟緬族一樣抵抗英國統治。英軍占領克欽山區時遭遇激烈抵抗，英國當局採行的安撫政策也只是引來一場場血腥抗戰。晚至一九一五年，克欽族的最後一次抵抗才被當局弭平。

不過從其他方面來看，英國在克欽邦和緬邦所施行的殖民統治完全不同。首先，英國對克欽邦及其他山地區域的治理是和緬邦分開來的。剛被攻占的緬族疆域，隸屬於加爾各答管轄，同樣的，一八七四年頒布的「印度預定轄區法」（Indian Scheduled Districts Act）也為一八八五年之後克欽邦、撣邦和欽邦地區的分開治理提供了原型。在這過程裡，為了便於理解，英國開始把緬甸境內的新福—景頗族統稱為克欽族，以跟居住在新劃定的中緬邊界另一側的雲南省境內的新福—景頗族區別開來。克欽族和其他山區民族於是在政治上逐漸形成和緬族相去甚遠的

氛圍。一九二二年，英國設立新的邊區機構來管理山地區域，指派軍官中的精英階級來處理政務，進一步加深了山區民族與緬族的差異。

此外，就如山區民族會抵抗英國統治，他們也會被英國拉攏，主要是透過從軍和信仰，而這一點和緬族很不同。當代的克欽族認同和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尚武基督信仰有密切關係，而克欽族和緬族之間至今最重大的差異仍是宗教。如我們之前提過的，美國浸信會教士在一八七七年開始來到克欽山區，之後基督教其他教派的教士也陸續跟進。在今天，克欽族幾乎人人是基督徒；約有半數是浸信會教徒，其餘通常是英國國教徒、天主教徒或美國教會神召會(Assembly of God)的教徒。在近代，南韓富有的福音布道者也大舉進入。光是在密支那就有十五間浸信會教堂，全國則超過三百間，大部分都在克欽邦。在這裡，基督信仰可不僅僅只是上教堂做禮拜而已，它是克欽族文化、認同與自治的一種生氣勃勃的表現。

除了鼓勵傳教士前來，就像英國人在英屬印度帝國的邊疆「省」尼泊爾的做法，他們也認為山區民族肯定跟廓爾喀人一樣是尚武的民族。不光是他們不容置疑的軍事長才，也因為尼泊爾山區和克欽山區當時位處大英帝國與中國接壤的邊境，英國得要防止虎視眈眈的中國進犯。因此，克欽族開始被徵募為帝國軍。姑且不論其他原因，對克欽族年輕人來說，軍中待遇以當地標準來說極為優渥。投效軍旅也被視為一種尊榮，更是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契機。

徵募克欽族新兵一開始進展緩慢，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後急速加快。在一九一六年，數百名克欽族人陸續入伍，克欽憲兵隊正好送去和廓爾喀人一起受訓。來自中國那一側邊

境的人也加入克欽軍，連同一些緬族人，他們組成第八十五緬甸步兵團，被派往美索不達米亞打仗——他們戲稱美索不達米亞為Ma Sawp Amya Ga，意思是「巨大的未知」。然而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沙場上，當代克欽族士兵的傳奇就此誕生。他們的鐵血紀律、驍勇善戰，叫他們的英國軍官大為驚嘆，小小一支勁旅贏得的勳章之多前所未有。其中一位名叫梭圖(Sau Tu)的尉官名聲響亮，後來被欽點為國王的值班軍官，在倫敦白金漢宮的王位廳擔任守衛。他也獲得法國最高軍事勳章之一。

這些士兵從歐洲返回後，被克欽族人捧為英雄，令人咋舌的精采故事、軍人薪俸和豐功偉業傳遍全城。赫赫有名的柯林·梅特卡夫·安立奎(Colin Mercalf Enriquez)少校在緬甸和美索不達米亞擔任克欽族徵集兵的司令，他記錄了歸鄉後會見傳奇人物梭圖的情形：

「那麼，」我問，「你在英國看到什麼？」……「杜瓦(Duwa)⊙！我看到一切。我看到國王，看到格拉斯哥，還有令尊。杜瓦，印度人一概領到印度奶油(ghi)，他們很嫉妒我，因為我可以要求一般的英軍伙食，結果吃得像一頭大象。在漢普頓宮，我有電燈和四件毯子，現在在這個礦村裡我會死於沙塵和沉悶。看看這些路！看看這竹地板！只能用來吐痰。我和恭杰(Kumje)尉官要一起蓋一間木造房。」³

⊙ 譯註：克欽族人對頭目的稱呼，可大略譯為「首領」。

在戰爭期間證明自己的價值後，大部分的克欽族徵集兵在和平到來時留在新成立的緬甸軍。當正規兵，而新成立的緬甸軍當時主要是由克欽族、克倫族和欽族組成——傳統的尚武民族。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兵役，進一步惡化克欽族和緬族之間的分歧。做為大英帝國的正規軍，他們不僅要撲滅大英帝國之內其他地區譬如馬來亞的小型叛亂，也要撲滅緬甸境內的反叛活動。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被派來鎮壓薩亞森(Saya San)起義的英軍裡就包含了克欽族人，而薩亞森起義是緬族最後的一次反殖民抗爭。在一九三五年，克欽族士兵也參與鎮壓緬甸東部偏遠的瓦邦(Wa)的反叛活動。這些軍事攻擊一再建立了克欽族人能征善戰的威信，也讓他們更堅定地站在殖民強權這一邊來打擊緬族。這種敵對關係後來不幸地延續到二次大戰，演變成在緬甸境內叢林裡而非美索不達米亞沙漠中的戰鬥。

大背叛

有誰比典型的基督徒士兵何瓦桑甘(Ho Wa Zan Gan)更能為克欽邦續寫歷史。二〇一四年我在他位於密支那中心整潔悅目的木造小平房裡與他見面。這位八十六歲老先生短小精幹，顯然非常強悍，他追述克欽族演變至今日處境的關鍵年代，彷彿昨日發生一樣。他出生在撣邦北部的克欽族部落中，年輕時搬遷到克欽邦。日本人占領緬甸期間，他的家人隱沒於克欽山區。英美聯軍在一九四四年末開始收復緬甸，當時十七歲的他就跟其他數萬名克欽族青年一樣

加入聯軍，要把日本人趕出家鄉。

這位新兵加入了克欽遊騎兵(Kachin Rangers)第五營，被指派到特別成立的美國單位——一分遣隊，隸屬戰略情報局的一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戰爭時期的前身。一〇一分遣隊的任務是蒐集情報並擾亂日本人，往往要深入日軍後方出任務。何瓦桑甘會說五種語言：英文、中文、克欽語、撣語和緬語，所以他奉命在一位美國軍官手下執行情報工作。他這樣跟我描述他的任務：

我們經常要越過日軍前線深入後方，和克欽族人、撣族人和巴龍人(Palongs)碰頭。我們帶兩或三公斤的鴉片浸膏，用鴉片跟他們交換日本人的行蹤，他們會告訴我們日本人的軍力和所在位置。然後我的長官會把訊息傳回總部，他們會砲轟日本人。我們經常在前線四處走動，三或四人一組，全都是步行。美國人來之前我們不曾穿鞋，他們發軍靴給我們穿。我們走路時習慣脫掉靴子，進村子後才再穿上去。

我們也配有卡賓槍和英國製的斯登衝鋒槍，但我們從沒和日本人交手，我們通常會避開他們，因為我們的裝備太陽春。我們有K口糧^②、罐頭食品和一些可以煮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在野外支撐三、四天左右。我們執行很多這類的任務；每次出任務後我們會休息

^② 譯註：是一種單兵軍用口糧，完整的一份可滿足一名普通士兵一天的消耗。

個兩天，然後再繼續出任務。

鴉片只用來從吸鴉片的人身上獲取資訊。那些人看起來又老又笨，日本人壓根不會想到他們會是間諜。日本人稱克欽遊騎兵是「幽靈軍團」，因為他們若跟克欽遊騎兵交手，不出幾分鐘他們就會人間蒸發，我們是在地人，很了解自己的土地，知道哪裡有河，哪裡有深谷或河谷，知道要在哪裡埋伏進行突襲。

像何瓦桑甘這類的人，對聯軍來說幫助很大，一〇一分遣隊最後雇用了高達一萬一千名克欽族人。他們厥功甚偉，別的成就不說，在該地區蒐集到的情資有九成是他們的貢獻。據估計他們也殺了高達一萬名日本人。何瓦桑甘在解放曼德勒的戰役中打過仗，也參與了保衛密支那的一場浴血戰鬥。密支那這一役，一萬名日本人死守城裡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的飛機場，幾乎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在一九四五年，有數星期的時間，密支那機場是全世界飛機起降最頻繁的地方。城裡有個日本人紀念碑，紀念在密支那之役身亡的數千名日本兵，那是一尊龐然的臥佛，放置在緬甸政府機關建築群後方。這尊佛像是一些不願公開身分的日裔公民在一九四〇年安放的，感人地提醒世人那一場極其慘烈的戰役，即便以緬甸戰爭的標準來看也是如此。

綽號「醋酸喬」的史迪威 (Stewart) 將軍，蔣介石部隊在這地區的一位性情暴躁、有名無實的指揮官，一回聽了一位克欽族指揮官自稱在某次戰役裡殺了多少日本人後，相當不智地加以質疑。結果這位克欽族將軍打開一根竹筒，把一堆乾燥的人耳倒到桌上。他簡短地跟史迪威

說：「兩個兩個數數看。」⁴

克欽遊騎兵最出名的戰績，是密支那之役結束前夕，四百名克欽族人對上七百名撤退的日軍，經過徹夜激戰，兩百八十一名日本人喪命，只有七名克欽族人傷亡。何瓦桑甘跟我說起這些往事時，他站起身指著牆上一張裱了框的嘉獎令，上面表揚克欽遊騎兵在這場戰役的英勇表現，由艾森豪 (Eisenhower) 將軍親自署名，標示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一月。

像何瓦桑甘這樣的人，為了把日本人逐出國土，很樂意為聯軍作戰，但是克欽族人與英軍和美軍並肩作戰，也是希望戰爭結束後他們會讓克欽邦獨立。就像這位老兵在我詢問下回想起來的：「我們想從英國政府得到自由，我們寄望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邱吉爾和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二年初簽訂)，期待英國會撤出殖民地。我們知道戰後緬甸可以獨立……所以密支那的克欽族人想要快速從英國取得獨立。我們當時信心滿滿。」事實上，這想法被認為只不過是從邊疆地區和中央平原分治這業已存在的法制安排，一廂情願的推論。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不論有心無心，分而治之的政策已經讓克欽族、掸族、克倫族及欽族和緬族之間生出一種差異感。二次大戰讓這個差異更鮮明。」

當克欽族發現，英國非但沒有打算讓克欽邦獨立，反倒支持翁山將軍以整個緬甸做為統一的國家爭取獨立，想必相當震驚。對克欽族人來說這是第一次背叛。對於克欽族和克倫族領袖們來說，被背叛也是一再要面對的問題。確實，從一九四五年至今，被背叛始終是山區民族最在意的事。

得不到英國和美國支持獨立，克欽族人不得不跟緬族領袖翁山將軍談判，甚至達成協議，願意加入剛獨立的國家——也就是後來被束諸高閣、赫赫有名的彬龍協議。就像先前談過，這協議是翁山將軍和撣邦、克欽邦及撣邦領導人在一九四七年緬甸即將從英國手中贏得獨立時共同簽署的。彬龍協議承諾，原則上「邊境地區內部事務給與完全自治」，並展望著最終由邦議會治理的克欽邦。

克欽族人認為，他們是基於那些條件才會在一九四七年之後併入剛獨立的緬甸。一九四八年初那動盪的幾個星期，吳努的新政府差一點被緬甸共產黨及克倫邦的叛亂推翻，克欽步兵隊還效忠於緬甸軍隊。克欽族期待，中央當局會重視他們獨立建國的權利以做為回報，儘管獨立建國的定義很模糊。獨立從未實現，對克欽族人來說是第二次重大背叛，這回背叛他們的是緬族人。

在克欽族人眼裡，緬族沒有兌現彬龍協議或他們所謂的「彬龍精神」，是當代緬族的原罪。克欽族浸信會領袖卡拉姆·薩姆森（Hkalam Samson），基督信仰的另一個勇猛化身，跟我解釋原因。這位牧師在密支那中心區克欽族浸信會聯會主建築內一間寬敞辦公室迎接我，倒中國茶給我的幾分鐘內，他已經滔滔不絕說起了克欽族人擊退日本人的英勇事蹟，以及後來如何被聯軍出賣等不知說了多少遍的歷史課。他的父親也加入克欽遊騎兵，在密支那和曼德勒打過好幾場仗，然後薩姆森悲嘆，英國——他父親口中的「日不落國」——事後竟然沒有幫助克欽邦獨立。

隨後他把話題轉到彬龍協議。假使緬族履行這項協議，薩姆森斷言，一切將會完全改觀。於是他談起緬族非但沒履行協議，後來還一直「歧視」克欽族。「緬甸的宗教迫害不如蘇丹的明顯，」薩姆森說，指的是北方伊斯蘭聖戰士對南方基督徒發動的戰爭，「沒有嚴刑拷打之類的」，卻有更幽微的迫害，譬如蓋教堂的申請被緬族當局駁回，而且克欽族人也無法在公家部門上班。他們承諾平權，但那些全是空話。「我們被看得很低賤。」他說。

連威名鼎鼎的克欽步兵隊，克欽族人英勇的化身，也被緬族化的新軍隊給除名——而克欽步兵隊是一九四八年拯救新生共和國的軍團之一。對於像何瓦桑甘這樣的戰士來說，除名是最後一擊。對其他人來說，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信佛教的總理吳努在一九六一年宣布佛教為緬甸國教。這激起了信佛教的緬族和信基督教的克欽族之間的正面對決。儘管當時克欽族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占多數的基督徒，但基督教信仰已經深植克欽族人心，成為他們自我認同最重大的標記，就像英語一樣——英語是全球浸信會社群的共通語言。

拿薩姆森來說，他精通三種語言，緬語、克欽語和英語。然而自從一九六四年起緬甸當局禁止各級學校以英語教學後，和薩姆森年紀相仿的緬族人大部分都不會說英文。相比之下，克欽族一直努力保有英文，好讓他們和浸信會教徒、英國國教徒、天主教徒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更廣闊的世界性社群有所聯繫。薩姆森本身是在加拿大神學院當兩年的成年學生時練就一口流利的英文。因此，很反諷的是，雖然克欽族人被困在緬甸最偏遠的遠北地區，但是他們遠比仰光或奈比多的緬族人更見過世面。

進擊的基督徒士兵

為了終止緬族人對克欽族文化、宗教及人民的抨擊，克欽族人終於在一九六一年初拿起武器對抗緬邦，成立了克欽獨立軍。有鑑於何瓦桑甘的二次大戰經驗，成立克欽獨立軍的克欽族青年延請他編整新軍隊。新成立的克欽獨立軍的指揮官大部分——但非全部——都在二次大戰時加入聯軍作戰過，所以很多觀察家認為，這新生的戰鬥不過是二次大戰時期對抗日軍及其緬族同盟的一種延續。「我們號召年輕人加入克欽獨立軍，」何瓦桑甘回憶道，「成立村里防衛隊。我和其他退役軍人，有些是退役上尉，有些是退役中士，聯手培訓年輕人。我們沒有精良的裝備，只有老舊的英式步槍、日式步槍和一些老舊子彈。我們沒有仿效特定的軍隊，我們用自己的想法來組織動員。」

何瓦桑甘最後遭緬甸軍逮捕入獄，在密支那郊區專門關克欽族戰士及其家人的集中營坐了四年牢。但是克欽族青年依舊為了民族大業聚集成軍。其中一位就是勉陽瑙里（Myangyung Zaw Li），目前在克欽獨立軍擔任中校。他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歲時入伍，而非入學。真正說來這並非出於選擇。他的祖父是克欽徵集兵，當年跟日本人打過仗。他的父親也在戰後加入克欽步兵隊，深信是為彬龍協議所許諾的所有種族一律平等的新國家奉獻。他祖父和父親跟勉陽瑙里一樣也是浸信會教徒。他有幾個十多歲的兒子，他跟我說，他希望兒子們有朝一日也加入克

欽獨立軍。「我們會一代代為自由奮鬥下去。」他沉著地說。

最初他加入村里防衛隊的一支。他記得入伍「當時宣傳得很激烈，獨立的風潮正盛。人人都想加入克欽獨立軍接受基本的軍事訓練。我們當時沒有軍服，食物是村子裡供應的。只有分隊長才配有步槍。我們有叫做kung hpai的自製槍枝，我們把火藥裝在槍口，做法非常原始，但是威力非常強大」。

和傳說不一樣，這些山區裡並沒有二次大戰二手軍械氾濫。勉陽瑙里記得，打從一開始克欽獨立軍的全部裝備就是要自己動手做。他們攜走緬軍的武器，「敵人的武器就是我們的武器。」要不然就自己發想製造。譬如說，他們想出了足球炸彈。「我們在足球裡裝大量炸藥，引燃後把它當手榴彈一樣扔出去。」最後他們用精密機械製造手槍和步槍。

對緬族軍隊「四斷」政策的殘忍野蠻強烈反感，有志於保衛村里的新血前仆後繼加入克欽獨立軍。確實，緬族軍隊永遠有更好的武器，包括噴射機，以及更多的人馬，但是克欽獨立軍的游擊戰士具有深諳地形的關鍵優勢。克欽獨立軍也從邊界另一邊中國境內克欽族村落的親友得到補給。如此一來，沒有哪一方占有決定性優勢，於是雙方在一九九四年宣布停火。克欽獨立組織和克欽獨立軍在與中國接壤的邊界上的拉咱（Lana）小鎮重新建造總部。環抱拉咱的狹長土地，緬族在緬甸這一側的邊境重兵部署建立基地，據稱克欽族人無法越雷池一步。克欽獨立軍旅也都按兵不動，因此在雙方的僵局中，克欽邦像是拼綴布似地大大小小軍寨們各據山頭。

克欽族人希望停火協定會帶來政治會談，處理他們諸多的冤屈不滿。在拉咱，克欽族人建立了活潑而純正的克欽族文化認同，譬如說印製景頗文的教科書，教授自身民族的歷史。但是在克欽邦本身，情況仍舊差不多，只有更惡化而已，不論權利、地位和文化上都是。戰爭只是加深了克欽族和緬族之間的歧異，而且會持續下去。因為民眾改信基督教，教會成了克欽族語言與文化的主要庇護所，尤其是浸信會教會。在可憎的緬族官方機構、學校和醫院之外，教會始終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就如沙登寫道，在密支那這類城市裡的基督教神學院成了「培育下一代克欽新血精英的溫室，他們接受基督教和國族主義的雙重薰陶，彷彿他們是血脈一般」。皈依基督教的腳步加快了，一九七七年，在慶祝瑞士裔美國人韓森（Ola Hanson）將《聖經》譯成景頗文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據估計一天之內就有六千兩百一十三人皈依並受洗，這人數比一九三一年克欽邦全境內浸信會教徒的總數還多。對克欽族人來說，皈依基督教和受洗是悍然拒絕緬邦的表示。

在緬甸公立學校裡，景頗族持續被邊緣化的情況劇烈。有些克欽族人擔心克欽族語言會盡數消失，因為年輕人用克欽文來書寫的機會少之又少。緬甸當局似乎一逮到機會就大肆摧毀克欽族文化。譬如說，審查員要求當地唯一的一家克欽文報紙必須譯成緬文備查；由於這樣做非常耗力，花費也很高，結果這家報紙只好關門大吉。克欽族文化的主要展現——傳統的目瑙（manau）縱歌盛會，即克欽族人載歌載舞的祭祖儀式，這些年來也因為戰火頻仍而無法舉行。克欽族人也擔心，緬甸當局有意把密支那中心向來舉行目瑙縱歌盛會的那塊地買下來，為

了保有傳統文化，克欽族人採取了深具象徵意義的捍衛舉措，在祭壇聖地建造了六座巨大的目瑙示棟，全都由在地的克欽族商人出資，重新占據首府中心屬於他們的空間。這些示棟是用水泥造的，以確保它們永遠佇立在那裡，而克欽邦裡其他地區的木製示棟可能會被緬甸當局拆除。

高聳的目瑙示棟今天仍矗立在那裡，無聲地痛斥著緬甸當局。每年一月舉行的目瑙縱歌盛會，仍然無法保證恢復。二〇一二年的慶典之所以取消，是因為克欽獨立軍與緬甸軍方在前一年又再度開戰，時間上差不多就是據稱會推動改革的新總統登盛上任之際。克欽獨立組織和克欽獨立軍判斷，十七年的停火讓他們毫無所獲，假使克欽族沒有再次反擊，他們的生活方式有盡數被滅絕之虞。這次開火若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初的戰事空前的猛烈，緬甸軍方派遣快速噴射機飛越拉咱。拉咱一度險些被政府軍攻克。

我在二〇一二年首度造訪密支那時，大約有兩萬名難民住在城市邊緣的臨時營區裡，全都是在新一輪戰火下流離失所的克欽族人。總的來說，約有十萬人無家可歸。那同一星期有四名克欽族平民在該邦西部的軍砲攻擊下身亡。兩年後我重返密支那時，顯然無人能快快回家。密支那周遭仍有十八個由基督教會搭建的難民營，在伊洛瓦底江東岸由其他宗教團體搭建的則更多。我造訪了其中一個，名稱就叫做「浸信會救援」，最初是在二〇一一年七月搭建的。約有四百五十人住在那營區內，接受諸如世界糧食計畫署及世界關懷協會的國際捐贈者補給物資。當時已經有三十四個嬰孩在營裡出生，而這蕭瑟淒涼的家很可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所

熟悉的唯一家園。政府對難民做出了少許讓步，譬如說減免了一些些父母親該付的學費。除此之外，這些人照例多半僅靠教會支援自謀生路。

歷經兩大背叛和數十年戰火，克欽族人會顯得如此剛毅而意志堅定也許不足為奇。他們一再地反覆學到自食其力的重要。結果，克欽獨立組織和克欽獨立軍有時為了持續戰鬥下去，簡直和緬甸軍隊一樣掠奪洗劫，不僅徵召自己族內的童兵，也跟在地企業強索金援。一位目前相當可敬的克欽族激進分子告訴我，他早年加入克欽獨立軍的無賴歲月：

我十七歲入伍，配有一把手槍。我的工作就是收稅。我到密支那的每一間店家和商號去晃一晃，他們必須繳稅給克欽獨立軍。如果不繳，收到三次警告後，店家就會被炸掉。不是由我動手，但這是勒索……沒有人想付稅，稅額視商家大小而定。我不喜歡我做的工

作，但這是職責。要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這麼做。

數十年的內戰不可避免地吧克欽族和緬族之間先前有的一絲絲信任和善意侵蝕殆盡，而這種不信任甚至也延伸到翁山蘇姬和全民盟。對外界來說，翁山蘇姬也許是民主的明燈，人權的鬥士，但是在密支那，她被視為緬族人，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在我看來，全民盟只不過是另一個緬族國族主義的政黨。」我這位激進分子說。雖然全民盟的緬族人也許會從民主的角度來界定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對於譬如說浸信會牧師薩姆森（Hkalam Samson）來說，「緬甸面對

的是種族問題。」這其中存在著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薩姆森告訴我，翁山蘇姬「不夠」關心種族問題，也不夠重視彬龍協議。「她比較關心外來投資。」他補充道。

這是克欽族、克倫族和禪族的領導人屢屢提及的看法，指出了少數民族及其政黨和全民盟之間持續存在的裂隙。歸根究柢，他們不認為他們的利益會自然而然的和緬族主導的全民盟趨於一致，當我走筆至此，翁山蘇姬在彌合裂隙以期形成一個廣泛的全國聯盟來取代軍人主導的政府這方面，做得也不夠。

中國大壩

關於外來投資，克欽族人懂得可多了，尤其是貪婪、破壞性的那一面。在緬甸境內的所有種族當中，就屬克欽族看得最透徹，假使他們得以公平分享一直被外來者從他們腳底下掘取的豐富礦藏，他們現在會相當富有，而不是過得苦哈哈的。這處境使得他們的冤屈多了幾分，因為克欽邦蘊藏緬甸境內最大最貴重的許多礦產，大部分是玉石和琥珀，還有黃金。最大的礦山很多聚集在帕敢（Hpakant）周圍，據說那裡是世界上推土機的密度最高的地方，約有一萬兩千台。在這裡，因為機械化開挖玉石，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整座丘陵或山嶺消失不見。克欽山區出名的翡翠在市場上的需求之高，過了邊界一進中國，一副翡翠鐲子就可以喊價到數千美元。

但是克欽族人幾乎看不到這些錢，這些錢最後大多落入緬甸將領、其親信和中國人的口袋。大多數的交易免不了都在黑市進行。就官方的紀錄，在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間緬甸生產四千三百萬公斤的玉石，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計，價值也高達四十億美元，但是官方出口的玉石卻僅有三千四百萬美元的收入。同樣的，哈佛大學一份獨立研究估計，二〇一一年的玉石出口的價值可能高達八十億，大部分產自克欽邦，但是官方在這部分的稅收卻是少得可憐。更糟的是，從克欽族人的角度來看，就算他們的礦山可能生產歲收大約六十億的玉石，邦政府卻只有大約三千七百萬的預算可以支配，而這個額度理當涵蓋學校、醫療及其他一切的所有經費。難怪在克欽族眼裡，緬邦就是一頭腐敗的寄生怪物。

外國公司依法不准開採玉石，但事實上在克欽邦的二十張左右採礦特許權，在一九九〇年代都發給中國商人或他們代理人所屬的公司。好幾家採礦公司直接屬於軍政府內的緬族裙帶權貴，有兩家屬於克欽族人。「當然有一些『利潤』會進到國庫，」根據帕敢地區最有名的克欽採礦公司「緬甸玉田」(Jadeland Myanmar)的會長亞鑿康(Yap Zaw Hkawng)被引述的說法，「但大多數都進了中國人和前政府高層(緬族人)家族的口袋。」

在礦區工作的克欽族人薪資相當微薄。關鍵的地方在於，他們並沒有參與切割玉原石以及經由曼德勒運送至中國這些使得玉石增值的程序。緬族的採礦業者也可以自由調度緬甸軍隊，來對抗與他們爭奪礦產所有權的克欽獨立軍和地方上的武裝民兵，保護他們的採礦特許權。在克欽邦發生的內戰會持續那麼久並非巧合。在這裡的經濟風險比緬甸的其餘地區要高得多，各

方勢力都想搶奪緬甸出口收益(甚至連天然氣或石油都比不上)最大宗單一來源這塊大餅。

克欽族和緬族權貴之間與中國利益有關的貿易不平等條款並不止於採礦。緬甸幾項最大型開發案也在克欽邦境內，為此克欽族人被迫讓出土地，而且幾乎沒獲得半點好處。這些開發案是緬甸中央政府和他們的大金主中國所商定的，大部分是建築水壩。克欽族領袖們幾乎沒被徵詢過意見，而必須承受後續的環境破壞的當地居民就更不用說了。

這類開發案中最大型也是耗資最巨大(八十億)的密松大壩(Mysone dam)工程，預定在密支那以北二十七英里處建造，就在將喜馬拉雅山冰川融水帶入伊洛瓦底江的兩條河流交匯處下方。緬甸政府和中國電力投資集團於二〇〇六年訂定的這項開發案，徵示了緬甸中央政府與克欽族之間關係的損壞殆盡，還有緬甸與中國之間更普遍而言的腐敗荒唐。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興建大壩對當地的人民與地景將帶來浩劫。將近一個紐約州大小的區域將會被水淹沒，大約四十個村落上萬名村民必須搬遷，而受害最深的居民卻從沒有機會對此開發案發表意見。這個大壩的興建地點也是一方聖地——伊洛瓦底江源頭，大壩的蓄水庫不僅會淹沒很多村落，無數的教堂、寺廟與佛塔也無一倖免。緬甸當局在傷害之餘又加侮辱，同意中國在水壩落成啟用的頭五十年獲得九成的發電量，對克欽族人來說，就算水壩開始營運，他們也仍舊處在半黑暗之中。

因此，不出所料，大壩興建案引起克欽族民兵的抵制。帶頭抗議水壩案的是教士、牧師和僧侶這些傳統上克欽族的領袖。其中最頑強英勇的就屬湯瑪斯·甘雷翁(Thomas Gunn Rai

Aung) 神父，密松大壩旁的唐普利 (Tang Hpre) 村的天主教神父。二〇一二年十月我在他的本堂教堂內與他談話，那教堂蓋在沙洲之上，位於匯入伊洛瓦底江的兩條河流之間的狹長沙嘴地。在我們腳下匯合的河水輕柔地激起泡沫，匯聚而成的伊洛瓦底江浩浩蕩蕩流向遠方。

對當地克欽族人來說這地方不僅神聖，也格外優美。儘管如此，大部分的村民已經被迫遷走，讓出土地以興建水壩。在河對面的陡岸頂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很多活動房屋，那是為兩百名左右已經動工的中國工程師蓋的。環顧四周，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的岸邊高地都已築牆圍起，預備蓋水庫。假使水壩工程繼續下去，這裡的水位應該會上升兩百英尺左右，把放眼所見的一切都淹沒，包括湯瑪斯神父的大部分教區。儘管官方百般要求連哄帶騙，他絲毫不讓步。湯瑪斯神父始終守護在原地，儘管愈來愈孤獨。神父受糖尿病折磨，偶爾要到曼谷看病，佝僂的身軀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湯瑪斯神父出生在這片山嶺間，他說，這裡是他的家。他告訴我，他只有在「水位高到他鼻尖時才會離開，到時候我會做一個竹筏，順著河流飄到我出生的山嶺間」。

勇氣可嘉的湯瑪斯神父最後得償所願，這是前所未見又非比尋常的事。二〇一一年十月，新總統登盛單方面宣布暫緩水壩工程。這項宣布在中國聽來也和克欽族人同樣吃驚。這是個重大決定，顯示登盛願意傾聽民意，當仰光和克欽邦民間社會普遍湧現反對興建水壩的抗議。這一回，登盛把人民的反對視為優先，將中國這個緬甸政府背後的大金主的經濟利益置於其次。這個決定是新的改革進程的里程碑，顯現出登盛的半文人政府和之前的軍人獨裁有所不同。

然而這事件也顯示，緬族主導的政府和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之間要發展出可行的平和關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登盛小心翼翼地強調，密松開發案只是「暫緩」——在他五年的任期之內不會重啟這項工程——而不是全面取消。緬甸政府也許承認這個特殊案例明顯的不公平，但直到我執筆的此刻，仍絲毫看不出緬甸政府在更大原則上有任何讓步，表明緬族中央政府有責任就經濟發展議題向人民徵詢意見。

很遺憾的是，勇敢的湯瑪斯神父永遠無法知道這個兩難問題是否有解。在我拜訪他之後的那一年，他因病過世了。

第五章 毒品浩劫

如果說近年來在緬族的暴政下受苦最深的是克欽族，那麼奮戰最久的就是克倫族了。克倫族說不定是緬甸境內僅次於緬族的最大族群。儘管估計的差異很大，克倫族的人數仍介於五百萬至九百萬之間，或者說大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假使這個數字是正確的，他們比掸族人稍微多一些，通常被視為第二大族群，居住在緬甸境內地理區域最為遼闊，與中國和泰國鄰接的東側邊境。

克倫族也是唯一一個大半居住在自身的克倫邦——緬甸東南部，與泰國接壤的地區——之外的民族。事實上，大部分的克倫族人住在散布於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村落，有幾十萬人以難民身分住在邊界另一側的泰國境內，他們是在緬甸軍隊的殘忍攻擊之下逃離的。頗為特別的是，克倫族就族裔和宗教來說也是相當多元的族群。最初來自今日的中國南方那片土地，主要分三大族群：山區克倫族 (Pwo)、平原克倫族 (Sgaw) 和帕歐族 (Pa'O)。克倫尼族 (紅克倫

族)是平原克倫族的次族群，而克倫尼族的一支次族群帕東族(Padaung)，以戴項圈拉長頸部的婦女聞名；他們大部分都住在撣邦南部。克倫族絕大多數都是佛教徒，其中有重要少數是基督教徒，約占四分之一，主要是浸信教徒。萬物有靈論始終是克倫族信仰很重要的一面，很容易和更傳統的宗教信仰交纏在一起。

史上最久的內戰

雖然有這些明顯而深刻的差異，但克倫族的領袖認為，有更重要的東西讓他們團結在一起，而非分化。他們的領袖之一是山達瓦拉(San Dar Wala)，克倫邦首府帕安(Hpa-An)最大的佛寺之一的住持。我和他曾在某個清晨長談，當太陽緩緩爬上寺院前方的山頭，他向我描述獨特而凝聚的克倫族文化如何總是勝過他所謂的宗教上的「小小差異」。

他告訴我，克倫族文化有五大要素：識字力、語言及口語傳統、詩歌、儀式、服飾與風俗。由於代代之間的文化傳遞主要是透過教堂和佛寺，「宗教機構成了克倫族文化的存續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就跟克欽族一樣，面對來勢洶洶的緬族化政策，保存語言成了克倫族抵抗緬族打壓的一大作為。對大多數的克倫族人來說，文化和政治上的「緬族沙文主義」一直是國家動盪的主要根源。就像一位克倫族的浸信教徒告訴我的，「克倫族群的內訌很多，我們只是為了打倒緬族而團結在一起。」

在英國人抵達之前，克倫族經常受到阿瓦王朝緬族國王的擴張野心所威脅。因此，當外來強權——英國人——抵達時，克倫族也是緬甸境內最熱烈歡迎英國人的族群之一，他們料想地方勢力會因而重新洗牌，有利於克倫族。一位美國浸信教傳教士哈利·伊格內修斯·馬歇爾(Harry Ignatius Marshall)，寫下二十世紀初關於克倫族最早的一部人類學研究，記載了克倫族與緬族之間的持續衝突如何演變成無可避免的「種族之間的相互仇恨，而緬族對於臣屬族群的鄙夷又更加強化這股仇恨……緬族人的宗教或生活對克倫族人來說毫無吸引力，假使緬族的宗教或生活方式被加諸進來，他們也不認為情況會有任何改善」。

克倫族的民間傳說預言，有位「白衣弟兄」將會把他們從緬族和其他敵人手中解救出來，這傳說倒是對浸信教傳教士很有幫助，至少他們這麼記載。這位白衣弟兄以馬歇爾的聖潔模樣以及入侵英國士兵的形象適時出現。因此，從一八二〇年代第一次英緬戰爭開打，克倫族就站在英國這一邊，協助攻打緬族軍隊。英國人迅速發現了克倫族斥候的技能與知識；第二次英緬戰爭對鎮守大金塔周圍的緬族進行突襲時，克倫族斥候即被派上用場。

因此，當英國攻克緬甸，克倫族的命運起了變化，而且運勢扶搖直上。跟克欽族一樣，克倫族經驗到的殖民統治和緬族大為不同，直到今天，克倫族人仍經常把殖民時期說成「光輝歲月」。在英國人眼裡，克倫族人在政治上比緬族人更可靠，所以英國人起用克倫族人來協助治理殖民地。結果克倫族人在殖民地的行政機關裡逐級高升，位居要津，從殖民者那獲得相當優渥的報償。

在宗教和教育方面和英國最相近的克倫族浸信教徒表現得尤其出色。很多人第一次上大學，克倫族人一度占仰光大學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儘管他們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²有些人甚至贏得獎學金到美國浸信會學院就讀。現代的學校和醫院就蓋在克倫族村莊裡。傳教士們顯然對自己的成果很滿意，每每誇大和美化他們無疑親眼見證的改變。馬歇爾如此描寫二十世紀初期的克倫族：「不過幾年前這裡有部落戰爭、誘拐孩童、烈火燎房和野蠻行徑，如今是井然有序的寧靜村莊，每個村子裡都有它的牧師和教師、教堂和學校。」³

殖民當局倒沒那麼滿意。克倫族成就卓著，因而期待也拉得更高，他們以為終究至少可以獲得半自治狀態做為酬賞。為推動他們的政治抱負，克倫民族協會 (Karen National Association) 於一八八一年成立。隨著克倫族愈來愈習慣與緬族分治的狀態，也就有愈來愈多的族人強烈要求完全獨立。很不幸地英國只是虛應故事巧言搪塞，小心翼翼地從未給出堅定的承諾。

打從英緬戰爭期間起用克倫族斥候開始，英國格外看重克倫族人的戰鬥技能。就跟克欽族一樣，他們被視為尚武民族。因此克倫族人充實了英國人率領的緬甸殖民軍，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知的緬甸自衛軍 (Burma Defence Force)。反觀緬族則大體上被解除武裝並遭漠視，到了二次大戰前夕，緬甸自衛軍裡有軍階的緬族人只有四百七十二人 (這數字還包括孟族人和揮族人)，而有軍階的克倫族、克欽族和欽族有三千一百九十七人，其中又以克倫族人占最大比例。克倫族人躍升至軍隊的高階，其中戰功最彪炳、威名最顯赫的就屬傳奇人物史密頓，他在一九四八年被任命為軍方 (以及警力) 的首腦。這位「四呎將軍」——他個頭矮，因而有此綽

號——的功勳，始終讓克倫族人津津樂道引以為傲。

然而，緬甸進入殖民統治後，緬甸自衛軍被用來進行內部控制，追捕緬族叛亂分子。就像克欽族，克倫族人因此被納入英印軍團，對抗反殖民統治的緬族。緬族當慣了稱霸一方的帝國民族，如今卻發現自己竟被追捕，甚而追殺，而圍捕殺害他們的不僅是印度人占大多數的警方，還有一度被他們征服過的克倫族。就像山達瓦拉跟我說的，到了一九四二年日本軍進犯之際，「緬族人對我們已經恨之入骨」，早就準備好要報復。

因此，當翁山將軍帶領緬甸獨立軍跟著進犯的日本人四處掃蕩時，就特別對克倫族人還以顏色。他們摧毀三角洲和山區의 克倫族村莊，殺戮的克倫族人就算沒有數千也有數百人。這些事件至今已烙入克倫族的集體記憶裡。就像當今很多克倫族人的看法，這兩個民族之間僅剩的信任或同理心，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摧毀殆盡，從沒修復過。跟克欽族一樣，克倫族在二次大戰時大多效忠英國，他們對於聯軍最終獲勝所做的貢獻，遠比翁山將軍及其緬甸獨立軍要多得多。在日軍陣線後方進行的游擊戰，克倫族證實是不可或缺的一支武力。克倫族對於聯軍的價值，也許可以從英國與美國空投一萬兩千具武器給他們略知一二。在二次大戰最後幾個月，當日軍往泰國邊境撤退時，據估計，武備精良的克倫族和克倫尼族游擊隊殲滅了一萬兩千五百名日軍。更全面地來看，日軍在一九四二年入侵全程僅有兩千名士兵喪生。⁴

在日軍前線後方所組織的抵抗軍一三六部隊裡，英國軍官和並肩作戰的克倫徵集兵有很深的革命情感。其中一位軍官休·席格林姆 (Hugh Seagrims) 上校至今仍備受尊敬。席格林姆對

日軍發動了幾次成功的游擊戰，但最終寡不敵眾，為了避免日軍對克倫族村民加以血腥報復，他徒勞地向日軍投降。後來他被押往仰光，關進高等法院大樓地下的大牢，行刑之前他和其他克倫族人犯關在一起。他懇求日軍放那些克倫族獄友一條生路，但他們還是全數遭槍決。席格林姆跟克倫族人一樣是信仰虔誠的人，就像他的後繼者約翰·克羅瑪提——塔洛克（John Cromarty-Tulloch）上校。克羅瑪提——塔洛克上校跳傘降落到克倫山區時已邁入知天命之年，據傳上校落地時他戴的單片眼鏡仍好端端在原位。他是叢林戰專家，在他麾下幾乎清一色是克倫族人的一三六部隊，牽制了東緬甸三萬名左右的日本兵。⁵

既然克倫族在戰爭期間大力支持英國，為緬甸的光復做出可觀貢獻，因此他們期待在戰後的政治調停裡，若不能取得徹頭徹尾的獨立，也應該擁有重大發言權，並不令人訝異。即使他們的英國盟友在戰後將迅速准與緬甸獨立的態勢愈來愈明朗，克倫族人深信，他們和殖民強權之間形成的在新緬甸之內享有自治的「紳士約定」不會生變。怎料即將撤離的英國人隻字未提克倫邦的半自治，更別說獨立。大量湧入倫敦的克倫族請願書根本無人問問。

和克欽族一樣，克倫族感覺被出賣了——這感覺一直持續至今。二〇一三年，這些事發生六十年之後，克倫族浸信教徒阿倫梭烏與我在仰光的河濱飯店喝茶時說：「我們被英國人騙了，這件事會一代代的傳下去。我們對英國忠心耿耿，但也太天真了。」他後來事奉英國國教會大主教。

直到今天，克倫族人仍深信，他們可以把自己的邦國治理得很好，因而緬甸會是一片祥

和。山達瓦拉是其一，他說：「當時克倫邦確實有能耐也有本領來統理自己。我們有參謀長也有政治人物等等……克倫邦可以治理好自己。」但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與新的緬甸當局就獨立進行協商時，克倫族幾乎毫無斬獲。克倫族僅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參加彬龍會議，而不是以簽署人身分，克欽族也一樣。因此他們覺得被完全排除在翁山將軍及緬族人對於獨立緬甸的制憲安排之外。阿倫梭烏指出，因此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的緬甸獨立日，克倫族人並沒有一同慶祝。相反的，理想破滅後憤怒的克倫族人準備再度拿起武器對抗新的緬族國家，打算靠武力贏得獨立——本質上是延續自一九四二年便開打的戰爭，只不過他們現在的武裝更齊全。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克倫邦所有主要政黨的聚合，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目標是推動徹頭徹尾的獨立，其武裝派系在一九四八年末發動攻擊。到了隔年一月，他們訓練有素的軍隊已經進逼仰光城下。更多的克倫族人已經掌控曼德勒好一陣子，還有上緬甸其餘的大片土地。

某些戰役裡的殘酷暴行只是加劇雙方的仇恨。緬族軍隊圍剿仰光城內的克倫族群並把他們逐出城外做為報復，他們攻擊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更多的克倫族村落，燒殺擄掠、姦淫婦女。緬族軍隊在那段年月裡一次次的大屠殺，在倖存者心裡依然記憶猶新。阿倫梭烏說起他的家庭如何受這一場戰爭波及。他母親的村莊被緬族軍隊燒毀時，肚子裡正懷著他，後來她逃到在仰光開餐廳的一戶中國人家裡避難，那戶中國人家的大家長是他父親的摯友。為了融入中國人當中，他母親剪了頭髮並盤捲起來，讓自己看起來像個中國姑娘。在餐館裡住了一陣子之後，她

搬進鄰近的一戶印度人家裡。他記得母親說過，印度人和中國人「比緬族人更有人情味」，之後有一段時間，他母親在印度人社區裡租了一個居所。很久以後，她才敢放心回到仰光的克倫族社區，他稱那裡是他們的「浸信教徒區」。

最後克倫族在一九四九年對仰光發動的攻擊被攔阻，在那之後克倫族終究被逼回他們的大本營。然而這場內戰後來卻演變成世上持續最久的種族衝突，直到二〇一一年雙方才簽下最後的停火協定。不過即便是我執筆的此刻，雙方仍未簽訂任何政治協議。

對於剛獨立的緬甸，內戰帶來慘痛的後果。它耗盡了雙方原本就很匱乏的財力與人力。戰爭讓國家政局動盪，也讓緬邦一切以軍事掛帥，集中力量在鎮壓叛亂。數十年來克倫山區的戰事起起落落，在「四斷」政策下，緬甸軍隊為了把敵人一網打盡，在那裡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⁶

鬼城帕安——毒品的浩劫

如果說克倫族發動的內戰重創了獨立後早期的緬甸，它最終對克倫族本身的傷害更大。克倫邦變成戰區，足有七旅的克倫民族解放軍，克倫民族聯盟的武裝派系，有時候可以控制該邦南部大部分地區，尤其是逼近泰國邊境更偏遠的山區。從泰國的基地，主要是三塔關（Three Pagodas Pass）周圍，他們獲得克倫族同胞的補給與支援，也吸引一些宗教信仰相同、反共理念

一致，又或純粹只是熱愛冒險的志願者和傭兵加入。

戰爭蹂躪了曾經繁盛一時的克倫山區經濟，這顯然是緬甸軍隊的預謀。克倫邦的人口大幅減少，數十萬人逃離戰火，很多人大膽穿越叢林，艱苦跋涉，逃到泰國境內美索（Maé Sot）附近的幾十個難民營。到了二〇一〇年，這些難民營收容了十四萬五千人，逃到這裡的很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因為在克倫邦已經沒有工作機會。兩造人馬都在這地區埋地雷，很多土地變成禁區，根本無法耕種。

克倫邦的一般行政也全面停擺，過去數十年來那裡是緬甸最貧窮的區域之一，而緬甸本身是亞洲第二窮的國家。日益嚴重的營養不良、疾病蔓延、流離失所和戰爭的壓力，使得克倫族人的健康狀態顯著地持續走下坡，全球健康相關的統計數字當中最堪憂的幾項都落在克倫族。辛西雅·茂（Cynthia Maung）博士和美索的「背包醫療隊」（Backpack Health Worker Team）一直在追蹤惡化的情況。到二〇一〇年，他們和其他醫療組織發現，緬甸東部山區裡五歲以下的兒童有百分之四十一，二處於極嚴重的營養不良，而五歲以下死亡的兒童當中有六成是死於可預防、可治療的疾病。孩童的死亡率幾乎是緬甸其餘地區的兩倍，孕產婦死亡數字是全國平均的三倍。⁷

數十年來軍事、政治和文化衝突的悲慘後果，在首府帕安顯而易見。通往帕安的每條道路都有緬甸軍隊的檢查哨嚴密管制。跟密支那一樣，緬甸中央當局的地盤很小，但小歸小，卻占據某湖畔的幾棟精選的大樓，面向當地石灰岩露頭的難忘景致。那裡是城裡勉強可以形容為風

景如畫的唯一地方。除此之外，放眼望去，帕安一片蕭條淒涼，盡是破敗水泥屋和波狀鐵皮屋，鬆垂的電線和坍塌的石造結構。

所有人都同意，這裡和整個山區的主要社會問題是毒品。對此，僧侶山達瓦拉難過得無法跟我多談，但他判斷，有六成的年輕人若沒有吸毒也在販毒。帶我在帕安四處看看的一位聰明而口條清晰的三十多歲克倫族醫生認為，那百分比應該是將近八成。「在我的朋友圈和社區裡，沒有人不吸毒。」他直言不諱。我這位醫生朋友在美索附近的難民營裡出生和受教育，但不願具名。他告訴我，到目前為止，最常被食用的毒品是甲基安非他命，就是當地以泰語俗稱的「鴨霸」(yaba)，直譯的意思是「狂顛」(ya)、「藥」(ba)。有時它又被叫做 yama 或「馬藥」，因為這藥最初是溶在水裡給馬喝的一種興奮劑，好讓馬更賣命幹活。鴨霸可以透過靜脈注射，在箔紙上燃燒後吸食，或最常見的，以藥丸的形式服用。它是當代緬甸的禍根。

這顏色鮮豔有甜味的小藥丸大部分生產於撣邦東部以及邊界另一側的泰國邊境，不過在帕安地區也有三間製造廠。「鎮裡有很多毒販，」我的醫生說，「在小鎮裡買毒品很容易……全都便宜，甚至學校裡的孩童也吸毒。」一顆藥丸要價約一塊多美元，最貴的三塊美元。這聽起來不貴，不過有些孩子一天要食用五顆或更多，而當地合法打工賺錢的機會少之又少，很多孩子開始行竊，為吸毒習慣找財源。這位醫師本身有個朋友就從家裡偷錢買毒品。一旦家裡沒錢可偷，他們開始變賣家當，再不濟就開始盜取鄰居財物。

這醫生說，警察、武裝組織、當地民兵、職業販毒者等等沒有人不賣鴨霸賺錢，「所以他們為了維持既得利益會讓毒品交易繼續下去。」警方對此瞭若指掌，但毫無實質的行動。「有些販毒者偶爾會被逮，但那只是做做樣子而已。」這醫生說：「村子裡更多人吸毒，軍隊上戰場也食用甲基安非他命。」為何有這麼多男孩女孩吸食鴨霸甚或海洛因？「年輕人沒有未來，沒有工作，無事可做。」鴨霸的效果會抑制感覺和情緒，至少足以讓失意、無聊、鬱悶的克倫族年輕人打發日子。鴨霸在柬埔寨、泰國、寮國及東南亞其他地方也變得很搶手，但是吸食的人口比例都不若克倫邦、孟邦、撣邦和克欽邦那樣的高。

克欽邦的毒品問題仍比較隱伏，不過我在二〇一四年交談過的當地領袖同樣也估算說，起碼有六成的人口有毒癮。每個家庭大概都有一人有毒癮；這些領袖都說這是個大禍。克欽邦本身很少種植鴉片，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且是來自世上戒備最森嚴有重兵駐守的地區。因此不出所料，克欽族人發現緬甸當局和販毒者勾結，這是毒品可以橫行無阻的唯一方法。不見官方政府有任何主動打擊販毒的行為，教會於是插手介入。密支那的茂克林 (Maunkring) 浸信會教堂的一位執事，帶領當地的毒品根絕委員會 (Drug Eradication Committee) 這個志工團體。他告訴我他和警方之間的交涉：

我們逮到兩個人和一位執事的兒子一起吸毒，說不定還販毒。他們沒穿制服，而是穿運動衫，胸前有警方標誌，背後有編號。他們肯定是警察，所以我們向警局報案，他們派了幾個警官來，把人接回警局，他們保證說，這兩人會被告上法庭，但後來根本沒下文。

我們委員會不確定警方有沒有確實在處理，但警方顯然和販毒者是一掛的。譬如委員會跟警方通報說，某屋子裡有個藥頭，希望警方前去逮人。我們等了又等，當委員會前去查看情況，發現藥頭往往已經不見人影……現在我們跟警察局打過電話後，會馬上到藥頭的屋子附近埋伏，確保藥頭無法逃脫。

我問過一名正在戒斷的二十四歲克欽族海洛因成癮者，了解他吸毒以及與警方接觸的經驗。我認為他的證詞可代表所有人的心聲，很不幸地這種事經常上演：

我十六歲開始吸毒，當時我的朋友都有吸毒，我也沒工作。我迷上海洛因和鴨霸有七年。當時我只是個孩子，我從爸媽那裡偷錢，每次偷個三、四萬緬幣（三十至四十塊美元）。有時候爸媽會發現，我們為此爭吵過很多次。我很容易可以弄到毒品，有太多的藥頭在賣。警方是這些藥頭的保鏢……警方每天待命為藥頭提供貼身保護，每次兩或三個警員，藥頭會分錢給他們做為答謝。他們有時穿制服、有時穿便服。我有五、六個朋友因為吸毒過量致死，過世時才二十或二十一歲。

毒品和不乾淨的針頭也會帶來愛滋病。毒品根絕委員會的那位執事估計，「密支那他的教區的一千八百人當中，感染愛滋病的不下五十人」，其比率約莫是百分之三。

揮邦與販毒經濟

山達瓦拉認為，毒品濫用或許問題嚴重，但它僅僅是「更大的政治經濟困境」的冰山一角。貧困和缺乏機會是人們會轉而吸毒的常見動機，但是緬族人對克倫族政治與文化認同的攻擊，讓很多克倫族人自尊低落或沒什麼企圖心。這位僧侶認為，毒品「主要來自武裝民兵，但政府協助他們，毒品成爲一種工具，讓克倫族年輕人變得怠惰，不去思考政治與未來」。

很多克倫族人和克欽族人持相同看法，認爲緬甸政府積極鼓吹製造與吸食毒品，是為了摧毀他們的自我價值感和自尊心，進而削弱他們對當局的政治抵抗。譬如說多年來近距離觀察到克欽邦毒品氾濫的密支那浸信會執事，便對此深信不疑。「這是陰謀，」他說，「這是政府的政策，計劃好的一貫政策。」

倘若屬實，揮邦人過去五十年來的遭遇即是如山鐵證。他們眼睜睜看著古老王國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被抹煞遺忘，只剩被逼至中緬邊境分崩離析的眾多販毒小國。揮邦東部如今是生產海洛因和鴨霸這項景氣大好的地區產業的震中。很多都非法走私到國外，大部分賣到中國，但是毒品貿易主要的受害者，是揮邦人本身。最可敬的揮邦領袖昆吞烏（Khuun Huan Oo）認爲其後果無庸置疑：「政府存心要讓揮邦淹沒在毒品產製之中，讓揮邦繼續沉淪。」

揮族屬於傣族，語言與傣語相近，最初來自現今中國西南的雲南省地區。揮族人口大約六

百萬，由好幾個支系組成。不像克倫族散布在緬甸好幾個邦，掸族人主要居住在幅員廣大的自己的邦內。掸邦是緬甸最大的邦，占地大約是緬甸土地的四分之一，掸高原幾乎涵蓋整個邦，首府東枝（Taunggyi）靠近風景如畫的茵萊（Inle）湖下方，不愧是緬甸最負盛名的觀光景點之一。

掸邦和克倫邦之間另一個很重要的差別是傳統的治理形式。克倫邦少有整體的統治架構，每一個村寨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權，而掸邦傳統上分成數個侯國，由土司（saopha）或親王（sawba）統治。從前大約有三十個土司。這些侯國在英國殖民時期被保持原狀，當時該地區被稱為掸聯邦（Federated Shan State）。今天的掸邦便是這些古侯國的後繼。

生於一九四三年的昆吞烏，是備受尊崇的土司蘇佳笙（Sao Kya Seng）——昔卜（Hisipaw）親王——的姪兒。他也是掸邦最重要的政治組織掸邦眾民族民主聯盟（Shan Nationalities League for Democracy）的主席。因此，他被分屬封建與民主的兩股人民力量所拉扯，而他本身必須概括承受來自緬甸政府的打壓。為了一九九〇年的選舉，他努力奔走，成立掸邦眾民族民主聯盟，而軍政府事後卻宣告選舉無效，二〇〇五年因煽動叛國的罪名被捕，經過簡易審理被處以九十三年徒刑。

跟大多數政治犯一樣，昆吞烏先被押往因盛（Insein）監獄，仰光北方英國人建造的一座龐大陰森的監獄。這是關押緬甸大多數政治犯的主要場所。後來他被轉往蒲陶縣的監獄。這裡的囚犯要面對的一大問題是酷寒，有別於關在因盛的囚犯要忍受的燜熱和塵土。那裡的溫度一

般只在零度以上，獄方只發給他一件短袖囚衣和籠基。有時候他可以弄到一條毯子和連身衣，但儘管如此，入獄期間還是有四位同房獄友凍死。蒲陶監獄地處偏遠，昆吞烏的家人只能每三個月探望他一次，家人離去前會塞錢給獄吏，好讓獄友們可以買點米、洋蔥和其他主食來烹煮。「只吃牢裡的食物，」他說，「你會餓死。」總總的一切嚴重損耗他的身體。昆吞烏的家位於前首都中心外緣的一個小小的掸族地盤，我前往他仰光的家拜訪時，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衰老虛弱。二〇一二年初登盛新政府實行大赦，最後他獲釋。

昆吞烏的家人始終忍受監禁的威脅，或更糟的，受監禁糾纏。他父親在一九六二年軍方掌權那年入獄，直到一九六八年出獄。他的伯父昔卜親王在軍方發動政變那天在東枝的某個路障被士兵攔下，最後被人看到被軍方押上卡車帶走。之後多年有關他的命運，各方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就此失蹤，下落不明。一般相信，他被拘留後不久便遭處決。

昔卜親王娶了一個年輕的奧地利女子英格·薩金特（Inge Sargent）為妻，薩金特後來把夫妻倆一同生活在掸邦東北，介於曼德勒和臘戍之間親王的世襲宅邸，那段田園詩般的歲月記述下來，書名是《緬甸的黃昏：我的掸族王妃生活》（*Twilight over Burma: My Life as a Shan Princess*，夏威夷大學出版，一九九四年）。薩金特目前定居美國。前往掸邦山區健行熱門地點昔卜宅邸的旅人，可以看見爬滿藤蔓的金屬大門後方親王大宅第的部分身影，只不過緬甸軍方仍不准遊客入內參觀。

一九六二年掸邦領導人之所以被軍方特別鎖定，據軍方的說辭，是因為奈溫預見掸邦企圖

脫離緬甸形成一個自治邦，「為避免緬甸聯邦瓦解」，而這也是奈溫發動政變的藉口。撣邦在彬龍協議裡爭取到在緬甸獨立十年後，也就是在一九五八年，撣族擁有民族自決分離的權利。因此，緬甸領導人把撣族視為威脅緬甸統一的頭號大敵，因為撣邦不僅在理論上享有分離權，而且假使他們選擇分離的話，仍有一個獨特又廣受愛戴的現存王族來統治領導族人。一九六二年二月召開的仰光會議，各方進一步討論聯邦憲法賦與撣族等邦的去、留權，確實直接促動了當年三月二日的政變。不過在之前數年，緬甸軍方也始終在威嚇撣邦，要撣邦噤聲默從。薩金特記述她的丈夫蘇佳笙身為族人領袖，幾近陷入一場抵抗緬甸軍的消耗戰：

每天從邦裡來見蘇的人，無一不抱怨緬甸軍隊為非作歹；村人被恐嚇，被迫提供無償勞動，婦女被騷擾，有時被強暴，企圖保護族人的長者遭逮捕。緬甸軍隊的行徑彷彿與這片土地為敵，而不是護衛它。……對於強烈抗議，緬甸聯邦中央政府置若罔聞。是領導階層掌控不了軍隊，還是這些暴行是對付少數民族的更大計畫的一環，在當時並不明朗。蘇和撣邦其他一些領導人，在撣邦政務會議及議會提出這些質疑，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⁸

新上台的軍政府搶在撣族脫離之前先發制人，逮捕並殺害撣邦主要領袖，一九六三年之後，又進一步逼迫剩下的撣族土司交出權力；有些土司早已被迫辭退。就如昆吞烏指出的，伴隨而來的是緬族「根除撣族文化」的一貫作為。結果撣族就跟其他邦一樣，不論在學校或公家

機關，不再被允許使用自己的語言。他們的地名也被政府更改。根據一九八九年關於地名的法案，譬如說東撣邦的首府景棟（Kengtung），被單方面改為Kyauing Tong。

抹煞撣族文化的戰略也有更具體的作為。以綿延起伏的山嶺之中環抱小湖的景棟為例。這裡山光水色，一直是緬甸最動人的城鎮之一，起碼從遠處看是如此。但是它最引以為傲的景觀卻消失了。在湖的北邊，如今矗立著一棟龐大得突兀，醜陋的黑色玻璃帷幕飯店：新景棟飯店（New Kyauing Tong）。這是緬甸政府在前撣邦土司王宮原址上蓋的，原本的土司王宮建於一九〇五年，從老照片來看，那是一棟精美迷人的建築，可是卻在一九九一年被緬甸政府炸毀，當局鐵了心要破壞當地最鮮明的古老威權象徵。新景棟飯店對面，土司的下屬曾使用過的殘破閉鎖屋宅仍在原處。遠處的山丘上可見撣邦親王的陵墓，如今被嚴密封鎖，禁止大眾進入。可以讓人一窺撣邦親王昔日風光的唯一建築，是侷促在飯店後方，一度坐落在王宮土地上的僧院瓊堪寺（War Jong Khan）。

儘管景棟位於北接泰國和東接中國的許多主要貿易路線的關鍵地理位置，它卻是舊日的一縷幽魂。景棟幾乎沒有電力，宵禁之後便被檢查哨切斷與緬甸其餘地區的聯絡，年輕人僅有的娛樂場所，是湖畔零星的幾家酒吧和夜店。從昔日商貿繁盛的撣邦都城沒落至此，景棟反映了撣邦更普遍的政治上的式微。

南鳳斐（Nang Voe Phat）這位說話直率、穿著講究的中年婦女，是協助撣邦的少數當地非政府組織之一的負責人，她告訴我該地區更多的問題與狀況。她說，在地全職的工作很少，所

以年輕人大部分移居到鄰近的泰國或邊城勐拉 (Mongla) 找工作 (這是更晚近的情況)。對於十四至十八歲的女孩來說，選項尤其稀少——「她們可以當性工作者、女傭、餐館的卡拉OK歌者或按摩師。」男孩的選擇也不多；他們可以當營造工人，或忍受惡劣條件在泰國捕蝦船上工作，通常是當包身工——實際上就是奴隸。運氣好的則在泰國的農田裡採摘水果或蔬菜。

同樣的，鴨霸以及強力膠是強大的舒緩劑。這位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估計，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年輕人經常吸食這兩種毒品之一，但大部分吸食鴨霸。毒品所造成的後果相當駭人，南鳳斐說。在景棟，「狂顛藥」名不虛傳，男孩子吸食之後對朋友、家人施暴或自殺的報導層出不窮。我在景棟的嚮導約翰，告訴我他家人吸食鴨霸的經歷。他的一位兄弟和兩名朋友曾躲在墓地三天三夜，服用了兩百顆藥丸，之後他的兄弟徹底發狂，差點拿刀戳進太太的脖子。服用鴨霸後他總覺得「非常強壯有活力」，因此長達五天或更久的時間都不覺得需要進食。他也酗酒，最後罹患胃病，過世時僅五十五歲。約翰的另一個兄弟也服用大量鴨霸，死時才五十七歲。

每況愈下

對於鴨霸和海洛因的受害者以及必須收拾殘局的家人來說，景棟的地理位置如今說來是不幸而非福氣。曾經為這城鎮帶來繁榮的貿易路線，在今天只意味著一件事，那就是毒品。景棟位於所謂的金三角地區的中心，在這地區裡，東南亞的三個國家緬甸、泰國和寮國與中國這一

北方巨鄰毗連。這地區長久以來是毒品交易的同義詞，而在緬甸這一側的邊境，被毒品經濟蹂躪最深的，很不幸地就是撣邦。這裡是緬甸絕大多數罌粟的種植地，地區上很多海洛因工廠都設置在此，產製大量的鴨霸。在這有厚利可圖的生意裡，緬甸政府、撣族民兵、毒梟和赤貧的農人全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緬甸政府始終試圖說服國際社會，特別是說服中國和美國，掃蕩毒品必須嚴肅以對。即便是在緬甸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和二〇〇〇年代早期受到制裁，外交與經濟的孤立達到最高峰之際，聯合國、美國緝毒局和其他各種機構也和緬甸軍方合作，試圖清空撣邦的罌粟田。

緬甸政府定期得到巨額的資金與設備來進行緝毒，因此他們也相應地熱切宣傳他們所聲稱的成果。於是，在勐拉這城鎮裡，崗哨般佇立於中緬交界的主要邊境通道之一，有一棟俗艷的粉紅色大樓：根絕毒品博物館 (Drug Eradication Museum)。在這俗劣的邊境崗哨裡，緬甸當局描繪了罌粟的種植以及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生產，如何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政府斷然實行根絕計畫後明顯蕭條萎縮。一九八五年，緬甸是全世界生產鴉片最多的國家，但根據這裡的說明，在此之後產量便持續下滑。阿富汗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取代緬甸成為最大供應國。博物館裡翻舊了的黑白照片記錄著所有外交官和外國記者前來見證上萬公頃罌粟田遭毀的得意功績。在陳列品當中四處可見丹瑞走下直升機視察成果的照片。

不過歷年成果的記錄終止於二〇〇六年。從那一年起，博物館牆外上演著完全不同的故事，近年來更是如此。根據聯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最新報導，毒品種植、產製和使

用的比率多年來節節攀升。在二〇一三年的緬甸，罌粟的種植比前一年上升百分之十三，達到五萬七千八百公頃（十四萬三千英畝）。這是種植面積最低的二〇〇六年的兩倍以上。除了種植面積更多，產量也更高，結果自二〇一二年起緬甸的鴉片生產量增加超過四分之一，達到八百七十英噸左右。這數量的總值大約是五億美元，對於這樣的一個貧窮國家是一大筆錢。邊界另一側的寮國，罌粟種植量也增加了，雖然腹地和規模都小很多。總的來說，相較於這兩國於二〇〇五年生產三百二十六英噸鴉片，占當年全球總量的百分之七；在二〇一三年，他們生產了八百九十三英噸，占全球總量的百分之十八。阿富汗的產量持續占最大宗，但緬甸正在急起直追。

在撣邦山區裡，大部分的罌粟都是小農生產的。雖然數十年來他們不斷被誘引棄種罌粟花，但緬甸罌粟產量的十分之九以上仍來自這地區。據估計，二十萬戶以上的家庭抗拒了改種橡膠、玉蜀黍或其他作物的誘惑。這裡的農人極為貧困，一旦有機會，種植罌粟顯然仍是他們最有經濟收益的選項。近年來市場需求驟升，尤其是來自中國的需求，因此當地市場的海洛因價格已經翻漲兩倍或三倍。有個世上發展最快速的國家在國門邊，既是緬甸的幸運，也是不幸。當中國人飢渴地富有起來，對海洛因的需求也同步增加。就官方資料來看，在中國已經有兩百萬人吸食海洛因上癮，但是很多人認為實際的數字應該是五倍，而且持續在攀升。中國對鴉片和其他以甲基安非他命為主的毒品的需求也在成長，因為青少年把它當成類似抽菸或喝酒的簡易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理論上至少比海洛因的傷害小。無論如何，中國快速成長的財富

肯定意味著，它對緬甸海洛因和鴉片的需求將繼續朝唯一的方向前進。

據聯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估計，罌粟基本上提供了撣邦半數家庭的年收入，也就是九百二十美元。非法種植罌粟是有風險的，但是農人都知道，他們受到裝備精良的民兵部隊保護（可參見第三章），而民兵部隊會抽成。幾乎總由少數民族出身的指揮官領導，這些民兵得到政府軍的許可，可以向在地人課稅來籌措資金，譬如在道路上設檢查哨，或插手各種商業活動——這在撣邦自然指的是毒品交易。在撣邦境內大約有一百支這類的民兵；他們保護罌粟的生產，因為得到奈比多方面默許得以放手操作，他們也會把某些利潤交到政府官員手上做為回報。

這樣的安排皆大歡喜。這些民兵領袖兼毒梟通常富甲一方，也成了緬甸中央政府控制撣邦的核心支柱。¹⁰這些公然與政府合作，只要不插手政治就可以合法做生意的人物，包括兩位最惡名昭彰的「鴉片之王」羅興漢（Lo Hsinghan）和坤沙（Khun Sa）。羅興漢開設的「亞洲世界公司」（Asia World Company）成為緬甸最大的企業集團，旗下的投資包括飯店、港口等等相當多元。

就如撣邦農人輸出大量海洛因，撣邦本身也是海洛因氾濫。由荷蘭為主的非政府組織「跨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針對吸食毒品進行的一份最新研究指出，在撣邦北部和克倫邦，海洛因濫用的程度像流行病一樣廣泛。撣邦也是金三角地區大量的甲基安非他命地下實驗室的大本營，這些實驗室都在非常隱蔽的臨時地點，通常只是屋內的浴室或車庫。就像駐

緬甸的聯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的前任領導者傑森·伊萊 (Jason Eligh) 向我指出的，鴨霸之所以在撣邦四處充斥，是因為它的化學原料很容易取得（從鴉片提煉出海洛因時也要用到），所以藥丸可以很輕易地「無限量」生產。光是撣邦一年生產的鴨霸藥丸就超過十億顆。

撣邦老人眼見傳統撣族群和習俗在毒品猖獗、非法買賣和剝削下崩潰瓦解感到痛心。昆吞烏悲嘆道，儘管撣族竭盡所能反擊，尤其是透過教會的力量，「撣族的孩童還是吸毒成癮，感染愛滋病。」撣邦北部的邊城木姐境內及其周圍，村鎮人民已經自行著手處理問題。自發的義警隊逮捕吸毒和販毒者，將之送往他們自行設立的勒戒營。

克欽邦也有相同的做法。在密支那有三間由克欽族浸信會開辦的大型毒品勒戒所，還有一家天主教的勒戒所，以及在郊區的其他幾家私人經營的勒戒所。當我問起是否從緬甸政府獲得任何協助時，浸信會毒品根絕委員會的成員們不屑地哼了一聲。說起來，緬甸當局還從中作梗。我拜訪過密支那其中一家私人勒戒所「眾民族之家」(All Nations Home Ministry)，由令人欽佩的莎拉·瑪璐璐婷 (Sarama Lu Lu Tin) 負責，這位浸信會執事剪得極短的頭髮已逐漸花白，陽光般的面容令人愉悅。她成立這家勒戒所是因為她三個兒子的其中一個，十五歲就吸毒成癮。這兒子後來改頭換面成爲一位執事，但三十二歲那年便因高血壓過世，說不定是早年吸毒所致。眼見政府對毒品的禍害完全不聞不問，她自行募款成立勒戒所，地點就在從前的墓園。資金來自克欽族商人以及「禱告的力量」，她告訴我。

這地方蓋得像一座堡壘，周邊的鋼牆上方圍起帶刺鋼絲。這是為了防止接受勒戒的人逃

跑，她說。關在裡面的人——幾乎都是年輕人——大多數是父母親送來的，有時候是被強迫帶來的。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數人都待了下來，而且經過爲期七十天的運動、推拿、熱鹽浴還有少不了的禱告，他們通常都戒斷了毒品。儘管如此，她也明白，這些人離開後沒工作可做，很容易就墮入舊習。她知道很多人就是這樣在勒戒所進進出出。

特區

不幸地，這毒品猖獗的情況似乎看不到盡頭。地方上關於開放交易和改善運輸的提議，儘管很可能會帶來一些利益，但因為牽涉的是毒品，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就像伊萊說的，當地的黑幫是「全世界最厲害的物流專家」。新開一兩條高速公路他們可就稱心如意。

即使緬甸政府反常地改變心意，真心要徹底根絕毒品的種植與產製，然而無數權力已下放至撣邦，中央鞭長莫及，就算有成果也是有限。那裡除了有半自治的草莽民兵要對付，而且每一支民兵和當地緬族官員都維持著共生關係，與中國接壤的邊疆地帶數十年前早已被棄守，任由各方勢力擁兵自重占地爲王，而今實際上自成獨立邦國。

這些邦國就是眾所周知的幾個「特區」，乃一九五〇年代險些要推翻政府的緬共叛亂的遺產。隨著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全球各地的共產勢力瓦解，緬甸境內各個共產主義團體最終與緬甸政府達成協議。他們放棄武裝鬥爭以交換自治權，形成與中國雲南省接壤的邊境上一個個各自

為政的小國。這些小國以族裔區分。聲名最劣的是第二特區——佤邦和剽悍的佤邦聯合軍（United Wa State Army）的大本營，而該聯軍大抵仍舊足有兩萬人。佤邦長久以來深深涉入罌粟生產；美國國務院曾推測，佤邦聯合軍是世上「武裝最強大的毒品販子」。

第二特區的南邊是第四特區，其首府在勐拉。這特區由大名鼎鼎的揮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Military）和當地政委會（東揮邦）所治理。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是佤族（Wa），其餘為揮族、拉祜族（Lahu）、阿卡族（Ahka）、栗粟族（Lisu）和佬族（Loi）。在這裡，緬甸政府的令狀，在景棟城外約莫一小時路程重兵防守的邊境檢查哨戛然止步。緬甸貨幣不流通於特區內，緬甸士兵或官員也禁止進入，所有的標誌都換成中文。勐拉本質上是緬甸國土內的一個新興的中國城，由揮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管轄，考量的主要還是中國人的利益，人民幣才是正式的流通貨幣。^①

這裡的主要產業之一是博弈。有個村子全是低劣俗氣的賭場，位處從緬甸這一側來的訪客抵達勐拉之前。在這裡，數百名中國姑娘索然仔細盯著賭桌上無聲移動的賭牌和骰子。她們顯然沒從玩牌得到絲毫樂趣，一概遵從耳機傳來的指示行事。這些姑娘只是在邊界另一側中國境內的真正賭客的代理人，而賭客正透過閉路電視顯示器追蹤賭桌上的活動。

勐拉髒亂、危險，充斥著妓女和毒品。不過就像當地揮族指出的，這裡也有電力、工作和機會，不像景棟什麼都沒有。我在勐拉看到的營造起重機鐵定比在揮邦其餘地區要多。因此，想找工作的揮邦男女無不往勐拉跑，就像追求性、毒品和在賭桌上試試手氣的中國人也往勐

拉跑。對於揮族來說，這不是老親王希望代代子孫能夠從事的那種工作。但是悲哀的是，對揮邦經濟來說，任何更健康的選項長久以來已經被充斥著鴨霸、人民幣、卡拉OK和性的勐拉取代了。誰料有著王侯貴氣的揮邦竟遭逢這種命運。

① 編註：揮邦東部鄰近中國雲南省邊境存在三個自治特區，分別為果敢自治區（舊稱第一特區）、佤邦自治區（舊稱第二特區）、揮邦東部第四特區。這三個自治特區的首府分別為老街、邦康與勐拉，各由果敢民族民主同盟軍、佤邦聯合軍、揮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實際統治，這些武裝部隊的前身多為緬甸共產黨在緬甸山區的割據勢力。此外因人口組成與地緣關係，這幾個自治特區的官方語言皆為漢語，流通貨幣則為人民幣。

第2部

為存續而改革

第六章 一窮二白

二〇一二年十月中，數千名緬族人圍繞在曼德勒的主佛塔，慶祝一年一度在守居期 (Buddhist Lent) 尾聲的點燈節 (Thadingyut)。街道上擠滿了小販，樹上掛著大小不一的各色燈泡。民眾大啖從火燙的炭盆取出的在地美味。

從六月至十月期間，僧尼要居守寺中不得外出，無法雲遊四海，到處化緣，於是善眾紛紛前來捐獻。這也是「豐饒樹」的季節，佛塔內擺滿了形狀像聖誕樹的金屬架，上面掛著信眾為了積功德捐獻給寺院的物品，通常是僧尼可以私自擁有的形形色色日用品，譬如牙膏、雨傘、杯子和掃帚。白花花現金也很受歡迎，尤其在仰光這類較為富裕的城市。在大金塔，想積大量功德的人會買整棵像結花彩似的繫綁著五千或一千緬元紙鈔的豐饒樹。

點燈節總漾著幾許興奮和期盼。就如僧尼要居守寺內修行，百姓照習俗也不能在這段期間內嫁娶。在點燈節月圓之後，有情人終於可以成婚，所以瀰漫著一種歡樂嘉年華的氛圍。在曼

德勒佛塔外面，男女老少聚集在開放的空地上享受難得的樂事，看露天電影。有個年輕的緬族人使勁地要把幾盤電影捲帶放進一台壯觀的義大利放映機，那機器可能是一九六〇年代製造的。從他身旁的一堆扳手和螺絲起子看來，他早已習慣跟這遲暮美人交手。

更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停在佛塔入口旁的一輛被仔細擦亮的紅色消防車。那是英國丹尼斯（British Dennis）出品，從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老舊但依然體面，而且還在出勤。值勤的消防員說，地方當局考量到城內各處點燃了數萬支蠟燭，每每要求曼德勒消防局要在節慶時四處部署。所幸當晚丹尼斯不須接受考驗，那水龍帶看起來已破損不堪。幾個外國人珍愛地打量這奇妙的車子，但緬甸人的反應很不一樣。我的嚮導面帶尷尬地跟我說起車齡，而消防員似乎很不解我們對這車何以如此感興趣。這輛優美的古董丹尼斯也刺眼地徵示著緬甸落後亞洲和世上其餘國家多遠。我在吉隆坡看過相似的一輛，不過是在博物館裡看到的。在這裡，在緬甸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它仍是唯一一台可用的緊急設備。

謊言、可惡的謊言和統計數字

威信正是這種深刻的難堪與丟臉，最終說服了緬甸軍政府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放棄惡毒的具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在二〇一一年之後總算考慮進行更深刻的變革。統治緬甸的軍官這些年來當然稱心如意，從寶石、毒品和其他交易大發橫財。他們經常到富有的城邦譬如新加坡

去購物、藏錢，並把子女送到該國最昂貴的私立學校受教育。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二〇一一年針對全世界非法資金外流所進行的一項重要研究指出，緬甸名列過去二十年來資金外流的第八名。該報告估計，在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八年間，將近有八十五億美元流出緬甸，占緬甸那段期間的國內生產毛額平均的百分之九。一，而發展中國家平均大約是一半。

大部分資金是透過海外金融中心來洗錢，避開了外國（主要是美國）或國際監管機構的審查。流出緬甸的資金，通常就是以最簡單的現金形式流出，往往是明目張膽的不法犯罪所得，譬如毒品交易。就如經濟歷史學家尚恩·特尼爾寫道：「這筆資金外逃也是同時期緬甸接收的外國金援總額的四·六倍。更清楚地說，在一九九〇和二〇〇八年之間，緬甸每從外國得到一美元，就有四·六美元又流出去。」¹

這絕對是奈及利亞甚或是剛果規模的盜取，讓人不禁想到臭名昭彰的非洲竊國者阿巴洽（Sani Abacha）或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緬甸和一些同情者往往會不滿說，它的人民從金援分得的數額，和東南亞鄰國譬如越南和柬埔寨相比實在很低；竊國者侯，原因之一在此。

無論如何，尤其是在一九七七年緬甸加入地區性的政治聯盟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之後，緬甸軍事出身的領導人走訪各個會員國，充分發覺到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甚至越南——和緬甸之間生活水平的落差急遽拉大。經過連年反覆的經濟處置失當、貪腐、竊國和內戰，外加強制驅離先前為國家製造大部分財富的無數人，緬甸很難不落得如此下場。一般通常會主張，流氓政權應該被孤立在地區聯盟之外，直到

進行改革，這樣他們才有動力去改進。譬如，土耳其就被期待要改善人權紀錄才能加入歐盟。但緬甸成為東協會員國，則指出反向操作也行得通。也就是說，緬甸執政者得常在世上最成功的經濟群體之一上露臉，因此也會為自己的治國無方感到顏面無光。

即便是他們當中的死硬派也不再否認，自從實施奈溫的社會主義實驗以及後續二十年同樣悲慘的裙帶資本主義，緬甸的財富嚴重倒退。只要統計數字可信，它就可以說明一切。在一九六二年，緬甸是該地區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當時緬甸每人的年收入大約是六百七十美元，是印尼人的三倍，也比泰國人多出兩倍以上。到了二〇一〇年，情況完全相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到了那一年，緬甸是東南亞當中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最低的國家，世界銀行在二〇一一年紀錄是八百二十四·一九美元，只等於全球平均的百分之七而已。²二〇一四年由聯合國資助的緬甸人口統計顯示，緬甸人平均預期壽命僅六十七歲，在該地區敬陪末座。緬甸至少仍有半數的人口每天靠不到兩美元度日，而馬來西亞和泰國這類國家則正在努力對付所謂的「中等所得差距」(middle-income gap)：跨出從發展中國家之首躍向成熟發達的第一世界地位的最後一步。新加坡當然已經做到了，目前新加坡擁有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比例居全球之冠。

不論在亞洲或歐洲，很多國家為了與新加坡這出奇成功的經濟模式相比，都吃足苦頭。但真正讓緬甸領導人震驚的，想必是眼見自己的國家被柬埔寨和寮國這類國家給比下去。歷經數十年內戰和外國入侵，之前還有赤東政權慘無人道的暴政，柬埔寨做為一個和平而(勉強)可運轉的國家崛起，不過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然而到了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尾聲，柬埔寨的平

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已經勝過緬甸，而另一個小國寮國也是，且寮國在一九六〇年代還深受東南亞衝突和強權介入波及。反觀緬甸，當時既沒被汽油彈攻擊也沒被入侵。

緬甸將領們多年來否認這急轉直下的經濟崩壞。就如獨裁者常有的作風，他們不面對問題，而是作假帳。他們急切地想證明，自己的國家各方面都和亞洲對手一樣威猛，他們不加掩飾地編造二〇〇〇年代緬甸經濟成長率，聲稱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二·二的可笑數字。這令人咋舌的數字甚至贏過中國。完全是杜撰的。

在今天，在講求公開的新時代，各部首長或多或少承認，從前的軍政府純粹就是捏造數字。關鍵的改革者同時也是登盛的左右手翁敏(Aung Min)在二〇一三年告訴我，政府現在根據「你們的」(西方的)資料而不是它自己的統計數字做決策。對翁敏來說，改革國家的第一步，顯然是「提出正確的統計數字和資料」，為建立「新政治文化與價值」扎穩馬步。在舊政府裡，編造的數字被一再複述，以致將軍們想必忘記它們可疑的出處而開始自欺欺人。這是極權政府常見的模式；政府公布的數字被當做打心理戰的黑色宣傳。也許更令人吃驚的是，很多外國機構對舊政府的數字信以為真，動不動就不假思索地搬出這被誇大的數字。

在二〇〇九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艾許中心的一組經濟學者團隊，對緬甸假造的成長率進行一項更可靠的估計，這項估計部分基於用電量，而用電量通常是推估經濟活動多寡或經濟活動闕如的可靠指標。這群哈佛學者的結論很值得參考：

自二〇〇〇年以來，（緬甸）真實的國內生產毛額看似有正向的成長但幅度不大。國內人均產值（per capita GDP）的成長可能近乎於零，但更可能的是人均產出增長（per capita growth）是每年百分之一至二。這數字對亞洲來說相當少，甚至比菲律賓更緩慢。假使所得分配愈來愈集中（譬如說，國家掌控的天然氣輸出量快速成長），那麼很可能在這段期間內大多數人的真實所得持平甚或下降。

三年後，該團隊警告，「將（官方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和用電量成長兩相對照，顯示我們的看法是對的，也就是說官方公布假數據已經行之有年，而且就某個程度來說當局也信以為真。這很危險。你得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才會知道如何抵達你想去的地方。」³

連蛇也到中國去了

哈佛估計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國內生產毛額可能下滑，即使東南亞其餘地區有些國家高出緬甸百分之六或更多，這和我在二〇一〇年之後對於這國家的觀察十分吻合。我的觀察大致上也和其他研究一致，尤其是二〇一一年政權開始改革之後可以更準確（和誠實）地把貧窮加以量化。前往緬甸之前我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的非洲編輯，所以我幾乎走遍了整個非洲大陸。我定期寫文章談到貧窮以及貧窮對一般非洲人的生存機會和健康的不良影響。二

〇一〇年我在緬甸很多地方看到的貧窮，都和我在非洲看到的一樣悲慘。譬如說在二〇一四年，我和世界銀行的一些代表一同造訪欽邦中部甘貝萊（Kampetlet）鎮裡幾個較偏遠的村寨，親眼見證了貧苦。在大約五千英尺高的山區，欽族過著幾近中世紀的生活。

大多數欽族都是小農，栽種馬鈴薯和玉米供自家食用，番薯則出口到中國。就我的估計，大部分人靠不到一美元度日。他們曾有過的少數農具，老早就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賣掉了，而這種經濟上的拮据困窘非常發生。男人使用古老的火繩槍、弓箭獵獸。沒有肥料可以提高貧乏的產量，在某些村寨裡，作物還會被老鼠吃掉。蛇在緬甸一向很多，牠會吃老鼠，但是在甘貝萊鎮卻不見蛇的蹤影。為了多攢一點錢，蛇也全被捕捉並賣到中國去。

村人告訴我，靠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每年只能撐六個月，之後他們必須想辦法湊合過下去。有多餘食物的人會分發出去，其他人則跟親戚借用。很多人純粹就是少吃一點，一天改吃兩餐而非三餐。大部分孩童僅靠蔬菜和米飯果腹，幾乎無肉可吃，頂多一週吃一次。村小學校長承認，他可以支配的費用從來不夠用，買不到足夠的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孩童因此通常營養不良，雨季期間更是如此。身為政府雇員，他不能直白地承認這類不幸，但他也說得夠多，暗示食物的匱乏肯定影響了孩童在校專注學習的能力。由於待在這些村寨裡沒什麼前途，很多年輕人已離開，前往泰國、馬來西亞等其他地方找工作。他們偶爾會匯錢回來貼補家用。

這些欽邦村寨有時候會得到聯合國機構的協助。譬如說，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已協助建造並維護幾所學校。世界銀行也開始介入，這是登盛的改革計畫的直接結果。儘管如此，這些欽邦

村民，以紋面和細長菸管出名的婦女，邦政府和聯邦當局完全不聞不問。其中一個村寨在幾年前曾去函給邦政府，投訴村裡有鼠患。一名官員回函，宣稱那不過是老鼠罷了，不是什麼禍患，而且他們也愛莫能助。

顯然，軍政府的執政黨鞏固官員，在二〇一〇年選舉期間曾在欽邦的幾個村裡現身，承諾要協助開闢新路或改善與其他村寨的聯外道路。他們的承諾村民聽了進去，有些村民甚至投票給執政黨，但那是大多數村民跟緬甸當局的最後一次接觸。緬甸政府對於進出欽邦嚴格把關，我在欽邦見過的人幾乎無一見識過緬甸其餘地區，甚至從來不會離開甘貝萊鎮太遠。欽族人並沒有抱怨，畢竟他們不認識其他族群的人，也就無從比較。但是這些村寨



圖5 欽族，亞洲最貧窮的民族之一（作者提供）。

很遺憾的卻是過去數十年來很多緬甸人過得多麼窮困的例證。

傳統上來說，山區民族向來是緬甸最被邊緣化的人民，所以才會從造訪欽族村寨的經驗歸結出這些人大抵是緬甸最貧窮的族裔。然而我在欽邦的所見所聞，肯定和當地專家在舊軍政府時期最後十年在他處所記載的相吻合。丹瑞的軍政府否認國內有任何糧食短缺的情形存在，更別提貧困或營養不良。然而，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乾燥地帶這緬甸中心地區，一般而言也是較繁榮的地區，進行的許多調查顯示，情況和丹瑞的說法完全不同。根據報告，這裡的數十個村落裡，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的農人和無地家庭面臨「糧食不足與糧食匱乏，就連沒鬧乾旱也如此」。此外，類似的考察也指出，年幼兒童營養不良且「瘦弱」的程度比政府所承認的要高出很多。⁴

僧侶的智慧，以及納吉斯風災

從內政的角度來說，只要將軍們繼續對人民隱瞞緬甸相對的衰退，這類的嚴重結果便形同不存在。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大體上與世隔絕，緬甸人只要自認表現得不比地區上的其他人差，也就沒什麼理由抱怨。因此，多年來將軍們讓人民與世界隔離，有效把國際呼籲、外國報告和有益的網站（有實際網路可用的地方少之又少）阻擋在外。出國旅遊被嚴密限制，但精英分子不在此限。緬甸境內的旅遊也被限制，奈溫當權的年代就不在話下。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為了

賺取強勢貨幣，外國觀光客才被准許持各種的短期簽證進入緬甸，但是緬甸政府仍然盡量讓觀光客遠離當地緬甸人以及最貧窮的鄉下地區。

然而，緬甸軍政府終究無法再假裝下去，就算他們能夠欺騙自己一時，也很難再繼續欺瞞其他人。研究緬甸及東南亞的專家麥可·蒙提桑諾（Michael Montesano）說，隨著科技、電視、電腦和網際網路的突飛猛進，就連緬甸將軍們也無法再「把這些東西掃進地毯底下」。

在這個脈絡下，緬甸不免被拿來與將軍們最親密的盟友北韓做比較。北韓政府面臨相同悲慘的經濟倒退，只不過北韓當權的封閉鎖國更勝一籌。金氏王朝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獨裁政權，義無反顧地切斷了與外在世界的聯絡。對於北韓來說，這樣做簡單得多，因為它的邊界較少：一條與俄國接壤的短邊界，一條與中國（其忠實支持者，雖然也動輒爭吵）接壤、長得多的邊界，其餘的就是與南韓的邊界。若非目前的國際形勢，北韓政權的主要敵人照說應該是散播無數文宣及心戰喊話，暗中顛覆金氏政權的南韓，但事實上卻不然。①不過南北韓的交界，仍是世上軍備最森嚴、封鎖最嚴密的邊界之一。

然而緬甸被五個不同國家環繞，與這些國家接壤的邊界非常之長又布滿相互滲透的縫隙。光是與中國接壤的邊界就大約有一千三百五十英里長。因此，總有相對大量的跨境活動，譬如走私，支援山區民兵的作戰補給，或來來去去的難民。到了二〇〇〇年代早期的尾聲，將近有兩百萬緬甸人因為缺乏工作機會而不得不到泰國工作並定居。新加坡也有相當大的緬甸人社群，在東南亞以及更遙遠的地方也是。他們總會透過很多有創意的方式設法和緬甸家鄉的親友

聯繫，讓國內的人知道周遭的國家有多麼富裕和自由。北韓的地理與歷史讓它自絕於外。緬甸則幾乎是不可能遺世孤立。

緬甸國內發生的兩件事，也合力向它的子民暴露緬甸的衰敗，戳破官方所謂全國一派繁榮興盛的謊言。一件是二〇〇七年的僧侶示威活動，所謂番紅花革命，另一件是熱帶氣旋納吉斯在二〇〇八年肆虐緬甸南部。這兩起事件迫使軍政府不得不正視自己的無能與弊端，也把那些無能與弊端暴露在廣大的觀眾面前，大大促成了緬甸的改變。

二〇〇七年僧侶的示威行動，起因於政府在八月突然取消燃油補貼，導致燃料價格突然高漲。一向壟斷燃料專賣權的緬甸政府，把每加侖一·四美元價格拉高一倍到二·八美元，使得天然氣價格陡增五倍，連帶地致使物價高漲。不久之後，抗議者上街頭，對高漲的物價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表達不滿。當時的政府已經對示威抗議習以為常，不過這一回非比尋常，走上街頭的是上萬名僧侶，而且聲勢非常浩大。

曼德勒素威庫吉（Shwegu）修院的住持阿里亞（Ariya），在二〇一四年跟我說明這些僧侶為何會發起這些示威活動。在曼德勒這緬甸傳統的心臟區，僧伽格外有影響力，因此他們在這裡發出異議，產生的效果也最大。「每天早晨僧侶會到民眾家裡化緣，所以僧侶非常了解民間疾苦。」阿里亞回憶說：「政府不像僧侶這麼了解人民的痛苦，因為僧侶每天早上都到民眾家

①譯註：作者應指北韓的主要敵人是美國。

裡！僧侶想幫助他們的施主。民生物價漲個不停，人民真的過得很苦。」人民確實過得很苦，苦到僧侶每早來化緣時信眾也沒什麼東西可施捨，所以僧侶也跟著施主一起挨餓。於是僧侶們開始繞著曼德勒舊皇城護城河牆邊緩緩步行，請求政府發「慈心」，即緬甸佛教用語說的 *metta*。這是一場平和的示威，要把飢餓與受苦公諸於世；它毫無政治目的，不論明示或隱含。就像阿里亞說明的：「它的目的是要人彼此尊重，相親相愛，而不是暴力相向，彼此傷害。民眾沒有足夠的糧食……也沒有任何權利，或政治權利。因此僧侶們必須喚起世人關注。」

氣氛緊繃地過了幾天，僧侶們被允許持續示威，吸引數千名支持者。沒有人敢說政府會怎麼處理僧侶們這史無前例的抗議。然而丹盛最後似乎吃了秤砣鐵了心。阿里亞敘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僧侶們聚集在曼德勒最有名的佛塔之一。他們試圖要走出去，繼續步行繞城，但是手持棍棒的人群把他們團團圍住，而且出棒嚇阻。這群人很有組織，僧侶們一往哪邊走，這些人便非常迅速地靠上來。我的僧侶和學徒被這些人攻擊，有些人受了傷。政府用軍發黨的人（事實上，這些人來自軍發黨的前身「聯邦鞏固與發展協會」）以及精武幫，聽命於昂當……全城都知道。精武幫的人都是草莽，不乏酒徒和惡棍，他們拿錢辦事，一次三千緬元。他們靠毆打僧侶賺錢，搞不好還會得到毒品和酒。有一些是罪犯和釋囚。很多人相信，下令鎮壓番紅花革命的人是昂當。

接下來幾天，政府軍湧入曼德勒的寺院，搜查被扣上「恐怖分子」帽子的示威抗議僧侶，很多人遭逮捕。阿里亞說：

我們的寺院舉行了一場布施大會，有個軍情局來的人假扮成施主，對所有人問東問西。他們經常這樣來探查。很多寺院會有一些裝瘋賣傻的人登門，賣豆子或什麼的給僧侶，他們進到寺院裡也會到處仔細查看。在我們的文化裡，這類小販是不能跟僧侶交談的，所以這些人是假冒的。

在曼德勒至少沒人被殺害或受重傷。在仰光，情勢完全不同。顯然，國內經濟狀況之惡劣已使得民怨沸騰，有數萬民眾準備不惜冒險抗議。他們和僧侶一起上街頭示威，結果警察、軍隊和精武幫以暴力回應，演變成一場流血鎮壓。軍警向抗議民眾開槍，造成數十人死傷，包括僧侶在內。

軍政府成功弭平了抗議活動。但是在篤信佛教的緬甸，殺害僧侶太過駭人聽聞。軍政府及其辯護者試圖聲稱，死傷者大多數是流氓和尚，或假扮成和尚的民眾——「假和尚」，甚或恐怖分子。但是真相是無法被掩蓋的，這是一場真誠平和、非暴力示威，沒有特定的政治訴求，只求世人關注普遍的飢餓與貧窮。丹瑞向來被認為冷酷兇殘，粗野褻狹，這會兒露出了屠殺僧侶的劊子手面目，在緬甸沒什麼比這更罪孽深重。根據黛比·翁丁·泰勒（Debbi Aung Din

(Taylor) 這位親眼目睹這些事件的某非政府組織的緬甸負責人，「大家都認為丹瑞做過頭了，他自己大概也這麼想。」同樣重傷軍政府形象的是，在數位相機和筆電的新時代裡，軍隊令人髮指的諸多掃蕩行動，也被當場拍下來，在全世界即時播出。任誰都沒有藉口可以忽視緬甸真正發生的事。

我問阿里亞以及他曼德勒的出家同伴，政府槍殺、毆打僧侶的殘暴行徑是否令他們吃驚。「不會，」他回答，「他們會不擇手段來保住權力，他們只關心權力。」在曼德勒事發當時，阿里亞曾要求那些惡棍不要出棒毆打僧侶，但是他們依然故我。「他們沒有人性。在緬甸有兩種法律，一種適用於政府喜歡的人，假使政府不喜歡你，他們會用所有的法律來對付你。所以這裡的法律是沒有規則的。」

佛教徒相信惡有惡報。熱帶氣旋納吉斯在事件結束後不到八個月登陸，很多人相信，那是神明對殺害僧侶的國家降災施罰。二〇〇八年五月初橫掃孟加拉灣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熱帶氣旋納吉斯，是史上最具備毀力的氣旋之一，在緬甸造成空前的巨大自然災害。氣旋捲起的暴雨，使海水往三角洲倒灌二十四英里遠，所到之處摧枯拉朽，造成十四萬人死亡。光是拉布達(Laduta) 這個鎮，咸信就有八萬人喪命；另一個鎮柏格里(Bogale) 也有大約一萬人身亡。據載有五萬五千人失蹤，更多死者在其他城鎮或地區被發現。聯合國估計，風災造成的損失高達四十億美元，是該地區損傷最慘重的風災之一。

緬甸政府的反應讓這起悲劇更是雪上加霜。緊急救難單位缺乏救災設備——不管設備現不現代，根本無法回應這類的災害，政府也束手無策，沒給勉強生還的人民任何協助，也無力重建災區。因此緬甸政府索性試圖掩蓋納吉斯造成的災情，希望他們的無助與無能不會暴露出來。但是規模如此浩大的災難，災情慘烈的消息不免還是會走漏。就連官方媒體終究也不得不報導。當緬甸政府不管是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提供救援，緬甸人民站了出來。數千位緬族平民百姓帶著有限的食物、水、衣服和毯子離開仰光，前往災區協助災民。就如密切參與救災的非政府組織負責人泰勒回憶道：「當緬族人進到村子裡協助救災，他們被鄉村地區的窮困給嚇壞了。」於是官方數字粉飾太平的面紗被掀開，露出了緬甸真正的貧乏窮困。

最糟的是，救災不力的緬甸政府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悍然拒絕外國救援，罪加一等。雖然幾乎在第一時間便向聯合國尋求奧援，但事實上軍政府延誤多日，遲遲不讓國際——尤其是西方——的援助進入緬甸，部分是顧慮到這類的西方介入會引發一場對緬甸的全面入侵和政變。西方的一些厲色疾言無疑也沒用。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 揚言，假使軍政府不准外國支援進入，西方將不惜侵犯緬甸領空及主權，「強制空投」遞送物資。嫁給美國人的泰勒便是在偏執的將領和西方之間穿梭協調的緬甸人之一，她努力讓軍政府相信，提供救援的各方立意真誠，至少這一回他們的出發點絕對是出於人道精神。

不過還是要到風災發生的一星期後，譬如說前往仰光的一次大規模美國軍事空運才被批准。又花了好幾個星期，國際救援工作者才獲得簽證得以進入緬甸提供協助。即便在當時，他們也只被批准進入軍方嚴密監管下的災區。在三角洲地區的救援物資遞送，經過這幾番耽擱，

無疑又造成更多不必要的傷亡。在事發之後，軍方也開始阻擋緬甸人自發的救助活動，竭力佯裝一切正迅速回歸正常。記者艾瑪·拉金(Emma Larkin)在納吉斯風災後設法持觀光簽證溜進緬甸，她目睹了國外專業的救援工作者和當地緬甸人的挫敗。她在風災之後的兩星期寫道：

絕大多數的國際救援工作者困在仰光，旅遊的限制將擴及緬甸人民的謠傳，從當局在三角洲地區的種種作為獲得證實。檢查哨的士兵開始散發傳單，上面寫著協助災民的救援行動到了結束的時候，救濟物資的發放已經告一段落，災區重建已經開始。內文指示捐贈者停止發送救濟物資給坐在路邊的民眾，宣稱這些人不是真正的災民，只是聚集在路邊想拿取免費的施捨。即日起，想要提供協助的人應該聯絡相關鎮區的「災難管理委員會」。乍看之下，這是一則客氣有餘的通知，但它卻伴隨著愈來愈嚴厲的警戒。裝載救濟物資的汽車和卡車經常被扣押，內容物被沒收充公。一回，有二十輛卡車的車隊在返回仰光的路上被攔下，駕駛全被拘留，還在牢裡過夜。⁵

總的來說，納吉斯風災顯現了軍政府的麻木不仁，進一步向緬甸子民披露國家的貧困和落後。它肯定把將軍們後續任何聲明的可信度破壞無遺。不過從好的一面來看，這個插曲也顯示出緬甸人能夠自行動員起來協助國人，事實上納吉斯風災足證是個重要的刺激，激勵緬甸發展出一個益發活躍而有影響力的公民社會。

經濟幻象

然而就算大多數緬甸人，包括活在假想世界裡的將軍們，終究看清楚國內經濟一敗塗地，人民糧食短缺、營養不良又經常失業，還是有責任歸屬的問題。誰該為這一團亂象負責？

「具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疑是始作俑者；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國有化政策摧毀了最能盈利的經濟單位，也把國內大多數的企業主和商人驅逐出境。然而奈溫的蘇聯式指令型和控制型經濟所導致的悲慘後果，不能全部怪罪於政府。畢竟緬甸的領導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只不過是追隨西方很多左派分子以及鐵幕後的共產主義分子所倡導的，在當時仍模糊朦朧的經濟政策。儘管「具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帶有佛教色彩，緬甸基本上受制於當時的經濟正統，而且做得有點過火，即使將軍們並不真的了解它。準馬克思主義經濟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之後才有所鬆綁，一些私人企業獲准回到經濟體系。後來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及更往後，緬甸政府可以輕易把經濟亂象怪罪於外國的經濟制裁，這些制裁手段顯然讓緬甸製造商失去國外市場與資金。

儘管如此，奈溫政權還是難辭其咎，尤其是把釀大禍的緬甸元素加到政策組合裡，也就是後續幾度的廢用某些紙鈔，對此奈溫政權無可避免地要負起全責。這些措施直接招來禍害。第一次廢用紙鈔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幾乎無可非議，但是到了一九八七年的第三次，經濟的處置

已經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

隨著具緬甸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和經濟控制起作用，通貨膨脹的壓力快速增大，廢用某些紙鈔是因應的一種做法。通膨的影響當中最明顯的是舶來品非常搶手，因而產生了龐大的黑市。奈溫政權沒有回過頭去放鬆國有化政策或批准更多的私人企業，反而選擇收回面額大的紙鈔使之停止流通。於是一九六四年五月，革命委員會法規第七條「貨幣廢止流通法」(Demonstrisation Act) 裁定，所有一百元和五十元面額的緬元紙鈔不再是法定貨幣；人民必須前往特別指定的中心兌換面額較小的紙鈔。很遺憾地，這本身就相當不切實際的做法，一經政府貪腐、組織紊亂和蒙昧無知，搞得更形複雜，結果是一團混亂。不僅政府內多半是異想天開的「投機」和「囤積」資本家為此受創，一般民眾也深受其害。

前政府官員也是勃固省的行政長官巴爾萬特·辛格 (Balwant Singh) 留下的記述，描寫民眾為了避免畢生積蓄在政府一聲令下化為烏有而發生的混亂景象：

兌換鈔票的中心都是指定的。一家……在我們家隔壁。所有停用的紙鈔要在宣布之後的一星期內兌換，大批人群蜂擁而入。人潮推擠得很厲害，兌換中心大門的磚柱竟然因而倒塌。仰光各地的擠兌地點也同樣湧入大批人潮，現場秩序的維護也同樣拙劣。民眾有的受傷，怨聲載道、怒氣沸騰。看見這麼多人頂著大太陽等著兌換實在令人心酸——況且他們很可能等不到！到了傍晚，僅有少數人能夠兌換成功的態勢變得明顯。中心關上大門，

要群眾解散。隔天政府宣布，換鈔地點多加了師範學院。

隔天，我在半夜兩點半起床，準備去兌換我的一萬一千緬元積蓄。當我抵達那地點，發現大門深鎖，很多人只好爬過鐵欄杆，這經驗實在很丟臉。已經有二十個人排在存款數額在一千緬元及以上的隊伍。排在一千緬元或以下的隊伍則更長。到了早上十點，我遞出我的財產然後回家。⁶

他是幸運兒之一，很多人始終沒換回他們的錢。可想而知，這場災難深深撼動了民眾對貨幣的信心。因此民眾反而寧可貯存黃金或貴重寶石，結果嚴重削弱了正規的金融體系。後來的兩次廢止貨幣流通，分別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實施，更是釀成大禍。一九八五年的廢鈔行動，再次以打擊「操縱市場」的黑心投機商人為藉口。這一次回收的是面額一百、五十和二十緬元的紙鈔，然後再令人不解地換上面額二十五、三十五和七十五緬元的紙鈔。換鈔過程又是一場混亂，更讓人傻眼的是，回收的鈔票大約只償還四分之一。無論如何，政府規定每戶每人最多只能兌換五千緬元，任意把很大比例的中產階級的存款一筆抹去。

不過一九八七年的廢止貨幣流通才是最荒唐且最具破壞性的一次。這一回似乎是奈溫突發奇想下的命令，把不過兩年前才發行的三種新鈔全數回收。這次完全沒有補償措施，無數的人再次眼睜睜看著他們原本就寥寥無幾的存款一夜之間歸零。不久後，這種瘋人之舉再添一樁，以九的倍數（四十五緬元和九十緬元）為面額的新鈔隨即發行，這獨裁者顯然迷信他的幸運數

字具有法力，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來解釋。

不出所料，因為擔心再一次突如其來的廢止貨幣流通，沒有人想保有現金。如此一來，對黑市貨品的需求再度增加，通貨膨脹飆升。沒有人對奈溫政權的善變專制有任何疑慮。同年，在情急之下為了吸引金援以及低利貸款，緬甸當局請求聯合國將之列為「低度開發國家」獲准。

正是一九八七年廢止貨幣流通所引發的經濟混亂，直接導致一九八八年的廣泛示威抗議。前後幾波的廢止貨幣流通明白揭露了執政當局的積弊無能。自一九六二年以來的民生凋敝、百業待舉，再加上這種輕率妄為的財政破壞，緬甸人實在不堪負荷。獨夫無道，民心思變，到了一九八八年初，仰光茶館裡的學生和在地少年爆發的一場口角，點燃了人民革命的火炬，繼而推翻奈溫政權，催生出緬甸新鬥士翁山蘇姬。

第七章 本夫人不轉^①

一九八八年是緬甸歷史的分水嶺。大規模抗議活動掃走了奈溫將軍及其自一九六二年起執政、益發專制無能又殘暴不仁的軍政府。軍方依然主政，但為了生存不得不改變。更重要的是，一股強大而一貫的反對力量——全國民主聯盟崛起。直到今天，全聯盟始終持續為緬甸的改革在道德和政治上施壓，縱使其領導人相繼入獄、流亡或被殺害。

一九八八年的流血動盪出現了一位領袖翁山蘇姬，她將對軍政府帶來最嚴苛的挑戰。這是因為翁山蘇姬和「全聯盟」代表的是來自草根的一股持續不懈的壓力，自一九九〇年代起這股

^① 譯註：英國已故前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的經典名句，她一九八〇年在保守黨大會上，因推行自由主義經濟遇到阻力，黨內出現巨大聲浪要求政策回轉。於是她擺明態度：「你們要轉就轉吧，本夫人不轉。」（You ca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草根壓力對緬甸政治的變化貢獻重大。同樣重要的是，翁山蘇姬在國際上變成了緬甸爭取民主的象徵，因此也是西方對緬甸的所有決策的裁決者。這一點尤其讓她在政治舞台上握有莫大的影響力。將軍們急切要解除的西方制裁，只要她開金口，旋即撤銷。到最後，亟欲改變這國家的總統登盛，也只能忍氣吞聲向這位長年的政治犯求救。

夫人回歸祖國

如前所述，一九八八年三月開始的反政府抗議起因於經濟凋敝，民眾忍受了政府數十年經濟的處置不當，前一年又飽受廢止貨幣流通之苦。全國各地湧現的示威遊行，首先促使奈溫及其老班底在七月下台。這其實相當出人意表，在當時被視為反政府勢力的一大勝利。不僅如此，政府也破天荒承諾多黨選舉。起初看來，緬甸的春天彷彿來臨，實際上完全不是如此。

奈溫卸下的總統和執政黨鞏發黨主席職務由另一位將軍盛倫（Sein Lwin）接替，而盛倫這一位不得人心的奈溫心腹，八月時再讓出大位給較溫和的人士貌貌（Maung Maung）博士。他是憲法律師，曾在奈溫政府裡擔任審判長。自奈溫下台，仰光和其他城市街頭始終持續醞釀著一股壓力，要求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反政府示威在八月的頭兩週達到高峰。與此同時，軍方強硬派主張清空街道、恢復秩序的力道也在蓄積。軍政府之內也另起變化，另一位將軍蘇貌（Saw Maung）接任貌貌博士的大位，對此有一說是政變。於是在同年九月十八日，軍隊進入

仰光街道，以武力阻止示威抗議。就像奈溫曾經警告過的，真正的開槍射殺上場了。在接下來兩個月的殘暴血腥鎮壓，總共有三千名手無寸鐵的人民被殺害。還政於民的虛偽矯飾已蕩然無存。有的只是高壓統治和致命武力。

在這段示威抗議期間，翁山蘇姬從英國回到緬甸照顧臥病的母親，這趟返國行程純屬巧合。她三月回國，到了七月八日，她母親已經大有起色，可以返回他們位於茵雅湖畔、大學大道上的大宅院休養。這房宅是國家為感念翁山將軍對國家的貢獻贈與家屬的；三十壯士的家屬均獲得這般報償（翁山將軍生前的住處，他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為緬甸獨立斡旋奔走期間所居住的地方，被軍政府關閉多年之後，如今是博物館，開放給民眾參觀）。

一九八八年七月之前，翁山蘇姬鮮少居住在緬甸。翁山蘇姬生於一九四五年，她在兩歲時喪父，守寡的母親後來被派任為印度大使，所以她早年在印度接受教育，後來就讀英國牛津大學聖修學院（St. Hugh's College）。在這裡，她遇見並嫁給她的夫婿西藏學者麥可·亞里斯（Michael Aris），在中產階級學術



圖6 翁山蘇姬，二〇一三年十月
（來源：Claude TRUONG-NGOC）

圈過著安穩生活。他們育有兩個兒子，亞歷山大和金姆（以吉卜林小說裡的兩位英雄來命名），住在大學城裡最宏偉的維多利亞新月街區（Victorian crescents）的一棟房屋裡。

她定期前往緬甸，肯定也對父親的生前事蹟和緬甸政治保持強烈的興趣。她甚至到日本去研究翁山將軍與日本人合作那段最受爭議的歲月。至此為止始終看不出她想長住緬甸的意願。然而世局很快改變這一點。當翁山蘇姬在一九八八年七月身處仰光，她不可能避開在周遭發生的混亂動盪和流血衝突。她在醫院照顧母親時，手無寸鐵的年輕人就在醫院外被當場射殺。

儘管她並沒有參與這些示威遊行，翁山將軍女兒的身分使得她很快被拉進政治角力場。亞洲政治屬王朝政治，人民自然指望她的指導與帶領。沒有人有這樣的精神高度能夠把急遽增加、形形色色的反政府民眾——對當權者失望的軍官、學生、破產的店主、知識分子等等——凝聚起來。翁山蘇姬的長兄身為家中唯一一男丁可能被期待要扮演這樣的角色，但是他長住美國，對政治沒有興趣，也與翁山蘇姬和她的家人少有來往。

翁山蘇姬具有其兄所欠缺的鋼鐵意志，她有名聲有家世，而且她就在現場。很多人請她發表言論，她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大金塔首度發表演說。這位纖瘦標致的四十三歲女子，在丈夫與兒子以及數萬名群眾的注視下，初試啼聲便出人意表地證明，她的言語力量足以鼓舞廣大群眾。

當天的演說從此界定了她的政治立場，設定了反對軍人專政這議題。當有人提及奈溫及其他將軍們曾在翁山將軍麾下效力向英國爭取獨立，她敏捷反擊並呼籲說，這是爭取民主的持續

抗爭，「這是一場全國的危機，而且事實上可以說是爭取國家獨立的第二次奮鬥」。她引述受愛戴的父親用過的強烈字眼：「我們必須把民主變成人民的信念……與自由相符的唯一意識形態……可促進並強化和平的意識形態。」歡欣雀躍的群眾鼓掌、吶喊、贊同；民主找到了它的聲音。演說結尾時，她說起她對軍隊有「強烈的感情」，自稱是不折不扣的軍人子女，但「擺脫一黨體制……盡快推動自由平等的選舉」的時機到了。¹

反對團體

自那之後，一個一貫的反對組織開始圍繞著她成形，後來很快地命名為「全國民主聯盟」。這組織反映了奈溫所激起的民怨有多深，抵抗的力量有多廣泛。其中最重要的領導人物是丁武（Tin Oo），昔日翁山將軍麾下緬甸獨立軍的一位老兵，曾因英勇而被授勳。丁武代表一群曾追隨奈溫和翁山將軍對抗英國，深信自己為打造一個開明而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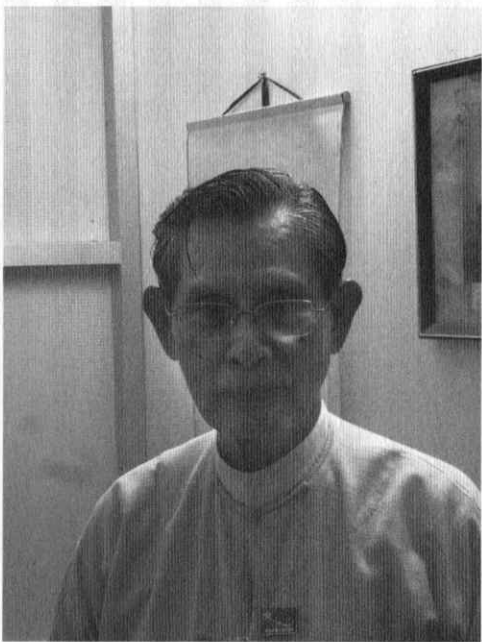


圖7 丁武，將軍變身成自由鬥士，全民盟的中堅分子（作者提供）。

主的緬甸奮戰，不料卻因奈溫掌權的實際作為而徹底幻滅的鬥士。我在二〇一四年與丁武會面時，他看起來依然挺拔、威嚴而且熱中政治。從很多方面來說，沒有人比他更能具現當代緬甸的希望與失意。我們在仰光市中心嘈雜混亂的全民盟總部裡狹小的辦公室裡交談。他的聲音時而被外頭在大雨滂沱中駛過坑坑窪窪街道，濺起水花的卡車喧囂聲壓過。

丁武出生於勃生，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最大的城市，周圍是綿延的水稻田，緬甸主要的稻米產區。二次大戰爆發時他從高中輟學離開勃生。就跟他那一代的人一樣，丁武亟欲投效翁山將軍帶領的緬甸獨立軍趕走英國人，只不過最初因年紀太輕而被拒。一九四一年末日軍攻打緬甸，年少青澀不再是首要考量，於是這位十七歲少年正式加入緬甸獨立軍的後繼組織，名義上由翁山領導剛成立的緬甸國防軍（Burmese Defence Army）。年輕的丁武接受日軍為期七個月的訓練。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畢業，成為緬甸國防軍的少尉。一九四五年三月緬甸國防軍向進攻的聯軍靠攏，對日軍反戈一擊，戰爭結束時他已升為連長。

戰後丁武一直在軍中服役，被分派到緬甸步兵團的三個營之一，在他看來，一九四八年解救剛獨立緬甸政權的軍力中，該營只是非常小的一支。他那一營的指揮官就是奈溫，他非常欽佩奈溫的愛國心和軍事能耐。一九四九年後奈溫擔任軍方首領，丁武在軍隊裡快速竄升。二十五、六歲時他已經是中校，而且是奈溫最信任的軍官之一。「奈溫和我情同父子，我們之間有很深的情誼。」丁武回憶道：「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暴動期間，我非常欽佩奈溫。」他說，雖然他也發覺到這位軍事首長「野心勃勃」。

即便奈溫在一九六二年發動政變後，丁武仍在軍中節節高升，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有兩年的時間成為軍方首領。然而一直以來他愈來愈察覺到奈溫的獨裁對國家的傷害很大，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議會民主時期該做的事都沒做，之前達成協議的每件事全被擱置。自一九六六年起，一切開始走下坡……挫敗開始出現，奈溫對手下將領愈來愈多疑。」

在緬甸軍人主政的封閉偏執世界裡，即便愛子也不免被懷疑——「簡直就像歐威爾寫的動物農莊一樣，」丁武說。更火上加油的是，一九七四年學生發動反政府街頭抗議，示威者開始擁戴丁武，視之為取代奈溫的可能人選。這大概也是逼使奈溫出頭的導火線。一九七六年，丁武被迫辭職，隔年被逮捕入獄。

出獄後，他出家為僧，修行兩年，接下來又花了五年時間取得法律學位。一九八八年抗議活動出現時，丁武一開始並無意涉入。不過就跟翁山蘇姬一樣，他是被人拱出來的。他的名聲響亮，尤其是在被奈溫革職整肅或關入大牢的退役軍人圈子裡。因此他被說服，出馬領導名為「全緬甸愛國老同友聯盟」(All-Burma Patriotic Old Comrades' League) 的新團體。實際上，這團體代表著來自軍政府內部的反對勢力。丁武在仰光發表了一場備受矚目的演說，就在翁山蘇姬站出來之後不久。其他的退役軍人也響應該組織的號召挺身而出，譬如與奈溫意見不合的將軍翁基 (Aung Gyi)，以及和奈溫鬧翻的上校吉茂 (Kyí Maung)。

丁武和他的昔日同袍很快體認到他們不可能獨力推翻奈溫政權，於是決定加入翁山蘇姬及擁護她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丁武認識翁山蘇姬的父親這一點很有幫助，打從一開始他就欽佩她

的堅毅。

擁護翁山蘇姬的知識分子裡最突出的是溫丁 (Win Tin)，一九八八年九月正式成立的全民盟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溫丁是深明大義又好戰的記者，對奈溫政權深惡痛絕。左翼的女訟務律師也是溫丁的同事敏敏欽 (Myint Myint Khin) 也加入了中央委員會。他們採用戰鬥孔雀做為全民盟的黨徽；在對抗英國統治的時期，翁山和學生們就是用戰鬥孔雀當做標誌。

因此全民盟打從一開始就是由各色各樣的人所組成。翁山蘇姬傳記的作者彼得·波凡姆 (Peter Popham) 寫道：

全民盟一直比較像「聯合陣線」而不是政黨，成員是一群胸懷大志但理念和背景迥異的政治人物，為了終結軍事統治、相信翁山蘇姬和她的領導魅力而結合。世界上大部分的政黨都具備、足以凝聚黨員的共同意識形態，但在全民盟很少看到，要不是她，全民盟肯定早就分裂成好幾個互鬥的派系。²

一九八八年九月發生大屠殺，全民盟的創立者或其他任何人都束手無策，對於接踵而來的軍事鎮壓也一樣。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激進分子被迫逃離仰光，躲避軍隊搜捕。很多人逃到邊境，在那裡有些人加入了少數民族反叛民兵，拿起武器對抗這會兒成了他們共同敵人的緬甸政府。

柯倪尼覺 (Ko Ni Ni Kyaw) 就是其一。他目前是曼德勒的一名活躍分子，二〇一四年他在城裡的一家茶館告訴我，他如何涉入一九八八年曼德勒的起義活動：

我當時只有二十二歲，一九八八年槍殺事件發生前我從沒涉入政治；我從來不感興趣。高中畢業後，我進了曼德勒理工學院。我就讀工程系，希望將來能當水手。這裡的一些老師鼓勵我參與政治……

八月七日那天，有大量的傳單在宣傳八月八日的抗議活動。那天早上十點，一群群年輕人走上街頭，但是軍隊們以軍車和卡車攻擊他們。軍隊試圖要輾過他們……我的朋友，才十九歲，名叫堅茂文薩林 (Kin Maung Wynn Salim)，是當天頭一個被槍殺身亡的人。另兩人也被射殺。我親眼看到這事情發生，我朋友倒臥在街上，身後有一灘血。因此民眾非常憤怒，再次聚集，結果軍隊又再度開火。地面上好大一灘血，這讓我非常氣憤……軍隊把他的屍體當狗一樣，我的人生就此改變。

我開始抗議。接著僧侶也走出來加入抗議，一連三天。隨後是曼德勒大學學生。當一支軍隊強行進入校園時，我在工程系大樓內。我被拷打，牙齒被踹斷。當時我們在系大樓內傳遞抗議活動的消息，因為我們是工程系學生，軍方以為我們在製造武器。最後有五六名學生被捕，我被關了七天。我們被帶到曼德勒監獄時，裡面是空的，之後每天大約會有五十人被關進來，包括有精神病和有皮膚病的麻瘋病人。我想軍方是故意的，想製造麻

煩；我和麻瘋病人關在一起。

在九月十八日軍隊終於展開鎮壓之前，八月的數星期和九月初期間，柯倪尼覺和其他人一樣享受了為期短暫的公開的政治激進活動，動員學生，使之更齊心協力地進行反政府抗議。但是經過十八日開始的下一輪射殺與毆打之後，他決定要逃離，開始了他被迫當地下激進分子的新人生。他就像成千上萬的其他學生一樣，前往東部邊境的山區，希望可以 and 既存的少數民族民兵接頭，把政治抗議轉為武裝鬥爭：

我從仰光坐火車到曼德勒，再從曼德勒到麥昂（Myone），然後再從那裡走路到拉咱。我花了十個星期，路上還要躲避軍隊巡邏。我之所以去克欽邦是因為那裡有共產黨的軍隊，但學生只加入少數民族組織……我們和克欽獨立軍合作，我們在拉咱的組織大約有五百人……全國大概有三萬名這類的學生。在拉咱，我們從克欽獨立軍獲得米和鹽，我們有一些錢，有月薪，也有軍事訓練和武器。我們也受一些先進的訓練，像是使用迫擊砲。學生會前往邊境的主要理由是接受訓練並保護自己。我們仍想貫徹我們的公民權運動，但不是透過武器。我們握有武器只是為了民主。民眾敬重有武器的學生。我指揮的地區靠近八莫（Bhamo），那裡有掸族和克欽族社群……很多掸族年輕人也加入我們。

柯倪尼覺因此成了因一九八八年事件而變得激進的學生領袖之一。在二〇〇五年，他們形成了更有凝聚力的組織，名為「八八世代」（88 Generation）。這個爭取民主的團體和全民盟有很多目標是相同的，從理念和人員來看兩者也有大量的重疊，但是他們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團體。很多學生像全民盟成員一樣選擇流亡海外，往往是待在泰國，而不是留在緬甸加入少數民族民兵組織。最靠近緬甸邊界的泰國大城市，譬如清邁和美索，因此成為形形色色、規模愈來愈大的緬甸流亡團體的大本營。

一九八八年事件也從根本上動搖了軍政府——從那時起，它不僅要應付自獨立以來便一直在抗爭的少數民族武裝軍隊，現在還要應付龐大、有組織而且時而武裝的政治反對勢力。到了隔年，一九八九年，焦急又徬徨的新軍政府，找了一個常見的方法來解套（只是為了全身而退），宣布政府將舉行選舉，選出一個新國會。這個國會將起草並表決一部新憲法。軍政府不擇手段地削弱反對勢力在選舉中勝出的機會。全民盟的領導人們一概被逮捕入獄；翁山蘇姬在一九八九年七月被軟禁。軍政府也立了一條新規定，明定翁山蘇姬因擁有外籍配偶，不得參選總統。所有形式的選舉活動也一概被斷然禁止，而在現行的戒嚴法之下，超過五人的集會就屬於非法活動。偶爾會出現的政黨廣播，也要由審查人員事先核准。政府自然選了個黃道吉日當投票日，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七日，硬是內含了大量的幸運數字九。

儘管如此，全民盟以及到此為止依然廣受愛戴的領導者還是獲得壓倒性勝利。在四百九十二席次裡全民盟取得三百九十二席。投票率達百分之七十二·六。軍政府的代理政黨全國統一

黨 (National Unity Party) 取得大約百分之二十二得票率，僅次於全民盟，但是從席次來說位居第四，僅拿到十席。

對於嚴重低估全民盟聲勢——原因至今依然不明——的軍政府來說，這次選舉的羞辱是莫大的打擊。面對這無可爭議的不信任投票，軍政府乾脆拒絕召開國會，斷然撤銷選舉結果。

謹記一點，一九九〇年的投票不是一般意義的普選；它是為了選出一個國會來起草新憲法，所以全民盟並沒被否決掉治理國家的明確權力。不論如何，這場選舉清楚顯示了反對勢力的聲勢。藉著不召開原先承諾的國會，國家恢復法律與秩序委員會 (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這個軍政府重新包裝自身的組織，否定了全民盟在制定新憲法上有最大的發言權，否認它贏得壓倒性勝利所得的權利。此後直到二〇一〇年那場大體上是舞弊的普選，當局沒有舉行任何選舉。這期間，軍政府企圖用武力撲滅反對勢力，並自行發展出一套新的憲政安排。

因盛監獄

為了打壓全民盟，一九九〇年以降的二十年左右，它的領導階層大部分都被逮捕、入獄和嚴刑拷打。翁山蘇姬則出了名的被多次長期軟禁在她湖畔的老家，她幾次獲釋期間，也不准離開仰光四處遊走。二〇〇三年，她的車隊被精武幫暴徒攻擊，她險些喪命。

她的領導伙伴們受的磨難比較禁在家更嚴苛得多，共同創黨人溫丁就是一例。我在他權充住所的活動車庫和庫房裡和他見面，就在他二〇一四年過世的前一年左右，他享年八十五歲。溫丁的住處是一位友人兼支持者好意出借的，入獄多年後，他失去了家產和薪水，幾乎一無所有。溫丁坐在一張小椅子裡，周遭環繞的書籍和紙張散發著幾許學究的氣息，他回想煉獄般漫長的監禁歲月所有的得與失。

身為全民盟的創黨人之一，溫丁在早期——一九八九年七月——就銀鐐入獄，後來在惡名昭彰的因盛牢房坐了將近二十年牢。有人說溫丁是世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身為翁山蘇姬的親近同僚，在成立全民盟之前便長年寫文章批判軍政府不遺餘力，獄方挑上他給與「特殊待遇」；溫丁說他被扣上共產黨、強硬派、翁山蘇姬傀儡的罪名。於是，獄卒連同軍情局官員為了取他口供，想盡各種最惡毒最羞辱人的方法對付他。他大部分時間都被單獨監禁，只有在他愈來愈常被送往監獄醫院時才被准許見到其他獄友。溫丁在牢裡從沒獲准閱讀或書寫。有五年的时间他被關在軍情局所屬的特區，在那裡他被一而再地審問，但是時間間隔不一定，有時一天一次，有時一個月一次，好讓他失去時間感。「審判一開始，他們一連審問好幾天，想把我累垮，他們不讓我睡覺，給的食物也很少，」他回想，如果他的訊問者不滿意所聽到的答覆，而他們通常不滿意，他會被關到監獄內用來訓練阿爾薩斯狼犬搏鬥的地方。他被迫睡在狹小狗籠的地板上，周圍盡是經常嗥吠的狗。一回他忍受了整整七個月這種狀況。迫害他的人逼他宣布退出全民盟，與翁山蘇姬斷絕關係，並招認他有不可告人的推翻政府動機。他被承諾說，認

罪就會獲釋。他們還提供其他誘因，譬如說可以出國去。他一概拒絕這些哄騙誘惑，他告訴我：「我不能屈服，因為其他人視我為黨的領導而敬重我。」

二〇一三年我和溫丁交談時，他依舊一如以往的頑抗不屈。支撐他度過監禁歲月的那種正義凜然的頑強性情依然明顯可見。他習慣穿一件藍色囚衣，提醒世人雖然他獲釋，但還有很多政治犯仍被關在牢裡。他說著一口流利老練的英文，思想鋒利，在貓頭鷹般大的眼鏡後方的雙眸因好奇與投入而閃爍光芒。但是他的身體相當衰弱。他在骯髒的監獄醫療室動絞勒性疝氣手術時喪失了一顆睪丸，又因屢遭毆打缺了牙齒。他拒絕裝假牙。在牢裡他兩度心臟病發，但經常得不到醫療和國際紅十字會探視。

但溫丁自始至終未曾屈服。一回他把一份揭發緬甸當局對獄中囚犯種種虐待、刑求以及監獄惡劣環境的檔案寄給聯合國。為此緬甸當局又對他多加了七年刑罰。最後他得其所願，在堅持自己的主張之下，於二〇〇八年九月無條件獲釋，部分也是因為大赦。這是他戰勝政權的個人勝利，出獄後他馬上又回歸老本行，在報紙專欄寫文章譏諷掌權軍人及其暴吏。溫丁也成立一個基金會為前政治犯提供醫療協助。

多虧有充斥軍中監獄每個角落的小型竊盜及貪腐，這是溫丁在獄中得到的唯一慰藉。「只要你行賄，什麼事都行得通。」他回憶道：

獄卒很腐敗，什麼東西都收，食物或錢，收賄後會替你辦事，像是幫你帶話進來或帶

出去。每兩星期我們家裡會送食物來，然後我們把食物賣給監獄醫院裡的有錢人，有錢的囚犯一定住在醫院，住醫院可以免除日常勞務，這些有錢人會跟其他囚犯買糖、餅乾等等。如此這般賺的錢會流向獄卒，他們會偷偷把紙筆夾帶進來，所以我們至少能寫點東西。我們甚至弄了一台手提收音機……但只能在早晨或晚上聽一點英國廣播公司節目。

全民盟的另一個堅定分子是溫廷 (Win Hein)。我在二〇一二年見到他時，實在難以理解這位七十一歲老先生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是在牢裡度過的。他依然精神抖擻，幽默又開朗得不可思議，簡直看不出他曾經長期受監禁。他確實看起來春風得意，才剛獲選為全民盟新任的聯邦議會議員之一，在同一場壓倒性的補選裡，翁山蘇姬也獲選。

和丁武以及很多協助成立全民盟的人一樣，溫廷也是行伍出身，在一九七七年因被懷疑涉入密謀推翻奈溫而被迫退役。我和他在首都奈比多的一間政府分配給他的簡陋小屋外談話。溫廷是全民盟四十三位新科議員當中最年長的，他顯然對自己身為議會黨團的大老引以為樂。溫廷告訴我，在他做了一切犧牲之後，他的新身分是很好的報償。他自豪地告訴我，全民盟的新議員足足有半數曾經是「囚鳥」。溫廷曾入獄三次，前後共坐了二十年又兩個月的牢；從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從一九九六至二〇〇八年，以及再度短暫入獄，直至二〇一〇年獲釋。他在全國各地的五座監獄服過刑，其中包括因盛監獄。他回想，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情況尤其嚴苛，那一整段期間他都是單獨監禁，二〇〇二年之後他才獲准和其他囚犯同房。他經常遭被指

派來監視政治犯的一般罪犯獄友毆打和羞辱。他第一次坐牢時也被軍情局的人嚴刑拷打，而軍情局那一組人也密切關照過溫丁。

全民盟的女性成員也沒有被當局放過。就像先前描述過的，欽蕾在一九九〇年初在運作失常的仰光大學讀書，幾年後開始為翁山蘇姬工作。二〇〇〇年欽蕾陪同翁山蘇姬出訪仰光城外，之後便遭警方逮捕。她被關到因盛監獄幾個月。欽蕾和其他三名女性被關在不到八英尺見方的牢房。她們每天放風兩次，總共五十分鐘。欽蕾對軍情局人員的殘酷問記憶格外深刻：

我一連五天被訊問，我不能睡，必須坐在沒有靠背的高凳上一整天。我曾經從椅子上倒下。我可以進食，但不能梳洗，連上廁所都戴手銬。大部分時間我都被蒙眼。有些軍情人員訊問得很客氣，有些很粗魯。他們只想折磨我們……他們已經知道所有答案。進行訊問的都是男性，其他女性也備受威脅。我母親在我被拘留期間過世，但我沒被通知。

大鋼夾、公車和鈔票革命

當大部分的領導人下獄或被軟禁，很多幹部流亡海外或在泰緬邊境叢林躲躲藏藏，留下來維繫全民盟運作的人寥寥可數。這個黨被政府派的眼線和走狗層層滲透，進出黨總部——位於仰光中心搖搖欲墜的大樓內——的人無不被便衣警察密切監視。黨員冒著極大風險運作，他們

只能過著隨時要跑路的生活，老是設法在當局找上門前進一步離開。這些幽靈般的祕密支持者構成了全民盟的新世代。他們太年輕，來不及參與一九八八年的示威抗議，所以他們實踐政治良知的道路，通常和黨的前輩大不相同。確實，鑑於官方自一九九〇年代初以來對新聞和資訊的嚴密限制，不轉入地下活動也難。

拿奈基溫為例，他是全民盟新世代活躍分子裡最有才幹的人才之一。我在二〇一三年和他會面時，他才剛設立了該黨的第一個研究部門，以非常有限的經費在仰光市中心他那簡直家徒四壁的公寓裡運作。他負責協調一組同時也為資深的黨領導提供簡報文件的年輕團隊。該團隊的每個成員各自負責特定的主題，譬如環境或宗教自由。話說回來，奈基溫並非一開始就毅然決然投身政治，他這麼告訴我：

我在一九八〇年出生於仰光河另一側的瑞德(Twintay)鎮。我上學，想成為大學生成，但在一九九八年從高中畢業後，所有大學都關閉了。大學為何關閉呢？這是我頭一個政治疑問。在十八歲之前，我對政治認識不多，我只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像是一九八八年的事和翁山蘇姬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差不多就是這樣。我的家人給了我多一點說明，然後是一位女性朋友暗中給了我一份以緬文寫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她要我在私底下看，否則我會被逮捕。我看了，但因為是緬文寫的，我看得不是很懂。不過它讓我開始質疑很多事。

那文件說了很多緬甸在一九九〇年的狀況，奈基溫和他的友人認為，他們必須去讀聯合國人權宣言，那份宣言說，緬甸是個傳統的黨國體制，運作隱密。奈基溫有三兄弟，在那當時，他母親主張，三兄弟當中有一人應該幫助翁山蘇姬，而不管是誰去做這件事，經營家庭事業的另外兩兄弟都要給與支持。由於奈基溫才剛讀過聯合國文件，他被認為是最有資格替夫人——緬甸民間對翁山蘇姬的一般稱呼——當義工的一個。為換取家人的支持（不管花多少時間才能為國家帶來民主），他同意不分家產。這可是莫大的犧牲，因為他的家庭事業包括了錄影帶出租店和一座小型魚池，他的母親是護士。

問題是奈基溫要怎麼開始當秘密特工呢？他母親不知道全民盟的總部在哪，家人也沒人知道。因此奈基溫跟當地的茶館探聽，幸運的是茶館裡有人碰巧在全民盟從事社會計畫，考察營養不良孩童的相關事宜。就此奈基溫加入了全民盟每兩週一次的讀書會，丁武也是這讀書會的成員，後來成為奈基溫的再生父親；而這也是奈基溫真正的政治教育的起點。他也在全民盟總部上英文課，同時也因此開始被監視那大樓、不是那麼秘密的祕密警察盯上。他也曾經被送到英國文化協會去多學一點英文。

自此以後，連同全民盟的一小群網絡，奈基溫努力不懈地把訊息傳遞出去，同時持續把全民盟的訊息帶到大眾面前。這麼一來，他可說是發動了三種革命：

首先是大鋼夾革命。我們的任務是把全民盟的聲明和傳單夾到從仰光民眾的公寓裡垂

下來的大鋼夾上。我們每天在入夜後進行，因為缺乏經費，有時候我們頂多只有五十張傳單。我們沒有印表機也沒有電腦，有時候這些傳單是手寫的。

接著也有公車革命。我們兩人一組，上公車後會開始聊起全民盟和一些政治事件，我們會假裝是從收音機聽到新聞，讓民眾聽到我們的談話。有好幾次我們被祕密警察和線民制止，但我們會說我們只是從收音機上聽來的。

還有鈔票革命。我們在緬元鈔票上寫字，然後把鈔票給店家來散布消息。有時候我們會被警察制止，但我們會說不知道那鈔票是從哪裡來的。

長久以來這段時間，奈基溫的生活很不安定，也過得很拮据，往往餐風露宿，在火車站或夜市過夜。奈基溫說，假使他可以躲到朋友家裡，他會住到仰光鬧區較富裕的區域，「因為那裡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或中國人，他們不涉入政治。」因此在這裡他可以躲過線民，相對安全。

奈基溫曾經有三次幾乎被逮捕的經驗，而且他在二〇〇八年被控與緬甸民主之聲這個流亡海外的反政府新聞組織有聯繫。於是他再次跑路，這一回他染了頭髮，做龐克打扮，好讓警方認不出來。自此他在全民盟的主要工作，是仰光監禁的領導人和流亡海外的領導人之間的聯繫橋樑，因此他終日待在鬧區的網咖裡。他和網咖老闆熟識，老闆讓他在那裡辦事。當警察問奈基溫為什麼老待在網咖不走，他說他家裡全是女人家，他又失業，所以在家很無聊，晚上也不

想回家。在翁山蘇姬最後一次被軟禁期間，就是奈基溫設法每兩個星期把她的訊息帶出去給全民盟的流亡組織。他是信使，與外界不可或缺聯繫者。

至此，他已將人生的十年獻給翁山蘇姬和全民盟，但卻從未見過夫人本人。翁山蘇姬最後終於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初獲釋，兩天後奈基溫總算被帶到茵雅湖畔那棟有名的屋宅裡與她見面。那不是個感傷的會面，他並不想跟大多數人一樣與她合照，而她也只想著手進行振興全民盟的工作。她似乎對全民盟的現況所知不多，奈基溫回想，她當時只知道該聯盟相當困頓。「把這個黨建立起來非常重要。」他記得她這麼說。

隨著夫人獲釋，隔年全民盟再度以完全合法的政黨開始運作；奈基溫從事地下活動的生活告終。二〇一二年，在他發起之下，以及更年輕學生和政治活躍分子的一支生力軍幫助下，他著手成立全民盟研究部門，這一回是公開的運作，不受任何限制。最初鼓舞他為全民盟效力的母親，辭掉護士的工作，也結束掉家裡錄影帶出租生意，全心全意要為全民盟奉獻。她目前是他們家鄉當地全民盟資訊部主任，所以奈基溫的兄弟會開玩笑地抱怨道，這下他們兄弟倆得要金援家中兩個政治激進分子，「不過這總比沒有民主好」，他們說。

然而，自二〇一〇年以來緬甸的進步是否稱得上真民主，在這家庭裡尚有爭論。最初的想法是兄弟們會在金錢上做奈基溫的後盾，直到民主到來。目前奈基溫領半薪，從這一點大概可以準確地衡量緬甸的民主目前已達到哪個程度。

反擊、報復和佛教

那些長期被監禁的全民盟領袖如何撐過苦難，且又如何精神奕奕地崛起復出？而且更了不起的是，我訪問過的那些全民盟的出獄成員——往往被關了十或十五年——少有人萌生對關押他們、對他們嚴刑拷打或橫加羞辱的人施以報復的念頭。想必他們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做到克制自己。他們如何化解這些情緒，為何他們似乎不把報復放在心上，不像世上其他地方獲釋的異議分子那樣？

溫廷告訴我，他的佛教信仰讓他「省去」對獄卒的報復念頭。自二〇一二年當上奈比多聯邦議會議員之後，溫廷經常會遇到軍政府裡當初下令逮捕他入獄的人，譬如內政部長。但溫廷平靜地說，他試著不對他們生氣，他只是打打招呼便錯身而過。溫廷告訴我，這是他佛教修行的一環。報復、反擊的欲念來自憤怒和憎恨，他說：「憤怒就像火，它會吞噬你，你自己本身也會受苦。」像他這樣的犯人已經吃夠多的苦，是往前邁進的時候了。

欽蓄的說法也很類似。「我們被凌遲折磨，」她說，「但我們現在是自由之身，我們在精神上自由的。他們（軍方）將備感威脅，他們是精神上被監禁的人。」她提到佛教善業與惡業的因果報應：「惡有惡報，所以丹瑞死後將會受苦……絕對會受苦。業因會形成果報，所以丹瑞以及他那類的人自然要承受果報……他們屠殺僧侶會有劫難。」

溫廷說，全民盟裡沒有哪個做過牢、被嚴刑拷打的人想對迫害者展開報復，沒人想控訴加害者或把他們送上戰犯法庭。然而，是堅忍不拔的溫廷有過人堅強的意志？也許是，但全民盟其他被關過的人也和他態度一致。拿邁舒（Myat Thu）來說，邁舒和溫廷是兩種人，年輕得多，心思縝密，看起來有點虛弱。他因激進的民主思想而入獄兩次，頭一次在二〇〇〇年，關了兩年七個月，第二次入獄是二〇〇八年。最後在二〇一一年五月標示登盛改革起點的第一波大規模釋放政治犯期間獲釋。他也曾被關在因盛監獄，後來被移往緬甸內陸深處的叢林裡監禁。

邁舒告訴我，那裡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牢房裡是泥巴地板，他必須睡在竹蓆上。昆蟲和蛇經常從屋頂掉下來。邁舒被一連單獨監禁六或七個月；在一連串暴力訊問後他喪失部分聽力，後來還有心臟方面的毛病。但邁舒表示，他無意報復。獲釋後，他致力於為緬甸打造更好的民主，在二〇一二年四月的期中選舉擔任非官方的民意測驗專家。他也回歸學術研究，贏得享譽盛名的獎學金，前往倫敦政經學院研讀政治學。他後來協助創建仰光政治學院（Yango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對這主題，丁武談得最激昂。雖然他被關在因盛，但是身為軍方的前領導人，他入獄期間所得到的待遇比大多數人好。他被單獨監禁，沒有書可讀，但他有兩個小房間，一間臥室和一間會客室。丁武在一九七〇年代頭一次入獄獲釋後，曾出家為僧的兩年，這段期間對他格外有幫助。「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打坐。」他這樣跟我說。丁武仍堅決認為，全民盟不該對迫害者施以任何報復，也不該鼓勵任何人用暴力對抗緬甸軍政府領導人。因為這正是全民盟和其他反對

者最大的不同，丁武這樣跟我說：

我們的政策打從一開始就是放棄暴力，也不以任何武裝抗爭當做政策工具……如果我們為了進行某種報復而燃燒，我們成就不了任何事。民眾就會說全民盟和軍方人馬沒兩樣。我受盡折磨失去很多，但我們不尋求報復……我們從不那麼想。人民必須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拋開過去的恩怨……只要能看到我的國家再度享有自由，我就感到很欣慰。我們想為人民重拾和平與和諧。

從這一點來看，丁武和翁山蘇姬秉持的非暴力信念不謀而合，而翁山蘇姬的信念乃承襲印度解放英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思想與實踐。翁山蘇姬在印度求學時曾仔細鑽研甘地的著作，她身為全民盟領袖的各種作為也深含甘地思想。

話說回來，在緬甸並非人人贊同丁武和翁山蘇姬的非暴力主張。有人爭論道，用這種謀略對付印度的英國人是一回事，不過英國人可以離開印度一走了之，不用收拾他們留下的爛攤子，而他們最後也確實這麼做。但是緬甸將軍們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們無處可逃，所以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不擇手段緊抓權力，流血鎮壓在所不惜。照這樣推算，非暴力主張的道德力量在他們的反對者眼裡沒什麼說服力。直到今天，很多少數民族民兵組織告訴我，他們和全民盟的主要差別，是主張暴力抵抗與和平主義之間的根本歧異。

丁武和溫廷這類人不生報復心的佛教信念，肯定有助於二〇一一年起緬甸的政治轉變。緬甸不會有格達費 (Muammar Gaddafi) ② 式的黑幫處決，也不會有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③ 式羞辱人的審判，即使全民盟最終在這國家完全執政。多半也不會有柬埔寨審判前赤柬領導人的那種一拖拖了數年、耗費一個長期貧困國家數百萬美元的仲裁庭。西方有些人對丹瑞及其心腹「無罪開釋」的可能性非常憤慨。但是有同感的緬甸人並不多。他們只想往前走。

我和全民盟一位活躍分子討論過這一點，他把緬甸情況和解除種族隔離後的南非做比較。曼德拉領導的黑人占大多數的新政府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撫平少數白人五十年殘暴統治所留下的傷痛。這位全民盟人士觀察到，這個委員會大體上被認為相當成功，是因為它僅僅聆聽證詞：它不對行兇者提告也不判罪。「關鍵在於，」他指出，「寬恕，而不是遺忘。我們埋葬苦澀的過去，為了更美好的未來。」這是全民盟對於緬甸的轉變最令人欽佩也最了不起的貢獻。

溫丁這位直到過世始終穿囚衣的前輩，則不像其他人那麼信服棄絕所有報復式正義的意念所帶來的好處。他「一個人對軍政府及將軍們沒有怨恨，」他告訴我，但他不會原諒軍政府做為一個體制對緬甸人民所施加的莫大苦難。他認為太多人——尤其是全民盟的偶像翁山蘇姬——太輕易就原諒軍政府。軍政府的種種惡行，溫丁堅決地說，不應該那麼輕易就被掃到地毯底下，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他堅持「那些將軍們必須懺悔，必須向人民道歉」。如果他們做不到這兩點，就不能真正改變政策去打造一個民主的緬甸，那麼他們就該被送到戰犯法庭。

此外，溫丁也深刻洞悉了五十年左右的獨裁軍事統治，對緬甸人民以及對全民盟本身所造成的影響。二〇一三年在緬甸經歷磕磕絆絆的轉變之際，溫丁與我的言談中告誡說，人民一般而言低估了軍方數十年來思想控制的後遺症。在學校裡持續進行的洗腦和緬族化，所有白色、黑色和棕色政治宣傳，已經腐蝕了緬甸人民對獨立與自由的感知。

「我們就像牛，」溫丁聲稱，並繼續毫不退縮地指出，這種態度從人民對翁山蘇姬毫不質疑的服從最明顯可見，而這不論對她本人或她的黨都是一種傷害。溫丁察覺到沒有人敢質疑翁山蘇姬，或自願說出與她相反的意见。「我們在軍人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年，人民現在習慣不在前輩面前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說：「這種態度是對權威人物的一種尊敬，是緬甸長期獨裁專政的結果。」他注意到，全民盟裡幾乎沒有任何有關於憲法或其他嚴肅議題的討論，人人等著夫人發表談話。「這對全民盟不好，對於民主和緬甸也是壞事。」溫丁堅信，全民盟成員應該維持一種激進的態度，永遠要挑戰和質疑權威，不管它以任何形象或形式出現。唯有如此緬甸才能開始有真正的民主。「我們不是牛，」他敦促，「我們應該要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

② 編註：前利比亞軍事獨裁者，統治利比亞達四十二年。二〇一一年利比亞爆發內戰，格達費遭反政府軍逮捕身亡。
③ 編註：前埃及總統，統治埃及達三十年，二〇一一年埃及爆發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被迫下台。

第八章 來自上層的改變

一九八八年的血腥鎮壓劇烈改變了緬甸的政治與經濟版圖。儘管軍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大刺地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之後還對全民盟及其他反對團體展開無情打壓，但它還是開始改變路線。最明顯的是，奈溫政府的繼任政權「國家恢復法律與秩序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簡稱恢委會)，放棄了具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展開它邁向憲政體制的所謂「七步路線圖」(seven-step road map)，也就是丹瑞將軍後來描述的「有紀律的繁榮民主」。隨著經濟崩壞，深得民心的一場起義革命處處帶來威脅，緬甸政府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走進了死胡同。改變方向的時候到了，只不過改變的同時也要盡可能對反政府人士做出最少的讓步。

自一九九〇年代初以來軍政府本身也深信朝改革的方向走是有效的，有這一點認知很重要，當我們想要理解之後所發生的一切。在改革總統登盛手下的準文官心裡，他們只不過是貫

徹丹瑞前政府所發動的變革罷了。而登盛唯一令人吃驚的地方，是他大幅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出乎眾人意料。從這一點來看，最近幾年的政治變革始終是由軍政府發動與執行、從上而下的施為——加上在後來的階段裡有翁山蘇姬的重大參與。對整個改革歷程來說，這有利有弊。最重要的是，這讓緬甸的變革完全不同於來自「人民力量」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歐洲共產勢力的式微、印尼總統蘇哈托 (Suharto) 及菲律賓總統馬可仕 (Marcos) 下台等，例子不勝枚舉。

裙帶資本主義

首先拿經濟來說。奈溫在恢委會——後來在一九九七年重新命名為「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Party)——裡的後繼者一開始掌權，便開始走回具緬甸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集中化官僚經濟。許多法律被引用來清出空間，以便再度引入有限的幾家私人企業和市場經濟。自一九六三年以來新的第一家民營銀行在一九九二年設立，到了二〇〇二年，另有二十一傢陸續開業。「緬甸農業暨鄉村發展銀行法」(Myanma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nk Laws) 原本應該架構一個適當的體系首度進行農村信貸。新的中央銀行也成立了。外國投資亦受到鼓勵，特別是從亞洲來的外資。泰國、新加坡和日本資金開始流向緬甸。在一九六三年國有化之後落入政府手中的破敗老飯店和其他地產被拍賣，由外資接手重新修繕。譬如說仰光殖民時期老飯店河濱飯店，軍政府接收後幾乎被棄置任由崩壞，而今經過一

番整修改造，已在一九九二年重新開幕。

無論如何，沒有人會把這新的經濟版圖誤認為西方式的自由市場體系。它比較是裙帶資本主義的一個例子，甚或軍隊資本主義的例子，因為在一九九〇年代設立的新銀行或企業幾乎都由執政將軍的親友經營或擁有。有時候它們甚至直接屬於軍方本身，透過它剛成立的控股公司來操作。這是企業獲得經營許可的唯一方式，而新企業也被期待要回饋給政府並聽命行事。

這無疑是緬甸銀行才有的情況。尚恩·特尼爾對此有深入的研究。在一九九〇年代初以後創立的大型民營銀行，其中最著名的兩家，妙瓦底銀行 (Myawaddy Bank) 和英瓦銀行 (Innwa Bank)，就是直接屬於軍方的控股公司。妙瓦底銀行的董事長通常由資深軍官擔任，也是恢委會／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的成員。同樣的，英瓦銀行也隸屬於軍方的控股公司「緬甸經濟公司」。其餘較大型的銀行也通常是跟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關係密切的商人所創設。甘勃薩銀行 (Kanbawza Bank) 就是其一，一九九四年由翁科溫 (Aung Ko Win) 創立。

因此，這些銀行當中的一些被認為密切涉入政府人士洗錢和毒品走私的活動。譬如說緬甸五月花銀行 (Mayflower Bank) 很可能是把第一台自動提款機引入緬甸的銀行，不過這家銀行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罌粟花銀行」。很多這類銀行也密切涉入軍政府的威望計畫，譬如建設丹瑞的新首都奈比多。

在這段期間竄出頭來的其他一些工業集團，譬如成立於一九九二年的亞洲世界集團，也和政權過從甚密，有時還涉入毒品交易。譬如說亞洲世界集團的創始人是羅興漢，二〇一三年七

月過世的華裔果敢族人 (Kolang)。他一度握有私人的民兵部隊。亞洲世界集團取得擴建仰光機場的合約，也參與了好幾項更具爭議，由中國人主導的水壩計畫。另一個有名的集團是大緬甸集團 (Max Myanmar)，是名為擊擊 (Zaw Zaw) 的大亨在一九九三年成立，他與軍方的關係眾所周知。拜他軍方友人之賜，大緬甸集團取得了大量的奈比多營造工程合約。

這相當特殊的一種裙帶資本主義，對這國家帶來許多不利後果。最明顯的是，它主要是為緬甸社會頂層的一小群人營造利益，其他人很少分得好處。譬如說，儘管有大量新成立的民營銀行，但貸款利率對一般大眾來說仍是高得負擔不起。因此直到二〇一〇年，只有一成的緬甸人有銀行戶頭。再者，無數的新銀行和企業與軍政府過從甚密，有涉及洗錢或其他不法行為之嫌，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它們幾乎都受到美國及西方制裁。在我執筆之際，很多仍在制裁中。

此外，大部分的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都由前任甚或現任軍方人士所管理，因此這體系嚴重缺乏專業人才來有效經營。監管上相當鬆散也是另一大疏失。種種一切導致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嚴重的銀行業務和金融危機，差一點（再次）全面拖垮經濟。那次的危機是由銀行擠兌的經典事件所觸發，起因於民眾的不信任——而這很可以理解，導致流動資金危機和貨幣短缺。它也衝擊實際的經濟面；商家破產，員工失業好幾週或好幾個月。即便到了二〇一一年登盛改革之初，這國家幾乎還沒有復原。這次的危機也澆熄了進一步經濟改革的熱忱。在二〇〇三年之後，經濟的重建幾乎原地踏步。

管制仍多於民主

比起一場手忙腳亂的經濟改革，軍政府對自身的政治改革則順利得多。早在一九九二年，恢委會召開了「制憲大會」，試圖發起一場對緬甸政治前途的廣泛討論。全民盟最初也參與，但在九九五年退出。這過程後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直到二〇〇四年恢委會推行的「七步路線圖」才重新啟動。

這路線圖提出了很明確的一系列步驟來達到新的政治安排：重新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有紀律的民主」；起草一部新憲法；透過公民投票來落實憲法；辦理立法委員選舉；召開新國會；以及成立新政府和其他的憲法機構。據緬甸官員表示，這整個進程按照允諾在執行。制憲大會像街頭表演一樣在全國各地舉行蒐集意見。公民投票在二〇〇八年舉行，就在納吉斯風災過後；而納吉斯風災軍政府之所以救災不力，原因之一是它當時的全副心思都在辦理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為制憲大會網羅的意見正式背書。二〇一〇年舉辦了普選，選出新國會。接著在二〇一一年，丹瑞領導的軍政府下台，新選出的民主政府和新總統登盛上台。順便像是給紅利似的，二〇一〇年選舉結束後，翁山蘇姬終於從最後一次軟禁獲釋。

因此，「民主路線圖的每一步都有實現。」李昂·德·瑞德瑪登 (Léon de Riedmatten) 二〇一三年跟我說。在整個二〇〇〇年代早期，德·瑞德瑪登在緬甸工作，服務於聯合國及其他

國際組織，跟軍政府有頻繁而密切的往來。「所以，那一切沒有什麼好吃驚的，全都計劃好了。毫無疑問丹瑞是現有的民主建築師。」只不過，德·瑞德瑪登繼續說，這是一強加的民主，沒有來自人民的任何貢獻。沒錯，這強加的「有紀律的民主」的最大特色，是軍方的主導地位在新憲法裡被鞏固了。最明顯的是，國會的下議院有整整四分之一的席次保留給未經選舉的軍官，而且新憲法第四百三十六條規定，修改憲法需要獲得百分之七十五的贊同票，這有效地讓國會的決策權仍牢牢掌握在政府軍手中。

軍政府支持者認為，這做法堪稱健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憲法也有類似的條文，然而這些國家壓根不是良政善治的榜樣，更別說民主。可以確定的是，這做法清楚顯示，打著民主的新幌子，政府軍事實上一心要維繫它的權力。此外，二〇〇八年的憲法也進一步確立軍方在國內的地位。新憲法甚至授與軍方更多的合法特權，結果政府軍簡直成了國中之國，公民權力機關根本管不著。

除此之外，最惡名昭彰的是憲法第五十九F條。對翁山蘇姬格外反感的丹瑞，很可能把這一條非常有針對性的條文加到憲法裡，特地攔阻他最忌憚的、當時仍被軟禁的敵手的政治抱負，因為憲法第五十九F條明令，任何人如果配偶或子女為外國公民則不得參選總統。翁山蘇姬已故的丈夫麥可·亞里斯是英國學者，她的兩個兒子也在英國出生，持有英國護照。翁山蘇姬深受人民愛戴，她的黨很可能會在二〇一五年末的普選中大獲全勝。^①不過總統是由國會議員提名選出的。要不是第五十九F條款，新選出的全民盟議員無疑會迅速把翁山蘇姬推上總統

大位。照現在的情況，根據二〇〇八年憲法，這情節不可能發生，到二〇一五年大選前的幾年之間，軍方的國會議員始終頑強地拒絕修憲。

譬如說，在二〇一三年中，幾個月的運籌帷幄之後，由一百零九位成員組成的一個負責就修憲一事收集民意的委員會^②，發表了一份報告，聲稱大多數緬甸人都反對修改該條款。軍方代理政黨鞏發黨的議員主導的這個委員會宣稱，總共收到兩萬八千封對憲法的修改提出意見的信件，不過足足有十萬名簽署人反對修改不管是第五十九F條款或軍方百分之二十五保留席次條款。相反的，據稱僅有五百九十二人支持修憲。對此結果，全民盟當然強烈質疑並大表抗議，但它證明了軍方鐵了心要緊緊抓住丹瑞遺留給他們的所有護身符。

這是由上而下的變革的後果。新憲法也許對反對黨和民主做出些許讓步，但它仍留下獨厚軍方的政治體系。有一說也同樣貼切，軍方很多人認為緬甸的變革於二〇一一年告終，因為二〇一〇年的選舉以及登盛坐上總統大位，是實行有紀律的民主的最後一程。此後所發生的一切，直到走筆至此為止，對緬甸很多當權者來說，只不過是惱人又無關緊要的尾聲。

當然，新憲法起草的方式，也很不被全民盟及其擁護者接受。全民盟拒絕參加二〇〇八年新憲法的全民公投，以及二〇一〇年的選舉。但是這項決策使該黨起內訌，有些人主張，反對

① 譯註：全民盟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的大選中贏得國會百分之八十的席位。

② 譯註：國會議法檢視共同委員會。

勢力必須把握任何機會對當局表達異議，不管機會多麼渺茫。從全民盟分裂出去的派系，自稱為「全國民主力量」(National Democratic Force)，選擇參加二〇一〇年選舉，並贏得十六席。其當選國會議員被全民盟裡很多人視為背叛黨的原則，始終沒得到諒解。

其他政黨大部分都有在二〇一〇年選舉角逐席次。掸族民主黨贏了五十七席，排全國第三。儘管如此，少了來自全民盟的競爭，當局無所不用其極地把其他幾個少數民族政黨排除在選舉之外，官方媒體也不報反對黨新聞，結果軍政府剛成立的代理政黨羣發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它在國會下議院贏得百分之五十九的席次。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軍方保留席，這使得政府在新國會裡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四的席次。果然有紀律。

參加二〇一〇年選舉的那些反對黨和少數民族政黨人士相信參選是值得的。很多人認為，儘管有那些明顯的限制，反對政治的「空間」(他們偏愛這用語)已經變大，在新國會裡政府有時甚至願意聆聽他們說話。掸族民主黨這個最大型的少數民族團體有個成員認為，儘管選舉不公，但是他的族人現在「有時間和空間來準備」二〇一五年的下一場選舉。全國民主力量也極力主張要有耐心。他們的領導人欽茂瑞(Khin Maung Shwe)曾被軍政府關了十六年，他告訴我：「我們在街頭進行了那麼多示威抗議，都沒有結果。所以我們現在改到國會裡進行抗爭。」雖然有選舉，奈比多堡壘中的閉塞政府仍然不願與異議者對話，更別說像全民盟這般的政敵。它在真空裡進行改革。在軍方和政府圈內人這利益共同體之外，緬甸少有人(或外國人)會認真看待他們口口聲聲的改革，沒有人相信會有實質成果。無論如何，還是有一些人努力讓

政府跟可以真正帶來改變的人對話，如果奈比多有人願意聆聽的話。

第三勢力——走出死胡同

荳荳溫(Hla Hla Win)一九八一年生於仰光。她在城裡最出色的高中之一受教育，換句話說，她幾乎什麼也沒學到，但是她生來聰明、有企圖心、意志堅定而且口才便給。她設法贏得獎學金，出國到愛荷華州的威廉潘大學(William Penn University)就讀。因為在自己的國家裡沒有讀書的機會，套她的話說，她是個「飢渴的學生」，除了主修之外還「副修」一大堆科目：語言、閱讀、教育等等。她在二〇〇〇年代中期返鄉，「想要改變緬甸」，把她在國外學到的知識運用出來，幫助她的國家。

但要怎麼做呢？就像她那一代的很多人，年輕到沒參與一九八八年的示威活動，也沒有被捲入對全民盟和翁山蘇姬的狂熱中。她回國那當時，全民盟似乎也沒什麼成就。政局陷入死胡同，軍政府和全民盟雙方僵持不下，氣氛低迷。眼看家鄉的政治情勢顯然毫無希望，她很多出國讀書的友人索性長住國外。有那麼一陣子，這樣似乎才是正確的決定。荳荳溫連同幾個回到國內的友人，努力找合適的空缺和機會卻遍尋不著。然而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她遇到奈溫茂(Nay Win Maung)這位改變緬甸的重要推手之後，一切就此改觀。

當時奈溫茂四十六歲，是位聰明又能言善道、菸不離手的熱情記者和政治激進分子，畢業

於仰光大學醫學系。他熱中於他的工作，菴菴溫回憶道，「但對金錢和政治不感興趣」。奈溫茂二〇〇四年在耶魯大學修過四個月的課。一些與他密切共事過的人，形容他很會激發人，但也很偏執。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發行兩份週刊，一份是商業期刊《活出色彩》(Living Color)，另一份是《發聲》(Voice)，然而他的主要活動，是運作一個他在二〇〇六年與另外六人創立的組織，名叫「緬甸出路」(Myanmar Egress)。

這個智庫——找不到更好的說法來描述它——本來是像菴菴溫那樣對緬甸的政治僵局感到挫敗和破滅的人的教育場所。眼見政府這一端持續不斷打壓，而另一端的全民盟頑強固執，他們想另找一條路。因此「緬甸出路」以及類似的團體成了緬甸政治的「第三勢力」。該組織的名稱「出路」便表明了這七位創立者想達到的目標，在希臘文裡，Egress的意思是找「出路」，為政治僵局找出路。

打從一開始，「緬甸出路」就有取巧的成分。其真正的目標是要在國內擴大討論與對話的政治空間，進而試圖改變政治體系。不過就如其中一位創始人告訴我的，「緬甸出路」更溫和地把自己宣傳為「能力發展中心」，避免招惹軍方起疑。因此它公然以教育為使命，開設諸如領導、經濟、社會企業精神、公民社會和憲政模式比較為主題的課程。這些都明白無涉政治本身，不過上課的人都可以用來檢視和思考政治。「緬甸出路」的辦公室和破敗的塔瑪達(Thamada)飯店共用一棟樓，在仰光鬧區上緣一帶。那裡有個小圖書館，堆放著直接影印製成的書(原版書在將軍們治下的緬甸大半不可得)。其中一間主要教室以傅尼凡為名表以紀

念。菴菴溫後來成為「緬甸出路」英語教學的首號人物。這就是她一直在尋覓的機會。

就像拉茂瑞(Hla Maung Shwe)、「緬甸出路」的七位創始人之一，告訴我的，「我們想改變國家；想發展技術與能力來建設國家。」不像全民盟否定二〇〇〇年代中期至末期軍政府的所有改革徵兆——「七步路線圖」和二〇一〇年選舉——「緬甸出路」準備要利用任何機會來改變緬甸，不管發起變革的一方有多麼不靠譜。他們的信念是，政府給的任何東西都要加以利用。倘若他們參與軍方所發起的憲改進程，他們起碼能夠多少朝正確的方向去影響它。因此，拉茂瑞記得，他們都很清楚，譬如說二〇〇八年的憲法一點也不民主，但是他們可以運用該憲法的條款在二〇一〇年參選，進而有所作為。「如果你徹底拒絕它，」他說，「那麼改革的路將會很漫長。」

拉茂瑞和「緬甸出路」的其他負責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是唯一一個先前在全民盟入黨過的人。他也曾入獄一年多。其他理事基本上是學者和/或商人。後者提供這新組織一些創業資金，外國一些基金會也會給與資助。眼見自身在國內有發揮的空間，「緬甸出路」也想和流亡海外的廣大社群建立聯繫。就目前來說，緬甸中產階級子女很多都留學海外，大多數不是前往美國——而且哈佛大學的緬甸高材生多得令人刮目相看——就是清邁。和「緬甸出路」或其他第三勢力組織有來往的人很多以泰國第二大城為基地。「緬甸出路」想要好好運用這些大量的傑出人才來重建這風雨飄搖的國家。到目前為止，一些流亡海外的人，甚至是直接受到一九八八年的民主抗爭感召而變得激進的人，就跟留在緬甸的人一樣對政治僵局感到困頓。

譬如翁乃烏 (Aung Mying Oo) 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八八年的屠殺發生後，他逃到叢林裡，後來在清邁成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他在哈佛大學讀過書，取得公共行政碩士學位，因此成為人稱「哈佛幫」的關鍵人物，這是個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組成的團體。然而在二〇一一年初我與他見面時，他早已放棄早年想法，不再支持西方對將軍們的制裁或其他懲罰性行動。他告訴我，制裁只會孤立這國家，「這國家愈孤立，將軍們及其家人愈能隻手遮天控制一切。」至於全民盟，他認為翁山蘇姬的「抵抗是走入政治的死胡同，對緬甸沒有幫助」。如果一九九〇年選舉後反對黨與軍政府談判協商，他認為「緬甸現在會更靠近民主一步」。他和很多同儕一樣，認為要有新做法才是。

「緬甸出路」無疑讓政府起了疑心。軍情局的人時常出入他們的場所進行刺探，甚至在一些課堂上錄影蒐證，不過顯然不覺得那麼有威脅性。因為重要的是，雖然「緬甸出路」的負責人很清楚他們的任務是要軍政府改變，不過像奈溫茂這類的人本身就是軍人子弟，得到軍方一定程度的庇護。

奈溫茂的雙親以前都在國防綜合大學擔任教師，該校位於英國從前的山城彬烏倫，而他也在那出生。因此他雙親教過大部分的緬甸軍事領導階層，尤其是在二〇一一年之後帶領民主改革的那一代將軍：登盛、瑞曼 (Shwe Mann) 和翁敏。他們都知道奈溫茂是他們敬愛的老師的兒子。菴菴溫告訴我，光這一點就讓將軍們和「緬甸出路」的負責人之間「建立了信任」。奈溫茂因此成了可以上達軍政府的一座重要橋樑——一名改革者，卻又是將軍們會信賴的人。他

是「居間人」，套菴菴溫的話說，「沒人像他這麼交遊廣闊」。

即便如此，將軍們發現老師的兒子現在也對他們施教只能算是機緣巧合。二〇〇七年，奈溫茂在他的雜誌上發表了一些在政治上相當敏感的議題，結果遭軍情局的人逮捕。軍情人員搜索他的辦公室，把他的電腦和許多文件帶回總部去仔細查看。當局若以為會發現顛覆政府行徑的證據，那就錯了。事實上，奈溫茂的兩篇關於政策的文章，事後證明非常有建設性。它正是孤立多年後焦急地想往前走卻又一籌莫展的政府可以好好運用的東西。用他同事欽孟薩 (Khin Moe Samn) 的話來說，「幾天後他被放出來，但他們（軍方）要他繼續寫這一類的文章，並暗中把這些文章帶給政府，但不能張揚。」軍政府自然不想讓人知道他們竟從外部聽取建言，何況還是從非政府組織。

當局對奈溫茂的想法感興趣的主要人物是瑞曼，瑞曼在二〇一一年之後嶄露頭角，成為登盛政府裡最大膽的改革者。瑞曼在一九六九年自國防綜合大學畢業，在官校裡他被「緬甸出路」負責人的雙親教過，後來逐級高升，在一九八八年升為少校，二〇〇三年官拜將軍。到了二〇〇七年，他是政府軍的參謀總長，軍政府的第三號人物。

瑞曼發現「緬甸出路」後，他的么兒翁奈曼 (Aung The Mann，以瑞曼哥語 [Shwe Mann Ko Ko] 為人所知，生於一九七七年)，擁有緬甸少數幾家無線供應商之一，後來便被父親指派進行一項棘手任務。他低調地到「緬甸出路」上課，學習政治結構和經濟政策等改革政府可以派上用場的課程。這成了「緬甸出路」和其餘的公民團體向政府傳遞意見很重要的一扇後門。

此後，「緬甸出路」被核發教學和演講執照，得以講授更多之前被視為具爭議性的主題，與此同時，他們的建言也愈來愈被政府內傳說中的改革派所採納。當二〇一〇年全民盟杯葛選舉時，「緬甸出路」急切地擁抱它視之為介入政治、改善政治的大好機會。他們提供更多明明白白談政治的課程給那些想在二〇一〇年參選的人。很多要角逐國會席次的少數民族政黨爭先恐後到「緬甸出路」來，上公共政策、市政學、政治領導統御等等很多其他課程。「緬甸出路」宣稱，在選前的起跑過程裡，總共培訓了一萬名人士。軍情局肯定起疑，又前來仔細打探「選民教育」課程為何物。

全民盟裡很多人特別批判「緬甸出路」攀附執政黨，或用荏苒溫的措辭，「巴結執政黨」，縱容政府打著改革之名，卻無改革之實，還給了它一層可敬的虛飾。很多人認為二〇一〇年的選舉是個陷阱，目的在引誘警覺心不夠的反對人士，讓實際上只會被軍政府用來當橡皮圖章、並內建了一個軍人占大多數的架構的國會變得合法。荏苒溫收到海內外的緬甸人寄來的恐嚇電子郵件，指控她背叛理念、忘了初衷等等。她不為所動，把它視為政治走極端會變得多麼危險的另一個遺憾的例證。話說回來，這小女子也是有過人的膽識才挺得住。

所幸，「緬甸出路」不僅有奈溫茂這座接通軍政府的橋樑，還有茂睿 (Maung Shwe) 這座接通全民盟的橋樑。這位翁山蘇姬的前黨員保證，儘管彼此立場對立，但是「緬甸出路」和翁山蘇姬及全民盟從來沒有完全斷絕往來；她在二〇一〇年從軟禁後獲釋後不久，大家還不期而遇，氣氛融洽。二〇一〇年選舉後，「緬甸出路」負責人還與登盛、前海軍上將及改革派部長

梭登以及瑞曼公開見面。這些部長積極聽取意見，熱烈談論如何建設國家，如何重建緬甸崩壞的經濟，以及如何開始與反對勢力展開政治對話。

茂睿了解，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必須與國際社群合作，而要贏得國際支持的關鍵，在於贏得翁山蘇姬的支持。因此在他居間穿梭協調之下，登盛與翁山蘇姬在二〇一一年八月有了關鍵性的會面。在奈比多，翁山將軍的肖像下，先前敵對的兩人握手合影。兩黨都沒有對外說明確實達成什麼共識，不過可以篤定地推斷，登盛提出了讓全民盟合法化並釋放政治犯等其他政治改革的承諾，以換取翁山蘇姬承諾會促使西方政府解除對緬甸的制裁，終止緬甸在外交和經濟上的孤立。這次會面啟動了改革歷程，使它成了跨越政治分歧、真正基礎深厚的一場運動。促成這場會面可不是個簡單任務，有翁敏和梭登在政府內部為此奔走，但這次會面證實是這整個變革過程最重要的關鍵一刻。以它的重要性來說，「緬甸出路」果然實至名歸，找到了一條「出路」。

隨著總統和翁山蘇姬的會面，改革運動加快了步伐，於是「緬甸出路」應政府的要求提供更多的專家建言與指導。登盛及其志同道合的部長們認知到自身的閉塞，於是快速打開門扉與外界往來。奈比多當局對「緬甸出路」提出的一些要求變得愈來愈離譜。最令人難忘的一樁，是要求「緬甸出路」送上一套美國一九九〇年代熱門電視劇《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 的光碟，該劇以美國總統幕僚周遭發生的故事為主軸。這齣劇曾在「緬甸出路」的課堂上被用作輔助教材，現在，晚了好幾步的軍政府急切地想知道民主制度究竟該怎麼運作。

這大抵是奈溫茂向我透露的最後一件事，二〇一二年一月他因心臟病過世。抽菸肯定沒幫上忙，但就像他跟蒞蒞溫說的，抽菸他才有靈感，而他點子真多。他身後留下四名年幼的女兒。在他的葬禮上，與他合作過的很多推動改革的部長都前來致哀悼念，表示他們失去了一位良師。

緬甸之春？登盛和改革派

雖然「緬甸出路」對於自身的工作相當在行，不過政府內假使沒有人接收它的訊息，它的努力不會有結果。確實，在瑞曼表示興趣之前，沒有人敢說政府資深高層裡有人確實想進行真正的變革，不管這變革有紀律與否。不過一旦瑞曼出面，顯然他的同僚裡有些人也在為緬甸的貧困與孤立尋找出路。這些人並不多，但足以啟動一個進程。

最重要的，而且令人跌破眼鏡，改革者竟是丹瑞欽點的總統接班人登盛。登盛在二〇一〇年新選出的國會裡，經由占絕大多數的軍方人士正式投票而當選總統，並在二〇一一年三月就任，且很快就證明人不可貌相這句俗諺。登盛略為駝背，戴眼鏡，柔弱而說話溫和，與身材魁梧一副凶神惡煞的丹瑞呈鮮明對比，登盛完全不像將相之人，但確實官拜將軍。同樣的，從登盛過去資歷來看，也完全看不出他是歷來統治緬甸的軍事強人那一型。他在軍中唯命是從，逐級高升，後來被任命將軍和總理，最後在二〇〇七年被丹瑞欽點為接班人。

然而走馬上任後，他一連發表三次備受矚目的演講，顯示出他和之前的歷任總統大相逕庭。這些演講包括他在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在新國會的就職演說，他對新政府各部會首長的演說，以及對「邊境地區與全國民族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for Progress of Border Areas and National Races)發表的演說。一如緬甸專家李察·霍塞(Richard Horsey)注意到的，這些演講由國營媒體全程轉播，目的是要盡可能讓更多的緬甸人民聽見和思量。²

不只是一口氣說出照例要說的林林總總虛造的豐功偉業，登盛破天荒表明，緬甸處境極為嚴峻，很多人不支持政府。他承認國家陷入赤貧、貪汙猖獗。再者，為了將這一切導回正軌，他主張政府現在必須和民間「宅心仁厚的政治勢力」——顯然指的是全民盟——合作。他承認，政府也必須謀取國際組織——譬如令它反感的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援助，來「改善人民的社會經濟狀態」。一連三次出擊，登盛終結了四十餘年來官方的誑騙、遁辭與空話。「緬甸出路」這類組織裡的人士馬上注意到了。美國人也察覺到政治氛圍起了變化，急於在這個時間點上與執政當局展開新的對話。

登盛總統的這些談話坦率得非比尋常，甚而勇敢，但他為何在這特殊的時間點直言無隱仍令人捉摸不透。他表述這些談話時已經六十好幾，他是否始終深信一些事，只不過在官僚體系裡逐級上爬的過程深藏不露？身為丹瑞欽點的接班人，他是否得到丹瑞首肯，得以承認先前掌政的強人本身的一切失敗？可以確定的是，丹瑞似乎從未駁斥他接班人的所言所行。我們只能推測，前獨裁者默許了辭令和政策的重大改變。說不定這兩人之間有協議，只要登盛發誓不

追殺前總統及家人或要他們頂罪，就像奈溫的下場一樣（見後文），他就有總統的實權可以放手處理一切。

從這一點來看，儘管登盛表面上派率直坦率，他仍像個謎。登盛出生於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某村莊的貧苦家庭，因此他想必比軍中高層那些富有的同儕更了解緬甸民間疾苦。最重要的，他可能也深知，軍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得民不聊生。確實，他在首度總統演說裡最令人動容的段落裡談到：「有很多人仍在對抗貧窮，他們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還有很多人失業。」

除了特別關心緬甸的貧窮問題，據說登盛也清廉得出奇。在坐上大位的一路上，他從沒有靠政治關係中飽私囊，就目前所知，也沒有和貪腐的毒品及寶石交易有所牽扯，儘管他曾在揮邦駐紮多年。YouTube上從未有登盛家人奢華地辦婚禮的錄影。至少在性格上，他似乎不可思議地絲毫沒有沾染到他周遭大多數人的自私、殘暴和不人道的氣息。

難道這就是丹瑞相中他的原因？我們永遠不得而知。登盛肯定熱切閱讀「緬甸出路」談論經濟改革與重建的文章，難能可貴的是，他樂意聆聽任何人提供的建設性建言。這樣的作風同樣的與偏好在周圍盡是阿諛奉承、唯唯諾諾者的閉鎖世界裡穩穩當當過日子的前任者大為不同。

最重要的是，一如新總統在就職演說裡提到的，他本人願意謀取翁山蘇姬的協助來改變緬甸，而且為此對她做了讓步。在這件事上，他採取的態度和丹瑞完全不同。有些人推測，丹瑞之所以對翁山蘇姬深惡痛絕，很可能是出於嫉妒。在丹瑞的認知裡，他才是為緬甸帶來民主的

人，他對翁山蘇姬站出來爭取民主而獲得全球矚目非常惱怒。

確實，丹瑞這殘暴的軍事獨裁者究竟何以要瓦解——即便以有限而管控的方式——他自己構築出來的中央集權統治，一般有諸多揣測。他的施政釀成經濟大禍，他也許是想做出德政善績，讓翁山蘇姬相形失色，也可能是為了二〇〇七年對僧侶大開殺戒贖罪。不過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他不想落得和前任奈溫或他家人同樣的下場。奈溫在一九八八年卸任後，有一段期間仍在幕後呼風喚雨，但在一九九〇年代末與當局鬧翻，並在二〇〇二年軟禁期間於屈辱中過世。此外，奈溫眼睜睜看著家人被指控密謀推翻政府，遭逮捕入獄，甚至判處死刑（儘管後來都獲釋）。印尼強人蘇哈托總統在一九九八年大規模群眾示威暴動中被迫下台一事，據說也令丹瑞深感其擾。就這個論點來看，丹瑞之所以策劃這項變革工程，主要是為了終結可輕易追殺卸任元首的中央集權獨裁統治。簡而言之，緬甸的新民主是這位獨裁者的退場之計。

倘若真的如此，這計策奏效了。丹瑞目前持續住在奈比多，從很多方面來看他堪稱全身而退。他的後繼者完全不去打擾他，就連一般認為會大力譴責他違反人權和貪汙舞弊的全民盟，也放過了他；他絕少再公開露面。

毫無疑問，登盛在政府高層做出了巨大的改變。就連行政官僚系統內支持他理念的人，也沒料到 he 接任總統後會改革得如此快速。他的盟友同時也是後來的新聞部部長葉赫（Ye Htut）向我承認：

改革的速度之快令我訝異。那完全看總統怎麼做，我們都大吃一驚。我們處在中央集權的體系裡很多年，所以不知道如何改變。（登盛）當選時我們很高興。我們知道他會進行改革，但以為他會先花個一、兩年鞏固權力，事實上他在三、四個月後就開始著手了。

葉赫跟其他人一樣也因登盛就職演說的坦率而感到錯愕。

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官員也證實了登盛在改革上的個人貢獻。總統「是真心想推動改革的人」，他告訴我，「縱使有些閣員不願意改革」。登盛特別關心脫貧計畫、農村發展以及他在就職演說裡提到的議題。我這位友善的官僚正參與這類議題的一項計畫，該計畫呈報給總統後不到三個星期就核准下來，這在緬甸龐大笨重的官僚體系裡可謂快得出奇。不過他也提醒說：「如果總統不支持，計畫就動不了。」

敵對者、改革者和反動者

最先對「緬甸出路」感興趣的瑞曼，他可說是推動改革工程的第二號人物。瑞曼想必曾經以為自己會接替丹瑞坐上大位。二〇一一年錯失大位，讓他與新總統之間瀾漫著明顯的較勁意味，在新政府的核心升起一股顯著的緊張對峙。瑞曼在二〇一一年一月被任命為國會下議院議長，他快速建立這新的立法機關，當做與總統辦公室抗衡的權力基礎。

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確定，用一句話來說，瑞曼是「利用國會為他個人在二〇一五年大選投標下注」，而他在二〇一三年六月篤定表明參選總統的意願。不論如何，瑞曼的政治野心帶來非常重大而正面的結果：他讓國會在改革歷程中比先前想像的更有威望和份量。當數百名新科國會議員在二〇一一年一月抵達俗麗花稍的新國會大樓坐上他們的席位時，沒有人認真看待他們。這些議員絕大多數不是未經選舉產生的軍方人士，即占百分之二十五席次的軍方陣營，就是軍方的代理政黨鞏發黨的成員。想必大多數人認定，國會將比較像是一言堂，而不是議事廳。³

起初，情況果真如此。議員們只能努力讓自己的發言被聽見，更別說質詢部長。但是在瑞曼運作下，快速起了變化。他確保合乎體統的辯論得以出現，立法提案得以仔細審查，而且他設置專門委員會，賦與它廣泛權力，得以調查眾將軍治下的緬甸晦澀隱密、不可見光之處。國會因此開始定期挑戰總統在制定法律和官員任命的職權。譬如說，二〇一二年九月，國會上下議院不分黨派壓倒性地投票通過，彈劾憲法法庭的九名法官。由總統任命的這些法官，先前試圖要限制國會各委員會的權力，最後被迫全部辭職。另一件事，通過不可或缺的新版外國投資法，也成了總統府和立法院的爭論焦點。草案在登盛辦公室和國會之間來回好幾趟，這一切開始有那麼一點像《白宮風雲》的劇情了。

瑞曼對於國會變革的另一個貢獻，是促成二〇一二年四月國會補選，全民盟大獲全勝，有

四十三名新科全民盟議員將前進國會（翁山蘇姬也在其中）。這些席位之所以空缺，是銜命即將就職的部會首長讓出來的。登盛承諾改革的一項重大考驗，是兌現他在前年八月與翁山蘇姬的約定，讓國會補選公平自由進行，結果全民盟獲得壓倒性勝利，拿下了他們與軍方角逐的每一個席次。這次選舉的成功和一九九〇年那次很像，只是規模沒有那麼大，不過政府這一次尊重選舉結果，翁山蘇姬和她的同僚進入了國會。他們進到國會後，無疑把它震得天翻地覆。

全民盟開始提出法案，在過去，民間政黨的這類動作被視為不當行為。其中一項法案打算強制內閣閣員公布財產，儘管這項法案沒有多大進展。全民盟也變得善於運用國會特別委員會仔細審查各部會職務與政策。這一切都獲得瑞曼的支持，他和翁山蘇姬比和登盛更合得來。翁山蘇姬被選為國會新成立的十五人「法治、和平與穩定委員會」（Committee for Rule of Law, Peace and Stability）主席，全民盟領導人終於取得意義重大的職位。這給了她非常有利的官方位置，可以著手進行她最關心的主題。

全民盟的存在與冒進似乎也讓鞏發黨成員大膽起來。全民盟的國會議員之一溫廷說，鞏發黨的國會議員跟他承認，他們很高興無趣的議事廳變得有活力。鞏發黨的議員在逐漸試探過底線後，也變得跟全民盟的同僚一樣會追根究柢、勇於批判。拿國會新成立的土地調查委員會來說，它開始著手調查遍行各地的強占土地，即軍方和政府官員及其親人強取豪奪而來的土地。國會議員到國內各地蒐集這些明目張膽違法犯紀的證據。不久他們便呈報，光是孟邦就有五千六百七十公頃（一萬四千英畝）的土地被強占。軍政府遭受如此質疑，幾乎前所未見。

瑞曼之後的下一號改革人物是翁敏。這位前少將在登盛上任後從鐵路運輸部這不太大的職位開始做起，但很快浮上檯面，成為當局與所有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簽署停火協議的政府關鍵談判人。停火協議迅速成為新政府最重視的目標之一，因此翁敏的重要性大為提升；二〇一二年，他擔任總統辦公室主任，就此得以把全副時間和精力投注在擔任首席談判人的職務上。歐盟、日本和聯合國相當認可他在這角色上的成功表現，於是共同資助仰光新成立的「緬甸和平中心」（Myanmar Peace Center），這機構主要是做為翁敏與克欽族、克倫族、孟族、欽族等多軌協商的祕書處。到了二〇一三年底，他和克欽族之外的每個重要的武裝團體簽訂了停火協議，而這些協議至今或多或少都還有效力。二〇一五年三月，他終於也和克欽邦簽下暫時協議，這些都是重大的成就。

我訪問的每個與翁敏談判過的少數民族組織代表，都稱讚翁敏正直、坦白和誠懇。與這些武裝宿敵達成和解的過程裡，翁敏本人似乎也不存先入之見，虛心坦懷。他開始談論從前不可掛在嘴邊的大事——聯邦制，並且認為政府應該要給與各民族平權的新保證。他的新團隊也開始研究權力分享和資源分享的新安排，譬如說，在新的聯邦體系建置裡，富人和窮人階級之間的財富重新分配。而這些對一個相當粗枝大葉的緬甸軍人來說，可都是令人非常頭痛的事。

改革的侷限

二〇一三年九月我與翁敏在他奈比多的辦公室見面，在助理與翻譯員陪同下，他一再重述已成為新政府座右銘的口號：「沒有和平，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照這樣看，結束緬甸眾多內戰之所以成為優先要務，終究是為了達到經濟發展這終極目標。這個公式透露出重要訊息。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達到經濟成長的手段，而政府裡的每個改革者都秉持這個信念。

一如登盛總統的就職演說，翁敏對緬甸問題也誠實直率，令人耳目一新。他跟我談到緬甸的落後與貧窮，甚至非常有遠見地批判教育體系，「需要更多的腦力激盪和對政治的思考」，而不是背誦學習。然而翁敏此處的思路同樣也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更好的教育純粹只是達成經濟發展的手段。「世上每個國家無不努力要變得富有，經濟議題最重要。」他說：「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帶來經濟發展的政治體系，好讓人民富有起來。我們必須把貧窮率從百分之二十六降到十六。」

因為搞好經濟如此重要，主持金融機構譬如中央銀行業務的技術官僚扮演關鍵角色也就不足為奇。溫斯頓·瑟翁（Winston Set Aung）在西方受教育，被選派到國家計畫部工作，後來擔任中央銀行副總裁。他協助督導銀行部門進行改革，並在大和證券集團（Daiwa Securities

Group）和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技術支援下，著手計劃開放股票市場的事宜。前海軍上將梭登也是另一位重要的改革者，他比登盛和翁敏都年輕。身為總統隨扈裡所謂的「超級部長」之一，他要全權負責政府經濟改革的議程。

因此在政府高層，有不少非常有熱忱、能幹又開明的改革者。在登盛的帶領和激發之下，他們在短時間內達到了數量可觀的成果。至於他們想達成多少以及他們預料可以達成多少，也有幾個強烈警訊值得注意。

第一個警訊是，就像翁敏向我解說的，民主是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而非本身具有價值。改革者認為之所以非得應付全民盟不可，只是想換取資金、投資和西方的科技專長。然而就意識形態上，他們仍舊和翁山蘇姬有明顯的歧異，而翁山蘇姬最優先的目標是要達成一個可運作的西方式民主。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緬甸軍人心目中民主必須有紀律的原因；民主是為一個非常有限的目標服務——經濟復甦，幾乎別無其他。

同時也要有一個認知是，這些改革者進行經濟改革而非政治改革的有限目標，和區域上的常態比較一致，但這不是翁山蘇姬對國家的願景。經濟成長優先，把言論自由、人權和民主放在其次，是新加坡、中國、越南、柬埔寨和泰國等國家的治國原則。假使將軍們要為（稍微）新生的緬甸找一個可效法的榜樣，眼界在這類國家之上也是很奇怪的事。

至於第二個警訊，愈來愈清楚的是，在緬甸政府內，即便是為這項有限的改革議程獻身效力的人也非常少。在軍隊和官僚體系裡，多數人都安於以行之有年的舊方式辦事，很不情願改

變，尤其是如果改變意味著要犧牲掉他們在國內享有極大特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拿我訪問的那位談到個人薪資並欽佩登盛的資深官員為例。他告訴我，他很認可總統「急切想迎頭趕上世界其他國家，打造一個更民主的政府和更進步的國家的理想」。就跟很多人一樣，他也對「（登盛上任後）一開始快速改變的情勢感到吃驚」。但是他也說，他對「準備好要跟隨總統領導的人，竟是那麼的少，感到深深的失望」。登盛執政三年後，二〇一四年我的內線跟我交談時，他感嘆道，沒有「真正的變革出現。政府裡大部分人都沒變，我們得憑良心講，沒變」。這意味著像他這般挫敗的改革者經常要跟官僚體系對抗。用他的話來說，緬甸的改變「其實相當脆弱」。

這句話倒是很貼切。構成緬甸政府和商業精英的很多前軍官，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又不得已地跟隨登盛的領導。我的資深官員估算，他認識的政府官僚裡支持改革的不到半數。另一位官員告訴我，有三分之一支持改革，另有三分之一堅決反對，而最後的三分之一則騎在牆上等著看誰勝出。

第九章 一場全新的地緣政治大競局

國際的脈絡對緬甸的改革來說，跟國內的政治同等重要，過去二十年來緬甸的發展演變中，有兩個國家的角色格外重要：中國和美國。中國，這還用說，它與緬甸的交界長達一千三百五十英里，數世紀以來始終虎視眈眈著緬甸，況且有數十萬的緬甸山區少數民族就住在交界另一側的中國境內。美國和緬甸的淵源是從近代開始，主要透過浸信會傳教士，以及二次大戰期間在聯軍對抗日軍的戰役裡，支援美軍的克欽族和克倫族徵集兵。

然而緬甸向來也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前線，亞太地區的兩大強權角力的區域。一九五〇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撤退至緬甸邊境揮鞭的蔣介石反共軍隊予以援助，寄望蔣介石的國民黨也許可以從這緬甸基地對共產勢力進行絕地大反攻。在冷戰時期的脈絡下，擊敗中國共產黨是美國的優先要務，美國運送武器和資金給國民黨軍隊，其實更加削弱了已經岌岌可危的緬甸政府，一般認為緬甸是無辜受累。美國中央情報局直到一九六一年才放棄抗戰，但那時國民黨

軍隊已經造成揮霍嚴重的政治動盪與分裂；國民黨軍隊甚至開始在那裡種植鴉片。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共產中國顯然在緬甸呼風喚雨。這新興的經濟強權急於剝削它弱小鄰居的龐大自然資源，當中國會促躋身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它對石油、瓦斯和水力的需求只會增加。與此同時，無可計量的緬甸木材、玉石、紅寶石和黃金，最後被運到中國邊城出售，對大多數緬甸人來說，無異於國家被整個劫掠掏空。因此緬甸和它的巨鄰之間明顯不平等的關係，成了二〇一一年之後登盛總統新政府更迭易轍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在緬甸大肆榨取，緬甸因為受制裁又缺乏來自西方可與之抗衡的力量，結果中國的包抄讓緬甸快透不過氣來。

什麼都能賣

中緬關係的覺醒，可從中國雲南省的瑞麗鎮以及昆明市的發達說起。瑞麗以前是個破敗的邊陲小鎮，位於中緬交界的中國境內；而昆明則是曾經為中國最貧窮省分之一雲南的首府，遠在中國沿海城市如猛虎般的經濟體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

但如今雲南已不可同日而語。瑞麗鎮現在是快速擴張、闊氣富有的貨物集散地，幾小時車程外的昆明也是。昆明如今有個美國人設計、耀眼閃亮的新機場，還有全中國第四大，一旁還有中國興盛的典型徵象——葡萄酒專賣店和奧斯頓·馬丁（Aston Martin）汽車的展示間。昆明被行銷為數百萬中國本土遊客——主要是針對雲南背面接近緬甸一帶的遊客——的旅遊勝

地，以異國風情的山區部落和堆積如山的翡翠寶石為標榜。確實，瑞麗和昆明的新財富大半源自在中國境內與緬甸進行的買賣，尤其是克欽邦產的玉石交易。在瑞麗有數千家商店販賣玉石產品。數十萬中國商人、顧客和遊客湧入選購，這裡販賣的可不只是翠玉墜子或小首飾。還有小雕像、箱匣、雕刻品等等；事實上，凡是可以這綠色寶石做的，應有盡有。

瑞麗的玉石無疑價格不菲。造訪鎮中心一家名叫「臻品玉石公司」如巨穴般的展示間，我被迅速帶到一顆特殊的黑岩塊前，而展示在現場的尚有數千顆之多。那岩塊其貌不揚，僅大約一英尺見方。一側有一條小縫，可見半透明的綠色和紫色內部，洩漏它真正身價；它是最高品質的緬甸玉石，在識貨的中國消費者眼裡，可是世上最上乘的貨色。經過貨幣兌換的一陣殺價亂砍之後，我的翻譯算出這塊石頭的標價是——一百二十萬美元。

臻品玉石公司的每件玉石都是從克欽邦越界帶過來的。年輕小伙子裡拿著小噴水瓶，潤濕散置在現場、有些大得像卵石的無數岩塊，之後用一把小手電筒在表面打光，隨而會有一小片綠色或紫色透出來，顯示這岩塊的價值。為了製造噱頭，這家店也提供「賭玉」；顧客可以買下一整顆外表看不出端倪的岩塊，然後當場在店裡把它切開。倘若裡頭有大量紫色，那它的價值就高出原先的買價；倘若沒有，他永遠可以再試一次。對於中國人愛賭又愛賞玉的癖好，這遊戲很有賣點。

那裡也有柚木產品，從同樣價值不菲的緬甸紫檀木製成。剛砍下來的巨大樹幹越過邊境來到瑞麗，然後在瑞麗的工作坊裡化身為任何東西、任何尺寸：床、沙發、燈座、佛像，甚至魚

缸。在一家木製品店的門口，我看見一座比門還高，毫無品味到極點，又極其糟蹋木材的工藝品：一座巨獅木雕，十一公尺長，四公尺高。它費時一年才雕成，用了整整兩棵樹，售價超過一百萬美元。洋洋得意的店主人預期它最後會落腳在北京或香港的某家飯店大廳，就像它的兩位前輩。

數千名持有執照的小規模緬甸交易商在瑞麗及周遭區域買賣玉石、寶石和木材。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人當中大約有三千人被認為是緬甸穆斯林，包括羅興亞族人在內，利用這地區內對他們有利的親屬網絡做生意。¹無論如何，玉石和其他寶石產地的緬甸人，幾乎完全無法從瑞麗的營收分一杯羹。礦區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薪水微薄，還有很多使用強制童工的



圖8 緬甸馳名柚木的去處，待售的一尊巨獅，於中國邊城瑞麗（作者提供）。

案例紀錄。要了解越界交易的失衡以及中緬關係隨之而來根本上的不平等，這是關鍵所在。緬甸人認為，中國商人哄抬其進口品的價格從中牟取暴利，還經常勾結腐敗的緬甸官員，緬甸在地人大多數得不到什麼利潤。因此中國人在緬甸極度不受歡迎也就不令人訝異，曼德勒和緬甸北部等大部分的玉石、柚木、紅寶石和其他寶石的產地，尤其反中。在緬甸人眼裡，中國商人劫掠了緬族、克欽族、撣族和其他民族與生俱來的權利——直白地說，就是他們好幾代人棲居其中的樹木、石頭和水。這是緬甸的緬族人和所有少數民族會發自內心意見一致的少數議題之一。

緬甸人眼睜睜看著他們的柚木原始林快速減少，玉石和大理石消失在通往中國的滇緬公路，同時他們也看見中國人用新建的輸油管和水壩，破壞他們國家最美麗的山川。因為中國快速成長的經濟，覬覦緬甸來滿足它不斷增加的能源需求。

譬如說，二〇〇九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開始建造貫穿緬甸中部的的主要輸油管和天然氣管，從若開邦西南端由中國人興建的終點港皎漂（Kyaukphyu），經過曼德勒和臘戍，一路延伸到昆明，約四百八十英里的距離。中國視這些管線為最優先發展的戰略重點。為了把石油和天然氣從非洲和中東的生產國輸往中國，在易受海盜和恐怖主義攻擊、很可能被敵意封鎖的馬六甲海峽咽喉點之外，這些油管成了必不可少的另一個選項。這兩條管線的造價合計約兩百五十億美元，在二〇一三年底開始運作。然而這些管線在建造時，卻完全不顧沿路的天然環境所受的破壞。管線在施工時，我曾經從曼德勒順著管

線北上至中國邊境，一路上滿目瘡痍，令人怵目驚心。當地村民的反對聲浪無人聞問。

除了油管，爭議更大的的是水壩。中國五家急著找到便宜、可再生又不會太遠的能源新來源的國營電力公司，全都相中緬甸。興建合約在二〇〇〇年代初便陸續簽訂，新大壩的頭一座瑞麗江一號發電廠在二〇〇九年開始營運。更多的幾座中國出資的水壩也蓋在瑞麗江，而源自中緬邊境喜馬拉雅山的瑞麗江，進入緬甸後正好在撣邦北部。根據一個消息來源指出，至少有四十五個中國跨國公司已涉入將近六十三座緬甸的水力發電計畫，包括變電、輸電和電氣化計畫。²這些計畫當中最龐大、造價也最高的將是密松大壩，緬甸政府和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在二〇〇六年簽訂的計畫（可參見第四章）。

中國一廂情願地相信，緬甸人會歡迎這些在他們貧窮國家裡的發展建設。從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一年，中國人在緬甸的累計投資金額從十億跳到將近一百三十億美元。其中大半——約八十億——花在中國投資的最大型三項計畫，分別是輸油管線、密松大壩和同樣也在緬甸北部的萊比塘（Legadaung）大規模銅礦開發計畫。在二〇一〇年四月至八月間，當這些計畫案都同時開足馬力在進行，中國在緬甸的支出相當於之前二十年間的三分之一。³

此外，這一些都還不包括多年來中國另外在緬甸建設道路、橋梁等其他基礎建設的援助。政府與政府層次的中緬關係因緊密的軍事和策略關係已相當鞏固。自一九九〇年代起中國成了緬甸主要的武器供應者，販售噴射戰鬥機、軍艦和其他軍事裝備。中國也協助訓練緬甸軍。做為回報，中國很可能被允許進入孟加拉灣沿海的緬甸基地，因而得以密切注意印度洋及更遠處

的動靜，儘管中國在該沿海並沒有軍事基地。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被國際唾棄的緬甸軍政府在面對西方強權的不友善決議和抨擊責難時，中國偶爾也會提供外交掩護。

「愚蠢、愚蠢、愚蠢」

對中國來說這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一九九〇年代之後當西方開始施加制裁，在商業和外交上沒有其他國家與之競爭的情況下，中國似乎可以在緬甸為所欲為。中國對緬甸在政治經濟上的壟斷，意味著兩國之間的契約關係實際上是中國說了算，尤其是在貿易條件上。

然而，在中國官方「不干預他國內政」政策——尊重他國政府不計後果追求任何政策的權利——名義下，單只著眼於政府對政府的契約，中國完全沒察覺緬甸人對他們的憤恨加深。結果，中國原以為與緬甸穩固互利的關係，竟然當面破裂，對緬甸造成深遠的後果，也影響到東南亞的權力平衡，以及中國與貧弱國家的交涉方式。

總總一切引發的沸騰民怨，在密松大壩興建案上爆發。一如前述，總統登盛將這項計畫取消，在緬甸大快人心，但在中國，暫停大壩興建工程引起一片錯愕。中國事先並未被告知。一個被中國視為附庸國的國家，會戛然轉向並公開斷然回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概也是史上頭一遭。之後不久，我去拜訪北京各大學院校以及中國外交部的外交政策學者來揣量他們的反應。這些人都是中國政府認可的發言人，得以用比中國官員更自由的方式清楚表達意見。其中一

位，發展經濟專家張曉明，他告訴我，大壩工程暫停「令中國政府非常震驚」，迫使他們「非常嚴肅地」去思考中國和緬甸的關係，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朱鋒闡述得更詳細，對於中國在緬甸究竟哪裡出錯提出分析。他告訴我，中國在緬甸及其他貧窮國家的援助和發展工作該如何進行，「警報一直在響」。回顧過去，朱鋒說，在緬甸犯的錯是，單只著眼於和政府官員打交道，完全沒去留意「緬甸國內政治的細微變化」。換言之，中國把政府的配合誤認為民眾的默許，這是獨裁國家政權很容易犯的錯誤。

這也是官方的不干預政策的直接後果。以緬甸為例，該政策只是中國當局蓄意漠視緬甸民意的一個託辭，因為這樣做對中國有利。中國習於嘲笑西方在施與救助或其他援助計畫時的附加條件，稱之為「干預」甚或「新帝國主義」。但是如此多慮地堅持不干預政策，朱鋒認為，使得中國對至關緊要的「政策、辭令和政治思維的轉變」全然不察，倘若他們傾聽當地政府之外的聲音，從地方的層次介入，就不可能錯過這些跡象。這真是「愚蠢、愚蠢、愚蠢」，朱鋒說：「這是莫大的教訓，我們必須引為警惕。」這也顯示出「我們是不成熟的政權」，他說，還沒「長大成大」。確實，西方評論家曾借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對中國外交政策做出同樣的批評，只不過措辭更離譜。他們逮到機會抗議中國支持緬甸和蘇丹的殘暴政權，稱那一次是「種族屠殺的奧運」。

無論如何，不干預政策助長了存心的漠視。我在瑞麗訪問過的中國人，對緬甸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只知道緬甸很窮，還有很多人深信它很危險。我問過的人當中，沒有人知道翁山蘇姬，他們也沒興趣去多了解一下這個國家。

來到這邊城的中國遊客被大力勸阻不要越界進入緬甸——他們在採購行程裡挑上的所有翠玉珠寶的出處。為讓遊客不虛此行，在中國這一側，如緬甸縮影一般的城鎮被怪異地打造出來。在這裡，無須擔心邊境另一側的駭人事物，只管在安全無虞的一座超現實的緬甸主題公園裡晃盪，裡頭有知名地標的塑膠製俗麗複製品，譬如大金塔和大金石（Golden Rock）^①。那裡有令人發毛的笑僧像，以及最讓人不安的，有一間住著真正「活生生」少數民族的小型房屋。兩名長脖子套著金頸圈的帕東族婦女，動也不動地站著，悲哀地等人拍照給錢。在這裡，緬甸是個井然有序、風景如畫（端看你的品味）和健全的佛教世界。在中國，說不定就像中國人想像的，緬甸乃順從的附庸國。因此，難怪密松大壩事件會那麼令人震驚，也難怪很多中國人搞不懂緬甸人為何不對投資他們家鄉的中國感恩戴德。

言而總之，緬甸的民主變革就目前為止對中國來說一直是尖刻的經驗。不過至少他們似乎學到一些教訓。舉例來說，中國海外的援助發展計畫近幾年來經歷官方的大檢修，多少是為了回應緬甸的紛擾政局，以及中國對非洲一些國家的涉入。這些涉入愈來愈受到非洲人以及慣常干預的西方人譴責。中國政府現在會警告在海外營運的公司——尤其是國營的公司——要尊重

^① 譯註：在孟邦丹那沙林海邊小鎮齋托（Zakto）附近，有一塊聳立在懸崖邊的花崗岩巨石，該處也是佛教朝聖地。

當地的風俗與人民，而且要多投資一些英國人和美國人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於是，建造貫穿緬甸的石油和天然氣管線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遲來地在管線附近的村莊裡蓋學校。這麼看來，緬甸本身無意中竟對它的巨鄰帶來衝擊。

歐巴馬上場

最重要的是，我訪問的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同意，中國的失足會讓華府有所斬獲。失去中國的善意後，緬甸政府勢必會投靠西方尋求彌補，尤其投靠美國。

儘管中國承認他們先前在緬甸為所欲為的情況將會減少，但我所訪問的學者們不願意承認，緬甸政府可能是出於自由意志，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轉向西方。他們反而把這個重新結盟完全歸因於美國惡意挑撥，一心想遏止中國在戰略上極其重要的地區崛起。很多中國人因此認為，美國重新對緬甸感興趣，背後有個長遠陰險的計畫，就是要讓緬甸脫離中國的影響。他們這麼推論，受西方支配的緬甸僅僅會威脅到中國。譬如有位中國專家憂心地跟我說，倘若美國用某種手段最終把緬甸帶向民主，這將會在某方面「影響中國的情勢」，彷彿選舉像某種病毒會從邊界散播過來。

然而，儘管美國及西方近年來與緬甸恢復友好關係是緬甸近年改革的重大因素之一，這歷程也比中國所想的要大為務實得多。正當緬甸人想法子要撬開他們和巨鄰之間的鎖鏈，美國也



圖9 太虛幻境，在中國瑞麗的緬甸主題公園裡的塑膠仿製品（作者提供）。

在想法子要重新介入緬甸，這幾乎是因緣巧合。

如前所述，將軍們拒絕承認一九九〇年選舉結果之後，美國對緬甸逐步施加貿易禁令以及其他制裁。那些經濟和外交的攻擊是美國國會發動的，一九九〇年美國國會通過「海關和貿易法」(Customs and Trade Act)，自此讓美國總統得以對緬甸將軍們施加新制裁（雖然當時總統老布希拒絕這麼做）。在一九九二年，美國象徵性地撤回駐緬大使（但大使館仍在，後來僅派一位代理大使主持事務）。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當時共和黨掌控的第一百零四屆國會通過了「解放緬甸法」(Free Burma Act)，這是共和黨參議員麥康諾 (Mitch McConnell) 的提案，主張對緬甸施加嚴苛的經濟及貿易制裁，同時也對與它貿易的國家施以制裁。在接下來幾年，麥康諾參議員在緬甸議題上一直是強硬派國會議員中最好戰的一位。麥康諾是美國南方浸信會的一員，所以他關心的不只是全民盟和民主運動所受到的殘暴打壓，還有克欽族、克倫族、欽族等其他族群的基督徒所遭受的攻擊。

最後在一九九七年，柯林頓總統終於對緬甸施以頭一項制裁，禁止美國在緬甸的大部分新投資，儘管他對這作為的效力仍有疑慮。美國也運用其影響力把緬甸排除在多邊金融機構之外，譬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接下來的小布希政府也處處譴責緬甸政府，施加新的經濟制裁，以及對緬甸的貿易和簽證的限制。歐盟在一九九〇年施加武器與科技的禁運，繼而在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對緬甸官員施加簽證及其他外交禁令。其他西方國家也如法炮製：加拿大二〇〇七年「特殊經濟措施實施細則」(Special Economic Measures Act) 禁止加拿大對緬甸的所

有進出口，也禁止加拿大和緬甸的公司和銀行之間所有的金融往來。就西方看來，從一九九〇年代末開始，緬甸被有效孤立了。人權倡議分子也針對個別公司發起從緬甸撤資的活動，很多公司加入這行列。只有少數幾家大公司沒有跟進，其中最知名的是德國的國際快遞公司 (DHL) 和法國的道爾達一億而富公司 (Total Elf)。

然而十年後，到了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左右，美國很多政治人物和官員爭論說這些制裁均屬失敗。其中最明顯的是，它們從未說服緬甸政府改變作風。更糟糕的是，這些制裁很可能促使丹瑞及其心腹做出更加殘暴不仁的作為，這比逼得他們落入中國手裡還慘，而中國可不像西方那麼關心人權和民主。維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韋伯 (Jim Webb)，就是主張要即時改試新方法的人之一，身為參議院遠東及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他處於有利的地位可以有所作為。二〇〇九年九月在國會山莊一場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上，他從懷疑制裁的角度總結美國所處的困境：

我們孤立緬甸的結果，是對該地區戰略形勢的忽視。緬甸一直被印度和中國夾擊，而且普遍認為它愈來愈受中國影響。我相信，我們孤立緬甸背後的政治動機是高尚的，因為我們想看見那個國家政治民主而且尊重人權。同時，我們在緬甸問題上所面臨的情況，是我們企圖孤立一個國家，但其他國家並未配合所造成的。由於外交和商貿的阻隔，我們和緬甸人民的聯繫也受到限制，使得他們看不到自由社會所能提供的美好。我們限制了讓他

們發展與探索知識的援助，我們也限制了促進正面改變的機會，只因為我們不跟執政當局直接對話。因此我們要問的是，坦白說，這個做法是否讓緬甸比受制裁之初更靠近民主？

沒有配合的「其他國家」，韋伯指的不只是中國，也許包括在這段期間一直和緬甸有密切往來的日本，還有組成東南亞國協的所有國家。東協是主要的區域性組織，本部在雅加達，緬甸於一九九七年加入。東協對緬甸採取完全不一樣的作法，這無疑影響了美國對緬甸政策的思考。

東協對緬甸的政策，由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主導。這幾個國家不巧也正是緬甸最大的外來投資者。以叢爾之地新加坡和中型的泰國來說，他們對緬甸的貿易量遠遠超過美國。有別於美國與歐洲透過經濟制裁迫使緬甸改變，東協採行的是外交官喜歡說的「建設性介入」政策。譬如說新加坡不管在官方和軍事層次上，均廣泛與緬甸的各個部門締結合約，包括學術和研究機構，以及商業與金融。緬甸將軍們也可以自由進出這個富庶的島國。

支持建設性介入的新加坡人，譬如自二〇〇〇年以來經常造訪緬甸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陳企業，認為這個做法大體上與亞洲價值一致。陳教授告訴我，亞洲人有個卑微的夢想，那就是所有亞洲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及有個安身立命的住所」，所有亞洲國家都應該相互幫助達成這夢想。他堅稱這才是「會改變緬甸的政治抱負」，而不是制裁。新加坡因此有責任繼續幫助緬甸人民改善經濟機會，關注經濟勝過關注人權。就像我在東協遇見的其他人

一樣，用他的話來說，他對「西方對待緬甸的雙重標準很反感」。他手指指著我，忿忿然說：「在亞洲經歷種種西方殖民壓迫和恃強欺弱之後，你們是最沒資格說這件事（人權）的人。」

東協建設性介入的擁護者指出了該政策的具體成果。舉例來說，東協在幕後無聲進行的外交，終究設法說服了極其多疑的緬甸軍政府在二〇〇八年納吉斯風災後接受國際奧援。東協帶頭成立了包括緬甸本身和聯合國在內的所謂「三方核心小組」，帶領納吉斯風災後重建。⁴

然而事實是，東協的做法也無能促使緬甸政治體制在二〇〇〇年代早期有任何明顯的改變。就如我們所見，大多數緬甸老百姓也沒有從緬甸與東協及其他亞洲國家所維持的經濟聯繫中獲得什麼好處。不僅如此，在一九九五年後緬甸反而更遠遠落後亞洲其他國家。這多少是西方制裁所造成的，不過大半是緬甸在那些年間盛行的失衡裙帶資本主義所致。確實，沒什麼證據顯示，至少在經濟層面上沒有，建設性介入對於協助緬甸實現他們的亞洲夢有幫上什麼忙。顯然，唯有緬甸政權在政策上的急遽轉變，同時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西方援助機構等獲得大量的外資和技術，才能讓緬甸經濟脫離加護病房。但是在美國的制裁下這些均屬空談。

因此，有鑑於不論是制裁或亞洲的建設性介入都不見什麼成效，在韋伯一類的人士敦促下，歐巴馬新政府在二〇〇九年初的頭幾個決策之一，便是針對美國的緬甸政策進行全盤的評估。這項任務由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負責。此項評估最後得出一個綜合性做法，合併先前政策和東協模式，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也

就是說，制裁依舊繼續，但必須與緬甸領導人開啟對話。這個新的做法被稱為「務實的介入」。就坎貝爾的說法，這個政策是要「測試緬甸領導人的意向，以及他們對於和美國發展更正面關係所表現的誠意」。這些都經由翁山蘇姬從中斡旋，她的意見在美國國會和美國官員之間具有很大的份量。

正當坎貝爾公開闡述他的新政策之際，這個做法事實上已經在積極進行。二〇〇九年八月，韋伯已經以美國議員的身分前往緬甸進行首度的官方拜會，而上一次的官方拜會幾乎是十年前。他也獲准前往拜訪軟禁中的翁山蘇姬，並和丹瑞會面；一個明確的訊號出現了，那就是緬甸至少樂於接受美國伸出的觸角。美國其他的外交使節也發覺到同樣的變化：當美國在探索一條路，走出與緬甸的外交僵局時，緬甸政權也正設法擺脫中國的勢力。顯然緬甸領導人正在摸索各種變革之道，而且需要美國協助，只是不曉得該如何進行。

坎貝爾在二〇〇九年秋天首度造訪奈比多。儘管沒有什麼成果，但他得到緬甸將進行變革的承諾。新任美國特使密契爾（Derek Mitchell）在二〇一一年初首度拜訪緬甸。他事後追述道，當時他甚至不確定能不能拿到簽證，不過他抵達奈比多時，他被堅定地告知說，緬甸將致力於走上民主道路，而且緬甸當局有意與美國發展更友好的關係。密契爾充分回應說，發展更友好關係是可能的，端看緬甸政府是否有具體作為，譬如釋放政治犯。所以說，在此之前，緬甸方面一直是抱負多於行動。直到登盛在當年三月上任才決定性地改變美緬關係。密契爾回憶道，從登盛的就職演說來看，顯然「這傢伙不一樣」。眼下，「這裡有些事有待檢驗」。此後，

登盛敏捷地回應了美國的要求，以行動顯示他對改革的堅定信念。

重返亞洲——新的競局

因此，美國之所以重新介入緬甸，是雙方都在改變的結果，也幸虧這改變同時發生。緬甸政府急著要拉攏美國，來打破它對中國的依賴；而美國也顯然對制裁的明顯失敗感到洩氣。歐巴馬就職演說裡的一段話也很有幫助，他宣布，美國會對「願意鬆開拳頭」的流氓國家伸出手，顯示美國準備好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棘手的老問題。最後，歐巴馬繃緊神經與緬甸握手。

另外，「重返亞洲」的政策也要考慮進來。除了願意與「赤色」或「邪惡」政權對話——華府的用語，歐巴馬政府的另一個主調是把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軸，從在中東和阿富汗徒勞、昂貴又不得人心的戰爭，移往亞太地區。歐巴馬的幕僚判定，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預料大部分落在亞太地區，而該區域也是新世紀裡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中國——的崛起之地。實際上，重返亞洲等同是強化美國既有的聯盟，讓緊張不安的中國鄰邦放心，譬如越南和菲律賓。很多人稱此新政策為「圍堵」，讓緬甸脫離中國的軌道似乎是這個策略明顯的潛在收穫。

然而，密契爾一類的美國官員反對這新圍堵政策的概念。他們主張美國反而必須「在這地區有更好的表現」，當亞洲在經濟上以及外交上更具重要性。「我們的盟友認為我們在二

○○○年代（初）分心了」，密契爾告訴我，所以「我們必須要讓我們在這地區的盟友放心」。此外，他也認為亞洲有一場「價值和規則的競爭」，在美國式自由社會和「北京說了算」的夾帶政治及社會壓迫的市場資本主義之間。密契爾主張美國必須起身捍衛它的價值，但這不見得「必須反中」。因此，美國「對緬甸的政策改變，始終關乎緬甸，而非關乎中國。緬甸已決定要改變，但他們是在回應中國，……而不是回應我們」。

在一定程度上密契爾是對的。中國以為緬甸國內情勢的轉變是美國長期在背後密謀策劃的結果，特別是基於地緣政治和戰略性考量而讓緬甸背離中國，這想法肯定是錯的。一如密契爾警告，「中國人誤解這一切得自負後果……他們很容易怪罪強權，因為這樣他們就是受害者。」儘管如此，重返亞洲政策也讓美國的重新介入具有某種急迫性與強度。的確，回顧過去，顯然美國的重新介入很可能過於急促，尤其是從結束制裁的角度來看。

一等歐巴馬總統及國務卿希拉蕊得到翁山蘇姬首肯可以著手處理登盛政府，事情就飆速進展得令人不知所措。翁山蘇姬才在二〇一一年八月與登盛會面，在政治改革上達成協議，同年十二月初希拉蕊已經在緬甸進行大抵是她入主霧谷（Foggy Bottom）^②，四年來最重大的一次出外訪問。十二月一日，登盛總統穿著夾腳鞋和籠基，一身傳統緬甸服飾打扮，迎接這位國務卿來到奈比多俗麗的王位廳。這是五十餘年來美國高層官員首度造訪緬甸。

會面氣氛友善真誠，登盛熱切地跟希拉蕊說明他將大刀闊斧改造一個一黨主政的貧窮國家。在「手法老練的」（根據美國人的說法）討論之後，享用了燻鮑魚和黑胡椒螳螂蝦的一頓輕食午餐。當天稍後希拉蕊便前往仰光，首度與翁山蘇姬會面，在會面過程中希拉蕊對翁山蘇姬毫無虛假的仰慕欽佩溢於言表。於是，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希拉蕊正式認可了這國家的變革歷程。她為登盛政府背書的同時，也公開讓反對勢力領袖合理地成為國家改革過程中同等重要的參與者。

歷經數十年的西方制裁之後，這是緬甸決定性的一刻。雙方都是帶著禮物來會面。就希拉蕊這一方，她承諾世界銀行將重返緬甸，評估這國家的經濟需求並再度開始放貸。就登盛這一方，他再次重申走向民主的決心，承諾隔年將舉行一場公平自由的補選，屆時全民盟將獲准參與競選。美國其他的外交使節也經常要求釋放政治犯，而緬甸政府方面的動作也快速得令人訝異。到了二〇一三年登盛掌權不到兩年，大部分的政治犯均已獲釋。

繼希拉蕊之後，國會議員麥康諾於二〇一二年出訪緬甸也具有重大意義。美國這位撻伐緬甸軍政府砲火最猛的議員在仰光與翁山蘇姬會面，和希拉蕊那次會面一樣，這次麥康諾顯然也激動不已。被說服緬甸確實在進行改革之後，他開始推動了後來由國會發起的制裁解除。

但是真正讓局勢起變化的是希拉蕊那次的出訪。轉變的一刻出現在她與翁山蘇姬在仰光湖畔老家的公開會面。在肅穆的奈比多與政府閣員經過一系列官方拜會後，希拉蕊一行人飛往生機盎然又搖搖欲墜的仰光這迥異的世界。希拉蕊和翁山蘇姬在第一晚共進私人晚餐，席間兩人

② 譯註：美國國務院所在地，美國國務院的代稱。

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不過她們倆在記者媒體前的公開見面，是在翌日早晨翁山蘇姬的老家。在不過幾個月前，這位前政治犯的照片不得刊登在緬甸報紙上，就連她的名字也不得上報。眼下她卻與不久前仍是軍政府死敵的代表會面，在一大群當地和國際的媒體面前。期待陡然拉高。

翁山蘇姬有圍牆的老家，恬靜地坐落在茵雅湖畔，幾乎和夫人本身一樣具代表性。她在這裡忍受長年的軟禁生涯，此處的建築物是世人記憶中她少數幾次露臉時的背景，都是她偶爾現身於高聳的前門上方，向雀躍的支持者揮手和演說時被拍攝到的。為了希拉蕊的造訪，這地方被整修過。二〇〇八年的納吉斯風災在此造成嚴重損害，園中樹木被吹倒，屋頂也被掀毀。而今翁山蘇姬及其訪客一同合照的門廊被重新粉刷過。清新的花朵羅列園中小徑。更惱人的新近增建部分也非常醒目。一道新的有刺鐵絲網牆兩週前才豎立在園中的湖邊——一道預防措施，我被這麼告知，因為考量到翁山蘇姬新近的曝光率，以及緬甸正處於變革的非常時期。

早晨九點剛過，希拉蕊一行人抵達，一同被領進翁山蘇姬的家裡。桌子的一側坐著全民盟的領導人和該黨資深大老。在漫長的討論後，這兩位女人現身，供媒體拍照以及發表簡短談話。一開始她們的身體語言相當僵硬而拘謹。翁山蘇姬表示她本人「很高興」美國的介入，這會讓前方的道路「更明朗」，也會促進民主化的進程。她也提醒她的聽眾，民主化只是緬甸所需要務的其中一項；停止少數民族的內戰衝突以及法治也很重要。希拉蕊至此臉上堆滿笑容，隨即為夫人「堅定」的領導表示感謝，並承諾美國目前會「努力做為緬甸的伙伴」。最後兩人

親切地擁抱彼此。這無疑是非常真摯的一刻。只聽得四周相機快門聲此起彼落。屹立不搖的老房子見證了解放的偉大一刻。

自此之後，新的自由似乎紛至沓來。審查大部分解除了，更多的政治犯獲釋，關於政治主題的談論也比較不被噤聲。改革在驚人的劇烈顛簸之中往前。心灰意懶的外國投資客和商人重新獲得保證。在希拉蕊出訪大有斬獲之後，歐巴馬本人甚而在將近整整一年後訪問緬甸，感覺像是狗尾續貂。美國總統僅落地停留六小時，這期間他排滿了過量的親善、觀光和高談闊論行程。就如他在仰光大學向頓生敬畏的聽眾說的：「我一上任，便發出訊息給那些以恐懼治國的政府：如果你願意鬆開拳頭，我們會伸出手。因此，我今天來兌現諾言，伸出友誼之手。」

到了二〇一四年，除了大約有一百名軍政府親信持續在黑名單上，美國幾乎把所有的制裁都解除了，然而儘管有世界強權的祝福，緬甸統治者在改革之路上究竟願意走多遠呢？

第十章 緬甸的未來與多元社會的幽靈

在密支那城外二十英里左右的威茂村裡，我和一名克欽族年輕人拉拉康道（La La Hkawng Dau）在浸信會教堂的建築群之間走走看看，他比較好記的別名是「傑克」。當時是二〇一四年十月，這位基督敎領袖培訓中心的負責人跟我談到他對未來的雄心壯志。

目前而言，這間浸信會教堂仍是個難民中心，是二〇一一年克欽獨立軍和緬甸軍隊再度爆發戰火的結果。一排排整潔的克難竹屋羅列在建築群的一區，後方有應急的公廁和一些基本的盥洗設施。此處的教堂為超過一百名克欽族難民學生供給住宿；這些男女學生所受的教育部分來自當地公立學校，部分來自浸信會中心。

傑克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夠完全在浸信會的傳教機構教育這些難民，以及其他的克欽族男女學子。換句話說，他要重新開辦在一九六四年被奈溫政府關閉的教會學校，就像國內其他的這類學校。看到這個願景，傑克非常興奮，他手邊已經有完整的計畫。他正在安排工作坊來研

擬課程以及訓練師資。他希望新聘二十名老師，新學校將以大約三十人為一班，有別於動輒上百名學生為一班的當地公立學校。學習過程將以學生為中心，老師的教學比較是依照學生主動想學的內容來進行，而且會有很多以英語講授的課程，還有音樂課。確實，我們朝著發出不成調伴奏聲的一間竹屋晃去，幾個年輕人正努力駕馭他們廉價的日本電子琴。傑克希望能在同時間開辦另一所這類的學校。

這一切聽來都非常吸引人，但是傑克也承認，這將是不合法的。在緬甸高度嚴密管制的體系裡，所有學童都必須到可悲的公立學校就學。傑克認為，如果克欽族浸信教徒不為自己採取行動，他們「將來的世代子孫將會失根」。他感嘆道，當地的克欽族文化已經幾乎消失。此外，獨尊緬族的學校體系教出來的孩子「語文說不好也寫不好，十六、七歲的學生只有少數能用緬文或克欽文書寫」。

因此傑克決定自力救濟。出了教會建築群，只消走上短短一程路，越過一小片骯髒、開放的灌木叢，即可看見他的孩童的另一選項。這裡的草地上散落著洩漏當地有人吸毒上癮的跡象。這塊地每隔一、兩天會有志工來清理，即便如此，地面上還是丟滿了針頭和注射器的廢棄塑膠包裝。注射器本身全被拋到牆另一頭的天主教學校的園子裡，清楚可見。傑克不允許他的學生離開浸信會土地，以防他們被引誘去吸毒或喝酒。毒品在威茂當然很普遍，傑克說，而且很容易買到。「沒有人會逮捕毒販。有些人被逮，但只要花個大約一千美元就會被放出來了。」在這地區這說法時有所聞。

自由的小裂縫

傑克說，在登盛政府進行改革之前，即便只是動一下重新開辦教會學校的念頭也是很荒謬的。不過現在「我們可以這麼做，因為我們感覺到更自由一點；在以前，我們什麼都不能做」。這大抵就是當代緬甸的狀況。全國各地的人都在利用這新的政治氛圍，利用這新的寬容，把想法實現出來。在商業、社會和智性上被壓制而積存了好幾代的能量而今被釋放，顧不得政府的舊法則與規章。緬甸不斷在變化，再也沒人能確知這一回政治上放寬到什麼程度。因此愈來愈多人在試探政治的新底線，等著看會發生什麼事，始終在揣測當權者是否會反撲，或何時會反撲。

傑克向我坦承，譬如說很多克欽族父母憂心，假使他們把孩子送到他的新學校而不去上政府的高中會有什麼後果。孩子得不到上緬甸其他公立大學所必須的結業證書該怎麼辦？傑克說，別擔心，假使政府態度強硬，孩子可以到印度讀浸信會學校和大專院校，這做法已行之有年。至少他們在那裡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很樂觀，不論如何他的教會學校都會如期開辦，而且會獲准辦學。他說揮那有十一所類似的學校已經開辦，到目前為止政府並沒有橫加干預。這是出於無力管轄、漠不關心還是更傲慢的心態，不得而知。

在密支那的情況也差不多。主廣場外剛開了一間新店鋪，就在目瑙慶典場地的入口對面，

販售汗衫、馬克杯、日誌、鑰匙圈等等飾有克欽獨立軍紋章標誌的物品。不過一年前左右，這些紋章標誌就算是最小程度的公開亮相也是無法想像的事，最起碼也會招來緬甸軍方立即而嚴厲的報復。而今，十多歲的少年會開心地騎著摩托車在城裡繞，秀出襯衫上或安全帽上象徵克欽獨立軍的交叉刀劍。

順著伊洛瓦底江往下，距政府機關建築群不遠處，人文學院 (Humanity Institute) 在二〇一二年開辦。就如傑克希望以教會學校來拯救受政府箝制的克欽族孩童，人文學院也想為克欽族學生做同樣的事。當地公立的密支那大學風評奇差無比。坊間流傳說，它的走廊堆滿了用過的針頭。因此，由在地商人和教師設立的人文學院，希望最終能開辦一所可把公立大學比下去的新大學。邊丹坤敖 (Nbyen Dan Hkung Awng) 這位年輕有活力又口條清晰的克欽族創辦人兼所長跟我說明，該學院也希望能提供「跟上時代的教育」來取代密支那大學背誦學習的古板體系。除此之外，人文學院也明明白白關心克欽民族議題；所有的課程都以克欽語和英語教學，完全排除緬文。他激動地說，人文學院的宗旨是「復興克欽族文化」。

就像緬甸的其他事務，人文學院也需要辦學證照。我在二〇一四年拜訪他時，邊丹坤敖說他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已提出申請合適的證照，但此後毫無下文。在等待核准期間，他說，他「不管如何向前走」便是。他說他現在有多一點的政治空間可以操作，所以跟傑克一樣，他要把握機會盡可能利用官方舉棋不定的這一刻。

人文學院隔壁，伊洛瓦底江畔的一棟華美屋宅裡，住著克欽邦年長的女政治家佳仙高馬蘭 (Ja Seng Hkawn Maran)。她父親是克欽獨立組織的第二主席，她本身也是克欽婦女協會 (Kachin Women's Association) 的主成員之一，而該協會是效法中國類似的毛派組織。她也在試探緬甸新政府有多麼嚴肅在看待真正的改革。她和其他克欽族商人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克欽邦公共有限公司 (Kachin State Public Company Limited)，為克欽邦經營公用事業等這類的生意。因此他們將為克欽邦提供譬如電力等緬族為首的克欽邦政府從未充分做到的公共服務。

該公司修復了兩座水力發電廠，以一種公私合營的新形式運作，與以緬族為首的邦政府共同合作。另一項計畫是修復從曼德勒到密支那的破舊鐵路，這條鐵路從前是連結克欽邦和緬甸其他地區的命脈。在緬族為首的前鐵道運輸公司管理下，佳仙高馬蘭告訴我，鐵道既是貪腐、遲緩、不可靠又昂貴的事業。因此她和投資者向邦政府買下三年合約來經營一條改善的鐵道，把遊客帶往克欽邦的同時也讓克欽族人從完成自身計畫當中重拾自尊。他們在宣傳鐵道的嶄新亮面小冊子中承諾，「鐵路服務將由滿腔熱忱、不同以往的員工所提供」；「水／電燈將不會短缺，也會有乾淨的廁所可用」；「旅途中將有電扇、甜美的旋律和悅耳的歌聲為伴」。

她已經培訓了六十名具備「滿腔熱忱」的職員，將在新鐵道上開始服務，只是我和她會面的當下，這些新進人員仍在等待邦政府核發許可，要再過一個月後才核准下來。「所以他們還是說做不到」，佳仙高馬蘭說。水力發電廠遇到的情況也一樣。與緬邦當局進行公私合營的新模式仍舊困難重重。在她看來，這更加確證「他們不是真的想改變」。不論如何，她說，「我們一有機會就使勁把門推開。」

在剛改革的緬甸，大型企業的遭遇當然又另當別論，尤其是諸如電信、石油和天然氣等具戰略性的國家部門。這是政府最想吸引外資挹注的事業，因此奈比多熱切地鋪上紅地毯歡迎新公司前來營運。將外國資金和技術帶進這些部門畢竟始終是改革的重點之一。譬如說，經過妥善執行且公開透明的投標過程，至關緊要的新電信執照由兩家外國公司雀屏中選，挪威電信公司 (Telenor) 和卡達電信公司 (Ooredoo)。史上頭一次，這兩家公司將提供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行動電話網路，以便宜的費率計價，而且與現存的國營網路競爭。消費者——這是緬甸的政治經濟的新概念——應是這類競爭的主要受益人。

政府本身沒有帶頭參與的地方，則又是不同的遭遇，尤其是在山區。就如佳仙高馬蘭說的，在地的緬甸當局對於是否「把機會讓給其他人」似乎猶豫不決。在克欽邦，克欽族人會覺得與在地緬甸當局合作很困難也許不令人意外。畢竟，我二〇一四年前往克欽邦時，嚴格來說，克欽獨立組織仍舊和緬邦處於交戰狀態。在克倫邦，二〇一二年一月簽訂了指標性的停火協議後，事情則進展得快速得多，但是我在兩年後造訪帕安時，「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 的會談似乎仍遙不可及，更別說整體的經濟有任何的改善。

歷史性停火最明顯的表徵，是位於帕安主街道上的克倫民族聯盟新穎辦公室。裡頭掛上了克倫族領袖們和總統登盛及其幕僚的合照，人人微笑並握手，難以想像這不過是幾年前的事。這地方足證了緬甸在過去幾年來確實有一些改變。這裡也有一些經濟發展的小徵兆。譬如說，俯瞰薩爾溫江，地處鎮內少數風景優美的區段，一間新飯店的地基正在開挖。在當代緬甸

的其他地區，蓋飯店吸引不了太多目光；在仰光和曼德勒，為了接待大批湧入的觀光客，少說已有數十家新飯店進駐，但是在帕安，這可是大事。從表面上來看，就一個缺乏固定工作機會的城市來說，這也應該是無可爭議的好消息，新飯店會帶來數百個相對來說待遇優渥的工作。

但願如此。事實上，這飯店成了在地克倫族和中央緬甸當局之間持續的政治對峙的另一個象徵。我發現，大多數克倫族其實反對興建這飯店，理由說來簡單也至關緊要，那就是他們沒被徵詢過意見。邦議會的在地克倫族議員，一位意志堅定的強悍婦女名叫南瑟瓦 (Nan Saw Hwa)，激烈地爭辯說，該飯店是奈比多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名緬族地方長官「硬加」到帕安的。南瑟瓦說這位長官從不傾聽「人民的意見或需要」。就蓋飯店這件事，南瑟瓦說，募資蓋飯店的商人就是該名地方長官的親信。南瑟瓦繼續說，如果他們問過居民的意見，在地克倫族人會要求，那飯店根本不該蓋在很多人踢足球的那片土地上，而且翁山將軍一九四七年被刺殺之前還曾在那塊地上發表一場有名的演說。

結果，對帕安來說原本會是發展經濟的一個機會，卻成了另一個政治衝突的來源。從這一點來看，新緬甸的政治變革，嚴重地落後於幅度不大的經濟成長，因為自總統登盛於二〇一一年推動改革以來，中央緬族掌控著克倫族和其他山區民族的舊結構幾乎沒有改變。中央也許在民主方面有一些進展，譬如說聯邦國會議員的選舉，但是中央緬族控制這個多元民族國家的政治和行政架構幾乎不受影響。儘管與各民族停火，緬甸表面上正進行改革的政府，並沒學到國家的政治結構為何需要大翻修或如何進行。這也難怪帕安克倫民族聯盟辦公室裡一位克倫族少

梭梭席秀 (Saw Shee Sho)，始終懷疑政府從根本上對統治方式進行改革的意願，不論現在或未來。「戰鬥可能會結束，」他挖苦地說，「可能不會，值此之際，我們還是要保有武器。」

緬甸新民主的黑暗面

儘管如此，在緬甸中央平原的城鎮村落裡，更大程度的政治與智識自由自二〇一一年起毫無疑問地廣為流布。隨著新聞審查告終，而且更能接觸到網路，緬甸一般老百姓比獨立以來的任何時候，有更多的機會了解他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言論與思想也比之前的數十年更加自由。尤其自從希拉蕊在二〇一一年底出訪緬甸，以及二〇一二年四月的期中選舉，政黨也或多或少被允許正常運作。譬如曾在因盛監獄坐過牢的全民盟前活躍分子欽蕾就告訴我，她為目前所擁有的新自由感到高興：「現在我們夜裡睡得很香甜，……在過去，警察都在半夜裡找上門來，毫無預警，我們總會聽到敲門聲或摩托車聲……這是（關於改革）最令人開心的事。以前我得吞安眠藥才能入睡，現在再也不需要了。」

但是自二〇一一年以來緬甸的進步也有它更黑暗的一面，而且這黑暗面也許甚至會暗中侵害海內外的改革者，為了讓國家更好所做的一切立意良善的努力。過去幾年來，緬甸這一面的故事，正好是從若開邦首府實兌開始的。自殖民時期以來累積的仇恨與怨懟，深深牽動著一九六二年之後緬甸將軍們種種最惡毒又離間的政策。悲哀的是，即便緬甸進入這據稱變革的新時

代，那些宿怨和仇恨仍被加以利用，這一回是急於壓制翁山蘇姬及全民盟選舉威脅的緬甸政府不顧一切、鋌而走險。

二〇一二年六月，實兌爆發血腥的大肆殺戮、破壞和洗劫，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若開族對穆斯林少數民族，主要是羅興亞族人，施以攻擊。同年十月再度爆發攻擊，只不過破壞的規模沒有上一次大。兩次慘劇造成九十人死亡，超過十萬名羅興亞族人流離失所。逃離實兌的羅興亞族人被迫住在城外數英里處草草搭建的難民營。¹第二次衝突爆發後不久，我來到實兌，清楚目睹若開族如何對羅興亞族人趕盡殺絕，幾乎片甲不留。穆斯林焦黑的房屋殘骸仍在悶燒，兩側佛教徒的屋宅完好無損。清真寺也被燒成平地，種族隔離狀態已昭然若揭。城中央的穆斯林區禁止所有人出入，同樣的，從城外骯髒的難民營來的穆斯林難民也不准進到實兌。我執筆之際，這些難民營收容了大約十四萬人。羅興亞族人只能走海路逃離，因此有數萬人被帶上設備不良的古舊漁船，大多數試圖前往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穆斯林社區。數以百計的人因船沉水或翻覆而溺斃，或者純粹就是消失在我們這年代最少被報導的最大悲劇中。

一如我們在第一章提到的，被強加進實兌的多元社會，若開族對之尤其深惡痛絕，這是因為大量湧入的緬族人和印度人，大多數是穆斯林，占走了該邦的很多工作機會，此外英國的外族統治也有關係。自此若開族和羅興亞族穆斯林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繃，偶爾會擦槍走火。在一九九〇年代，激烈的暴力衝突時而發生，也發生過數以萬計無國籍的羅興亞族人遭到強制驅逐事件。

我在實兌見過的每個若開族人，尤其是若開邦主要的政黨代表，若開民族發展黨冥頑不化的偏執者，似乎都有一本蒙塵的老舊冊子或錄影帶可用以指陳「穆斯林威脅」的鮮明現實。這個威脅顯然以各種形式出現：穆斯林生很多小孩，他們很快會占據緬甸；凡是穆斯林都待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訓練營；所有穆斯林都想摧毀佛教。顯然若開族人向來是聽著捕風捉影的反穆斯林言論長大，這多少說明了，那些狂熱流血的抵禦在他們眼中是為了捍衛若開邦家園。很多人相信，就像先前印尼佛教徒被穆斯林蹂躪（他們主張有知名的婆羅浮屠〔Borobudur〕為證），所以在緬甸也很容易發生同樣的事。

此外，緬甸社會裡最受敬重的成員——僧侶——也助長這類的信念。某天在實兌，我目睹一大群憤怒的暴民在大街上對穆斯林示威。根據他們的說法，他們走上街頭是因為一則新聞報導說，有個穆斯林救援組織在緬甸成立辦事處來幫助受宗派暴力的羅興亞族人。這類的抗議並非不尋常，但這次抗議吸引我的注意，在於它是由僧侶動員的。穿著藏紅色袍子的神職人員沿著實兌大街包圍群眾，相當震撼。這是若開族佛教徒裡最極端的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僧伽的匯集，而且顯然是一個強大的組合。一位怒火中燒的抗議者看到我在觀望，一個箭步衝向我。他的兩個伙伴也跟了上來，他要我說出我的宗教信仰。幸好我可以誠實告訴我不是穆斯林。實兌發生的殘暴種族清洗，很可能是一名穆斯林男子強暴了一名若開族佛教徒女子所引發的。之後不久，一連串類似的事件開始頻頻出現在緬甸心臟地區的各個角落。在大多數情況下，殺戮、焚燒和洗劫穆斯林及其商店與財產也發生在多元社會的中心區域，諸如梅鐵拉

（Meiktila）這類城鎮以及曼德勒，而梅鐵拉是奈比多西北方的一個重要的鐵路交會城市。佛教徒女子被穆斯林男子強暴的一項指控，竟引爆了這一連串燒殺事件。

以穆斯林人口占百分之十的曼德勒為例。一位年輕溫和的穆斯林朋友，我姑且叫他哈利，描述了二〇一四年七月頭幾天所發生的事。在那之前的幾個星期，佛教徒社群已湧現大量的仇恨言論，不僅衝著穆斯林而來，也針對翁山蘇姬和全民盟。七月一日那天，曼德勒各僧院裡高唱民族主義的反穆斯林僧侶之中，善於煽動民眾的帶頭者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thu），在他的臉書轉貼一則有關奈比多附近一名穆斯林男子強暴一名佛教徒女子的報導。被控強暴的男子擁有一家茶館，地點在曼德勒市中心某街角。貼文沒多久，便有一群緬族佛教徒聚集在那家茶館叫囂，出言恐嚇，企圖逼迫茶館關門。哈利當時在場，他如此描述整個過程：

大約有三、四十名男女騎機車現身。他們都是外地人，沒人見過他們。他們大聲喊著「殺光穆斯林」以及「這是我們的土地，不是你們的」。警方起初沒干預，後來有試圖驅散那群人。一整晚有好幾群人持這類的言論在曼德勒城裡到處叫囂。清晨五點時，一名穆斯林男子在前往禱告途中被一群暴民襲擊身亡。

一名佛教徒男子也遭殺害。哈利難過地說起這起暴力攻擊的餘波：「現在很多人不信任彼此。佛教徒不敢上穆斯林開的茶館，穆斯林也不會踏入佛教徒的地盤。所以整個城像是一分為

二。這就是暴力的後果。」

自從二〇一二年起，在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間製造分裂與仇恨的事件頻傳。七月一日騎車現身街頭大肆叫囂種族歧視言論的外地人，之前也在曼德勒有過類似的挑釁，只不過那幾回都沒有有人傷亡，新聞媒體也就沒有報導。社群媒體和推特輕易地淪為散播不實又具煽動性謠言與誹謗的管道。譬如說曼德勒瘋迷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而且大部分僧侶（基於奇怪的理由）支持曼徹斯特聯隊。但是幾年前臉書上的一篇貼文指出，曼聯的美籍（而且是猶太裔）老闆，已故的格拉沙（Malcolm Glazer），有著鬍鬚，肯定是穆斯林。忠實的佛教徒因此急切地投效他隊。哈利本身有一段時間也淪為臉書的受害者。他的女友碰巧是緬族佛教徒，這一點也被阿欣威拉杜在臉書上張貼公告。結果，不想把公寓出租給異教徒的一群佛教徒房東，將哈利和女友列入黑名單。

在緬甸很多人相信，這些攻擊事件是政府在背後慫恿，並串通阿欣威拉杜這類的民族主義僧侶及其他人士聯手策動的。所有的攻擊事件都有相同的模式可循，而且都是在二〇一二年以後發生。這個年份絕非巧合。實兌爆發的種族衝突就在這一年，而且同年四月國會期中選舉全民盟大獲全勝，翁山蘇姬進入國會問政後執政黨也倍受威脅。這兩件事會被兜攏起來，是因為反穆斯林的暴力攻擊的主要目的，是要利用民眾對穆斯林的既有惡意，一如在實兌所顯現出來的，來與全民盟長久以來的選舉訴求相抗衡。鞏發黨的人似乎是要威脅恐嚇佛教徒，使之相信穆斯林將要接管緬甸，同時藉此再度向佛教徒保證，唯有他們鞏發黨才會真正挺身捍衛他們的

「種族與宗教」。

相反的，翁山蘇姬因為提倡普世的人權與法治，則被說成與穆斯林為友，因此被誤導為與佛教為敵。這是無稽之談，但是在無知、謠言和影射當道的政治環境裡，這種戰略起了效果。這種仇恨穆斯林戰略的政治目標，是要逐步削弱翁山蘇姬在她的核心支持者緬族佛教徒之間的高人氣，繼而弱化她的選舉訴求，不管是即將在二〇一五年舉行的普選或之後的任何選舉。這是操弄恐懼的政治，或者說是緬甸式的民主政治。

就如某位穆斯林活躍分子對我說明的，反穆斯林的攻擊「主要目標是全民盟，穆斯林成了代罪羔羊」。用美國選舉政治的用語來說，打「種族與宗教」牌是製造分裂的一種手法，企圖離間翁山蘇姬與自然向她靠攏的支持者或群眾基礎。美國共和黨的策士會在總統和國會選舉期間，以同樣的手法操作同志婚姻議題，來剷除更保守、更草根的民主黨員的主政機會。

沒有人能肯定是誰策動了這反穆斯林、反全民盟的戰術。精武幫的流氓被認為是在曼德勒等地突然現身大呼反穆斯林的口號，激起民眾不滿情緒，很可能還屠殺了一、兩個穆斯林的詭異外地人。昂當，丹瑞的心腹和黨羽，與精武幫關係密切眾所周知，便是美國人認定的幕後黑手。他被美國列為黑名單，就在歐巴馬總統為了參加二〇一四年十一月的東亞峰會第二次訪問緬甸前夕。「藉由蓄意暗中破壞緬甸政治與經濟的正面變革，昂當始終在進行暴力、打壓和貪腐活動。」美國財政部官方引文如此寫道。軍情局的心戰部數十年來一直刊登反穆斯林的內容，所以現今流通各地的反穆斯林文宣也很可能來自軍方。昂當和曼德勒的一些僧侶交情匪淺

是出了名的，尤其和民族沙文主義傾向的僧侶中最惡名昭彰的一個——心狠手辣又直言不諱的阿欣威拉杜，過從甚密。

數字對抗

生於一九六八年曼德勒近郊，阿欣威拉杜公認是九六九運動領導者，九六九運動是僧伽發起的反穆斯林活動當中最著名的一個。該運動本質上強烈反對穆斯林，支持緬族的民族沙文主義。它經常引述阿欣威拉杜的說法，「（穆斯林）繁殖的速度之快，他們偷走我們的女人，強暴她們」，以及，緬甸穆斯林大多數是「本性惡劣的人」。緬甸現在有很多汽車和商店貼上了九六九運動貼紙，表明支持反穆斯林的僧侶。這是九六九運動在二〇一二年之後的最新化身，它很可能源起於孟邦的僧侶，儘管它概念上的先驅，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更為古老。九六九運動一開始很可能是自發性的運動，為了支持若開族對抗實兌的羅興亞族人，但它很快地被當局利用。

數字九六九在佛教有特殊意義。第一個九代表佛祖的九種屬性，六代表佛祖教誨的六種義法，最後一個九指的是佛門僧侶的九種德行。①這數字也是刻意用來直接與穆斯林數字七八六抗衡。在整個南亞及東南亞，穆斯林以七八六這數字來代表「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這數字經常出現在穆斯林開的商店或企業裡。有些緬族佛教徒卻把這數字看成是穆斯林密謀主宰世界

的進一步證據。總之這想法是這麼推演的：七八六這三個數字相加起來是二十一，明明白白顯示了穆斯林想征服二十一世紀的野心。「你們當真這樣想？」我問曼德勒的一名告訴我這典故的僧侶。「沒錯，」他答道，「很多沒受過教育的人這麼想。」九六九是被特意用來對抗七八六的。

九六九運動毫無疑問是個資金充足又組織良好的運動。它有自己的週報（很可能是心戰部的產品），定期對伊斯蘭和其他宗教譬如基督教發表攻擊言論。阿欣威拉杜在二〇〇三年因散播仇恨言論入獄，因他煽動群眾殺害穆斯林，以報復一位據稱殺害了一名佛教徒女子的穆斯林，但他在二〇一二年初隨政治犯大赦而順帶獲釋。我二〇一四年在曼德勒訪談過的僧侶當中，沒有人贊同阿欣威拉杜，他們向我指出，阿欣威拉杜以前只是個不成氣候的宗教偏執狂，但是自二〇一二年出獄後，他的言辭明明白白帶有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對翁山蘇姬和全民盟的抨擊。阿欣威拉杜及其侍僧經常嘲弄全民盟的黨徽戰鬥孔雀，其緬文是 Khut Daung，阿欣威拉杜以諧音說成是 Mut Daung，意思是穆斯林孔雀。

我訪談的僧侶把這一類的政治誹謗直接歸因於昂當的影響。曼德勒某僧院的一位老僧對我說明：「阿欣威拉杜想出名，和昂當在佛寺裡見面後，他就變了個樣。以前他只會談論一些宗教議題，見過昂當後，他開始談論政治和全民盟。」

這位老僧指出，自二〇一二年起，阿欣威拉杜和其他的九六九運動倡導者享有其他人沒有

① 譯註：九六九就是佛、法、僧。

的徹底自由——「政府准許他們為所欲為」。阿欣威拉杜散播仇恨言論的主要管道，他臭名昭著的臉書上的很多指控，往往都是奸巧杜撰的挑撥性謊言。譬如說，他在七月一日張貼的那篇佛教徒女子被強暴的報導，引爆曼德勒的攻擊事件，後來很快地被發現完全是捏造的。

九六九運動也鼓動了一個名為「保護族群和信仰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Race and Religion) 的龐大佛教組織，其緬文是「緬甸愛國者協會」(Ma Ba Tha)。該組織基底深厚，緬甸宗教事務部曾就會牽動「族群與信仰」議題的立法草案，徵詢過該協會的意見。該運動是由軍政府最富裕的親信之一欽瑞(Khin Shwe) 提供資金，欽瑞是澤卡巴公司(Zaykabar Corporation) 的負責人，也是國會議員。他曾成立名為Sasana Noghaha的佛教徒支持團體，其目的之一是要在緬甸每個大城市的每個街角為佛教徒設祈禱室或聚會廳。由於資金雄厚，在曼德勒的這一類街角大樓，有的非常精美。在這裡，僧侶進行佛教徒——民族主義思想宣傳，鼓動盛行的反穆斯林情緒。

二〇一四年，登盛總統本人要求國會根據「緬甸愛國者協會」一手發起的四項提案起草立新法。由此看來，總統密切關心他們鎖定的議題。他們的提案無非進一步限制穆斯林在緬甸的權利，並把穆斯林和占大多數的佛教徒區分開來。很多的立法提案，尤其是即將通過的「女性佛教徒婚姻特別法」(Buddhist Women's Special Marriage Bill) 和「轉換宗教法」(Religious Conversion Bill)，甚至違反了現行的緬甸憲法，更別說與國際人權常規相抵觸。² 當聯合國「特別報告者」(Special Rapporteur) 在二〇一五年初為了緬甸人權抨擊這四項立法提案違憲

時，她被阿欣威拉杜粗暴地詆毀。根據媒體報導，他稱她為「婊子」和「娼妓」。

分化和統治？

曼德勒的僧侶整體來說是良善而思慮周詳的人。他們看穿阿欣威拉杜，了解反穆斯林戰略的本質。遺憾的是，大多數緬甸人的無知程度令人咋舌，尤其是年輕人，他們輕易便聽信了九六九運動所散播的謊言和謠言。在一個數十年來除了少數幾家由政府把持、散漫無章的報紙和電視頻道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媒體的社會，很少人具有必要的資源來嚴正而客觀地分析社會媒體。此外，無孔不入四處滲透的不實惡意宣傳也在強化了很多人既存的偏見。

因此柯倪尼覺這位曼德勒的八八世代(可參見第七章)活躍分子倍感遺憾地說道，九六九運動及所有佛教沙文主義的宣傳，「造成很大的影響」。他本身就有理由密切追蹤這種影響，因為他是個穆斯林，對於那世代的活躍分子來說很罕見，他的祖先克密族(Kaman)三百多年前便遷移至此，在曼德勒的緬族王朝下任事。他被政府當局盯上，不僅是因為支持民主，也因為穆斯林的身分。一九八八年柯倪尼覺在爭取民主示威活動中被逮捕後，他說軍情局對他的審訊大部分都繞著他的信仰打轉，而不是他的政治主張：「你這狗娘養的卡拉(Kala)◎，為什麼

◎ 譯註：外來者，帶有貶義，多指稱穆斯林。

麼要插手緬甸政治？」他們這麼叫罵。

即便是現在，當局似乎仍對他倍感興趣。我們在曼德勒一家相當破舊的茶館交談。其他的顧客大多很年輕，很邋遢，顯然也沒錢，但現場有一名中年緬甸男子穿著燙得一絲不苟的籠基和白得亮眼的襯衫。他在最靠近我們的那一桌坐下時，連我也忍不住瞧了他一眼。果不其然，偷聽了一、兩個鐘頭後，他起身離開，經過我們這一桌時，他跟柯倪尼覺說了幾句打趣的話。「特工，」柯倪尼覺說，「他經常在這裡，現在我們可以正常談話了。」

柯倪尼覺主持一個名為「慈」(Meta，意思是善心或慈愛)的組織，促進各種信仰之間的和解，但是他也承認這項任務已經變得難以為繼。九六九運動「在村鎮之間進行得很成功……幾乎每個緬甸人都深信這是緬族的佛教國……與世上其餘地區的隔絕也助長了這種信念，如今很少有僧侶到過其他國家，所以人人都是這樣想」。他對未來非常悲觀：「各種信仰之間的調解沒什麼成效，要對抗這信念非常困難，高呼『我們可以打敗這種運動』很蠢。」

很多人會贊同他。他認為，在種種反穆斯林宣傳的影響下，民眾開始背離全民盟，所以該黨將會愈來愈難在多元社會的震中——像是梅鐵拉、若開邦和曼德勒——贏得跟從前一樣多的選票。確實，有很多證據顯示，這一「爭端」在全民盟的內部大肆挑撥離間。全民盟的研究室主任奈基溫告訴我，黨內已出現過好幾次佛教徒和穆斯林黨員反目為敵的情況。他說起有一回全民盟某城鎮委員會的幾位成員來尋求他的意見。該委員會裡幾個佛教徒委員試圖要把穆斯林委員除名，他們試圖阻擋這件事。但是他們「擔心被扣上親穆斯林的帽子」，所以也不敢採取

任何作為。奈基溫告訴我，最後他幫他們壯膽，阻止了那些穆斯林被除名。

然而事情不會永遠順遂。穆斯林領導人說全民盟內已經有很多穆斯林黨員被他們的佛教徒同志給開除。翁山蘇姬本人以及資深元老丁武親自走訪各個在地委員會，談論包容與友愛的美德，但似乎作用不大。奈基溫的看法肯定是對的，在全民盟黨內挑起反穆斯林情緒的那些人當中，起碼有好幾個是政府的線民和內奸。他說，因為全民盟沒有中央登記系統或黨員入黨紀錄，所以根本不可能把這些人開除。

「這是打種族和信仰牌來贏得選舉的陰謀。」奈基溫說。但是看穿對方計謀不見得就能輕易推翻它。他分析了翁山蘇姬在政治上進退兩難：「這計謀把她逼到了牆角。假使她站出來支持少數民族，政府會指控她親穆斯林，她會失去聲望；如果她表達反羅興亞族的言論，她會被指責有種族歧視。所以她只能堅守法治。」

這聽起來都非常合理，但是在西方很多人眼裡，這做法等於完全不表態，而這要付出代價。擁護她的人很多都感到失望，退一步說，至少她對於二〇一二年以來羅興亞族人遭遇的大屠殺和種族清洗所發表的言論過於謹慎，令擁護者感到失望。同樣的，她因為沒有更普遍地為穆斯林少數族群辯護而飽受批評，就像她也受到克欽族強烈抨擊，指責她在二〇一五年初停火之前緬甸軍隊砲轟克欽邦期間，也沒有為他們挺身而出。這些都是曾經不沾惹政治爭議的一位昔日政治偶像的進退維谷，但是她現在必須以一名平凡的政治人物自處，在對手精心設計橫加阻撓的政治環境裡步步為營。

翁山蘇姬的左右手屢屢表達她私下很同情緬甸穆斯林的處境，藉此消除所有人的疑慮，但他們也認為她著實難以多說什麼。她肯定知道光是這個議題很可能就會阻礙全民盟最終的執政，而他們多年前早該上台主政。但是她願意更強烈地直言，反對緬族佛教徒的暴力攻擊和仇恨言論，不惜賠上全民盟贏得二〇一五年開始的未來普選的可能性？他們只能寄望，就如奈基溫說的，緬族佛教徒裡始終有一群沉默的多數，這群多數對九六九運動及其反穆斯林宣傳毫無興趣，而且無論如何都會票投全民盟。也許吧，但是政府、鞏發黨以及軍方上上下下想盡辦法要緊抓最大權力與特權的人認為，這個選舉策略若不能徹底阻止全民盟也足以大傷全民盟元氣，這想法也為真。一向以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打「種族和信仰」牌的策略逐步發展，尤其是自二〇一三年以來，國會裡的鞏發黨成員以及政府各部會首長對於將來的改革，在態度上變得益發頑抗。譬如說，對於全民盟提出的憲法爭議，政府斷然拒絕做出任何讓步。九六九運動和反穆斯林、反全民盟的宣傳成功，讓他們更有幾分膽量寸步不讓。他們不再非得接受歷史的浪潮會無可避免地撲向他們。

政府裡的強硬派也得力於西方解除過去對緬甸的嚴苛手段。希拉蕊訪問緬甸後的一年內左右，西方對緬甸改革的質與量，始終握有相當可觀的掌控權，譬如以解除制裁來換取政治犯的釋放等等。但是解除制裁進行得太快，也過於全面。特別是歐洲一口氣便取消所有制裁（除了武器禁運之外）。美國和歐洲在緬甸從未真的手持大棒，而這會兒他們已經丟出所有的胡蘿蔔。因此西方影響緬甸情勢的力道後續也在消退。歐巴馬在二〇一四年間為了重啟磕磕絆絆的

改革進程的所有呼籲，幾乎一概被當成耳邊風；緬甸現在可以穩穩當當地不把西方放在眼裡。

回顧過去，歐巴馬政府似乎過於急切地要證明它真心誠意要伸出援手，只好設法忍受它最頑固的對手。美國在二〇一四年發覺，隨著緬甸的情勢逐漸惡化，它必須重新施加選擇性的制裁來對付昂當。然而這類的制裁對於緬甸政治的走向不大可能有任何影響。這樣的制裁太輕微也來得太遲。緬甸將軍們想必盤算過，西方從二〇一一年到此刻為止已經在緬甸投注了太多政治、情感和金融的資本，不可能大規模撤回對登盛政府的援助。

鞏發黨肯定想說：假使我們可以應付得過去，達到馬來西亞式的政治體制，那將是登盛改革的最佳結果。倘若如此，多數族裔（緬族）的政黨透過全然為了保衛既有權勢與特權的政治重鑄，將贏得選舉式的霸權，就像馬來人做到的那樣。這麼一來，經濟成長的目標不僅可以達到，同時也不須屈服於任何深層的政治變革。

很遺憾地，抗議政府打「種族與信仰」牌的聲浪，並不如預期強烈。翁山蘇姬對於這件事的相對沉默，折損了她在國內少數族裔群體之間的聲望。克欽族、克倫族及其他族裔的領導人當中很少會再於政治上支持她，她沒有更加力挺少數民族權益以對抗緬族為首的政府，令少數族裔普遍感到心寒。同樣的，翁山蘇姬念在父親是軍隊創始人對軍方的溫情喊話，也讓數十年來被當成肉掃雷裝置的那些人難以接受。她不能與軍方過於對立，這毫無疑問，無論國家未來情勢如何演變，軍方仍握有重大的發言權，但一般認為，她大可不必違背自己的原則去認可軍方的作為。

總之，翁山蘇姬自一九八八至二〇一〇年成為受迫害的反對勢力領袖，贏得廣泛愛戴的那些特質——她的執拗、堅忍與勇氣，以及她願意為了國家人民犧牲家庭——在近年來似乎已沒什麼感召力。自從全民盟於二〇一一年合法化，她奮力把該黨轉變成一個發揮功能的民主機構，準備要執政。但是翁山蘇姬顯然拙於下放權力，幾乎不見她在周遭部署更廣闊的領導班底，為制定政策分散責任的作為。沒有正式的「影子內閣」，沒有被委派職位的待命部長。相反的，權力緊握在圍繞翁山蘇姬的小徒黨，引起黨內普遍的不滿。大量的戰術運用，是為了支援修憲好讓她有資格選總統，但對於全民盟端出的任何政策，卻沒有進行同樣大規模的討論。她眾所周知的頑固，現在卻經常被認為是自大傲慢和不知變通。在培養年輕一代領導人方面也少有作為，儘管不久之後勢必要有人從老前輩手中接棒。

這總總一切讓全民盟比它原本該有的樣貌更虛弱，尤其是該黨以及翁山蘇姬本人都深得廣大民心的情況下。結果全民盟對於將軍們打的「種族與信仰」牌並沒有做出應該有的強力反擊。二〇一〇年翁山蘇姬從軟禁獲釋後，情勢的發展出人意料，自二〇一二年以來，緬甸的政治議程無疑大半是由鞏發黨裡重出江湖的一幫累犯所主導，而不是全民盟舉世聞名的領導人。最叫人詫異的是，全民盟沒有披起翁山蘇姬父親的戰袍，清晰闡述一幅現代彬龍協議的願景，勾勒出聯邦緬甸的樣貌，跟將軍們乖戾可畏地一味護衛現狀一較高下。確實，總的來說，鞏發黨的死硬派相當成功地讓緬甸在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三年輝煌年代的改革動力放緩，而所有人都難辭其咎。

受害者中的受害者

這場政治殊死戰裡的代罪羔羊，緬甸穆斯林該何去何從呢？就某方面來說，他們就像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中的受害者，不論是緬族這一波的政治鬥爭，或從前他們靠英國翻身而遭受清算。在這一波被挑起的反穆斯林狂熱中，羅興亞族人當然付出慘痛代價，但其他穆斯林也遭受波及。緬甸穆斯林自豪於他們的包容與溫和、蘇菲教派傳統以及對其他宗教團體的尊重。就這一面來說，他們堪稱是多元社會至今仍奉獻給當代緬甸的最美好事物。然而穆斯林領袖如仰光伊斯蘭機構的主任敏登 (Myint Thein) 博士卻認為，倘若年輕一代的穆斯林愈來愈覺得必須動員起來，反擊佛教民族主義者的襲擊，這一切都會被耗損，甚或消失。他擔心，而且這擔心非常合理，假使佛教徒抨擊《可蘭經》並持續中傷穆罕默德，就像九六九運動的作為，那麼相應地很容易會出現類似印尼伊斯蘭祈禱團 (Jemaah Islamiyah) 的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一號召失業貧困的年輕人為使命而戰，那些親眼目睹家屋被焚毀、家人遭屠殺的年輕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發現有這類的組織存在，但是如果這些偏激的民族主義者（佛教徒）持續挑釁，這種組織就會出現。」

敏登告訴我，他寫信給瑞曼、登盛和其他部長，預先提出警告，但「他們沒有強烈回應，他們說不予置評」。也許他們會這樣回答有很充分的理由，因為那樣的組織出現，可謂正中下

懷。主流的伊斯蘭恐怖主義若在緬甸發起暴動，就正好中了九六九運動的圈套，反而確證了有關穆斯林威脅的種種駭人聽聞的謠言均屬實。一個可信的來源告訴我，在緬甸政治這個新起的是非顛倒世界裡，軍情局已經在暗中支援正在促進穆斯林意識覺醒的穆斯林組織，希望能挑撥佛教民族主義者，發起更大的反穆斯林反彈。

顯然這將是緬甸以及該區域的可怕悲劇，倘若這種暴力與恫嚇的循環持續下去。極其反諷的是，英國和法國有數千名在政治上與物質上享盡一切好處的年輕穆斯林，急忙投效伊斯蘭國這類極端主義組織；而緬甸穆斯林在這國家裡備受排擠幾乎一無所得，卻一點也不激進，不論是反對緬邦或支持全球聖戰。網路也許會改變這情況，但就目前來說，撇開羅興亞族人不談，緬甸穆斯林在面對無止盡的挑釁，反應出奇的克制。

不過已經有微小的跡象顯示，在緬甸的穆斯林之間正形成一股回應九六九運動的新戰鬥精神。名為傳教團 (Tablighi Jamaat) 的穆斯林團體，該團體一九二〇年代創立於印度，追隨者一直在增加。這是一個非常溫和而且更虔誠的中東派別伊斯蘭，目前在曼德勒一類的城市以穆斯林自衛團的形式組織起來。

我和其中一位較為知名的傳教團活躍分子卡溫奈 (Ka Win Nang) 見面，地點在曼德勒他的五金行前面。卡溫奈纖瘦而誠懇，有著稀疏的一絡絡鬍子，穿著整潔的籠基，卡溫奈跟我強調說，他堅定地認同自己是緬甸人。「伊斯蘭教導我們要愛我們出生的土地，」他說，「所以身為在緬甸出生的穆斯林，我愛緬甸。」但當權者卻不讓他當緬甸人，不管他多想當緬甸人。雖

然在曼德勒出生，他的國籍卡上卻被註明為印度人。卡溫奈說，他曾要求當緬甸人，卻被告知說他是穆斯林，所以不能當緬甸人；他必須選擇當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現在他覺得加入傳教團是「對種族歧視的最好回應」。他們認為，更加虔誠，與其他穆斯林一同祈禱和工作，才是自救之道。

卡溫奈自問，他還能怎麼做？畢竟他的生活正在瓦解。他的五金行租在這店面已經十七年之久，但日前他的佛教徒緬族房東說只能再租他一年。事實上他和房東處得很好，卡溫奈說，房東也很樂意繼續把店面租給他，「但他也受到九六九運動僧侶的威脅恐嚇。」

這是新民主時代的另一個受害者，另一個代罪羔羊。緬甸也許在轉變，往往會變得更好，但它也要付出代價，由卡溫奈這類沒名、守法、勤奮、愛國的人來付出代價。如果和他有相同處境的人就此離開緬甸，這將是另一代人脈廣闊、有雄心抱負也相對富有的生意人和店主從這國家出走，就像一九六四年之後，正值革新的緬甸最需要這些人的時候。

後記

我在仰光舒適的飯店房間內寫這篇後記之際，有數百名緬甸人在孟加拉灣沿海溺水喪生。此刻是二〇一五年五月，過去數個月以來大約有三萬名羅興亞族人乘著單薄小船逃離若開邦西部，希望能在印尼、馬來西亞或泰國靠岸，展開新生活。他們付給人蛇數千美元的船資，卻有無數人撐不過這場磨難，還有更多的人被不友善的政府遣返。

遭遇船難的羅興亞族人登上了全球頭版新聞；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網派員在沿岸實地拍攝報導，有的甚至進到人蛇的骯髒舊船內待上數星期之久。對於這事件，似乎世上人人都說話要說——唯獨緬甸政府除外。

有好長一段時間，緬甸當局對這件事完全保持沉默，政府管制的新聞媒體也有樣學樣，不管是平面或電子媒體。最後，幾星期過去情況愈演愈烈，部會首長再也擋不住國際的大聲疾呼，不得不出面發表聲明。但即便如此，當局也只是譴責人口走私販和人蛇集團，並且宣稱，

人蛇才是罪魁禍首。對於羅興亞族人本身，對於真正把他們逼到海上的極端貧窮、種族歧視和反穆斯林仇恨，政府仍舊隻字未提。反覆以羅興亞族人並非緬甸正式公民，或不屬於官方承認的一百三十五個少數族裔為託辭，政府官員對他們的處境撒手不管，視若無睹。某一天，緊繃情勢達到高峰，印尼和馬來西亞屈服於國際壓力，收容在海上漂流的數千名羅興亞族人當中的一些，緬甸電視新聞的頭條，卻是登盛總統代表奈比多的稻農領取國際獎項。

這整件事對羅興亞族人來說當然很悲慘，但它也令人憂心地想起昔日的普遍情況。不僅新聞媒體封鎖這令人不安的事件，政府也冷酷漠視羅興亞族人的困境，這些都讓人不禁想起二〇〇八年當局對待納吉斯風災災民的種種態度，就如羅興亞族人受到與日俱增的迫害，呼應了軍政府打壓最力期間緬甸境內所有少數族裔的遭遇。同樣的，當今反穆斯林的好戰氣氛，多少是政府本身的內部勢力在煽風點火，也讓人想起早年的宗派暴力衝突。

換句話說，儘管二〇一一年登盛上台以來緬甸確實有進步，但是在許多重要的面向，改變卻有限。當然，現今的行動電話覆蓋率比以前好太多了，也有更多的銀行和更多的餐廳，就連仰光市中心珍貴的古老街道路面也重新鋪過。但這個國家看來仍必須跟糾葛複雜又干戈不息的歷史達成和解；這一幅馬賽克鑲嵌畫似乎還是跟從前一樣破碎。現今有很多期待已久的「發展」，不過究竟是誰得利？譬如說在若開邦，利益幾乎一概歸若開族所有，而羅興亞族人從來分不到一杯羹。結果，發展反而加深了族裔之間的鴻溝，而非彼此的融合。

沒錯，羅興亞族人是極端的例子，但是就像本書先前提過的，理當是官方認定的所有非緬族裔群體，都受到和羅興亞族人同樣的歧視和打壓。就這方面來看，合法與否的細節，其實意義不大。無怪乎政府與克倫族、克欽族和其他族群簽訂停火協議要花那麼長的時間，也難怪真正的政治會談依然遙遙無期。與這些族裔花上那麼長的時間談判，一般緬族人往往覺得匪夷所思，然而這只是因為當代緬邦的侵略，大多發生在緬族占多數的心臟區之外目所不見之處；這侵略真實得很。

種種思量，著實讓人對緬甸的前途很難感到太樂觀。這國家將會舉辦選舉，說不定還是由平等的選舉，最終甚至發展成某種有限的聯邦制架構，實踐創建人翁山將軍最初的承諾。不過就目前的發展軌道來看，這些西式的政治機轉可能只是用來掩飾這國家潛藏的分裂，而非化解分裂。

譬如以聯邦制來說，這概念往往被隨口提及，做為解決國內族裔分裂，把政治權力移轉至譬如說克欽邦或若開邦的方法，以賦與克欽邦和若開邦足夠的權力，讓他們留在緬甸聯邦之內。然而世上沒有一個國家嘗試過純然以族裔為基礎的聯邦體制，儘管印度可能是個例外。況且在緬甸的每個邦裡，族裔群體非常多元，其中有一些還擔憂他們的權利和語文會遭剛被賦權的強勢族裔所踐踏。一旦若開族對自己的邦有更大的掌控權，羅興亞族人的處境可能會更悲慘，這樣的推測應當錯不了。

就長遠來說，一個更困難得多但唯一可行的選項是，緬甸包容自身之內無以倫比的多樣性，因為在當今世界，這樣的兼容並蓄才是它最大的優勢，一如本書一貫的論點。不論二〇一

五年大選以及往後誰主政，緬甸領導人不必煞費苦心，就可以找到對治國內長期貧困和經濟衰敗的解藥——他們只消望向窗外的仰光市中心街頭。從這裡，緬甸可以學著重拾往日的商貿榮景。這裡是全球化率先登場的地方，儘管後來的施為摧毀了把這些商貿者和世界勾串在一起千絲萬縷的綿密網絡，但存留的還是夠多。假使猶太人和孟加拉人、羅興亞族人和緬族人、旁遮普人和克倫族人等等，在新緬甸裡都是平等的公民，它將是出奇富裕又強大的混合體。就如多元社會適時誕生於這些街道，儘管它有缺陷，也不難想像另一個社會從昔日的殘屑中崛起，比從前更出色、強盛而富有。然而這需要緬甸所有領導人帶著無比的政治勇氣，以鍛造一個嶄新國家之名，讓這國家再創歷史高峰。

仰光·二〇一五年五月

誌謝

撰寫這本書所需的研究考察，主要是在二〇一〇至二〇一四年擔任《經濟學人》雜誌東南亞特派員期間進行的。為了報導該地區的時事，我落腳繁榮富裕的島國新加坡，但很快被緬甸吸引。剛接下這份差事之際，緬甸正要舉行新民主紀元的首次普選，只不過那場選舉遭翁山蘇姬的主要反對黨杯葛，我們記者圈也就沒認真地當一回事。然而我在二〇一一年的兩趟緬甸行清楚發現，石破天驚的大事正在那裡發生。因此後續幾年間，我定期往返於緬甸和新加坡之間，一個困在時光裡，另一個是亞洲世紀的先鋒。探索發掘一個似乎在急速開放的國家很令人興奮，特別是在中東的阿拉伯之春正急速邁入凜冬的背景下。

這本書是根據我多次緬甸行所訪談的人物和蒐集的資料寫成的，有幾次我還去到這國家最偏遠的地區。在緬甸各處行走的莫大樂趣，來自在這多元得出奇的國家裡遇見的緬族人、克倫族人、克欽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書中很多內容引述具名人士的談話，這是我遇上的時機點的

一大優勢，當時很多人破天荒頭一次能夠暢所欲言，談論他們在軍政府統治下的生活；當老大哥終於開始稍稍鬆手，這些男男女女無不慷慨騰出時間，而且無比好客。

其他一些我交談過，但不見得在內文裡具名的人包括：Alan Saw U，Ariyawuntha Bhiwunsa，Aung Kyaw Zan，Aung Naing Oo，Cheery Zahau，Devi Thant Cin，Jason Eligh，Glenn Kyaw Nyunt，Han Sein，Hkalam Samson，Hkaupha Sadan，Hkun Hrun Oo，Hla Maung Shwe，Ho Wa Zan Gan，Richard Horsey，Hpunggan Hkun Nawng，Hay Oo，Ifekar Ahmed Chowdury，Ja Seng Hkawn Maran，Khin Lay，Khin Moe Samn，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Derek Mitchell，Myint Thein，Myo Win，Nang Voe Phart，Naw Rebecca Htin，Nay Win Maung，Nbyen Dan Hkung Awng，Ngun Cung Lian，Nyantha Maw Lin，Pe Myint，Léon de Riedmatten，Moses Samuels，Sammy Samuels，Set Aung，Shwe Maung，Edmund Sim，Soe Win，Tony Stern，Tan Khee Giap，Tejohasa，Thant Myint-U，Tin Oo，Mathew Walton，Wang Dong，Win Hein，Win Kyaw Oo，Yet Htur，Zang Xiaomin，Zha Daojing。

在寫書的過程裡，我也很幸運地受惠於幾位緬甸專家和亞洲專家的真知灼見，從固定與他們的討論中，我獲益良多。因此我特別要感謝 Romain Caillaud，Farah Cheah，Joseph Fisher，Hla Hla Win，Tom Kramer，Simon Long，Michael Montesano，Nay Chi Win，Robert Pé，Mael Raynaud，Ben Rogers，Kantan Shankar，Irene Slegt，Soe Thein，Ashley South 和 Hans Vriens。文中若有任何錯誤和判斷失準，不消說責任在我。

我也要對一位老朋友致上謝意，他碰巧也是我外派到東南亞期間的倫敦編輯。當我在通訊設備停留在中古世紀的國家一連消失好幾天，他似乎從不恐慌，至少我再次出現時他總顯得由衷開心。他堪稱是模範編輯。

我也要感謝耶魯大學出版社的團隊，他們以無比的專業為這本書把關，就像他們上次做的一樣。感謝 Phoebe Clapham 決定出這本書，Heather McCallum 接手製作並且從頭到尾關照每個細節，Tami Halliday 也是盡心盡力的好編輯。至少有家出版社仍非常在意出書的品質，實在令人欣慰。

最後，這本書的完成，內人 Harriet Paterson 功不可沒。走訪緬甸各地的行程，很多次我們是一起去的，同行的還有我們的兒子，她幫忙我在仰光進行人物採訪。她是個專業的文字編輯，文稿最後也是由她一手修潤。這本書是我們共同的心血，她的參與讓這本書更加完善。

漢默史密斯 (Hammersmith)，倫敦，二〇一五年

註釋

第一章 血、夢想和黃金之城

1. Kwasi Kwarteng, *Ghosts of Empire: Britain's Leg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 Bloomsbury, 2011, p. 149. For a full account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Burmese court and British occupation, see Thant Myint-U, *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s 7-8.
2. For further details of these buildings, see the Association of Myanmar Architects, *30 Heritage Buildings of Yangon: Inside the City that Captured Time*,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13. I have drawn from this work for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3. Wai Wai Myaing, *A Journey in Time: Family Memoirs, Burma 1914-1948*, Universe Inc., 2005, p. 8.
4. Ruth Fredman Cernea, *Almost Englishmen: Baghdad Jews in British Burma*, Lexington Books, 2009, p. 10.
5. See the draft paper by Noriyuki Osada, "Housing the Rangoon poor: Indians, Burmese and town planning in colonial Burma", for a fuller description of the Indians in Rangoon. This paper was read at the "Sites of Modernity" workshop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14.
6. Wai Wai Myaing, *A Journey in Time*, p. 6.
7.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Britain's Asian Empire and the War with Japan*, Penguin, 2005, p. 92.
8. Norman Lewis,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Eland, 2003.

6. See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pp. 171-172.
7. John Latimer, *Burma: The Forgotten War*, John Murray, 2004, pp. 4-5, for his complete list of the nationalities of the Forgotten Army.
8. Latimer, *Burma*, p. 433.
9. Michael Aung-Thwin and Mairii Aung-Thwin, *A History of Myanmar since Ancient Times*, Reaktion Books, 2013, p. 251.
10.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p. 81, and Taylor, "Refighting old battles", p. 4.
11. See Berlie, *The Burmanization of Myanmar's Muslims*, p. 41.

第三章 緬族化運動

1. David Steinberg, *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
2.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p. 80.
3. Benedict Rogers, *Than Shwe: Unmasking Burma's Tyrant*, Silksworm Books, 2010, p. 48.
4.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work of the French scholar Bénédicte Brac de la Perrière, "Nats: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of Religion in Burmese Studies", *Asian Ethnology*, Vol. 68, No. 2, 2009, p. 201.
5. Dulyapak Preecharushh, *Naypyidaw: The New Capital of Burma*, White Lotus Press, 2009, p. 89.
6. Aung San Suu Kyi, *Freedom from Fear*, Penguin, 1991, pp. 103-104.
7. Matthew Walton, "The 'wages of Burman-ness': Ethnicity and Burman privilege in contemporary Myanm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2, p. 8.
8. Aung-Thwin and Aung-Thwin, *A History of Myanmar*, p. 25.
9. See www.pcn.org.uk/burma%200907.pdf for an exhaustive list of the name changes. Last accessed 30 June 2015.
10.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David Dapice, Anthony Saich and Thomas Vallely, *Appraising*

9. Felicity Goodall, *Exodus Burma: The British Escape Through the Jungles of Death 1942*, Spellmount, 2011, p. 38.
10.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Silksworm Books, 2003, p. 42.
11. Wai Wai Myaing, *A Journey in Time*, p. 176.
12.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p. 89.
13. Quote from a later edition of J. S. 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304.
14.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Wars: The End of Britain's Asian Empire*, Penguin, 2008, p. 378.
15. Sean Turnell, *Fiery Dragons: Banks, Moneylenders and Microfinance in Burma*, NIAS Press, 2009, p. 37.
16. Quoted in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p. 67.
17. J. A. Berlie, *The Burmanization of Myanmar's Muslims*, White Lotus Press, 2008, p. 61.
18. Thant Myint-U, *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pp. 89-90.

第二章 將軍的復仇

1. See Robert Taylor, "Refighting old battles, compounding misconceptions: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Myanmar today", *ISEAS Perspective*, March 2015, p. 5,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2. See 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A. Shepsle, *Politics in the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Longman, 2009, for a more theoretical account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e plural society.
3. Donald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since 1940*, NIAS Press, 2007, p. 1.
4.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p. 29.
5. Goodall, *Exodus Burma*, p. 41.

- in *Myanmar*, ed. Nick Cheesman, Nicholas Farrelly and Trevor Wilson, ISEAS, 2014.
2. Mandy Sadan, *Being and Becoming Kachin: Histories beyond the State in the Borderlands of Burma*, The British Academy, 2013, p. 98.
 3. Sadan, *Being and Becoming Kachin*, p. 214.
 4.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p. 69.
 5. Sadan, *Being and Becoming Kachin*, p. 382.

第五章 毒品浩劫

1. Harry Ignatius Marshall, *The Karen People of Burma: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White Lotus Press, 1997, p. 304.
2.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p. 51.
3. Marshall, *Karen People of Burma*, p. 309.
4. See Smith, *Burma*, p. 63 and Seekins, *Burma and Japan*, p. 45.
5.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p. 72.
6. Se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report, Ashley South, *Burma's Longest War: Anatomy of the Karen Conflict*, 2014, for a recent analysis of the Karen war.
7. For some reports on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ditions of the Karen, see Burma Medical Association report, Back Pack Health Worker Team and others, *Diagnosis Critic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in Eastern Burma*, 2010, or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 *Protracted Displacement and Chronic Poverty in Eastern Burma/Myanmar*, 2010.
8. Inge Sargent, *Twilight over Burma: My Life as a Shan Princes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49.
9.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Southeast Asia Opium Survey, Lao PDR, Myanmar*, 2013.
10. See the Report by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Bouncing Back: Relaps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2014, p. 32.

- the Post-Sanctions Prospects for Myanmar's Economy: Choosing the Right Path*, January 2012, p. 20.
11. Ian Holliday, *Burma Redux: Global Justice and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Myanm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7.
 12. Berlie, *The Burmanization of Myanmar's Muslims*, p. 61.
 13. See Martin Smith,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Zed Books, 1999, p. 92.
 14. See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n the army and reform, *Myanmar's Military: Back to Barracks?*, 2014.
 15. Smith, *Burma*, p. 260.
 16. <http://www.dvb.no/uncategorized/army-using-civilians-as-minesweepers/2150>.
 17. This account and several others can be found in the report by the Human Rights Action Group (Northern Myanmar), *Dignity Uprooted: Denied Human Rights in the Armed Conflict in Kachin State and Northern Shan State*, 2012.
 18. Desmond Ball, *Burma's Military Secrets: 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 from 1941 to Cyber Warfare*, White Lotus Press, 1998, p. 61,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19. Mary Callahan, *Making Enemies: War and State Building in Burm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3.
 20. See Renaud Egretreau, "The Burmese jade trail", in *Myanmar's Transition*, ed. Nick Cheesman, Monique Skidmore and Trevor Wilson, ISEAS, 2012, p. 95.
 21. Turnell, *Fiery Dragons*, p. 266.
 22. See Global Witness, *A Disharmonious Trade: China and the Continued Destruction of Burma's Northern Frontier Forests*, April 2009.

第四章 壓迫與反抗

1. Anders Engvall and Soe Nandar Linn, "Myanmar economic update: Macroeconomy, fisc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in *Debating Democratization*

第九章 一場全新的地緣政治大競局

1. See Egreteau, "The Burmese jade trail", p. 105.
2. China in Burma: The increasing investment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Burma's hydropower, oil and natural gas, and mining sector, 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008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5/China_in_Burma-ERI.pdf).
3.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eport, *China's Myanmar Dilemma*, Asia Report No. 177, September 2009, p. 11.
4. See Holliday, *Burma Redux*, p. 111, for this and a good discussion of Burma's external re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5. Congressional Hearing report, *US Policy Toward Burma: Its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30 September 2009, p. 6.

第十章 緬甸的未來與多元社會的幽靈

1. See Human Rights Watch, *All You Can Do Is Pray*, April 2013, for a fuller account of the anti-Muslim violence in 2012. See also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Rakhine State*, Asia Report No. 261, October 2014.
2. See Richard Horsey, "New religious legislation in Myanmar", SSRC paper, February 2015,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recent proposed legislation.

第六章 一窮二白

1. Nick Cheesman, Monique Skidmore and Trevor Wilson, eds, *Myanmar's Transition: Openings,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ISEAS, 2012, p. 151.
2. For a full appraisal of the hapless state of Burma's economy, se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yanmar in Transi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ugust 2012.
3. Ash Center, *Appraising Myanmar's Economy*, 2012, p. 5.
4. Ash Center, *Appraising Myanmar's Economy*, p. 21.
5. Emma Larkin, *Everything is Broken*, Granta, 2010, p. 78.
6. Quoted by Turnell, *Fiery Dragons*, p. 239.

第七章 本夫人不轉

1. Quotes from Peter Popham, *The Lady and the Peacock*, Rider, 2011, Ch. 2.
2. Popham, *The Lady and the Peacock*, p. 369.

第八章 來自上層的改變

1. Turnell, *Fiery Dragons*, p. 259.
2. Cheesman, Skidmore and Wilson, *Myanmar's Transition*, p. 46.
3. See the interesting paper on the make-up of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Renaud Egreteau, "A closer look a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MPs in Myanmar's first post-SPDC national legislature", Center for Myanmar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yanmar in 2014: Re-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uly 2014. The author shows that in fact few of the USDP MPs have specifically military backgrounds.

參考書目

下列的清單是我在撰寫這本書時覺得最受用的書籍、文章、報告和網頁。關於緬甸的文章非常多，有些還相當晦澀難讀，因此這裡提供的絕非是全面的考察。適用的話，我會建議書中／文中的哪部分和當代緬甸研究或該國近代史的某特定面向最為相關。我特別挑選出有關羅興亞族人和若開邦政治寫得最出色的最新文章，而這個主題先前一直被忽略。每一部分的清單都是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順序排列。書的出版日期，尤其是比較舊的書籍，都是我參考的版本，而非初版本。

書籍

- Association of Myanmar Architects, *30 Heritage Buildings of Yangon: Inside the City that Captured Time*,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13
- Aung San Suu Kyi, *Freedom from Fear*, Penguin, 1991
- Aung-Thwin, Michael, and Maitrii Aung-Thwin, *A History of Myanmar since Ancient Times*, Reaktion Books, 2013
- Ball, Desmond, *Burma's Military Secrets: 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 from 1941 to Cyber Warfare*, White Lotus Press, 1998
- Bayly, Christopher,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Britain's Asian Empire and the War with Japan*, Penguin, 2005

- Marshall, Harry Ignatius, *The Karen People of Burma: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White Lotus Press, 1997
- Maung Maung, *Aung San of Burma*, Unity Publishing House, 2011
- Orwell, George, *Burmese Days*, Penguin, 1982
- Pascal Khoo Thwe, *From the Land of Green Ghosts: A Burmese Odyssey*, Harper Collins, 2003
- Popham, Peter, *The Lady and the Peacock*, Rider, 2011
- Rabushka, Alvin, and Kenneth A. Shepsle, *Politics in the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Longman, 2009 (The classic theoretical account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e plural society in Asia, Africa and elsewhere.)
- Rogers, Benedict, *Than Shwe: Unmasking Burma's Tyrant*, Silkworm Books, 2010
- , *Burma: A Nation at the Crossroads*, Rider Books, 2012
- Sadan, Mandy, *Being and Becoming Kachin: Histories Beyond the State in the Borderlands of Burma*, The British Academy, 2013
- Sargent, Inge, *Twilight over Burma: My Life as a Shan Princes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 Seekins, Donald, *Burma and Japan since 1940*, NIAS Press, 2007
- Smith, Martin,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Zed Books, 1999
- Steinberg, David, *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Taylor, Robert, *The State in Myanmar*, 2009
- Thant Myint-U, *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A Personal History of Burma*, Faber & Faber, 2008
- ,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Faber & Faber, 2012
- Turnell, Sean, *Fiery Dragons: Banks, Moneylenders and Microfinance in Burma*, NIAS Press, 2009
- Wai Wai Myaing, *A Journey in Time: Family Memoirs, Burma, 1914-1948*, Universe Inc., 2005

- , *Forgotten Wars: The End of Britain's Asian Empire*, Penguin, 2008
- Berlie, J. A., *The Burmanisation of Myanmar's Muslims*, White Lotus Press, 2008
- Callahan, Mary, *Making Enemies: War and State Building in Burm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Political Authority in Burma's Ethnic Minority States*, ISEAS, 2007
- Cernea, Ruth Fredman, *Almost Englishmen: Baghdad Jews in British Burma*, Lexington Books, 2009
- Cheesman, Nick, and Monique Skidmore, and Trevor Wilson, *Myanmar's Transition: Openings,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ISEAS, 2012
- Dulyapak Preecharushh, *Naypyidaw: The New Capital of Burma*, White Lotus Press, 2009
- Furnivall, J. S.,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
- Ghosh, Amitav, *The Glass Palace*, Random House, 2002
- Goodall, Felicity, *Exodus Burma: The British Escape Through the Jungles of Death 1942*, Spellmount, 2011
- Holliday, Ian, *Burma Redux: Global Justice and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Myanm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Kwasi Kwarteng, *Ghosts of Empire: Britain's Leg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 Bloomsbury, 2011 (See especially part 3 on Burma, an excellent recent account of how and why the British got involved in the country.)
- Larkin, Emma, *Everything is Broken*, Granta, 2010
- ,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Penguin, 2004
- Latimer, John, *Burma: The Forgotten War*, John Murray, 2004
- Lewis, Norman,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Eland, 2003
- Lintner, Bertil,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Silkworm Books, 2003
- , *Aung San Suu Kyi and 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Silkworm Books, 2011
- McLynn, Frank,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to Triumph*, Vintage Books, 2011

-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in 2014.
- Raynaud, Mael, "Burma's civil society between Nargis and the 2010 elections", June 2009 (Private paper sent to author)
- , "Nay Win Maung, Une autre histoire birmane", January 2012 (Private paper sent to author)
- Taylor, Robert, "Refighting old battles, compounding misconceptions: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Myanmar today", ISEAS Perspective, March 2015, p. 5,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f this subject.
- , "The armed forces in Myanmar politics: A terminating role?", ISEAS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2015
- Walton, Matthew, "The 'wages of Burman-ness': Ethnicity and Burman privilege in contemporary Myanm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2, pp. 1-27. (A very good analysis of Burmanisation.)
- Weiss, Meredith, "Electoral patter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limits to engineering", ISEAS Working Paper #3, 2014

報告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yanmar in Transi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ugust 2012 Back Pack Health Worker Team, Burma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others), *Diagnosis Critic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in Eastern Burma*, 2010 (American) Congressional Hearing report, *US Policy Toward Burma: Its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30 September 2009
- Global Witness, *A Disharmonious Trade: China and the Continued Destruction of Burma's Northern Frontier Forests*, April 2009
-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David Dapice, Thomas Vallely and Ben Wilkinson, *Assessment of the Myanmar Agricultural Economy*, February 2009
-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David Dapice, Anthony Saich and Thomas Vallely, *Appraising the*

文章

- Brac de la Perrière, Bénédicte, "Nats: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of religion in Burmese studies", *Asian Ethnology*, Vol. 68, No. 2, 2009. (A good academic study of how nat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mainstream Burmese religion and politics.)
- Callahan, Mary, "Democracy in Burma: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Vol. 9, No. 3, 1998
- Egreteau, Renaud, "The Burmese jade trail", in *Myanmar's Transition*, ed. by Nick Cheesman, Monique Skidmore and Trevor Wilson, ISEAS, 2012
- , "A closer look a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MPs in Myanmar's first post-SPDC national legislature", *Center for Myanmar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yanmar in 2014: Re-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uly 2014. (An interesting and original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of MPs who took their seats in the 2011 parliament, showing that in fact few of the USDP MPs have specifically military backgrounds.)
- Engvall, Anders, and Soe Nandar Linn, "Myanmar economic update: Macroeconomy, fisc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in *Debating Democratization in Myanmar*, ed. Nick Cheesman, Nicholas Farrelly and Trevor Wilson, ISEAS, 2014
- Goh, Daniel P. S., "From colonial pluralism to postcolonial multiculturalism: race,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Sociology Compass* 2/1, 2008, pp. 232-252
- Horsey, Richard, "New religious legislation in Myanmar", SSRC paper, February 2015. (A good discussion of the recent proposed legislation attempting to regulate inter-religious marriage etc.)
- Noriyuki Osada, draft paper on "Housing the Rangoon poor: Indians, Burmese and town planning in colonial Burma", for a fuller description of the South Asians in Rangoon. This paper was read at the "Sites of Modernity" workshop

<http://www.dvb.no/uncategorized/army-using-civilians-as-minesweepers/2150>。
「新曼德勒」(New Mandala)網站經常刊出有關緬甸局勢的精闢討論。譬如說，有關緬甸最近的政治衝突的評論，請參見以下網頁<http://asiapacific.anu.edu.au/newmandala/2015/03/17/dissent-and-repression-persist-in-myanmar>

- Post-Sanctions Prospects for Myanmar's Economy: Choosing the Right Path*, January 2012
- Human Rights Action Group (Northern Myanmar), *Dignity Uprooted: Denied Human Rights in the Armed Conflict in Kachin State and Northern Shan State*, 2012
- Human Rights Watch, *All You Can Do Is Pray*, April 2013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yanmar's Military: Back to Barracks?*, Asia Briefing No. 143, April 2014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Rakhine State*, Asia Report No. 261, October 2014. (The latest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Rakhine State and how this has affected politics in the country more generally.)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Dark Side of Transition: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Myanmar*, Asia Report No. 251, October 2013. (Particularly good on the anti-Muslim violence in Rakhine State and more generally around the country.)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Myanmar Dilemma*, Asia Report No. 177, September 2009 Proximity Designs, Myanmar Past & Present, 2014
-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 *Protracted Displacement and Chronic Poverty in Eastern Burma/Myanmar*, 2010.
-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Kramer, Tom and others, *Bouncing Back: Relaps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2014 (A very good update on the drugs situation in east Burma.)
-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South, Ashley, *Burma's Longest War: Anatomy of the Karen Conflict*, 2014 (for a recent analysis of the Karen war).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Southeast Asia Opium Survey, Lao PDR, Myanmar*, 2013

網站

有關緬甸軍隊把平民百姓當人肉掃雷裝置和其他這類虐待的描述，請參見

【Eureka】ME2078

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

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

作者❖理查·考科特 (Richard Cockett)

譯者❖廖婉如

封面設計❖陳文德

排版❖張彩梅

校對❖魏秋綱

總編輯❖郭寶秀

責任編輯❖邱建智

行銷業務❖力宏勳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馬可字羅文化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02-25007696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 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 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2:00；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458372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e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services@cite.com.my

輸出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6年9月

定價❖400元

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 by Richard Cockett

Copyright © 2015 Richard Cocket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Marco Polo Pres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86-93358-2-9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
理查·考科特 (Richard Cockett) 著；廖婉如譯。--
初版。-- 臺北市：馬可字羅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2016.09

面：公分--(Eureka：ME2078)

譯自：Blood, Dreams and gold: the changing face of Burma

ISBN 978-986-93358-2-9 (平裝)

1. 緬甸史

738.11

105013619

這是我所讀過關於緬甸的介紹與概述書中，最好的一本。

——《南海》作者比爾·海頓

一本書帶你剖析緬甸的過去與未來

作者理查·考科特曾任《經濟學人》東南亞通訊員。不同於坊間描寫緬甸的書，多著眼於緬甸的政治、歷史、民族和文化，且受限於一定的時間框架內，《變臉的緬甸》試圖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將訪談放入歷史與政治的脈絡中，全景式地述說緬甸的過去與未來。

關於緬甸，你我所不知道的事

如果緬甸沒了翁山蘇姬，我們還知道些什麼？這個曾經光榮璀璨的南亞強國，在經歷殖民統治、軍政府獨裁、民主改革後，將再度站上世界的舞台。但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的背後，卻有著根深柢固的族群問題即將爆發。

民主大選後，美好的時代就會來臨？

結束軍政府專政，似乎象徵著民主的勝利。然而，緬甸要轉型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仍有一段漫漫長路。早年殖民者為便於統治而施行的族群分治、數十年來緬族化運動激起的族群矛盾，依舊牽動著緬甸未來的發展。

閱讀緬甸，反思台灣

先看看經歷過外來殖民、威權統治，如今面臨民主轉型的緬甸，再想想我們台灣，是否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就讓我們好好閱讀緬甸，反思過去、展望未來。

ISBN 978-986-93358-2-9

00400



9 789869 335829

城邦
CITYLINK

馬可孛羅